

爾吉邱
錄憶回戰大次二第

冊上編一第

行發館書印務商

邱吉爾第二次大戰回憶錄

商務印書館發行

敘言

我曾在世界的危機、東戰線和歐戰後篇三書中記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故事。我必須認爲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各編，卽爲承前之作。如果本書全部完成，與以上各書合起來，將成爲又一次三十年戰爭的詳細紀錄。也同在前面各書中一樣，我盡力之所能，採取狄福一個騎士的回憶錄的撰述方法。在那本書中，作者以某一人的人個人經驗爲線索，藉以紀述和討論重大的軍事和政治事件。居於政府的高位，身經自有紀錄歷史以來兩次最大的劫難，我也許是唯一的一人。不過在第一次大戰中，我雖擔任負責的，但畢竟是從屬的職位，而在第二次對德戰爭中，有五年多我是英國政府的首長，因此我是以不同的立場，和非以前各書所能有的更大的權威來寫本書各編的。

我的全部公務工作，幾乎都是由我口授秘書辦理的。在我任首相時期內，我發布的備忘錄、訓令、私人電報加上筆錄，總數幾達一百萬字。這些在緊張事勢下、根據當時所有資料而作成的文件，無疑顯有許多缺點。但如果把他們綜彙起來，要足以表示出由一個負英聯邦共和國及英帝國作戰和政策主要責任的人眼中所看到的，關於重要事項的通行記載。我懷疑現在有、或過去曾有過這種記載作戰和政府日常行爲的同樣紀錄。我並不把它稱爲歷史，因爲歷史是屬於後代人的。但我相信可以說是對可供後人利用的歷史的一種貢獻。

這三十年來的行動和主張，包括和表現了我畢生的努力，我甘願別人根據它們而對我評斷。我信守我的原則，卽對於任何戰爭的或政策的措置，除非事前我曾公開或正式發表過意見、或提出過警告者，我決不作事後的批評。實際上事後的返顧，我已經融化了當時爭論中的許多嚴峻之詞。在我下筆記述和那麼多我所敬愛的人發生爭執之時，使我感到痛苦，但如果不把過去的教訓提出於將來之前，那就成爲不對了。在本書內，記下了那些誠實而用心甚善的人的行爲，大家在譏笑他們之時，不可不同時探索自己的內心，檢討自己履行公職的情

形，和應用過去的教訓，作他自己未來行爲的鏡鑒。

大家必須認明，我並不希望人人都同意我所說的一切，更加不是專挑那些可以受人歡迎的東西寫下來。我是按我所遵守的見地，提出證據。關於這些事實的考訂，已盡一切可能的審慎，但由於俘獲敵方文件的發現，或其他的揭露，不斷有新的事實出現，對我所下的結論可能提出新的方面。證據確實之當代紀錄，以及在一切尙晦昧不明時所提出的意見表示，其所以重要，也由於此。

有一天羅斯福總統告訴我，他正在向公眾徵求意見，對這次戰爭應該作何名稱。我立即說：『原可不必的戰爭』。從沒有過一次戰爭，比剛把上次大戰劫餘一切破壞盡了的這次戰爭更容易制止的。在幾千萬人作了最大努力和犧牲、和正義的目標勝利之後，而我們至今仍沒有得到和平與安全，我們仍處在比我們所已克服了的更爲惡劣的威脅之中，可說人類的悲劇已到了登峯造極的絕詣。我竭誠希望，對往事深思熟考，可以做我們將來的引導，和使後起的一代，可以葺補過去各年中所犯的若干錯誤，和因此按照了人類的需要與光榮，控制未來展開的嚴肅局面。

溫斯敦·斯賓塞·邱吉爾

却特威爾邸、威斯特罕姆縣·肯特郡

一九四八年三月

本書的教訓

在戰爭中：堅決

在失敗中：不屈

在勝利中：大度

在和平中：善意

本編的主題

英語民族如何由於他們的愚昧、疏忽和好心腸，聽任惡人重行武裝。

總目

第一編 山雨欲來風滿樓

上册

第一卷 從第一次大戰到第二次大戰（一九一九至三九年）

- 第一章 勝利者的愚昧（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
- 第二章 和平鼎盛的時代（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二年）
- 第三章 潛伏中的危機
- 第四章 希特勒
- 第五章 蝗蟲的年代（一九三一年至三五年）
- 第六章 黑暗的景色（一九三四年）
- 第七章 空中的均勢失去了（一九三四年至三五年）
- 第八章 挑戰和反響（一九三五年）
- 第九章 空中和海上的問題（一九三五至三九年）
- 第十章 制裁意大利（一九三五年）
- 第十一章 希特勒進擊

第十二章 箭在弦上——西班牙

第十三章 德國武裝了（一九三六年至三八年）

第十四章 外交大臣艾登和他的辭職

第十五章 一九三八年二月兼併奧國

第十六章 捷克

第十七章 慕尼黑悲劇

第十八章 慕尼黑之冬

第十九章 普拉格、阿爾巴尼亞和對波保證，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四月

第二十章 蘇維埃之謎

第二十一章 到了戰爭邊緣

附錄

下冊

第二卷 晦暗的戰爭（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至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

第一章 戰爭

第二章 海軍部的任務

第三章 波蘭的破滅

第四章 戰時內閣的問題

- 第五章 法國前線
- 第六章 戰鬪加劇
- 第七章 磁性水雷
- 第八章 普雷特河口外的海戰
- 第九章 斯坎底那維亞，芬蘭
- 第十章 一個黑暗的新年
- 第十一章 風暴之前
- 第十二章 海上的爭鬪
- 第十三章 那維克
- 第十四章 特朗海姆
- 第十五章 挪威的挫折
- 第十六章 挪威最後的階段
- 第十七章 政府倒了

附錄

第一編上冊分目

敘言

本書的教訓

本編的主題

第一卷 從第一次大戰到第二次大戰（一九一九至三九年）

第一章 勝利者的愚昧（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

第二章 和平鼎盛的時代（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一年）

第三章 潛伏中的危機

第四章 希特勒

第五章 蝗蟲的年代（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

第六章 黑暗的景色（一九三四年）

第七章 空中的均勢失去了（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

第八章 挑戰和反響（一九三五）

第九章 空中和海上的問題（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九年）

第十章 制裁意大利（一九三五）

第十一章 希特勒進擊（一九三六年）

第十二章	箭在弦上——西班牙（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	一五三
第十三章	德國武裝了（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	一六五
第十四章	外交大臣艾登和他的辭職	一七五
第十五章	兼併奧國（一九三八年二月）	一八九
第十六章	捷克斯拉夫	二〇五
第十七章	慕尼黑悲劇	二一九
第十八章	慕尼黑之冬	二三七
第十九章	普拉格，阿爾巴尼亞及對波保證（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四月）	二五一
第二十章	蘇維埃之謎	二六五
第二十一章	到了戰爭邊緣	二七九
附錄		二九五

漢英對照表

邱吉爾第二次大戰回憶錄

第一卷 從第一次大戰到第二次大戰（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九年）

第一章 勝利者的愚昧（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

以戰止戰——血流乾了的法國——萊因河國界——凡爾賽和約的經濟條款——關於賠款的無知——聖日緬因奧特利安農和約破壞了奧匈帝國——拿破崙共和國——美國否決英美對法的保證——克勒孟梭的下野——樸恩克賽進占魯爾——馬克的崩潰——美國的孤立——英日同盟的終止——英美裁減海軍——第二次大屠殺的如何易於避免——和平的一個確實基礎——勝利者忘了——戰敗者牢記於心——第二次大戰道德蕩然——原因爲未能使德國保持裁減軍備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大家深信不疑，並且幾乎普遍的希望，世界即可重享昇平。所有人民的這種衷心熱望，如果大家堅守正義的信念，和根據合理的常識和懲前毖後的警戒之心，原本很容易加強實現的。『以戰止戰』的口號，掛在每個人的口頭，並曾採取措置，使之成爲事實。當時被認持有美國大權的威爾遜總統，曾使大家心理嚮往於國際聯盟的概念，凡爾賽和會中的英國代表團，就把總統的概念塑造具體化，造成了一種將永遠成爲人類艱苦前進途中紀程碑的制度。勝利的協約國，此時至少就其對付他們的外敵而言，居於絕對的優勢。他們固然須應付國內的嚴重糾紛以及許多他們不知道如何回答的難題，但變亂禍首的位於中歐大陸的條頓國家，已經匍伏在他們的面前；因德國的鞭笞，弄得創深痛鉅的俄國，此時正陷於內戰的騷亂之中，逐漸落入布爾塞維克（共產黨）的掌握。

一九一九年的夏季，協約國大軍沿萊茵河而陣，他們的橋頭堡墨銳進深入至戰敗、軍備解除和飢餓的德國境內。勝利各國的領袖，在巴黎討論和爭辯未來的措置。歐洲的地圖放在他們的前面，他們幾乎可以隨心所欲的重新改繪。經過艱難困苦和風雨飄搖的五十二個月以後，條頓聯盟（指德、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和土耳其——譯者）終於屈膝聽候發落，聯盟四員中沒有一國能對協約國的意思作些微的抵抗。罪魁禍首的德國，被大家認為是造成世界這場大災禍的元兇，現在完全聽命受征服者的支配。征服者自身過去含辛茹苦，現在正在復元途中。並且這一次的戰爭，不是政府之間的而是人民之間的戰爭。各大國的整個生命精力，都傾注於憤怒與殺戮之中。在巴黎集會的戰爭領袖，在那裏感受到人類史上空前強大的情感潮流的影響。烏特里特和約（結東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的和約——譯者）和維也納和約（結束拿破崙戰爭的和約——譯者）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在那個時候，貴族出身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無論勝利者和戰敗者，在折衝壇坫之時，都是彬彬有禮，而且不受民主那一套擾攘爭論的拘束，儘可根據於他們所共同承認的基礎，奠立改造政治的制度。現在的情形可不同了。各國的民衆於飽經痛苦之餘，並且受了曾經使他們歡欣鼓舞過的羣衆宣傳，至此便億萬人一條心的要求必須澈底實行報復。站在目亂心迷的勝利巔峯的政治家，如果他們在會議席上，放棄了戰士們在沙場浴血百戰得來的東西，那真罪該不赦了。

法國憑了他的努力和犧牲而來的權利，居於領袖的地位。爲了保衛法國的疆土，在國內奮起與侵略者誓死搏鬥，法國人死傷人數幾達一百五十萬人。巴黎的聖母寺的鐘樓，曾在一百年以內五次（一八一四、一八一五、一八七〇、一九一四和一九一八年）目擊普魯士的閃爍砲火，聽到隆隆砲聲。法國有十三省受普魯士嚴酷的軍事統治，至此時已達四個可怕的年頭。大片的地域，曾受敵人有系統的破壞，或因兩軍激戰而淪爲一片焦土。北起凡爾登，南至土命，每一村落每一家無不都有國殤或傷殘的人。曾經參加一八七〇年戰爭和受過戰爭之苦的法國人，其中有許多人現在已經成爲顯要，在他們看來，法國之能在這一次剛結束的更爲慘烈的戰爭中，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幾乎是一個奇跡。他們一生中對德意志帝國抱喘恐的心理。他們記得俾斯麥一八

七五年所擬進行的預防戰爭；他們記得一九〇五年驅使德爾凱舍去職的無情威脅；一九〇六年摩洛哥事件，一九〇八年的波斯尼亞糾紛，和一九一一年的阿加地亞危機，都曾使他們震慄不安。德皇的『裝甲拳頭』和『鮮明武裝』的演說，在英美人聽來也許會引為笑柄，但在法國人心理，卻是貨真價實的凶惡的朕兆。五十年來他們幾乎生活於德國武裝的恐怖之下。現在以鮮血為代價，一朝解除了這長期的壓迫，和平與安全終於實現了。法國人民熱情憤激，衆口一詞的要求：『不許再有第二次！』

但前途充滿了不吉之兆。法國的人口數僅及德國人口的三分之二；法國的人口在靜止中，而德國的人口在繼續增長。在十年或不到十年之內，每年大量的抵達軍役年齡的德國壯丁人數，一定會比法國的多出一倍。德國曾經幾乎以一國而與差不多整個世界作戰，而且它差一點幾乎成功。熟知內幕的人，最清楚曉得有幾次大戰的勝負誰屬，繫於千鈞一髮之間，以及那些轉移大局的意外和僥倖。將來能否希望偉大的協約國再度派遣幾百萬大軍到法國戰場或東線來呢？俄國正在瓦解和動亂之中，變化得和過去迥然不同。意大利頗有參加敵方的可能。英國和美國同歐洲隔有重洋大海。團結英帝國各部分的聯繫，是祇有帝國公民而非局外人所能瞭解的。究竟在什麼事態聯合之下，纔能使參加微米山戰役的強大加拿大軍，參加維勒·白里汝諾之戰的光榮的澳洲軍，參加巴斯春特勒危地作戰的無畏的新西蘭軍，和曾於一九一四年危急的冬季苦守阿蒙提亞爾陣線的堅毅的印度軍團，再度開到法國和法蘭特斯來呢？和平、放任和反軍國主義的英國，它的兩三百萬大軍什麼時候會再踏上亞多亞和畢伽底原野呢？什麼時候美國兩百萬優秀分子會再度遠涉重洋，開到香賓和阿爾良？創痍遍體，人口減去十分之二的法國，但在當時是無疑居於主宰的地位，在瞻望將來之時，正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那麼在什麼地方有安全呢？如果沒有安全，則過去一切所得，似乎都將成爲無足輕重，而且生命的本身，即使在勝利的歡呼聲中，也將幾乎無法忍受了。

休戰日，德國大軍秩序井然開回本國。協約國總司令福煦元帥面上顯出光榮的采色，以軍人氣概宣布：

「他們打得不錯，就讓他們保持他們的武器吧。」但他要求今後法國應以萊茵河為界。德國的軍備可能加以解除；它的軍事制度可能搗成粉碎；它的要塞可能拆毀；它可能變成赤貧；它可能負擔無法計算的賠款重擔；它可能成爲內部鬪牆的犧牲者；但所有這些，十年二十年後都將成爲過去。『全體日耳曼部落』的無法摧毀的實力即將捲土再來，武士的普魯士即將重新點燃起它難加熄滅的火焰。但是寬深流急的萊茵河，一旦爲法國陸軍所有和加以設防以後，即可以成爲防衛法國的天塹，使後方的法國人可以世代過和平的日子。法國如沒有英語世界的支持，在戰爭中一定難免失敗，但關於處置戰敗德國的領土問題，英語世界的觀感見解和法國大不相同。結果凡爾賽和約中關於土地的條文，實際上使德國的國土沒有變動。它仍是歐洲最大的種族純一的集團。福煦元帥聽到凡爾賽和約簽訂的消息以後，他非常精確的說：「這不是和平，這是二十年的休戰。」

和約中關於經濟的條文，竟報復性和愚笨到使之顯然不能實施的程度。德國被懲處須根據荒誕的比例繳付賠款。這種強制的命令表現出了勝利者的餘怒尙在，也表現出勝利國的人民相信，任何戰敗國或集團的賠款規模，儘可以抵償現代戰爭的消耗費用。

羣衆不瞭解這種最簡單的經濟事實，沉湎於愚昧之中；而一心想取得他們選舉票的領袖們，又不敢向他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報紙照他們時行風氣，反映和強調着流行的見解。很少人出來說明，賠款的償付，祇有兩種方式，或是由賠款國家提供勞役，或是用貨車或輪船裝運實在的貨物輸出國外；也沒有人說明，這種輸出的貨物到達接受賠款國家以後，除非那個國家的社會仍在極端原始的狀態，或受嚴格的管制，否則國內的工業，必至發生紊亂的後果。實際上真要掠奪一個戰敗國家，唯一的辦法，祇有把所有需要的可以搬動的東西一起運走，和驅使戰敗國一部分壯丁，使之擔任永久或暫時的勞役。這一點甚至蘇聯現在也已經明白了。不過由這種方法所得的利益，如與戰爭的費用比起來，實在渺乎其小。但在各國的顯要中，沒有一人具有理解力和權勢，或不囿於公衆的愚昧，向選民宣布這種基本的無情的事實；即使他們說了，恐怕也無人會加以聽信。勝利的協

約國家繼續揚言，他們仍將壓榨德國「直至極叫爲止」。所有這種，對於後來世界的繁榮和德國民族的情緒，都有強烈的影響。

不過這種條文，始終未曾執行。事實恰相反，一方面勝利的列強徵收了約一、〇〇〇百萬鎊的德國資產，但幾年以後，主要由美英兩國貸給德國一、五〇〇萬鎊，因而使德國得以很快的修復國內戰爭的破壞。這種顯然慷慨的措置，因爲同時勝利國家的痛苦不幸的人民提出千篇一律的要求，政治家提出保證要使德國「付出最後一分錢」，所以不能希望或激發感激之忱或好意後果。

德國祇付了（或者祇能付）被勒索的賠款的一部分，因爲此時美國正在對歐洲尤其對德國作大量的貸款。實際上自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的三年中，美國由各方面所收回的分期償還的戰債賠款，僅及它收回無望的對德貸款的五分之一。然而每個人似乎都很滿意，而且好像認爲這種局面可以永久維持下去似的。

所有這種交易，在歷史上都將被譏爲瘋狂行爲。他們幫助滋育了軍事的禍源和後來還要詳細講到的「經濟的風暴」。德國現在四面八方的借錢，貪婪地吸納了每一筆向它寬濫提出的信用。引導失當的幫助戰敗國的情感，加上這種貸款的高利，也使英國的投資者積極參加，雖然在規模上要比美國小得多。由此德國得到了二、〇〇〇百萬鎊的貸款，而付出的賠款祇有一、〇〇〇百萬鎊，付款的方式，或是由繳出在國外的資本產和匯兌，或是利用美國的龐大貸款掉弄槍花。所有這些，合成爲一篇錯綜複雜的愚昧故事，爲造成這篇愚昧故事，多少的血汗和美德擲諸虛牝了。

聖日緬因和約和特利安農和約完全分裂了奧匈帝國，是第二個基本的悲劇。多少世紀以來，這一個神聖羅馬帝國歷劫長存的遺體，曾使許多不同的民族，得享一種共同的生活，分占商業的和安全的利益。這些民族在我們的時代中，如果聽其自然，無一有足夠的實力，可以抵抗德國或俄國捲土重來的壓力。所有這些民族都希望脫離聯邦或帝國的組織，對他們的這種希望加以鼓勵，被稱爲是自由主義的政策。西南歐的大踏步巴爾幹

化，結果相形之下，普魯士和德意志帝國卻日益壯大，因為後者雖因戰爭而創痍遍體，卻仍保持完整，占有局部的優勢。構成哈布斯堡王朝帝國（即奧匈帝國——譯者）的各民族各省，在獲得獨立的過程中，無一不發生古代詩人和神學家專為罪該萬死者而設的慘苦景象。華貴的首都維也納，原為經過長期奮鬥而存在的文化與傳統的舊邦，也是多少公路、鐵道和河流的中心，現在卻成了空無所有嗷嗷待哺的狀態，正好像在貧民區中，人民流亡殆盡剩下來的一所大商場的光景。

勝利者以西方國家追求已久的理想，強加之於德國人的身上。德國人從此解除強迫軍役的重負，無須再維持強大的軍備。他們雖無擔保可言，大量的美國貸款卻不速而來。在韋瑪訂立了一個根據最近改良的民主憲法。國王們被趕走以後，名不見經傳之輩起而代之。在這種脆弱的建築之下，德國民族強大的、雖戰敗而實質未受損傷的熱情，仍在滂沛奮湧。美國人對帝制早懷成見，而英國的勞合喬治也始終未作相異的見解，這樣就不會明告戰敗的帝國，如能成立共和體制，比起帝制自可得到較好的待遇。當時為協約國計，最好是成立君主立憲，由德皇的幼孫登位，另設攝政會議，使韋瑪共和國得以充實強固。然而不此之圖，卻在德國人民的民族生活中開了一個空虛的裂口。所有強有力的分子，包括封建分子和軍人，本來可以在君主立憲的旗幟之下集合起來，並為君主立憲之故而尊重和支持新的民主和議會制度，如今在共和制度之下卻成了脫羈之馬。韋瑪共和國所有它自由主義的外觀和嘉惠，都被視為出於敵人強制而實行的東西。它不能吸引德國人民的效忠和想像力。在一個短時期內，他們實逼處此牢守着高年的興登堡元帥。不久，種種強大的力量，又陷於徬徨無主的狀態，在這暴露的空隙之中，經過一個時期以後，一位具有殘暴天才的瘋子，代表前所未見的腐蝕人心的仇恨種子，大踏步的闖了進來——那就是希特勒伍長。

法國已因戰爭而弄得民窮財盡。從一八七〇年以來，即夢想復仇與德國一戰的人勝利了，但使國力發生嚴重的耗損。勝利實現之時，法國已成了強弩之末。從他們燦爛成功的一刻起，法國民族對於德國便抱着深切的

恐怖心理。由於這種恐怖心理，爲了法國的安全和應付遠爲強大的隣邦計，法國要求把國界遠推到萊因河。但英美的政治家認爲，如把由德國人居住的區域併入法國國境以內，將違背威爾遜總統所揭櫫的十四點，也違背凡爾賽和約所根據的民族主義和民族自決。因此他們拒絕福煦和法國的要求。他們爲取得克勒孟梭的同意，向法國保證：一、英美共同保障法國的安全；二、成立非武裝區域；三、德國全部永久解除武裝。克勒孟梭不理福煦的抗議和他本人本能的感覺，接受了英美的保證。於是威爾遜、勞合喬治和克勒孟梭簽訂了保證條約。結果美國參議院卻拒絕批准條約，否決威爾遜的簽字。在訂立和約的全部過程中，我們對於威爾遜總統的意見和願望一向委曲求全，而末了我們卻得到不客氣的通知，說我們對於美國的憲法應有更好的瞭解。

在法國人民的恐懼憤怒和混亂之中，壯偉卓越的克勒孟梭，具有世界著名的權威，和英美有特殊的接觸，卻立刻遭秋扇之捐。古希臘史家波盧塔克說得不錯，「對他們偉大領袖忘恩負義，是強大民族的特徵。」法國在如此嚴重削弱之時，便犯這種毛病，是很輕率的事。在成爲第三共和國特徵的政團陰謀與政府和內閣不斷變動再度復活中，不管參與其事者如何可以從中取利或藉以排愁解悶，卻失去中流砥柱的力量了。

繼克勒孟梭而起的最強大的人物爲樸恩克賽，他企圖建立一個受法國庇護和支配的獨立的萊因地。這是心勞日拙的。他爲了強迫德國繳納賠款，毫不躊躇的侵入魯爾區。估領魯爾之舉當然是爲了要使德國遵行和約，但大受英美輿論的抨斥。德國金融和政治的一般性的瓦解，加上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所付的賠款，結果使馬克的價值很快的慘落。法國佔領魯爾，德國於憤怒之餘，引起了濫發紙幣，故意摧毀貨幣的整個基礎。在通貨膨脹的最後階段，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纔值得一金鎊。這種膨脹情形，在社會和經濟方面發生了極端惡劣和影響深遠的後果。中產階級的辛苦儲蓄一掃而光，而替國社主義的旗幟，招引了一批天然的信徒。托辣斯雨後春筍的發展，變亂了德國的整個工業構造。全部工作資本都完了。內債和固定資本負擔與抵押形式的工業債務，自然也受到清算或抵賴，但並不足以補償工業資本的損失。所有這些情形，直接造成破產國家在國外的大規模舉債，並且成爲以後各年中的特色。德國人痛苦與怨憤交併——正好像他們現在的

情形。

英國人對德的感情，最初非常嚴厲，但不久就轉到另一方向，走入歧路。勞合喬治與樸恩克賓之間發生了公開的裂痕，前者的容易激動的性格，妨礙了他堅決遠見的政策。兩國在思想上和行動上柄鑿不合，而英國人對德國的同情，或者甚至敬慕之情，獲得了強有力的表現。

國際聯盟剛成立，便受到一個幾乎致命的打擊：美國遺棄了威爾遜總統的產物。總統本人準備為他的理想奮鬥，但正在着手進行運動時，猝遭中風，在此後兩個長的重要的年中，纏綿床第，成爲一個沒有用的殘廢者，直至一九二〇年，共和黨總統選舉的勝利，把他的黨和政策一下掃出去了。共和黨勝利的翌朝，大西洋對岸孤立主義的見解盛行一時，讓歐洲去自作自受好了，而合法的債務卻非償不可。同時又把關稅提高，阻止那唯一可以用之還債的貨物的進口。在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中，美國提出了影響深遠的裁減海軍的提議，英美政府沾沾自喜的進行鑿沈主力艦和消滅他們軍事設備。據奇妙的邏輯見解，認爲除非勝利者自己也解除了武裝，否則道義上便無解除戰敗國武備的理由。法國萊因河的國界和保護的條約同時落空，但因爲仍維持一支根據普遍軍役、雖然人數較前已大見削減的陸軍，所以現在成了英美指斥的對象。

美國向英國明白表示，日本過去所信守弗渝的英日同盟如果繼續下去，將成爲英美關係的障礙。這個同盟因此中斷。同盟條約的廢止，在日本發生了強烈的反響，認爲是西方世界拒絕與一個亞洲國家合作的表示。許多在以後對於和平也許可以有絕大價值的聯繫都切斷了。同時日本所以自慰的，自從德國和俄國失敗以後，一時內使它的地位升成爲世界第三海軍強國。華盛頓海軍協定關於主力艦五、五、三的比例，雖使日本在數量上較英美爲遜色，但所規定的比額，已儘夠吸納今後幾年中它建築與財政能力了；它急切的注視着英美兩大海軍強國互相爭先恐後削弱本身實力，直到遠低於他們資源能力可負擔、而爲他們義務計所不許的程度。因此無論在歐洲、在亞洲，勝利者同樣在爭取和平的名目下，很快造成了戰爭捲土重來的形勢。

正在這類不幸的事件發生之時，在大西洋兩岸不斷空談用意甚好的陳言腐語聲中，在歐洲顯現了一個新的爭執目標，性質上比沙皇和德王的帝國主義更爲可怕。俄國的內戰，結果使布爾塞維克的革命獲得絕對的勝利。企圖進而征服波蘭的蘇維埃軍，誠然在華沙之戰中被擊退了，但德國和意大利卻幾乎屈服於共產主義的宣傳和陰謀之下。匈牙利在共產黨獨裁者貝拉孔支配之下，實際上一度陷落。福煦元帥雖然聰明的說，『共產主義始終未曾越過勝利的境界』，在戰後最初幾年中，歐洲文明的基礎却顯出了杭陞動搖之象。法西斯主義是共產主義的陰影，或者可說是共產主義的醜惡之子。希特勒伍長正在慕尼黑城爲德國軍官効犬馬之勞，竭力煽動士兵工人狂熱仇恨猶太人和共產黨人，說他們應負德國戰敗之責，而另一冒險人物墨索里尼，則向意大利提供一套新的政府方案，一方面自稱可以把意大利人從共產主義中拯救出來，卻乘機自己僭執了獨裁大權。正如法西斯主義由共產主義脫胎而出，而同樣納粹主義又是從法西斯主義轉生出來。這些互相因緣的運動，就着手進行，註定要把世界捲入更爲可怕的衝突之中；現在誰都不能說，這種衝突已因這些運動的毀滅而告終止。

雖然如此，和平的一個確實基礎仍舊保持着，即德國已經解除了武裝。所有它的大砲武器已經摧毀。它的海軍已經在斯加伯·弗洛自行鑿沉。根據凡爾賽和約，德國爲維持國內治安，只許有一支人數不超過十萬人的長期服役的職業軍隊，不能以此爲基礎生聚後備人員。每年及齡壯丁不再受軍役訓練，幹部經已解散。軍官團經用盡力量使之減到十分之一。任何軍用航空隊，皆在禁止之列。潛水艇已予禁止，德國的海軍限於十來艘萬噸下的艦隻。蘇聯由沙皇帝國脫穎而出，以新的更可怕的面目出現，但一羣極端反共的國家，組成帶狀，把蘇聯和西歐隔斷了。波蘭和捷克獨立昂首，似乎屹立於中歐。匈牙利經貝拉孔的變亂，逐漸復元。正安享榮譽的法國陸軍，是歐洲無與倫比的最強大的軍力；在若干年內，大家相信法國的空軍也是第一流的。

直至一九三四年止，勝利者的權力，在歐洲、事實上在整個世界仍無敵手。在這十六年中，前協約國的三國，或者甚至祇須英法兩國和他們在歐洲的盟邦，只要稍爲決意一下，即無時不可用國際聯盟的名義，在國聯

道德的和國際的護持之下，就可以支配德國的軍事力量。然而直至一九三一年止，勝利者尤其是美國，卻不此之圖，反集中力量用存心不善的國外管制的方法，向德國勒索他們每年應得的賠款。而德國的付款，又全靠美國向之作數目更大的貸款，這個事實，使全部交易成爲荒謬絕倫，結果除了產生惡感，全無所獲。另一方面直至一九三四年止，如果嚴格實施和約中的軍事條款，原可無須武力和流血，永久保持人類的和平與安全；但大家對於軍事條款不加理會；而違約的情形仍屬輕微，及至日積月累到了嚴重程度之時，又力求拖延躲避。這樣就把長期和平的最後保障丟掉了。從勝利者的愚昧中，戰敗國德國的罪行得到他們潛滋默長的背景和他們的解釋，雖則這自然不能作爲曲諒罪行的理由。要沒有這種愚昧，罪惡即沒有了誘惑，即使蠢然思動，也沒有下手的機會。

在下文中，我所打算敘述的若干事件和印象，這些在我私衷認爲造成了人類動亂史中最不幸的經過。悲劇不僅限於戰爭中勢所必至的生命的殺戮與財產的破壞而已。在第一次大戰中，早已見到士兵的可怕屠殺，和許多國家的寶藏一旦化爲灰燼。但是除了俄國革命的極端行爲外，歐洲文明的基本結構，直至戰事結束之時，仍舊屹立無恙。到砲火突然停止之時，交戰各國雖然敵愾之心依舊，仍舊承認彼此歷史上種族上的人格。戰爭的法則，大體上得戰爭雙方的尊重；在雙方作戰的軍人之間，具有共同的職業的一致之點。無論戰勝者和戰敗者，都保持着文明的面目。莊嚴的和平宣布了，這種和平縱使在財政方面說是行不通的，卻與十九世紀越來越顯著的規定文明民族間關係的法則，卻是符合的。法治的時代被宣布成立，世界性的機構也組織成功，以保障我們全體，尤其保障歐洲，防止變亂的再起。

現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人與人間所有的連繫，都蕩然無存。德國人在自願承受的希特勒統治之下，他們所造成的罪惡，其規模之大和性質的毒辣，任何人類史上的黑暗紀錄，都無法與之等量齊觀。在德國的集中營中，曾有計畫的把六、七百萬男女老幼作大規模的屠殺，其慘慄更過於成吉思汗的隨便殘殺，在規模上言，

更使後者好像小巫之見大巫。在東線戰爭中，德國和蘇聯都曾處心積慮，計畫和實行消滅過整個的人口。轟炸不設防城市的暴行，由德國爲始發俑者，實力日益龐大的盟國，如法泡製，實行報復，至使用原子彈把廣島、長崎予以毀滅，可說到了登峯造極的絕詣。

這種物質破壞和道德糜爛的場面，是過去歷代都想不到的。現在我們終於脫身而出了。經過種種苦難和所有成就以後，結果卻發現我們現在所遭遇問題，和那些幾乎使我們萬劫不復的問題比起來，更加可怕得多。

我的目的，是想以過來人和曾經獻過身手者的身分，來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悲劇如何很容易的本可避免；善良者的軟弱如何加強了歹徒的惡意；民主國家的組織和習慣，除非他們合併成爲更大的機構，如何缺乏那唯一可使勤苦大衆得到安全的堅毅和信心；如何在十年或十五年的長期內，即使關於自衛自存的問題，我們都沒有政策之可言。我們在後面可以看到，慎重和隱忍的勸告，如何成爲造成嚴重危險的主要因素；爲了求安全和平生活而採取折中妥協的途徑，如何適足以直接引達禍難的中心。我們也可看到，各國在長時間中，不問國內有何波動變化，如何絕對有走上國際合作行動坦途的需要。

使德國在三十年內保持解除武裝，和勝利者保持充分的武力；同時即使不能和德國成立協調，建立一個強大的真正的國際聯盟，足以保障和約的執行，非經討論與各方同意不得變更，這原是一種單純的政策。過去三四大國的政府曾聯合一致要求本國人民作最可怕的犧牲，人民也爲了共同目標慨然應命不辭，終於達到希望已久的目標。在這種情形之下，各國似乎理合維持共同的行動，以求至少避免基本目標的喪失。然而這個最起碼的要求，勝利者有實力、文明、學問、知識科學，卻不能滿足。他們的生活只求苟安眼前，一天作一天的打算，過了一次選舉到下次選舉再談，結果還不到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可怕的信號又發生了，我們又必須

稱那些忠實英勇作戰而死的國殤者的子弟們：

『並列成行，帶着創痛的身體，密集前進，他們蹣跚的離開了生命之光明的廣野。』（原註）
原註：引沙遜句。

第二章 和平鼎盛的時代（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一年）

鮑爾溫的登臺——勞合喬治的下野——重新實施保護——英國第一次工黨政府——鮑爾溫的勝利——我出任財政部大臣——賠款與戰債——國內各階級的不斷進步——興登堡當選德國總統——羅加諾會議——奧斯汀·張伯倫的功績——和平到了登峯造極——平靜的歐洲——德國恢復繁榮——一九二九年的大選——我和鮑爾溫的異見——印度——經濟的風暴——甜蜜的希望幻滅了——失業——麥唐納第二屆政府的垮臺——我開始被趕出政治舞臺——英國財政的激變——一九三一年的大選

一九二二年中英國出了一位新的領袖鮑爾溫。他在國際舞台上原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在國內政治中亦是一位次要的角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任財政部財務秘書，此時正任商務局局長。從一九二二年十月他推翻勞合·喬治起，直至一九三七年五月擺脫沉重的任務，在公眾的崇敬聲中，載譽退隱桓斯特郡故里止，他成爲英國政治上的統治力量。我和此公的關係，是我下面所要講的故事中確切的一部分。我和他意見的不同，有時很嚴重，但在所有這些年中和以後，在我們個人之間從未發生不愉快的談話或不歡的接觸，我從沒有感覺到，不能和他作個人之間開誠布公的談話，作個人之間的諒解。

勞合喬治聯合政府由於愛爾蘭解決方案而起的內部的政黨緊張狀態，因爲大選勢所不免即將舉行，更有變本加厲之勢。問題是在大選前是否我們仍保持聯合政府的方式，還是乘大選以前先將聯合政府解散。聯合政府內的各黨各員，曾經同舟共濟，度過難關，擔負過大宗共同的責任，所以爲公眾的利益及英國政治的風度計，似乎應該繼續團結，訴諸全國選民之前。爲了使保守黨容易接受起見，首相和我曾在本年之初，用書面提出表示願意辭職，並從私人的地位，幫助保守黨的奧斯汀·張伯倫組織新政府。保守黨的領袖把這封信考慮了以後，堅決覆稱他們不能接受我們這種的犧牲，並稱我們必須共同進退。這種俠義的精神，未能得到黨內同志的

支持，他們此時覺得自己的地位十分堅強，已經足夠獨掌國家的大權了。

保守黨以絕大的多數，決定和勞合喬治破裂，結束聯合政府。同日下午首相提出辭職。早上他們還是我們的友人和同僚，到晚上他們成了我們的政敵，一心一意想把我們逐出政府之外。所有曾經和我們一起作戰的保守黨人，除了唯一的和出乎意料外的例外寇松勳爵，以及多數的閣員，都隨勞合喬治而告退。其中包括保守黨四位最能幹的人物：貝爾福、奧斯汀·張伯倫、項恩和勃庚海特子爵。在這個緊張關頭時，我因為盲腸炎發，入院開刀，等到第二天早晨恢復知覺時，知道勞合喬治政府已經辭職，我不僅失卻了我的盲腸，也把我殖民地部大臣的差使掉了。我自己認為，我在職時在議會和行政方面曾有相當的成功。一年以前曾因健康嚴重關係而與我們分手的龐納洛，勉強承諾出任首相之職。他所組成的政府，可以稱為『第二流的十一人政府』。顯著人物鮑爾溫，任財政部大臣。首相請國王下解散國會之令，而人民也靜極思變。龐納洛由鮑爾溫隨侍在側，以俾維勃洛克勳爵為主要的鼓勵者和顧問，獲得了一二〇票的多數，和五年執政期的指望。一九二三年初龐納洛辭首相之職，退休後病發去世。鮑爾溫繼任為首相，寇松勳爵在新政府裏心安理得的出任外相之職。

從一九二三年起的十四年，這個時期也許可以稱為『鮑爾溫、麥唐納的統治時代』。在這個時期之內，鮑爾溫即使形式上不是，實質上或者擔任政府的首長，或者反對黨的領袖，而麥唐納始終在議會內不會得到獨立的多數，所以鮑爾溫無論在朝或處於在野黨的地位，都不失為英國政治中的統治人物。這兩位政治家，最初由輪流迭替的方式，到後來政治上結成袍澤之誼打為一片，合作統治着英國。名義上他們代表互相反對的兩黨，代表兩種理論和互相敵對的利益，但實際上他們的氣味相投，觀感一致，方法相同，實為我國憲法自有首相一職以來任何兩個首相之間所從未有過的。說出來奇怪得很，兩人的同情心都遠推到對方的境界之內。麥唐納抱有老式保守黨人的許多情感，而鮑爾溫除了因製造業者的身分牢不可破的贊成保護關稅一點外，比起工黨陣營內的許多人物，更能真正代表溫和的社會主義。

鮑爾溫並沒有因為他突然取得的政治顯位，變成目眩心迷。在別人向他道賀時，他說，「請你爲我祈禱」。但不久，他因爲深恐勞合喬治將以保護關稅的口號爲號召，聯合許多與戰時內閣同時去職的抱異議的保守黨人，共同發難，不單削弱政府的多數，甚至直接與黨的領袖挑戰，感到不安。因此到一九二三年秋季，他決定制敵機先，由他自己先行提出保護關稅的問題。十月二十五日他在樸里穆斯發表演說，結果使新選出的議會不由未到期，先告壽終正寢。他表白本心無他，絕未蓄有這一類的圖謀，但如果承認他的話，那就未免太小看了他對於英國政黨政治所有的遠密瞭解。根據他的勸告，議會於十月中宣告解散，在不到十二個月之內，又舉行第二次的大選。

自由黨在也是我所信奉的自由貿易旗幟之下集合起來，在選舉中得到了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是少數黨，如果愛士葵斯（自由黨領袖——譯者）有意，很可能掌握政府。麥唐納領導的工黨，在下院中僅占五分之二強的議席，鑒於愛士葵斯無意組閣，纔成爲英國第一任社會主義首相，靠了歷史較長的自由、保守兩黨的默許和兩黨的鵲蚌相爭，總算勉強在位一年。在占少數的工黨統治之下，全國騷亂不安，政治的空氣非常有利於自由、保守兩個反對黨，去挑選時機討論一個主要政策問題，而一舉擊敗工黨政府。於是又重新舉行大選——兩年不到舉行了第三次。選舉結果，保守黨所得席數比各黨加起來還多出二二二席，計保守黨四一三席，自由黨四〇席，工黨一五一席。在選舉之初，鮑爾溫的地位是很微弱的，對於選舉的結果，也未有特殊的貢獻。不過以前他曾保持爲保守黨的領袖，所以一待選舉的結果公布，他之將再度出任首相，成爲當然之事。他返回家園，進行組織他的第二屆政府。

此時，我頗得保守黨的愛戴。在大選前六個月威斯特敏斯特脫補缺選舉中，我業經證明對於保守黨分子的吸引力量。那次我雖以自由黨黨員的名義參加競選，但有許多保守黨人爲我効力，投我的票。我的三十四個小組委員會，各由一名保守黨議員主持其事，他們反抗了黨領袖鮑爾溫 and 黨機構的本意。這是空前未有的事。在總數所投的兩萬票中，我以四十三票之差失敗了。在普選中我以「憲政派」的名義代表厄平區以一萬票的多數重新

當選。那時我原不該用『憲政派』的名義的。在我失敗和當選期間，和鮑爾溫曾有若干次友善的接觸，但我不相信他仍能保持首相的地位。現在當他勝利之朝，我完全不知道他對我抱什麼觀感。他的忽然邀我出任我父親一度做過的財政大臣，不僅出我意料之外，也使保守黨爲之震惶失措。一年以後，我沒有經過個人的多費唇舌，獲得了本區選民的同意，重新加入保守黨和回到離開已有二十年之久的卡爾登俱樂部（保守黨俱樂部——譯者）。

我在財政部遇到的第一個國際性問題，便是我們對美國的戰債。在歐戰結束時，歐洲協約國共欠美國戰債約計一〇、〇〇〇百萬美元，其中英國所欠的約爲四、〇〇〇百萬元。另一方面其他協約國，主要爲俄國，共欠我們七、〇〇〇百萬元。一九二〇年英國曾提議把戰債一律取消。這樣一來，英國至少紙面上須損失七五〇百萬鎊。鑒於自那個時候以來幣值跌了一半，實在的損失可能倍於此數。但這個提議沒有得到協議解決。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勞合喬治政府發出了貝爾福照會，宣布美國如不向英國索債，英國也不再向它的債務國，無論協約國或以前的敵國索取債款。這是一個有價值的宣言。一九二二年十二月龐納洛政府派遣了一個英國代表團，由財相鮑爾溫率領，訪問華盛頓，訪問的結果，是英國不問它債務國的繳付情形，照付對美的全部戰債，利息由百分之五減至三·五。

這個協定引起了許多熟悉情形方面的關心，尤其是對首相本人。英國在戰事中，也同這次戰爭一樣，從戰事開始至結束，始終其事，早已大爲民窮財盡，這個協定，將使英國在今後六十二年每年支付出三千五百萬鎊。不單在英國，就是許多態度超然的美國財政專家，也認爲這個協定的基礎，無論對債務者對債權者，都將造成一種嚴重的缺乏先見的情勢。柯立芝總統只說：『他們借了我們的錢，不是麼？』這種簡賅的說明原自不錯，但尚有未盡之處。各國之間的支付，如果出之以移轉貨物或勞役的方式，或者尤其作互通有無的交流，誠然不僅是合乎公道，而且雙方交受其惠。至於因戰時財政而發生的龐大數額的貨物和勞役的交流，使支付成

爲胡亂人爲的方式，則勢所必至，將使世界經濟的整個程序，陷於紊亂不可收拾。勒索支付，無論其對象爲共享勝利和創深痛鉅的盟國，或爲戰敗了的敵國，都有同樣的情形。鮑爾溫、柯立芝債務協定的執行，顯而易見是使世界經濟陷於崩潰、阻止經濟復興和激發仇恨心理的因素。

因爲美國新近把關稅提到更高的限度，幾乎所有新採掘的黃金都到了它庫藏的地窖裏去，所以使美債的償付更見困難。它和歐洲其他協約國，也強迫訂定了同樣的但性質較輕微的解決辦法。這種的處置，第一個結果是使大家一齊向德國加緊勒索。我對於一九二二年貝爾福照會中所表示的政策，完全同感，在當時曾爲辯護；等到我任財政大臣後，就再申舊論，並依照採取行動。照我想來，英國如果因此而不單成了美國的債務國，也成爲美國的討債人，則華盛頓方面一定可看出索債之舉的不智。可是美國非特沒有發生此類的反應，對於這種理論，事實上反發生了憤慨。美國繼續堅持英國得每年付款。

因此除了我們已經把德國的賠款加以削減外，現在輪到我來和其他協約國商討解決辦法了，以便我們能取得每年須向美國國庫繳納的三千五百萬鎊。於是對德國加以最嚴峻的壓力，和強迫成立了一個多事的干涉德國內政的國際管制機構。英國對美債款一共付清了三次，而這筆錢又是以賠款的方式，根據修正的道威斯計畫轉向德國勒索而得的。

鮑爾溫住在唐寧街十一號，我和他比隣相居幾乎近五年之久，每天早晨我去財政部辦公，路過他的居處，總是順道找他在內閣會議室裏作幾分鐘的談話。我是他主要的屬僚之一，對於所發生的一切，都擔負我一份的責任。在這五年內國內迅見復興。這個政府是一個沉靜幹練的政府，在此時期內顯著的進步和復興工作逐漸按年完成。在政綱方面，雖然沒有聳人聽聞或引起爭論的可供大吹大擂的地方，但如果根據任何經濟的或財政的標準來說，在此期內，人民大眾的生活確見改善。在我們任期終了之時，國內和世界的處境，比起我們就任時要舒服和豐饒多了。這是一個平凡的，但也是一個很實在的功績。

政府的聲名是在歐洲方面成就的。

此時興登堡在德國東山再起。戰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和第一任德意志共和國總統厄伯特，失敗後於一九二五年二月底去世。現在全國須選舉一個新總統。所有的德國人過去一向是在以民為懷的專制政治之下撫育長成的，不過因為有影響深遠的言論自由與議會反對的習慣，沖淡了政府專制的成分。戰事的敗北，給德國人帶來了各種極端程度的民主體制和自由。但因為過去經過的種切，使全國四分五裂，徬徨失措，而各黨各派，互不相下，竭力爭奪領導和職位。在這種混亂之中，出現了一種擁戴興登堡的期望。興登堡此時退休家園，仍受人的敬慕。他仍效忠於流亡國外的國王，贊成『採取英國的模式』恢復帝制。這自然是最合情理，但也是最不投時好之舉。當他被提名為韋瑪憲法下總統候選人時，他感到十分的不安，他一再的說：『讓我過平安的生活吧。』

但是各方仍繼續對他實施壓力，最後找到了鐵辟茲海軍大將，纔能用為興登堡一向服膺的為國盡職的名義，使他放棄自己的主張和自己的願望。興登堡的競選者為天主教中央黨的威廉·馬克斯，和共產黨的塔爾曼。四月二十六日星期日，德國全國舉行選舉。投票結果，出乎意料以外的接近：

興登堡

一四、六五五、七六六票

威廉·馬克斯

一三、七五一、六五一票

塔爾曼

一、九三一、一五一票

興登堡因為聲名赫赫，此次競選出於各方推挽，持超然的態度，所以站在其他競選者的上風地位。選舉結果，僅僅獲得一百萬多數票，在全部投票中還沒有達到絕對的多數。選舉揭曉時，他的兒子奧斯迦在七點鐘把他叫醒了，結果他大發脾氣，罵了兒子一頓：『你為什麼要比平常早一點鐘叫醒我？就是到了八點鐘，結果也不會兩樣呀。』說完他又重新入睡，直到他平常叫醒他起身的時間纔起床。

與登堡的當選，在法國最初被視爲德國挑戰的捲土重來。在英國方面，反應比較平穩。我一向希望看見德國重新恢復它的榮譽和自尊心，和讓戰時仇恨的心理歸於消釋，所以對於這種消息，完全不存憂慮之心。在下次我和勞合喬治見面時，他告訴我說：『他是一個極通情達理的老人』；實際上在他官能沒有喪失期內，證明確是如此。即使若干最反對他的人，例如一九三三年九月爲納粹黨所暗殺的勒辛，也不得不承認，『一個空無所有的人總比一個暴君好些』。不過，他已經七十七歲，任期有七年之長。很少人期望他能再度連任。在各黨之間他盡其所能，保持公正的地位；在他任期內，的確給了德國一種並不威脅隣國的清醒的力量和安慰。

一九二五年二月，德國政府給了當時法國總理赫理歐一個牒文。在備忘錄中德國聲明，如果對萊因河有利益關係的各國，尤其是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德國，能訂結一個以美國政府爲保證人的公約，規定訂約國不得相互作戰的莊嚴義務，德國願意宣布接受。此外德國也可以接受一個保證萊因河區疆界現狀的公約。這是一個非常的事件。法國政府即進行和他的盟邦諮商，在英國方面則由外相奧斯汀·張伯倫於三月五日在下院公布。法國和德國國會政潮的發生，延緩了談判的進行，但經過倫敦與巴黎方面的協商，終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由法國駐德大使在柏林向德國外交部長斯特斐斯曼提出一個正式的照會。照會中宣稱，非待德國加入國際聯盟完成先決條件後，不能成立協議；德國不得提出任何修改和約條件的提議；比利時應列入訂約國家之內；最後，應訂立一個法德仲裁條約，爲萊因地公約的自然補充。

六月二十四日，英國下院關於英國的態度，舉行辯論。張伯倫說明在公約下英國所負的義務，以西線爲限。法國也許會和波蘭、捷克訂定特殊的關係，但除國聯公約規定外的任何義務，英國都不預備接受。各自治領對於西歐公約，沒有熱烈的表示。南非的斯末資將軍亟求避免區域的協定，加拿大態度冷淡，祇有新西蘭準備無條件接受英國政府的見解。但我們堅持進行。在我看來，解決德、法兩國千年來深仇痛恨的衝突，似乎是我們最高的目標。如果我們能把高盧及條頓兩大民族，在經濟上社會上和道德上促成密切的團結，阻止新糾紛

的發生，使他們在共同的繁榮和互相依賴的關係之中，消失過去的積嫌宿怨，則歐洲即可再度抬頭。在我看來，英國人民的最大利益，似乎厥在於解除德、法之間的仇恨，此外似乎別無他種可資比擬的、或與之接觸的利益了。直至今日，我的見解仍是如此。

外交大臣的奧斯汀·張伯倫，具有為各黨所尊重的先見，內閣全體一致作他的支持。德國於七月中對法國照會提出答覆，接受把西歐公約和德國加入國際聯盟兩件事合為一起的提議，但說明各國對於一般裁減軍備問題，有先行成立協議的需要。法國白里安作英倫之行，對於西歐公約及其環境，進行延長的討論。八月中法國取得英國的完全同意，正式答覆德國。德國首先必須無條件的加入國際聯盟。德國接受了這個條件。這等於說，關於和約的規定，除非或直待經互相同意修正外，將繼續有效；德國也沒有得到協約國將自動裁減軍備的具體保證。此外德國人在強烈的民族主義壓力和激動狀態之下的其他要求，如取消和約中『戰爭罪魁』的條文，阿爾薩斯·洛林隸屬問題應作為未曾解決的懸案，協約國軍隊立即自科倫撤退，德國政府既未十分堅持，協約國也不會加以承認。

在這個基礎之上，羅加諾會議於十月四日正式舉行。在波平浪靜的湖水旁邊，英、法、德、比、意的代表共聚一堂。會議的成就為：第一、五強訂立互為保證的公約；第二、德法、德比、德波（蘭）、德捷（克）分別訂立仲裁條約；第三、法國和波蘭、捷克分別訂立特殊的協定，協定規定如果西歐公約破裂，發生武裝侵略行為時，由法國保證援助波、捷兩國。西歐民主國家，由此同意在無論何種情況之下，保持相互之間的和平，並且如遇訂約國之一甘冒不韙向其他國家進行侵略時，即聯合一致加以制裁。英國向法、德兩國提出莊嚴的保證，西國中任何一國如受對方無覺發動的侵略，即由英國予被侵略國家以援助。英國接受了這種影響深遠的軍事義務，而且獲得全國熱烈的支持。這樣的保證是史無前例的。

至於英國或法國是否負裁減軍備，或裁減至何種水準的任何義務，這個問題並不因公約而有變動。我以財政大臣的身分，很早便接觸到這些問題。關於同時向雙方提出保證，我的見解認為，法國既然保持武裝，而德

國則已經解除武裝，德國當無進攻法國的可能；反之，法國如進攻德國，就將使英國自動成爲德國的盟邦，法國考慮及此，便決不會進攻德國。因此這個提議，在理論上似乎很危險，因爲這樣一來，如遇德、法發生戰爭，勢必使我們捲入漩渦。但實際上這種大禍，絕少臨頭的可能；而且這是防止大禍臨頭的最好的方法。所以對於法國解除軍備和德國恢復武裝，都表示同樣的反對，因爲有一樣發生，英國就要立即發生危險了。反之，英國和德國根據協定而加入的國際聯盟，給了德國人民一種真實的保護。因此就造成了一種均衡局勢，英國的主要利益，原在於終止德、法之間的齟齬，在這種局勢之中，英國主要居於公正人和仲裁者的地位。我們希望這種平衡局面可以維持二十年，在此期內，協約國的軍備在長期和平、信心增加和財政負擔的影響之下，自然將逐漸減縮。如果有一天德國的軍力和法國大致相等，尤其是如果比法國更爲強大時，則顯然危險即將發生。但條約既已規定神聖的義務，這種情形似乎已無發生的可能。

羅加諾公約僅管西歐的和平，照大家的希望，一個所謂『東歐的羅加諾公約』，即將繼之訂立。如果能根據防止德、法間戰爭可能性的同樣精神和同樣措置，以防止德國和蘇聯間未來戰爭的危險，我們誠應表示皆大歡喜。但即使是斯特斐斯曼時代的德國，也不願關閉德國向東方提出要求的門戶，或者接受和約中關於波蘭、但澤、走廊地帶和上西利西亞的領土規定。蘇聯在由反布爾塞維克國家所組成的『衛生地帶』後面，念念不忘於它的孤立地位。我們雖然繼續努力，但在東歐方面沒有造成什麼進步。在任何時候，我的念頭沒有斷過，設法使德國在東界方面有較大的滿足，但在這短短的有希望的幾年中，始終沒有發生機會。

羅加諾會議於一九二五年底所產生的公約，大家對之深表慶幸。鮑爾溫在外交部內首先簽字。外交大臣因沒有官邸，向我商借我在唐寧街十一號的餐室，招待斯特斐斯曼，作親密友善的午餐。我們聚在一起，意氣極爲相投，大家認爲如果歐洲最大的國家變成真正的團結，自己覺得安全，則歐洲的前途將如何的不可限量。這

個可以紀念的文件，經議會熱烈同意以後，奧斯汀·張伯倫獲得英國最高爵士勳位和諾貝爾和平獎金。他的成就是歐洲復興到高潮點的表示，也開始了和平與復元的三年。雖然舊有的仇恨不過一時潛伏而已，新軍的戰鼓之聲已經隱約可聞，但我們確有理由希望，根據這個堅確得到的基礎，將打開再度向前邁進的大路。

一九二九年鮑爾溫第二屆政府結束之時，歐洲風平浪靜，不特爲過去二十年所沒有過的，而且也是至少此後二十年中所僅見的。自從一九二六年我們訂結了羅加諾公約以後，對德國漸次發生一種友善的情感，法國和協約國在萊因地的駐軍，也在凡爾賽和約規定期前便老早撤退了。新德國加入了殘缺的國際聯盟。德國在美、英貸款的同情影響之下，很快的趨於復蘇。他新建的航海商船，獲得大西洋打破速度紀錄的獎狀。它的貿易有飛躍的進步，國內達到十分的繁榮。反之，法國和它的同盟制度，在歐洲方面似乎穩固無虞。凡爾賽和約的軍事條款，沒有遭遇公開的破壞。德國的空軍在禁止之列，尙未再起。德國的海軍已蕩然無存。在德國有許多有力方面，至少爲了不敢輕舉妄動，反對重提戰爭，而德國的軍部也不相信協約國會容許他們重整軍備。另一方面，我們面對着我後來稱爲『經濟的大風暴』的形勢。不過曉得這一點的，僅限於寥寥可數的若干財政界人士，而且他們看到前途的嚴重，也噤不敢言。

一九二九年五月的大選，顯出了『鐘擺的震盪』，也表明正常的求變之心，是影響選民的強有力的因素。在新的下院中，工黨的席次較之保守黨僅略占多數。共有六十席的自由黨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它如果在勞合喬治的領導之下，一定會對保守黨採取敵對的立場，至少開始時將如此。我和鮑爾溫完全同意，不願成立少數黨政府，或由依賴自由黨的靠不住的援助進行組織政府。因此雖然內閣和黨部內部對於應採步驟意見不一，鮑爾溫終於向國王提出辭職。我們全體乘特掛的專車到溫莎，繳奉印綬和職位；六月七日，麥唐納再爲馮婦，成爲依賴自由黨票的少數黨政府的首相。

這位社會主義首相，希望他的新工黨政府由埃及及作大規模的讓步，在印度作影響深遠的憲政改革，重新努力促成世界的、至少英國的裁軍，以自行樹立名聲。他算定這些目標可以得到自由黨的支持，與自由黨合計起來，他在議會內即可取得多數。我和鮑爾溫的異議，即在此處開始；五年前他任命我為財政大臣，共同合作，但從此時以後，這種關係發生了顯然看得出的變化。自然我們仍保持隨便的私人接觸，但我們都知道已經不是這麼一回事了。我認為無論在帝國的或國內的問題方面，在野的保守黨應該堂堂正正反對工黨政府；應該自己認定，努力保持俾康斐爾特和薩里斯伯勒執政時代的英國的尊嚴；應該急起直追接受論爭，即使一時不能引起全國的反應，亦在所不計。就我所見，鮑爾溫認為任何樂觀斷言英帝國偉大的時代，已經老早過去了；保守黨的希望，在於和自由黨工黨的勢力融通合作，再採取合時巧妙的策略，把勢力強大的輿論潮流和大批的選民從他們的手中搶過來。他當然極為成功，他是保守黨得未曾有的最偉大的經理人。他以保守黨領袖的身分，參加過五次大選，獲勝了三次。關於這些一般性的問題，祇有歷史能判定孰是孰非。

我們之間發生斷然的決裂，是由印度問題而起的。首相在屬保守黨的印度總督歐文勳爵、後改稱哈里法克斯勳爵強有力的支持，甚至督促之下，提出了他的印度自治方案。於是就在倫敦舉行了一個古怪的會議，新由起居舒適的獄所內釋放出來的甘地，成為會議的中心人物。關於引起一九二九年、一九三〇年議會爭執的詳細情形，此地毋須敘述。當政府決定釋放甘地，以便他担任出席倫敦會議民族主義印度的代表之時，我和鮑爾溫的關係，到了破裂之點。鮑爾溫對於事態的演變，似乎頗為滿意，其見解首相和總督大致相同，斷然領導反對地位的保守黨走上這條路徑。我堅決認為，這最後一定會使我們失去印度，印度人民也一定會受到無可比量的禍難。因此不久我便爲了這個問題，辭職退出保守黨的在野內閣。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我寫信給鮑爾溫：

我們關於印度政策的爭執已經公開。過去承邀參加你的事務委員會，現在我覺得不應再出席會議了。無待煩言，我將盡力之所能，給你一切幫助，在下院中反對工黨政府；我也將在大選中作最大的努力，以促成工黨的失敗。

一九二九年直到第三季，尤其是在美國，仍處於繁榮增長的希望與外表之下。非常的樂觀主義，扶植了投機的狂歡。有人著書，證明擴張的企業組織和科學，終於克服了經濟恐慌的階段。九月中紐約證券交易所主任說，『顯然我們把我們以前所知道的經濟周期性結束和打消了』。但在十月中，一陣突然而起的狂烈的風暴，橫掃過華爾街（美國紐約金融中心——譯者）。縱經最有勢力的機關的干涉，也不能阻止紛紛拋售的風潮。有一批重要銀行，合出了十萬億資金，以求維持和穩定市場。但一切都白費心力。

照以前各年中紙面價值而很快累積得來的整個財富，都化為烏有了。幾百萬美國家庭的繁榮，過去建築在信用膨脹的龐大基礎之上，現在突然證明這種繁榮實在祇是幻覺。除了全國性的股票投機，甚至最出名的銀行，也用放鬆貸款條件加以鼓勵外，也產生了一種用分期付款方式，購買房屋、傢具、汽車、家庭用品等的龐大商業組織，現在一起同歸於盡。宏偉的工廠陷於混亂麻痺狀態。一天以前，成千的技師工匠，乘車紛至沓來，到廠工作，爲了停車問題，常成爲緊急的問題。直至現在爲止，整個社會從事於積極的生產工作，製造各色各種有用的東西，但到今天整個社會遭遇到了工資減低，失業增加的痛苦。美國的銀行制度，遠沒有像英國那樣的集中和基礎穩固。有兩萬家地方銀行停止付款；人同人間交換貨物與勞役的手段打成了粉碎；華爾街的崩潰，對每一個家庭，無論爲貧爲富，都有同樣的反響。

不過我們也不應認爲，爲美國人靈魂顛倒的美麗瞻望，即由更多的人共享更大的財富和安適，完全祇是幻覺和市場的狂嘍。以前任何社會，從來沒有生產、分享和交換過這麼大量的貨物。事實上，人類憑其勤勉和技術作最大的努力，其互相傳授的利益是沒有限度的。浮誇的想像和華華謀利的貪婪心，趕過了偉大成就的本身，終於把這個光明燦爛的外表粉碎和丟棄了。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間，緊接着股票市場崩潰以後，物價的慘跌和結果引起的生產減縮，造成了普遍的失業現象。

這種經濟生活的紊亂，發生了世界性的後果。失業與生產減削，使商業趨於一般的緊縮。各國紛紛實行關稅的限制，以保護國內的市場。這種一般的危機，帶來了尖銳的貨幣困難，麻痺了國內信用，把蕭條和失業現

象遠推到世界各地。麥唐納政府曾提出種種的諾言，但到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却發見遭遇倒一百萬至近三百萬人的失業。據稱美國無工可作的達一千萬人，這個大共和國內的整個銀行業，陷入混亂與暫時崩潰之境。結果所至的禍難又落到德國及歐洲其他國家身上。不過在英語世界中尚沒有飢餓至死的人。

一個島國的經濟是極度人爲的，例如英國，其所非常需要的自信和信用，往往很難由一個以攻擊資本爲基礎的政府或政黨予以維持。麥唐納的工黨政府，對於他們所面對的問題，完全無法應付。他們甚至不能演用黨的紀律，或產生必要的努力以求預算的平衡。一個早已處於少數地位、而又喪失所有財政上信心的政府，在這種情形之下，是不能繼續存在的。

工黨政府之不能應付這種風潮，英國財政信用的突然崩潰，以及自由黨的分裂，和該黨的失去有害的舉足輕重的地位，促成了舉國一致政府。爲處理這種危機，似乎祇有一個由各黨所組成的政府纔能勝任。麥唐納和他的財政大臣，本於愛國之情，打算把工黨的大衆一起加入這個全國的團結中。鮑爾溫一向認爲只要他保持實權，名義官職不妨屬之他人，他是願意在麥唐納之下服務的。這一種態度雖然值得尊敬，卻與事實不符。自由黨的勞合喬治剛開過刀，正在休養，以他的年齡言，情況相當嚴重；於是由西門爵士率領大多數自由黨人，參加各黨的聯合政府。

聯合政府沒有邀我參加。爲了印度問題在政治上我已經和鮑爾溫脫離關係，我又是反對麥唐納工黨政府政策的人。也同許多其他人一樣，我感到舉國一致的需要，但我的被棄置局外，既沒有使我詫異，也沒有使我發生不快之感。事實上在政治上發生危機期內，我正留在法國的坎城作畫自遣。如果那時我被邀參加，我會做出點什麼，我不能說；總之討論事實上從未發生過的頗有疑問的誘惑，原是畫蛇添足的事。當然在夏季，我會和麥唐納談起全國一致政府，他曾經表示相當的興趣。但我在政治舞台上處於很爲難的地位。我曾在內閣中擔任職位十五年，現在正忙於寫我的馬爾波洛公爵傳。在投身於政治風雲變幻中的人，當時的政治戲劇確極緊張，

引人入勝，但我可以坦白真誠的說，在國家緊張關頭，我的被斷然去開，我既從未感到憤懣，自然更說不上感到痛苦。不過卻有一個不便的地方。從一九〇五年以來，在這些年頭中我總是坐在前排的這一端或那一端，常有從固定席次發言的便利。你的筆記簿就可放在席次，你走去大概總可以取得發言的席次。現在我必須很費力氣去占政府下面中立黨的席次，在說話時筆記簿得拿在手裏，只好聽憑運氣，與其他著名關員參加辯護。不過我常常得准發言。

新政府的成立沒有阻止金融的恐慌。我返國以後，發現一切都沒有解決，大家在期待勢將舉行的大選的到來。選民作了不愧為英國民族的決定。全國一致政府在工黨的創設者麥唐納領導下成立了。他們向人民提出了一個極端節約和犧牲的方案。這是『流血、流汗、苦工、流淚』這口號的早先版本，雖則當時沒有戰爭或生死危險的刺激。當時必須實施最嚴峻的經濟，每人的工資、薪俸和所得，都須減削。人民大眾被籲求投票贊成一個克己緊縮的政府。人民接受呼籲，他們在表現英雄氣概時是常常如此的。政府不管所作的宣言，廢止了金本位；鮑爾溫曾經強迫一九二三年的龐納洛內閣接受美國戰債的償付，至此雖不得不停付（以後就永遠不付了），自信與信用卻重新恢復了。麥唐納出任首相，黨內繼續擁護他的只有寥寥七、八個人。但在新選議會中，工黨中曾做過他信徒而現在成爲他敵人的，得重行當選者不過近百人之譜。他的健康和權力，迅見衰弱；在這決定命運的近四年中，他站在英國政府的最高位置，統治越來越見得羸弱。就在這四年中希特勒很快的脫穎而出

第三章 潛伏中的危險

我在一九二八年的觀感——未來戰爭的殲滅性恐怖——若干戰事技術的預言——協約國憎惡戰爭和贖武——「安樂的局面會改變的」——德國的陸軍——十萬志願兵的限制——塞克將軍的工作和言論——「沙恩霍斯特德第二」——一九二七年一月協約國管制委員會的撤退——德國的航空——侵略與掩飾——德國的海軍——拉瑞諾的軍備計畫——可以改變的工廠——「十年無大戰」的規律

在我所著的歐戰後篇一本書裏，我對於從歐洲停戰起到一九二二年底英國政府的改變止四年間的情形，已寫下了幾種感想。這本書是一九二八年寫的，可是我已深切感到大禍即將臨頭。

戰爭，到了耶穌紀元後二十世紀開始的時候，已經在逐漸變成足以毀滅人類的東西。人類組織成大的國家，大的帝國，以及各民族發生了充分集體意識以後，便使屠殺事業，可以按某種規模，而且用以前意想不到的堅忍力，來計畫實行。所有個人的高尚的德性，都被集中用以發展屠殺羣衆的力量。優裕的財力，對外貿易及信用方面種種資源，以及大量資本的積聚，使各國可以在相當長時期以內把全體人民的力量，用於破壞殘殺的事業。民主政治制度，使萬衆的意志得以表現。而教育不但把鬪爭一課，灌輸在每一個人的腦中，而且使每一個人當前的目標中，非常的合用。報紙使人們有了一種彼此團結、互相策勵的工具。至於宗教，在基本論點上，雖然很賢明的避談戰事，卻用種種方式，對所有戰鬪員不偏不私的予以鼓勵及慰勞。最後就是科學，把它寶藏和祕密，以供應人們迫切的要求，把無情的殺人器械和工具放在人們的手中。

結果，許多新的現象便自然發生了。從前是深溝高壘的城鎮，因被圍困而發生饑饉，現在是全體民族，被人們有計畫的造成飢荒，而不得不告屈服。全體人民，無論站在什麼工作立場，都參加了戰爭；他們同爲攻擊的目標。還有天空當中，也開闢了路徑；死亡與恐怖，即可一路深入，遠達實際軍隊陣線的後方，在先前戰事中一定不會受到任何侵犯的婦孺老弱，亦不能倖免。鐵路、輪船及自動車等的神奇組織，運送和維持成千累萬的人，繼續作戰。極進步的治療和外科手術，一而再的把醫治痊愈的受傷軍士，重新送回屠殺的戰場。凡是可供利用的廢物，皆經充分利用。即是士兵垂死的掙扎，還要拿來作軍事的用途哩。

但是，在大戰最初四年中所發生的一切，還只是第五年所發生事情的先聲。一九一九年的戰爭，如果繼續下去，一定可以目擊到破壞力的大量增強。假使當時，德國人能夠保持士氣，完成他們撤退到萊因河陣地的目的，那末，在該年的夏天，他們恐怕已經受到了比較向來所用任何方法及武力更爲強大無比的攻擊。他們的城市，必將受到幾千架飛機的轟炸。他們的前線，必將受到無量數大噸的射擊。同時

攻擊者必已從事種種安排，以百萬大軍，帶着一切需用品，用每天行走十哩或十五哩的機械化車輛，繼續前進直至越過國境。祇有一種秘密防毒面具（德國人一時還不能獲得此種面罩），可以用作防禦的、惡毒到使人難信的毒氣，必定已經使德人的全部抵抗，趨於窒息，必定已把敵線上一切生命，陷於麻痺。當然，德國人方面，也是有他們的計畫的。但憤怒的時間，是過去了。停戰的信號發出來了，而一九一九年的恐怖，始終沉埋在各主要交戰國家的檔案之中。

戰事突然普遍停止，正和它突然普遍開始一樣。世界抬起頭來，視察了劫後破壞的景象，勝利者和戰敗者，同樣喘下了一口氣。在成百的實驗室中，成千的兵工廠、製造廠及局所中的人員，都立即挺身而起，離開了他們曾經專心從事的工作。他們的計畫，都在未經完成、未曾實施的當中，丟在一邊了，但是他們的知識卻被保留着；他們的資料、計算及發明，由各國的軍事機關，匆匆捆聚一起，並且摘取要點，以「供將來參考」。一九一九年的戰爭，始終沒有打成，可是它的種種觀念，卻在向前進行着。每一軍隊之中，都在和平面幕的背後，把這些觀念，拿來研究、推敲，取精擷華；所以，假使戰爭再度臨到世界上來，所用的武器，一定不是供一九一九年戰爭用的武器及工具，而是由這些武器及工具推陳出新的東西，比原有者更爲可怕，更足致人於死。

我們就是在這些情勢當中，走進了那個精疲力竭的，一般所認爲「和平」的時期。這個時期，無論怎樣，是給我們一個考慮一般局勢的機會。幾種陰暗的、確切而不可動搖的事實，顯露出來了，正好像山的影子，從飄浮的烟霧中現出來。第一，從此以後，全體人民，都要參加戰爭，都要竭盡他的力量，都難免遭受敵人的狂暴打擊。其次是，一國的人民，凡是相信他們自己的生命已在危險當中的，便可毫無限制的採用任何手段，來保障他們的生存。還有是，或許——不要認爲或許如是，簡直是的確如此——在下一戰事，他們所採用的各種手段當中，一定有大批無限制的，並且或許是——一旦發動了，便不可控制的毀滅性的作用和武力。

人類在以前從來沒有臨到這種處境。一方面在德性上並未有顯著的改善，或受到比較聰明的指導，而同時人類便已開始把這些一定可以致自身毀滅的工具執在手中了。這就是人類運命的重要關頭，而所有人類的光榮和努力，到了最後，都是把人類引導到這個關頭上面。拿着這些毀滅工具的人們，最好審慎從事，考慮一下他們所負的新責任。可是死神卻很注意的，很服從的站立着，在期望事情的發生，在準備服務，準備大批的剷除人類；準備一經召喚，便把人類文化上遺留的一切，一概予以粉碎，永無修復的希望。他祇等司令者的一句話。他祇在等候一個脆弱而昏亂的人來下屠殺的命令，這個人一向是他的犧牲者的人，而現在——只不過片刻之間——卻是他的主人。

所有這些話，都是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發表的。現在，又是八年後的一個元旦了，我還是不能寫出和先前兩樣的話來。在兩次戰爭間所有本人應該負責的言語和行動，目的上只是想防止第二次的世界大戰；並且保證如果不幸而言中，我們能取得勝利，或至少繼續生存。就已往而論，恐怕沒有一個戰爭比較這個第二次大戰戰更爲容易防止了。爲了防止暴政，避免世界毀滅，我常常準備使用武力。但是假使我們英國的、美國的及

協約國的事務，是用通常的合理方法及平常優良家庭所用的常識來處置，那就根本無需脫離法律而使用武力；不但如此，我們在正當的理由上，可以使用兵力而並不冒流血的危險。英國、法國，尤其是以具有無限實力的公正的美國，在喪失目標，放棄甚至他們誠心贊許的主張之中，竟任令種種情勢，逐漸造成而達到他們所最怕的最高點。他們僅僅再拿以前那種善意的、缺乏遠大目光的行為來對付種種新問題。現在我們又在遇到極端相似的可能造成第三次大戰的新問題了；在這次戰爭中也許沒有一個人活得了，能留下來講述混亂的舊事了。

早在一九二五年，我已經寫出了若干在今日不宜忽略過去的關於戰爭技術上的思想和疑問：

關於爆炸力的使用，會不會再有比較從前所發明者更為強烈而無可匹敵的方法？會不會有一個形體不過像橘子一樣大小的炸彈，具有一種秘密威力足以毀滅整排的大批的建築物——而且，足以集中一千噸炸藥的力量，一下子把一個市區炸毀？是否可以用無需駕駛員而由無線電或他種電光來控制的飛機，自動引導即使現在形式的爆炸物，對敵方的城市、兵工廠、營壘或造船廠，施行不停的襲擊！

至於毒氣及各種形式的化學戰術，還祇是一本可怖的書籍內所寫成的第一章，這種趨向毀滅的每一新路徑，萊因河兩旁國家的人士，一定正在用所有的科學和人類所能有的忍耐心，盡力研究。而且，為什麼我們定要以為這些資源是只限於無機化學？在實驗室中進行疾病研究——把鼠疫經有系統的準備，故意施放在人類和野獸身上——的大國家，一定並不止一個。毀壞農作物的害蟲，殺斃馬匹及牲口的脫牌痘，不僅毒斃軍隊，而且害及整個區域的良疫——凡此種種，都是軍事科學正在悍然循着進行的路線。

如上所說的情形。迄今差不多已有二十五年之久了。

一個戰敗的驕傲民族，一定要儘速的來重整他們的軍備，原是當然的事。他們對於那些強迫他們服從的種種條約，只要有辦法，是就會不遵守的。

「……安樂的局面會推翻痛苦中所發的不自然的，無效的誓言。」

所以，使一個戰敗的敵人繼續維持其解除武裝的狀態，乃是勝利者的責任。為這種目的起見，勝利者必須進行兩種政策：第一、他們一方面自己保持充分的武裝，同時必須以孜孜不倦的戒備精神和權力，監督實行條約中

禁止戰敗敵人軍力復興的各項條款。第二、勝利者必須儘其可能的限度來和戰敗國修好，用仁惠的手段，使戰敗國實現大量的繁榮，並用種種方法來建立一個真正友誼的和共同利益的基礎，這樣一來，戰敗國要想重新訴諸武力的動機，便會漸次化除。在這幾年中，我創造了一個箴言，就是：『緩和戰敗國的不平，應先於裁減戰勝國的軍備。』但下面就可見到，英國、美國及法國，大體上却採取了相反的路線。於是乃有本書內所述情節的發生。

建立一支把一個大國全部壯丁包括在內的軍隊，是一個艱巨的工作。勝利的協約國，依照勞合喬治的建議，已把德國軍隊限為十萬人，禁止徵兵。所以，這一點兵力，就成爲一個細胞核，成爲一個熔爐，在可能的時候，百萬大軍便會從這個核心，這個熔爐裏產生出來。這十萬人就是十萬個領袖，一旦他們決定實行擴充，小兵會變成軍曹，軍曹會變成高級軍官。雖然如此，勞合喬治的防止德國重建陸軍的計畫也並非思慮有欠周到。任何外國的監察，在和平的時期中，對於德國奉准設立的十萬兵員的素質的是不能控制的。但是問題不在這一方面。德國單是要防守國境，便需要三百萬或四百萬訓練良好的兵士。要造成一個可與法國陸軍相比擬或竟凌駕法國陸軍之上的全國性軍隊，不但須培植許多領袖，恢復舊日的聯隊和編制，並且須每年征集達到兵役年齡的男子，實行全國強迫兵役。義勇隊、青年運動、警察人員的擴充，舊日的陸軍同志會，以及一切不屬官方的及不合法的組織，在過渡的階段中，或許都可以發生他們的作用。但如無普遍的國民兵役，則骨架雖全，總缺乏外面的筋肉。

所以，除非德國實施了幾年的徵兵，它是不能建成一個足與法軍抗衡的軍隊的。要實行徵兵，有一條界線應得衝過，這是一條非把凡爾賽和約加以彰明昭著的破壞、便無法衝得過去的界線。每一種隱秘的、巧妙的、精細的準備，固然可以在事先做起來，但是終有一天會超過最後關頭，受到勝利者的反對。這樣看來，勞合喬治的原則是不錯的。假使協約國對於這個原則，確曾使用他們的權力，審慎執行，那麼，德國就沒有產生

新戰爭機構的可能。每年所徵召的班級，不論在先受到如何良好的訓練，仍須在部隊或其他行伍中至少再住上兩年，只有經過了這一個訓練時期，纔可把現代陸軍所必不可缺的後備軍漸次組成，和累積起來。法國的人力，在上次戰爭中，誠然有大得可怕的損耗，可是它在訓練每年入伍的兵額方面，在把已經受訓的兵士變為那構成全國整個戰鬥力的後備軍方面，都能保持正式的連續的常規。德國不許成立同樣的後備軍，有十五年之久。在這些年中，德國陸軍，容或可以培養及撫育它的軍事精神和傳統，但是如果要和由法國陸軍制度自然培育集合的，久經成立、未曾中斷、發展而成有武裝、有訓練、有組織的人力相對抗，這恐怕連做夢也所不及。

未來德國陸軍的機構和細胞核的創造者是塞克將軍。早在一九二一年，塞克就在暗地裏，和在報紙上忙於計畫一個完備的德國陸軍，並且把他的種種活動，謙卑地和協約國軍事管制委員會討論。他的傳記作者賴本諾將軍，在一九四〇年的勝利時期中寫着道，『假使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四年間，領導的中心只是適合小規模軍隊的需要，那就不容易做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九年的工作了。』例如凡爾賽條約要求把軍官團的人數，由三萬四千人減到四千人。德國人用了種種策略，來突破這個致命的界線，而且不管協約國軍事管制委員會的努力，重建德國陸軍的步驟，一直向前進行。

敵人（塞克傳記作者說）曾經竭力要消滅參謀本部，得到德國境內各黨的支持。協約國管制會，根據它的立場，曾經有好幾年，正當的想把較高級的參謀官員的訓練，弄得非常幼稚，使之沒有成立參謀本部的可能。他們曾經用非常大膽的手段，試圖發現參謀本部的軍官，究竟是在受些什麼訓練，但是我們居然保持秘密；關於制度及教授的課程，不曾透露分毫。塞克始終不讓步；因為假使參謀本部被人毀壞，那就很難重新建造……雖然參謀本部的形式已經破壞，它的內容是保留住了……

實際上，有好幾千穿便衣的參謀軍官和他們的助手，假託建設部、研究部及教育部人員等名義，聚住在柏林，在深切的考慮過去和未來。

賴本諾還有以下一段透澈的言論：

沒有塞克，今天（一九四〇年）便沒有德國意味的參謀本部，因為這個組織，必須經過好幾代人們的努力，方可成立起來，無論軍官

們有如何的天才，如何勤勞，它不是旦夕之間可以成功的。觀念的連續，是領導者在疑忌不定的實際考驗中所必需的憑藉。個人的知識或能力是不够的。在戰爭中，多數人的有組織發展的能力是必要的，這種集體能力需要幾十年纔能培植成功……在一個小型的十萬人組成的軍隊，如果將軍們不至成爲小派，那就必須創造一個偉大的理論上的結構。爲這種目的起見，就採用了大規模的實際演習和戰爭競賽……不祇是訓練參謀本部，尤其是要創造一個比較高級的司令官階級。

這些人將可以作全面戰爭的思想。

塞克主張應該避免在大戰中個人經驗上所發覺的錯誤理論。所有那次戰爭中的教訓，都經過透澈的及有系統的研究。新的訓練原則及各種教課都經採用。一切現有的操典都重新編訂過，不是爲那十萬名軍隊，而是爲德意志帝國的武裝兵力而編訂的。爲規避協約國查出情弊，這些操典的全部項目，用特別字體印成，而且是公開的。但是操典中專供內裏人研究的部分，卻是秘密的。他們所諄諄教誨的主要原則，就是所有重要武器必須密切合作。不但主要的隊伍——如步兵隊、摩托化騎兵隊及砲兵隊——應該在戰略上打成一片，而且機關槍隊、塹壕砲隊、手提機關槍隊、平射砲隊、陸軍航空隊以及其他種種，亦應互相混合。一九三九年及一九四〇年戰爭中，德國各軍事領袖，都認他們戰術上的成功，是全仗這種理論。一九二四年，塞克已可覺得德國陸軍的兵力已在慢慢的增加，超過十萬人限制之外。這位替他作傳記的人說：「其結果，不到十年就產生了。」一九二五年，老年的陸軍元帥麥肯生，對於塞克建成德國陸軍，曾向他致賀，並把塞克比作沙恩霍斯德。這沙恩霍斯德，就是在法軍攻取耶拿後佔領德國境幾年內，秘密組織普魯士軍反攻拿破崙的人。麥肯生又說：「舊日的火勢，仍熒熒未熄，協約國的管制，並不會損毀德國兵力上任何一種永遠存在的原素。」

一九二六年夏天，塞克曾用旗杆和信號，舉行最大的司令官軍事演習。那時他並沒有軍隊，但實際上所有將軍們、司令官們及參謀本部的軍官們，都經他引導而熟習戰爭技術，以及大德國陸軍無數的技術問題，這樣的準備，只須一旦時機到臨，便可把德國民族，提高到和先前一樣的地位。

他們在官署以外實行小規模的短期兵役訓練，已經有好幾年了。這些受訓練的人員，被稱爲「黑兵」，也就是所謂不合法的兵。從一九二五年起，這些「黑兵」，便被全部集中於德國陸軍部，由國家經費來維持。參

謀本部的一九二五年計畫，企圖在條約限制以外擴充並改良軍隊，想把現有合法的七個步兵師，增加一倍，再由兩倍變成三倍。但是塞克的最後目標，是至少成立六十三師。從一九二六年起，這個計畫遇到的重大阻礙，就是普魯士社會民主黨政府的反對。社會黨政府，現在剛被推翻了。十萬名軍隊的名額，直至一九三三年四月纔公然超過限額，雖然軍隊的實力，在早些時日內已有不斷超過限制的情形。

在羅加諾會議後的善意及各種希望中，英國及法國政府採取了一個雖非無可補救，但頗成問題的決定。這就是，撤退協約國管制委員會，而為代替起見，成立一個由國際聯盟主持而經各方面同意的調查計畫，準備於任何一方面要求時付諸實行。有人認為這一種部署，可以成為羅加諾公約的補充條款。但這個希望，並沒有實現。福煦元帥曾報告，說有效的德國解除軍備，現在已經實行了；但是應該承認，一個具有六千五百萬人口的国家，是不能永遠維持解除軍備狀態的，所以另外必須要有若干預防的政策。雖然如此，一九二七年一月，協約國管制委員會從德國撤退了。當時大家已經知道，德國人正在用許多隱蔽的、不顯著的方式，曲解凡爾賽和約，而他們無疑的正在訂定使德國再成爲一個武力國家的紙上計畫。他們有童子軍，有士官團，以及由青年及退伍軍人所組成的許多沒有武裝的義勇隊組織。但是在陸軍或海軍任何事情，如果大規模的來幹，就無法避免爲大家周知。至於實施強迫國民兵役，成立空軍，或超過凡爾賽和約的限制，建造戰艦，那就是等於公然違背德國應守的義務，任何時間，都可以在國際聯盟中提出來，何況現在德國亦是國聯會員之一了。

講到空軍，那是更加難於解釋明白。凡爾賽和約禁止德國設立空軍，所以一九二〇年五月，德國空軍，便被正式解散。塞克在他的告別命令中說道，他希望空軍會將再成立，同時空軍的精神，依然存在。他對空軍用盡了種種鼓勵的方法。他的第一步驟，就是在德國陸軍部裏，成立了一個由有經驗的舊日空軍官員所組成的特別團體。它是瞞着協約國委員會暗中成立的，而且連他自己的政府也不讓知道。這個團體，以後逐漸擴大，直到陸軍部中各部分辦事機關都有所謂「空軍細胞」，而空軍人員，亦逐漸的被引進陸軍內部，遍布於陸軍各

幹部之間。民用航空部的部長是一位有經驗的戰時軍官，是由塞克所指派的人；他把民用航空的管理和發展，配合軍事需要。民用航空部、德國民用航空公司以及各種偽裝的，表面用其他名義的陸軍或海軍航空機關的人員，大部分是以前並無商航智識的航空軍官。

甚至在一九二四年以前，德國全境就有了飛行場和民用飛機廠的設置，航空員的訓練，及消極防空的教導。那時已有許多合理的商業航空飛行表演，並且還有那結構成網的許多滑翔俱樂部，以鼓勵大量的德國的男女，使他們養成『航空意識』。關於准許從事飛行的民用航空人員數額的嚴格限制，在紙面上是遵守的。但是這些規則，以及許多其他規則，都被塞克濫混過去了。他得着德國運輸部的暗助，為強大的航空工業及未來的空軍力造成了堅固的基礎。照一九二六年的協約國的心理，還以為如果過分抑制這些德國的違約舉動，未免太傷德國國家的體面；因此，勝利者就停留於禁止德國成立空軍一原則的界限之上。這個界限，已經證明是一個極空泛而漂渺的東西。

關於海軍方面，德國人也是實行同樣的掩飾手段。依照凡爾賽和約，德國只准保留一個小規模海軍，最高兵力不得超過一萬五千人。德國就用狡猾手段來增加人數，超越限額。各種海軍組織，經祕密的藏納於各民政機關之中。在黑列哥蘭及其他各地的陸軍沿海要塞，因為沒有按照凡爾賽條約的，予以撤毀，不久即由德國海軍砲兵人員，一起接收過來。潛水艇亦私自建造了，而潛艇的軍官和人員是在別國訓練的。他們為保持德皇時代海軍的生存，為準備將來有一天能夠公然恢復海上的地位，一切可能做到的事，都已做了。

其他斷然的方針，亦有重大的進步，拉瑞諾在一九一九年他職掌建設部的任期內，即已用種種最廣大的方針，着手於德國軍事工業的建設。他曾很着實的告訴各位將軍們說道：『他們固然已經毀壞了你們的兵器，但是這些被毀壞的兵器，恐怕在下次戰爭以前，早已成爲廢物，在任何方面都是無用了。下一次的戰爭，是要用簇新的武器來打仗，而且是，不爲陳舊武器所困累的軍隊，才會獲得大大的利益。』

雖然如此，德國的參謀人員，在協約國管理下的幾年中，沒有一年不是在積極鬭爭，想把原有的兵器保

留，不讓銷毀。每一種瞞騙的方式，每一種阻撓兵器銷毀的行動，都避開了協約國委員會的耳目。施行狡猾手段的工作，組織得非常綿密。德國的警察，起先對這種行為，還加以干涉，不久亦成爲幫同陸軍部收集武器的人。他們並成立了一個保藏軍器和軍用設備的組織，表面上是用民衆團體的名義，以作掩飾。從一九二六年起，德國全境，都有這個保藏軍器組織的代表。各種保藏軍器的倉庫，星羅棋布，成爲一個倉庫網。創造供將來生產軍用品的機器的方法，更爲巧妙。以前會供軍用及可以改作軍用的車床，都被保留着供人民的普通生產；所保留的數量之大，遠過於足供尋常商業用途的需要。爲戰爭而建立的許多國家兵工廠，都沒有依照凡爾賽條約予以封閉。

一個一般的計畫，就因此付諸實行了。由於這個計畫，所有由英、美建設借款來開辦的新的工廠，以及舊的工廠，開始就經他們設計，迅速變爲軍工廠。關於他們設計這件事的底細及詳情，可以寫成幾部書。拉瑞諾已於一九二二年慘被反對塞姆族的新生的納粹祕密社會暗殺，這些人，都痛恨這個猶太人——德國的忠實僕人。一九二九年獲得政權的白魯寧，就很熱誠的審慎的來繼續推行這個工作。所以，當勝利者還是在一大堆陳舊無用的軍事設備上面高枕而臥的時候，無量數的德國新武器，已是一年一年的產生出來了。

一九一九年，英國戰時內閣曾經決定，軍事各部門在編製他們的預算方面，應該假定『不列顛帝國，在以後的十年中，不會從事任何大戰，不會需要遠征軍，』作爲減政的一部分。一九二四年，本人出長財政，便請求帝國國防委員會將這個規則再加審查；但是沒有人提出修改。一九二七年，陸軍部建議，一九一九年的決議，在陸軍方面應該只包括『從現在的日期』起的十年之內。內閣及帝國國防委員會便都核准了這個建議。一九二八年七月五日，這件事又提出討論，那時我就以接受的態度提議「軍事各部門的預算編製，應該以『十年之內沒有大戰』一句話來作基礎，而且這個基礎應該是一天一天向前推移，但這個十年無大戰的假定，應該每年由帝國國防委員會予以覆核。」我這個提議，讓任何軍事各部門或殖民政府，在他們認爲應該討論的時候，

即可自由提出討論。

有人曾經發表意見，以為接受了這個原則，使戰爭機關，陷於錯誤的安全感中，忽略了研究，使祇有目光限於短期的見解得以流行，尤其是牽涉到支出方面。直等到一九二九年我離開了財政部，我還感覺很有希望，以為世界和平，或可維持，因為我覺得那時並無採取任何新決定的理由；而事實上亦沒有任何足以證明我的錯誤的地方。戰爭直到一九三九年的秋天，方纔爆發。在這個局勢不穩定的世界，十年的光陰真是長久時間了。這個一天天推進的『十年無大戰』規則，繼續實行到一九三二年，麥唐納的政府於那年三月二十三日，便正當的決定，可以把這個規則取消了。

在這時期，協約國在實力方面及權利方面，都可以阻止任何看得見的或覺得着的德國重整軍備，而德國對於英、法、意各國的堅強聯合要求，也一定會服從，而使它的行動，遵守和平條約的規定。我們把一九三〇年起，到一九三八年止的歷史，再看一遍，就可看出我們有多少時間可以如此做法。至少到一九三四年，我們還可以不損一兵一卒來阻止德國的重整軍備。我們所缺少的不是時間。

第四章 希特勒

一個雙目失明的伍長——出身不明的領袖——一九二三年的慕尼黑暴動——『我的奮鬥』——希特勒的問題——希特勒與德國陸軍——施萊徹的陰謀——經濟風暴的襲擊——國務總理白魯寧——一個立憲君主政體——軍備平等——施萊徹的阻撓——白魯寧的下台。

一九一八年十月裏，有位德國伍長，於英軍攻擊科民附近時，被綠氣侵害，弄得他的眼睛，暫時竟成盲瞎。當他睡在波美拉尼亞的病院中的時候，德國全境於戰敗之餘，革命四起。他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奧國稅關官吏的兒子，在青年時，曾經夢想成爲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因爲不能進入維也納的藝術學院，他便住在維也納過貧苦生活，以後又遷到慕尼黑。他有時做油漆房屋的工作，但普通以做短工的時間爲多，過極爲貧苦的生活，心中蓄着深切的怨恨，以爲社會不讓他成功。他所遭的種種不幸，卻沒有使他參加共產主義的陣營。他來了一個誠心的向後轉，愈加深切的懷抱着異常的忠愛種族觀念，和熱烈的、不可思議的崇拜德國及德國民族的心理。戰爭爆發，他便踴躍從軍，在西線巴伐利亞聯隊中服役了四年。這就是亞道爾夫·希特勒早年的命運。

一九一八年冬天，當他眼睛看不見，熒熒無援的臥在病院裏，他本人自己的失敗，似乎已和整個德國人民的苦難合而爲一了。全國震驚的戰敗，法律和秩序的崩潰，法國人的勝利，使這個傷勢纔愈的聯隊士兵，又陷於銷身蝕骨的苦悶中，而滋生出那些凶惡的、無限量的、足以左右人類生死的精神力量。德國的失敗，在他看來，以爲照通常的事勢過程，是難以索解的。他以爲其中必有一個巨大而可怖的通謀敵國情事。在寂寞和幽閉之中，這個小兵，便只憑他自己那狹小的識見，去推究德國發生失敗禍變的原因。他曾經在維也納和極端的德國國家主義派混在一起，因此他便聽到許多關於諾狄克種世界內另一種族，另一仇敵、另一剝削者——猶太人——的惡毒而陰險的活動故事。他那愛國的熱憤，便與他的嫉忌富有、嫉忌成功之心，冶爲一爐，鍊成了一

個威懾一切的憎惡心。

最後，他就像一個普通的病人一樣，離開病院，仍是穿着制服。他對於軍服，差不多具有學校兒童對制服所抱的那種得意氣概。這時候他的新醫好的眼睛，看見了些什麼呢？戰敗的騷亂是可怕的。在失望和狂暴的空氣中，他的周圍，閃現出了赤色革命的輪廓。裝甲車在慕尼黑的街市橫衝直撞，向着茫無所歸的不逞之徒散布傳單和子彈。他自己的同事們，在制服上加上了公然挑戰的紅色臂章，在瘋狂的呼喊口號，反對地球上他所喜歡的一切。像在做夢一樣，一切都突然間變成清清楚楚了。德國已經被猶太人，被站在前線後面的發國難財者和通敵者，被可恨的布爾塞維克黨人中猶太知識份子的國際陰謀，用暗箭傷害，用利爪搏倒了。他看見照耀在他前面的，是他的責任，是要把德國從這些疫癘一樣的禍害中拯救出來，要對危害德國的惡人施以報復，要領導這個做主人的種族，回到他們那久已註定的運命。

在他這一聯隊的軍官們，因為部下那種騷動的革命的情緒，大起恐慌；無論如何，很歡喜找到一個似乎可以操縱全局的人。伍長希特勒願意仍舊留在軍中，找了一個『政治教官』即特派員的職務。在這種姿態之下，他收集了關於叛變及陰謀計劃的情報。當時他在一位保安軍官下面工作。他奉命去參加當地五光十色的各政黨會議。一九一九年九月裏有一天晚上，這位伍長出席在慕尼黑一家釀酒所裏召集舉行的德國勞工黨會議，他第一次聽到別人所發的言論，和他內心所信如合一轍，一樣的在談論打倒猶太人，打倒投機分子，打倒對那致使德國墮入深淵的『十一月各罪犯』。九月十六日，他便加入這黨，不久，為配合他的軍事合作，他便擔任黨的宣傳事宜。一九二〇年二月，德國勞工黨在慕尼黑舉行第一次大會，在會議中希特勒便支配了會議的決議，而把黨綱規畫了二十五個要點。這時希特勒已成為一個政客了。他的救國運動就開始了。同年四月，他被解雇，他以整個生命，致力於黨的擴張。在翌年的中間時期，他就把原有黨內領袖，一概逐出，並且，用他的熱情和天才，強迫那些被催眠的同志，接受他個人的控制。這個時候，他已經是『領袖』了。他收購了一個營業不振的報紙——人民觀察報，作為該黨的機關報。

共產黨員不久便認出了他們這個仇敵。他們企圖破壞希特勒的集會，於是在一九二一年快要終了幾天內，希特勒組織了他的衝鋒隊。直到此時為止，所有的一切，都是發生於巴伐利亞的當地人士之間。但是，因為戰後起初數年中人民生活上的困苦，德國全國各地就有許多人開始聽受這個新的福音。一九二三年，法國佔領魯爾，德國全國都大為憤慨，由是使現在稱爲國家社會主義黨的黨員，大大激增。馬克的崩潰，消滅了德國的中等階級，其中有許多人在絕望之中，變成了這個新黨的黨員，於仇恨、報復、及愛國狂熱之中，找到了他們苦痛的救星。

希特勒一開頭就明白認識，要獲取政治權力，須從激烈反抗由戰敗恥辱而產生的韋瑪共和政府入手。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這位『領袖』在身邊就有了一羣堅強的黨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戈林、赫斯、羅森培、及羅姆，這些行動人員認定奪取巴伐利亞邦政權的時機已經到了。魯登道夫將軍亦把他名字所代表的軍事聲威，爲這次冒險行動張目，而且在暴動中他領隊前進。在戰前人們常說：『德國是不會有革命的，因爲在德國一切革命都是嚴厲禁止的。』慕尼黑黑的地方當局在這次事變中，重新恢復這個觀念。警察開了鎗，但是很仔細的不打在魯登道夫的身上，魯登道夫將軍便一直邁步前進，跑到警察的隊伍當中深受敬禮。示威者差不多死了二十人，希特勒把身子撲倒在地，和其他領導的人逃出肇事場所。一九二四年四月，希特勒便被判處四年監禁。雖然德國當局已經把秩序維持了，德國的法院亦把肇事的人加以判處了，但是國內各地的觀感，都以爲當局是在打擊他們自身的血肉，是在爲外國人服務，犧牲德國最忠實的子孫。希特勒的刑期就由四年減爲十三個月。他住在蘭德斯堡獄中的幾個月裏，足夠使他完成我的奮鬥一書的綱要，這本書是他爲紀念最近暴動死者而作的、關於他的政治哲學的著作。當他後來獲得政權以後，沒有其他比這本書更值得所有協約國軍事和政治上統治者作更仔細研究的了。德國復活的方案，黨務宣傳的技術，攻擊馬克思主義的計畫，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概念，德國理應站在世界最高峯的地位，諸如此類，都在書中寫得明明白白。這是關於信仰和戰爭的新可蘭經，誇大、冗贅、沒有格式，但是含有它的使命。

我的奮鬥的主旨是簡單的。人是一戰鬪的動物，所以由戰鬪者集合而成的民族，便是一個戰鬪的單位。任何有生命的有機體，如果停止求生存生存的鬪爭，那是註定了要絕滅的。一個停止戰鬪的國家或種族，也是同樣註定要滅亡的。一個種族的戰鬪力，是依它的本質是否純粹來確定的。所以一個種族，必須要脫離外國的沾污。猶太種族，因為它的普遍性關係，必然是和平主義的和國際主義的。和平主義是最萬劫不復的罪惡，因為和平主義，簡直就是種族在生存競爭中提出投降。所以每一國家的第一職責，就是使民衆成爲國家所有；個人方面的知識，並不是第一要件；意志和決心，纔是最主要的品性。生而有指揮能力的人，比較無量數只具附從性質的人，價值高貴得多。只有暴力纔能保障種族的生存，所以軍事方式是必要的。種族必須鬪爭，苟息的種族，必定會腐化、死亡。假使德國種族在早就團結一起，或者早已做全地球的主人翁了。新的德意志帝國，必須把所有散在歐洲各處的德國分子統統集合在她的懷抱之中。一個遭受失敗痛苦的種族，可以由恢復它的自信力，而獲得拯救。最首要的事，就是把軍隊訓練得相信自身是無敵的。爲恢復德國國家，必須使人民確信用武器的力量來回復自由是可能的事。貴族政治的原則，根本上是健全的，理智主義是要不得的。教育的最後目的，是要產生一個可以用最低限度的訓練，使他成爲軍人的德國人。要沒有狂熱的歇斯底里式的推動力，歷史轟天裂地的變動是不可思議的。主張和平與秩序的平庸德性，沒有做成過一件事。世界現在已在轉向這樣一個變動了，而新的德國，必須保證我們的種族，在這個地球上最後及最大的決定中，未雨綢繆，有所準備。

外交政策，是可以不擇手段的。外交的任務，不在於使一個國家英勇的失敗，而是使國家能夠繁榮和生存。英國和意大利是德國唯一可能締結同盟的國家。沒有一個國家，會和受民主黨及馬克思派統治的卑怯和平主義國家締結同盟的。德國一天不能自己防衛，一天不會有人來維持她的生存。她所喪失的省分，決不能由叩訴上天或虔誠希望國際聯盟拿得回來，只有施用武力，纔可物歸原主。德國決不可重走同時對所有敵人攻擊的覆轍，它必須選定其中最危險的一個敵人，用全力加以攻擊。只有到了德國恢復權力平等，恢復她在太陽下的地位時候，世界纔會停止反對德國。德國的外交政策，絕對不許有情感用事。如果純粹爲感情上的理由來攻擊

法國，那就是愚蠢。德國所需要的，就是增加她在歐洲的土地。德國在戰前所施的殖民政策，是錯誤的，應該放棄。德國必須着眼於向俄國、尤其向波羅的海諸國去發展。對俄國同盟是不能容許的。和俄國聯合來與西方各國作戰，便是罪惡，因為蘇維埃主義者的目的，就是國際猶太主義的勝利。

這些就是希特勒政策的『精華』。

希特勒這樣不停的鬭爭及逐漸出露頭角而成爲國家人物，受着自己國內糾紛及黨爭的壓迫和困擾的勝利者，竟不曾加以注意。國家社會主義，就是後來所謂『納粹黨』，經過相當長時期後，纔對於德國民衆，對於武力方面，對於國家機構方面，對於那些並非無緣無故恐怖共產主義的工業家取得非常堅強的控制，纔成爲世界注目的德國生活上的一種威力。一九二四年希特勒從獄中獲釋時，他曾經說，他爲重新組織他的運動，恐須五年之久。

韋瑪憲法的民主的條款之一是規定國會每兩年選舉一次。人們都希望由這個條款，來確保德國人民享有完全的繼續控制國會的權利。自然，實際上這個條款，只是使他們生活在一個連續的狂熱政治刺激和不斷選舉的空氣之中，因此關於希特勒和他的主義的進程，存有精確的登錄。一九二八年，他在國會所佔的議席，只有二十八席；一九三〇年，成爲二百零七席；一九三二年，就有二百三十席了。在那時候，德國整個機構都感染了國社黨的作用和薰陶，而對於猶太人的各種威嚇、侮辱、和暴行，便到處蔓延開來。

在本記載中，對於此種複雜的可怖的事勢發展，用不着一年一年的把它所有的情感衝動情形、所有的殘暴行動、所有的種種經過，詳細敘述出來。羅加諾的黯淡日光，只不過曇花一現。大量美國借款的支出，引起了一種回復繁榮的觀念。與登堡元帥做德國的總統了，而斯特曼斯曼是他的外交部長，沈着的合乎禮法的大多數德國民衆，爲應他們那根深蒂固的嗜愛、偉大、和莊嚴權力之心的要求，便依附於與登堡之下，直到他臨死方纔罷休。但是其他有力量的種種原動力，亦在這個苦悶的國家中從事活動，因爲韋瑪共和政府，對這個國

家既不能予以安全之感覺，亦不能滿足人民期求國家光榮和報復的心理。

戰後數年間，德國的真正政治權力和持久性的機構，並不是勝利者所安排而且帶有失敗色彩的共和政府及民主制度，乃是處在這個虛飾的共和民主外表後面的德國陸軍的參謀本部。總統和內閣的任免，其權就操在這些人的手中。他們認定了興登堡元帥是他們權力的象徵，是他們意志的動作力。但是一九三〇年興登堡已是八十三歲了，從這時候起，他的性格和精神上的掌握力，都不斷的衰頹了。他已逐漸成爲成見甚深無定向的、衰老的人。在戰爭中，興登堡已經被造成爲一個偉大的偶像，可是現在，德國的愛國志士，卻以希望他早些歸天，來表示他們的敬仰了。這句話，是確切的說明現在的興登堡，已經變成了一個『木頭做成的泰坦神像』了。若干時來，將軍們已經明白他們應該物色一個滿意的領袖來繼承這位耆年的元帥了。但物色新人之舉，卻被國社黨運動的猛烈的發展和勢力攔截住了。一九二三年慕尼黑暴動失敗以後，希特勒曾經發表過一個嚴格合法、而不超越韋瑪共和政府體制的黨綱，但是同時他卻鼓勵並計畫擴展納粹黨內軍事及防衛組織。突擊隊或『褐衫黨』以及小而經過訓練的核心組織希特勒衛隊，人數和勢力都大爲增加，使軍部對他們的活動和力量，發生嚴重的驚惶。

領導突擊隊的，就是那位德國的投機軍人羅姆，他是希特勒的同事，而且在以前鬪爭的幾年中，始終是希特勒的親信朋友。羅姆的任褐衫隊的總參謀長，是一個極有能力和胆量的人，但是爲個人的野心所支配，而且是一個性變態者。他的劣行，並沒有阻礙希特勒和他的合作，他們依然是共同循着那條艱苦而危險的謀取政權的途徑上走。正如白魯寧所訴說的，突擊隊已經把舊有德國國家主義派的組織，多半吸收在內，包括曾於一九二〇年間在波羅的海區域及波蘭作戰、攻擊布爾塞維克黨的自由團，還有鋼盔團的國家主義派退伍軍人組織。

陸軍部在極度審慎考慮國內潮流趨勢之中，不得不確信以他們那樣一個和納粹運動對立的軍事組織，恐怕不能統治德國了。這兩派都是同樣決心想把德國從地獄中拯救出來，都想報失敗之讎，但是陸軍是代表有秩序的德皇時代帝國機構，並且是保護德國社會中的封建階級、貴族階級、地主階級、及富裕階級的；而褐衫隊大

體上已成爲一個革命運動，是由性情激烈或心懷不平的破壞分子，和失敗絕望者拼死不顧一切，煽動起來的。他們和所非難的布爾塞維克黨，彼此意見的相左，就像南北兩極的天差地遠一樣。

在陸軍部看來，和納粹黨鬭爭，不啻是把這戰敗的德國，撕成粉碎。一九三一年及一九三二年間，陸軍中各領袖都覺得，爲他們自己及爲國家前途打算，他們必須和那些曾在內政方面、用着全部德國人所有的剛強和嚴酷心理來反抗他們的人聯結起來。至於希特勒方面，雖然他準備爲了攻取政權的城堡，不辭採取任何式樣的攻擊武器，但是在他常常嚮往那些領導偉大燦爛德國時代的領袖人物，他們在他年青的時候，曾經獲得他的敬仰和効忠。所以他和陸軍部雙方的成立協約，乃是很簡捷、很自然的事實。陸軍的首領們逐漸認識納粹黨在國內的勢力，已經到了只有希特勒纔能繼承與登堡爲德國元首的程度。而希特勒方面，也知道要想實施他那復興德國的計畫，那就非和當政的陸軍階級成立同盟不可。於是交易一經定當，德國的陸軍領袖們便開始勸請與登堡承認希特勒是最後可能做德國總理的人。希特勒則允許制止褐衫黨的活動，允許把褐衫黨徒受參謀本部的統轄，並且允許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把這些褐衫黨予以最後的清算；就在這些承認的條件之下，希特勒得到了德國統治勢力的歸順，得到了正式的行政主宰權，得到了明確的德國國家元首的繼承權。這位伍長，步步高陞，已是升得很高了。

不過，內部還有一個另外的複雜情形。如果說德國陸軍的參謀本部是任何德國內部各勢力總聯合的鎖鑰，那就有好幾隻手在想握取這把鑰匙。這個時候，施萊轍將軍操有一種機微的、有時具決定性的勢力，他是那後備的有潛勢力的軍人界的政治導師。各黨各派對他都抱有相當的懷疑心理，都認他是一個靈敏而有用的政治人員，具有參謀部典範的許多知識，與士兵通常不甚接近。施萊轍久已確認納粹運動的重要性，和有予以遏止及控制的必要。反之，他又看出，這種可怖的暴徒橫行，及其日益擴張的私有的褐衫隊軍隊，是一件可以利用的武器，如果參謀本部的同僚，運用適當，可能重新造成德國的偉大地位，並且說不定還可造成他自己的地位。施

萊轍存了這個念頭，他就於一九三一年中，開始和納粹突擊隊參謀長羅姆進行秘密圖謀。可是，這樣一來，工作上發生了雙軌齊下的情形，參謀本部和希特勒作直接的談判，而施萊轍就在他們當中，和希特勒的主要副官，並且是可能成爲希特勒勁敵的羅姆，進行他個人的陰謀。施萊轍和納粹黨的革命份子的接觸，尤其是和羅姆的接觸，直等到三年後他們兩人被希特勒下令槍殺的時候，方纔終止。施萊轍等一死以後，當然使政治局勢以及對劫後生存的人，簡單化多了。

轉瞬之間，經濟的風暴，又來接替着攻擊德國。美國各銀行，鑒於國內業務日漸增多，都不肯增加他們那種草率的對德貸款。影響所被，弄得德國工廠到處停閉，許多企業亦突然的趨於瓦解，這些工廠和企業，都是德國和平復興所依賴的根本。一九三〇年冬天，德國的失業人數，增加到二百三十萬人。同時賠償問題，亦走入一新的階段。在過去三年內，美國委員楊格，曾經主持德國的預算，並曾收集協約國要求德國償付的大宗款項，其中包括付給英國的賠款，經我之手自動的移交美國國庫。這個制度，當然是不能持久的。早在一九二九年夏季，楊格在巴黎草訂，提出和談判了一個重要的減低賠款的計畫，不但對賠款的償付設定了一個最後的限期，並且使德國國家銀行及德國各條鐵路，都脫離了協約國的控制。此外又規定把賠償委員會予以撤消，另行設立一個國際清算銀行。希特勒和他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就和那位獷悍而爲時甚暫的商業巨子胡根堡所代表，並有相當領導力量的商業勢力，連成一氣。他們發動了一個沒有效果而很野蠻的運動，反對協約國所提供的這個遠大而仁慈的通融辦法。德國政府使盡了十二分的力氣，纔勉強的使德國議會，以二百二十四票對二百零六票通過了『楊格計畫』。此時奄奄一息的德國外交部長斯特婁斯曼，於請求協約國軍隊全部撤離萊茵區一事，亦獲得他的最後成功。萊因撤兵，終於遠在凡爾賽條約規定的期限以前，便實現了。

但是德國的羣衆，對於勝利者的大讓步，大體上是表示冷淡。在早先，或者在比較快樂的情勢下，勝利者這種讓步或許會受到歡迎，被認爲是走向重歸舊好和實現真正和平的一大步。但是現在，德國一般羣衆正在面

臨着一個時刻存在的、陰暗的失業恐怖。中產階級因馬克的貶值，早已崩潰，並已挺而走險。國際經濟壓力削弱了斯特婁斯曼在國內的政治地位；希特勒所領導的納粹黨和胡根堡所領導的大資本家，對斯特婁斯曼攻擊不遺餘力，卒於把他打倒。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天主教中央黨的領袖白魯寧，出任國務總理。

白魯寧是一位威斯特發里亞邦的天主教徒，而且爲一位愛國志士，想以現代民主政治做外表，重建以前的德國。他繼續研究拉瑞諾於未遭暗殺前所擬的軍事工廠計畫。他亦曾從事財政上的奮鬥，想在層見迭出的混亂中，維持財政的穩定。他的節約和裁減文官人數及俸給的方案，並不爲一般所歡迎。怨憤的潮流，只有更趨狂烈。由於與登堡總統的支持，白魯寧解散了一個敵對的國會，而在一九三〇年的選舉中，使他在國會中得占多數。他現在就用最後一次明顯的努力，來重新號召舊日德國的殘餘勢力，反對復活的、暴烈的、及惡劣的國家主義者的騷動。爲了這個目的，他第一步就要設法確保再選與登堡做總統。白魯寧希望有一個新的、很明白的解決。他看出只有恢復帝制，方可造成德國的和平、安全、與光榮。如果與登堡再度被選爲總統，白魯寧能否勸動這個高年的元帥，於他的最後任期內成爲預備在他死後恢復帝制以前的攝政者呢？這個政策如果成功，必已使希特勒此時顯然正在努力謀取的德國國民最高地位的空缺有了着落。就一切情勢來看，這個政策，是一條正當路徑。但是白魯寧怎麼能把德國引導到這條路上呢？已在傾向希特勒的保守黨份子，或者因爲鑒於德皇威廉復辟，可以使他們回轉頭來；但是無論社會民主黨或工會的各勢力，都絕對不許老德皇或皇太子捲土重來，再做國家的元首。白魯寧的計畫，不是要再造成一個第二德意志帝國，他要想建立一個照英國方式的立憲君主政體。他希望德皇太子的諸子中，能夠有一個可以成爲憲政君主的適當人選。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白魯寧便把他的計畫，向一切有待其決定的與登堡密陳。這位年老元帥的反應是激烈而奇特的，他表示了驚異和敵對的態度。他說，他自認只是受了德皇委託的人，任何其他解決辦法，都是侵侮他的軍人尊嚴。他所專心嚮往的君主政體概念，與在皇子中挑選一人當皇帝的辦法，是不能協調的。皇位的

合法繼續手續，是絕對不容破壞的。同時，因為德國人既不願德皇返國，那麼剩在德國的，就沒有別人，祇有興登堡他自己。他說到這裏為止。他是不肯妥協的。他說：『我在這裏，我就留在這裏。』白魯寧和這位年老的宿將，作了一番激烈的，也許太長的爭論。這位國務總理，有一個強有力的理由。除非興登堡肯接受這個雖然不合正統的君主政體解決辦法，革命的納粹獨裁，一定會出現，可是兩人並沒有得到協議。但是，不論白魯寧是否能使興登堡回心轉意，這再選興登堡做總統的事，卻是非辦不可的，因為這樣，至少可以避免德國國內立刻之間發生政治的崩潰。白魯寧的計畫，在第一個階段上是成功的。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實行總統選舉中，興登堡於第二次投票結果，佔獲多數，制勝了他的勁敵希特勒和共產黨員塔爾曼。可是現在卻須來面對國內經濟情勢和對歐關係兩個問題了。裁軍會議正在日內瓦開會，而希特勒卻在推動一個狂吼的運動，反抗凡爾賽條約下德國的恥辱。

白魯寧在審慎的思慮當中，草擬了一個遠大的修改凡爾賽條約計畫；並且，在一九三二年四月間，他跑到日內瓦，受着出乎意外的優渥款待。在他和麥唐納、史汀生、及道威斯談話當中，似乎頗有成立協議的可能。這次談話的特殊基礎，是德法『軍備平等』，不過這個原則，受各種保留意見的解釋。事實上很奇怪，任何腦筋正常的人，竟會以為和平可以在這種基礎上建立起來似的，這在以後幾章中就要講到。假使勝利者對這一個重要點肯讓步，那也很可以把白魯寧從他的逆境當中援救出來，於是第二個步驟——這是高明的步驟——恐怕就是為歐洲復興而取消賠款了。假使果然如此解決，那一定已經把白魯寧個人的地位，抬高到勝利的境地了。

美國特派的無駐在國大使台維斯，曾經打電話給法國總理泰狄歐，請他立刻從巴黎到日內瓦來。那曉得白魯寧真是不幸，泰狄歐已經得到了其他消息。這時施萊徹正在柏林大事奔忙，並且不遲不早剛巧先一步警告法國大使，叫他不要去和白魯寧談判，因為白魯寧馬上就要下台了。或許泰狄歐對於『軍備平等』方案關懷到法國的軍事地位，因而不願談判，亦未可知。不管怎樣，泰狄歐到底不會到日內瓦來，而白魯寧便於五月一日回

返柏林。在這樣一個時際，白魯寧竟兩手空空的到了柏林，這便是他的致命傷。爲應付德國內部感受威脅的經濟崩潰，還得需要非常的、甚至拚死的手段來對付。白魯寧這個失去民心的政府，已經沒有相當的力量來實施此等手段了。白魯寧在五月中足足奮鬥了一個月，而同時泰狄歐於變化無窮的法國議會政治中，亦被赫里歐取而代之。

新法國總理宣布他本人準備商討日內瓦談話中的方案。道威斯便奉命催促德國總理迅速日內瓦，不可遲延片刻。五月三十日晨，白魯寧接到這個電報，但是此時施萊轍的努力，已告成功。奧登堡已經聽信人言，決定解除白魯寧職務。就在這一天的早晨當中，於美國的邀請電報以及電報中所代表的一切希望和輕率舉動，達到白魯寧面前之後，他知道他的命運已經完結；到了中午他便自動辭職，以免正式明令免職。在戰後的德國中，最後一個或者可使德國人民享受安全和文明憲政幸福而開睦鄰通路的政府，就是這樣的告終了。假使沒有施萊轍的陰謀和泰狄歐的延誤，則協約國對白魯寧所提的建議，當然定已把白魯寧救了轉來。現在這些建議，就該和一個與前不同的政府及一個與前不同的人物來討論了。

第五章 蝗蟲的年代（註）（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

麥唐納·鮑爾溫聯合政府——印度的渙解——全德騷動——興登堡與希特勒——施萊轍的急救失敗了——希特勒成爲總理——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國會火燒——希特勒在選舉中得到多數——新主人——質的裁軍——一九三二年的德國——一九三三年英國空軍預算——軍備狀態的平等——『麥唐納計劃』——『謝謝上帝給了我們法國陸軍』——希特勒退出國際聯盟——紐約的新冒險——卻特威爾的靜謐生活——若干聰明的朋友——瑪爾巴洛公爵的戰場——『普齊』——保守黨的態度——遠東的危機——日本進攻中國——
總帳

一九三一年普選結果所產生的政府，從表面上看是英國紀錄上最強的，而實際上卻是最弱的政府。首相麥唐納脫離了他畢生從事於創設的工黨，雙方都抱着極端憤慨的心理。他的政府名義上雖稱舉國一致，卻由保守黨人占多數，此後他就在這個政府的卵育之下優游卒歲。鮑爾溫寧取實權，不在乎形式，退隱成爲幕後的操縱人物。外交部一職由西門爵士擔任，他是自由黨中一派的領袖之一。張伯倫擔任政府國內的主要工作，他不久即繼斯諾登任財政大臣，工黨因未能解決金融的危機，大受詬病，在選舉中慘受打擊，現在由極端和平主義者藍斯伯雷負領導之責。在這個政府的近五年期內，自一九三一年一月起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止，歐洲大陸的整個局面逆轉了。

新議會第一次集會時，政府要求對他們的印度政策作信任投票。關於這個問題，我提出下面的修正動議：
「茲議決以上政策不得使本院同意在印度訂立一照威士特敏斯脫法令所規定的自治領憲法……此際，任

註：四年後熟習聖經的國防協調大臣殷斯基伯爵士，用聖經上表達盡意的成句，把他躬逢其盛的這些慘澹的年頭，稱爲『爲蝗蟲吃光的年頭』（舊約約珥書第二章二十五節）。

何印度自治的問題，都不得侵害議會維持印度帝國和平秩序與良好政府的職責。」

這一次我發言長達一點半鐘，大家都聚神傾聽。但關於這個問題，也如後來對於國防問題一樣，無論一個人說些什麼，總不能使局面發生些微的變動。我們現在已經順着這條附帶的東方的路徑，達到了我們可怕的結局：幾十萬的可憐人民，原只期望在和平與公道的情形之下，謀取生活，現在陷於屠殺之中。我大胆向各黨愚昧無知的議員說：

英國的權力一時渙解了後，回教與印度教徒的舊有仇恨，就將重行復生，變本加厲，更爲惡毒。關於這種仇恨之心，我們是很難想像得出的。在印度，一生比隣相居的暴衆，在這種仇恨情緒之下，可以如中風狂，互相殘殺，親手把男女老幼撕成粉碎。自從英國被認爲即將失去其把握、相信只要提出要求即可使英國退出以來，印回關係的惡化，是一百年來所未曾有過的。

我們在議會應接室中，僅能徵集得四十多名同志，與下議院中三黨全體議員對抗。這必須視爲下坡路上一個不幸的里程碑。

同時全德國在騷動之中，重大的事件紛沓而來。

自從一九三二年五月白魯寧內閣下台後，一年中發生過許多事。巴本和熱中政治的施萊轍將軍，過去會想憑機詐和陰謀來統治德國，現在他們的時間過去了。繼白魯寧任總理的巴本，希望取得興登堡周圍親信和國會內極端民族主義派的擁護，統治全國。七月二十日他採取一種有決定性的步驟，普魯士的社會黨政府被迫去職。普魯士總理曾表示非用武力，他決不屈服，他得到的答覆是：『你要多大的武力？』說完便把他從桌子上拖走了。但巴本的對手正在積極圖謀奪取權力。照施萊轍的打算，他可以利用躲在希特勒蒸蒸日上的權力與名字背後，突然打入德國政治中的潛伏黑暗勢力，作爲奪取權力的工具。他希望使希特勒運動，成爲德國陸軍的一個馴服的僕人，並由此而使兩者都歸入他的掌握。施萊轍與納粹衝鋒隊領袖羅姆，自一九三一年便已開始發生接觸，至第二年更加擴大，使施萊轍和希特勒本人之間發生了確切的關係。似乎祇有巴本和興登堡對巴本的

信任，把他們取得權力的路徑阻塞了。

一九三二年八月，希特勒奉總統秘密召命到了柏林。更進一步的時期似乎就在眼前。這位領袖背後有一千三百萬德國選民的支持，他定必要求在政治中分占重要的地位。現在他處的地位，和向羅馬進軍前夕墨索里尼所處的地位，大致相同。但巴本並沒有理會意大利最近的歷史；他既有與登堡的支持，並無辭職的意思。高年的元帥接見了希特勒，沒有發生良好的印象。『那個人想做總理麼？我可以委他做一個郵政局長，他可以在印有我頭像的郵票上打戳子』。希特勒在宮廷的圈子內，沒有像他競爭者所有的勢力。

在國內龐大的選民，浮躁不安，徬徨無主，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德國全境舉行一年內第五次的選舉。納粹在選舉中失勢，其席次由二三〇席減至一九六席，共產黨相對占有優勢。希特勒講價還價的實力因此削弱。也許施萊徹將軍可以完全用不到他了。施萊徹獲得與登堡顧問者圈子的贊助，於十一月十七日巴本辭職後，繼任總理。但結果發現新總理幕後拉線的本領，強於公開執政的能力。他得罪的人太多了。希特勒、巴本和民族主義者現在聯絡起來，一致和他為難；而共產黨一方面在街上和納粹黨打架，一方面用罷工和政府鬭爭，更幫助使他無從統治。巴本運用了他個人對登堡的影響力量。把責任和職位的擔子推到希特勒身上，和他成立和解，畢竟不是一個最好的解決麼？與登堡最後勉強同意了。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希特勒就職為德國總理。

這位主宰者的辣手，不久便伸到所有將、或可能反對新秩序者的身上。二月二日德國共產黨的一切集會和示威皆遭禁止，政府開始在國內各地搜查共產黨祕藏的軍械。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晚，形勢到了頂點。國會的建築忽然失火，褐衫隊、黑衫隊、以及其他附屬的隊伍奉命出動。一夜之間有四千人被捕，包括共產黨的中央執行委員。這些措置，由現任普魯士內政部長的戈林負責辦理。它們成了準備未來選舉的事先布置，和保證了新政府最大敵人共產黨的失敗。組織選舉運動是戈培爾的工作，他是兼具技巧和熱誠的人。

但在德國國內，仍有許多嫌惡、頑強或積極反對希特勒運動的勢力。選舉的結果，共產黨獲得八十二席，有許多人在徬徨痛苦之餘，都投了他們的票；社會民主黨得到二一八席；巴本和胡根堡得到五二席。與之相

對，希特勒獲得一千七百三十萬票二八八席。希特勒用盡了種種陰謀詭計，纔能在德國選民中得到這個多數。他占有二八八席，其他各黨加起來合占二五一席，他僅占有三十席的多數。如照文明的憲政政府平常程序，這樣龐大的少數，在國內一定可以有極大的勢力，受相當的尊重。但在新的納粹德國，少數黨現在就要領會到，他們是沒有權利可言的。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希特勒在波茨坦與腓特烈大帝墓相近的駐地禮拜堂內，召集第三帝國的第一屆議會。議堂內列席的，有徵象德國實力綿續的軍部的代表，希特勒衛隊及衝鋒隊的高級官佐，以及再起德國的新貴。三月二十四日，議會多數壓倒和脅服了所有反對派，以四四一票對九四票通過把全部緊急處置權力，授予希特勒，以四年為期。議決案宣布時，希特勒朝向社會民主黨的席次叫着：「我再用不到你們了」。

在選舉的緊張中，歡欣鼓舞的國社黨隊伍，在柏林的通衢作火炬游行，走過他們的領袖面前，行異教式的致敬。這一種長期的鬪爭，是外國人、尤其那些未曾嚐過戰敗痛苦滋味的人所難於理解的。希特勒最後來了，但他不是一個人來的。希特勒從失敗的深淵，喚起了潛伏在歐洲這一個人數最多、最勤勉、殘酷、矛盾和運氣不好的民族心中的暴厲的怒燄。他用咒語召來了一個貪滅一切、以人為犧牲的可怕的神仙偶像，他成了偶像的祭師和化身。至於如何以超乎想像以外的殘酷和凶暴，計劃出這種仇恨與虐政的機構，以及現在如何使這種機構益為精密，不在我敘述的範圍之內。為此處敘述計，祇須把仍然懵懂之中的世界所突然遭遇到的可怕新事實：希特勒統治了德國和德國正在武裝中，提出於讀者之前就夠了。

在德國正發生非常變化之時，但麥唐納·鮑爾溫的政府，卻迫於財政的危機，覺得在若干時期內仍必須把已嫌貧弱的軍備，再加大事削減和限制，而對於歐洲方面令人不安的徵象，則一貫的不問不聞。麥唐納和他的保守黨自由黨同僚，熱心努力於使勝利者的軍備，減縮到和凡爾賽和約強迫戰敗國接受的程度。他們曾在國際聯盟和所有其他公開的路徑，提出了一連串的提議。法國方面，雖然它的政治狀態仍在無特殊重要意義可言的

流動變化之中，卻強韌地堅執維持法國的陸軍，作為法國生活的和它的整個聯盟制度的中心和支持點。這種態度，在英美都受到抨斥。報紙和公衆的意見，都不是根據的實事求是的基礎之上，但逆流是十分的強大。

一九三二年五月各黨在下院中對裁軍的美德大吹大擂之時，外交大臣提出了一個新的方式，把武器加以分類，分成爲應准予保持和應予廢止的兩類。他把這個稱爲『質的裁軍』。暴露這種說法的謬妄，比使議員們聽而信服要便當多了。我說：

外交大臣告訴我們，要把武器分爲進攻的與防禦的兩類是很困難的。這是當然的事，因爲每一種可以想得出的武器，幾乎都可以作進攻或防禦之用；可以供侵略者、也可以供侵略對象的無辜犧牲者的使用。爲使侵略者進行較爲困難起見，長距離大砲、坦克、和毒氣被歸入侵略武器凶惡的一類。但一九一四年德國進攻法國聲勢最盛時，並沒有使用任何以上的武器。長距離大砲被認爲是『一種進攻的武器』。大砲在要塞中是可以的，在此處它是善良的，具有和平的性質；但如果移往戰地，事實上在需要時，當然會把大砲移往戰地的，它就立刻變成惡劣的、有罪的、黷武的，和須置於文明的禁令之下。舉坦克爲例，德國於侵入法境以後，深溝固壘，在一兩年內有一百五十萬想恢復法國失土的英法士兵，死於德國鎗彈之下。德國人靠了機關鎗的火力，守住在法國的陣地，坦克的發明即在於抵制機關鎗的火力，在驅逐敵人出境中節省了許多生命的喪亡。機關鎗是德國用以保持占有法國十三省的武器，而坦克則爲協約國保全生命損失的工具，現在機關鎗顯然被視爲善良的防禦的，而坦克則被列爲受所有公平正直人士批評和痛罵的一類……

比較更確切的分類，毋寧規定凡武器在活動時具不分青紅皂白的性質，使用後不僅使戰線上的戰鬪員，也使遠離戰區男女老幼平民有死傷之虞者，置於禁止之列。

末了我第一次提出戰爭即將臨近的警告：

德法軍力發生任何相等的情形，我都將引以爲憾。凡認此爲是、或甚至當做公平交易問題的人，完全低估了歐洲局勢的嚴重性。我要向那些希望德法軍備平等的人說，「你們希望戰爭麼」？就我個人而論，我竭誠希望終我之世或我子女的一生，不要發生這類等量齊觀的情形。這一番話，絕不是說對於德國人民的偉大品質，缺乏關注或敬慕之情，但我堅決認爲，主張德法軍事地位應該平等的理由，如果一旦見諸事實，就將實際上使我們行近那幾乎無從衡計的大災禍了。

一九三三年三月的英國空軍預算，表露出政府以及在野的自由黨和工黨，對於當前局勢的演變，同樣完全缺乏瞭解。我會不得不說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日）：

我遺憾的聽到次長宣布，我們祇是第五等空軍強國，以及十年計劃再延期一年實施。聽到他誇稱空軍部在本年內沒有成立過一個新單位，使我引以為憂。事態的演變正在繼續使所有這些觀念成爲笑柄，我們應該有良好的勸告，以更大的努力，集中於建設我們的空防。

英國的輿論在所謂舉國一致政府之下，顯得越來越拋棄所有對德國的戒備。法國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日的備忘錄中準確的指出，凡爾賽和約中規定的一般保證，即繼續德國片面裁軍之後，將實行普遍裁減軍備，並不是一種條約義務。除了時勢和環境外，它當然不是一種可以實施的義務。但他們的話沒有效果；而一九三二年出席裁軍會議的德國代表團，在鄭重提出要求取消對他們重整軍備權利的一切限制時，他們竟得到英國報紙有力的支持。泰姆士報稱之爲『不平等的及時補救』；新政治家稱之爲『無條件的承認國家平等的原則』。這等於說，應該准許七千萬德國人重行武裝，準備戰爭，而在最近一次可怕戰爭中獲勝的勝利者，不准提出任何的反對。這是勝利者與戰敗者間地位的平等；是人口三千五百萬的法國與人口幾乎倍於此數的德國間的平等！

英國的態度壯了德國政府的膽子，德國把這種態度，認爲是由民主與議會社會體制所造成的基本弱點和固有的墮落性，英國雖是諾狄克民族，也不能避免。德國人以整個希特勒民族運動爲後盾，採取了一種倨傲的方針，七月中他們的代表團收起文件，退出了裁軍會議。此後如何用甜言蜜語，使他們重行出席，成了勝利的協約國的主要政策。十一月，在英國嚴厲的和不斷的壓力之下，法國提出了名稱有欠公允的『赫里歐計劃』。計劃的要點，規定把所有歐洲國家的國防軍，改爲短期服役而人數有一定限制的軍隊，承認各國地位的平等，但不一定接受實力的平等；不過既然承認了地位的平等，則無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不能不進而接受實力的平等。這使協約國政府得以向德國提議：『在可以保障所有各國安全的制度之下權利平等』。法國在若干幻想性質的保證之下，接受了這個沒有意義的公式。德國接受提議，同意重新參加會議。這件事被歌頌爲有利和平的一個顯著的勝利。

英國政府受輿論洽驩的鼓勵，於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六日提出了一個以其著者及提創人爲名的『麥唐納計

劃」。它以接受法國人短期服務軍隊的觀念爲出發點（在方案中規定服役期爲八個月），並進而訂定各國軍隊的確切人數。法國的陸軍，應自平時編制的五十萬人縮減至二十萬人，而德國應該擴充達到平等。德國此時的軍力，雖然還缺乏受過訓練的大量後備隊伍，因爲這是祇有靠每年徵召一定數額的壯丁入役，繼續不斷纔能供應的；但一部武裝的志願軍的人數，也許已經老早超出五十萬人了。從改裝或一部分改裝製造軍器的工廠方面，得到了許多最新式的武器。

在大戰結束之時，法國也同英國一樣，存有大量的大砲，而德國軍隊所有的大砲，實際上都已經按照和約破成碎片。麥唐納爲補救這種顯然的不平等，提議把機動砲隊大砲的口徑限爲一〇五公分或四·二英吋。現有口徑六吋以下的大砲仍得保留，但此後補充必須以四·二英吋爲限。英國的利益與法國的不同，直至一九三五年提議舉行新海軍會議止，它可以由維持和約中裁減德國海軍軍備而得保障。在協定期內，德國不准有軍用飛機，但協約國三國，應該把他們自己的空軍機數縮減爲五百架。

我對於這種對法軍的攻擊，和企圖使法德兩國成爲平等之舉，極表痛恨；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我藉機在議會中發言：

我懷疑此時強迫法國接受這個計劃是否得計。我不相信法國會表示同意。他們對於德國國內發生的情形以及若干隣國的態度，定必感到極大的關切。我多少年來在說，「謝謝上帝給了我們法國陸軍」，現在在這一箇慄慄不安的月內，我敢說一定有許多人，曾對自己作同樣的道白。在我們看到德國的情形，在我們以詫異和悲痛的心情目擊殘酷與贖武精神的叫囂作戰，毫無憐憫的虐待少數分子，取消文明社會尋常所有的保護，單是爲了種族的理由壓迫大量的個人——當我們看到所有這種的情形，在世界天賦最好、最有學問、最科學和難侮的國家之一發生時，一個人不由不引以爲幸的，就是在德國猖獗的凶暴情緒，除了向自己發洩以外，還沒有找到任何其他出路。在我看來，在像現在這一個時候，去要求法國把陸軍實力減少一半，同時德國則把實力增加一倍，要求法國把空軍實力減削一半，而德國空軍實力則維持原狀，這一種提議，至少在目前一定會被法國政府認爲多少不合時宜。計劃中所提出的陸軍及飛機數字，規定法國所有的飛機數，僅與意大利所將有的相等，可說完全沒有考慮到德國所有的任何空軍力量。

四月內我又說：

德國要求武器的平等，陸軍與海軍組織的平等，我們聽到說，「你不能使這樣一個偉大的民族，長處於劣等的地位。別人有的東西，他們也非有不可」。對於這種意見我始終沒有同意過。這是一種所提出的最危險的要求。生命中是沒有永久的東西的，但所可斷言的，如果一方面德國自己的不平仍未得矯正，仍抱持我們曾經痛苦地目擊過的那種心思，而一方面在軍事上對隣國取得完全的平等，則我們就將計日可待，捲入歐洲大戰的漩渦了。

……大戰後我們聽到的理論之一，即德國將成爲具有議會制度的民主國家，可以給我們一種安全的保證。所有的民主制度，都已蕩然以盡，現在你有的的是最嚴酷的獨裁政治。你有的的是軍國主義和向各式各種戰鬥精神的呼籲，包括自大學恢復決鬥起，至教育部長勸告在小學校充分採取鞭打止。你有了這種好戰的或善鬪的現象，也有了本院許多議員曾經說過的對猶太人的壓迫……

我現在放開德國，轉到法國。法國不僅是歐洲唯一僅存的偉大民主國家；而且我很高興的說，它也是歐洲軍力最強大的國家，是許多國家和民族的聯盟制度的領袖。法國是成爲新月形整個各小國的公正人和保護者。這些小國自比利時起，迂迴至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止，他們都惟法國馬首是瞻。當英國或任何其他強國採取任何足以削弱法國外交或軍事安全的步驟時，所有這些小國無不因震恐和憤怒，慄慄自危。他們怕那中央的保護勢力將被削弱後，他們就將聽命受那個龐大的條頓強國所支配了。

一個人想到這些事實之難於置辯，就不易相信一個由高尙人士所組成的負責政府，以及結成一片支持他們的輿論，竟有如此顛覆的行動。舒服的生活好像把他們的意志消沉盡了，我特別記得我在下院中說到「謝謝天給了我們法國陸軍」時，院內各議員都表示出痛苦和討厭的神情。說話不能動他們的聽聞。

但法國勇敢地堅持須待四年之後，再銷毀他們的重武器材料。英國政府接受了這個修正，但條件是法國須同意立即訂立一個明白規定銷毀他們大礮的協定，法國屈服了。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西門爵士對前幾星期中德國的改變立場埋怨一陣之後，在裁軍會議中提出了這種的草案。結果不出所料，現在已任總理成爲德國主人的希特勒，早已於握權以後，在訓練場和工廠方面同樣作全國規模的擴張，自覺地位已十分穩固。對於向他提出的那些愚而好自用的提議，他甚至懶得予以理會。他以鄙夷不屑的姿態，命令德國政府一起退出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這就是麥唐納計劃的命運。

英國政府的這種愚昧和法國政府的這種荏弱，是很難找到比擬的，但他們在這個不幸的時期內，也完全反

映出他們議會的意見，反之，美國也逃不了歷史的批評。美國人專心致志於本身的問題，致力於自由社會的許多利益、活動和事變，只是張口疑視歐洲所發生的重大變化，以爲全與他們無關。人數甚多的幹練而受過廣泛訓練的美國官員，雖有他們自己的見解，但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缺乏先見的隔岸觀火態度，似乎並無顯著的影響。如果美國曾經使用了他們的影響，可能激發英法政治家，使之有所行動。國際聯盟過去雖已歷受磨折，但仍不失爲一個莊嚴的機構，可用以對抗新的希特勒戰爭的威脅，予以國際法上的制裁。可是在緊張狀態之下，美國人不過聳聳肩而已，因此不到幾年，他們就得傾注新大陸的鮮血和財富，以求自救而免危亡了。

所有這些，在我七年後在都爾（按指法國淪陷前邱氏最後一次法國之行——譯者）目擊法國的苦難時，仍牢記於心；這也是爲什麼提出單獨媾和的提議之時，我祇說安慰和保證之詞的理由。我引以爲快的這種保證，現在已經履行了。

在一九三一年初我部署停當，在美國作一次重大的演講旅行。在那裏遇到一次幾乎把命都送了的嚴重意外。十二月十三日，我在紐約訪晤巴洛渠的途中，車子停錯了一邊，我下車橫過第五街，當時沒有想到美國車行靠右的規矩剛巧和歐洲相反，也沒有知道在英國那時尚未施用的紅燈記號。結果發生了猛烈的碰撞。我受創不起者兩個月。後在巴哈馬島的奈索城我逐漸恢復，可以徐步而行。在這種情形之下，我進行了遍及美國全境共包括四十次演講的旅行。白天整天睡在火車的車廂內，晚上向人數龐大的聽衆演說。就整個說來，這一次我認爲是我畢生中所經過的最艱苦的時期；但我的體力經過相當時間恢復原狀了。

同時在國內方面，我們的生活平靜地直向下坡路走。鮑爾溫在議會中，通過和支持了麥唐納印度法案的主要原則。由新任印度事務大臣霍爾爵士把法案提出下院。西門委員會的報告被置諸不理，也沒有給議會辯論的機會。我和其他約七十位保守黨分子，組織了一個叫「印度保衛聯盟」的團體，在此後的四年內，對於政府的印度政策超過西門委員會建議之時，盡力抗拒。我們把問題提出黨的會議，奮鬥到底，得到了很大的援助，有

時比數很接近，不過常是少數。工黨對於印度問題，在議會中投票贊成政府，也同在裁軍問題中一樣，它成爲前座兩席次（指政府黨與在野黨）之間的一個聯繫，工黨中絕大多數聯合反對我們的團體，並斥我們爲「死硬派」。希特勒的勃興握取大權，納粹黨的取得支配全德國的地位，和德國軍力之迅速的積極的發展，更加深了我和政府及國內各黨間的異見。

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除了爲大局擔心外，就個人而言是很愉快的時期，我由口授記成的文章維持生活，這些文章不僅盛行於英美兩國，也盛行於受到希特勒陰影威脅以前的歐洲十六國。我是一手來一手花，在這時期內我連續著成了馬爾波洛公爵傳。我不斷考慮歐洲的局勢和德國重整軍備的問題。我大部分的時間住在卻特威爾，在那裏我有許多自娛的地方。那裏的兩所小屋和寬廣的菜園牆壁，大部分由我親手築成，此外築成各種的假山、自來水裝置、和一個經過過而澄清的大游泳池，經加熱後可用以補充捉摸不定的陽光。因此從朝至晚，我沒有一刻沉悶和懶散的晨光，同我快樂的一家在家中渡安靜的生活。

我在這些年中，對牛津大學實驗哲學教授林特曼發生了深切的認識，那時他已經成爲我的老友了。我在第一次大戰結束之時，初次與他相識，在戰爭中他以舉行空中若干種試驗而著稱，這種試驗，專爲勇敢的駕駛員而設，用以克服那時幾乎有致命危險性的『扭旋駕駛』。自一九三二年後，他和我較前更接近得多，他常常從牛津開了汽車到卻特威爾來同我共住。在那裏有好多次談到漸有迫近我們光景的危險，一直談到深夜。在朋友中間，我們稱他爲教授而不名。在現代戰爭的科學方面，尤其是空防問題，以及各種包括統計的問題，他成了我的主要顧問。這種愉快的和饒有結果的友誼，在整個戰爭期中仍繼續維持。

我的另一摯友爲穆敦。一九一七年海格元帥挑選新經戰陣的青年軍官充實他自己幕僚時，穆敦經人推薦，擔任礮隊的監督。在那年最激烈的春季戰鬪中，他曾指揮阿拉斯最前線的戰地砲隊。除了軍事十字勳章外，他又有一個獨特的榮譽，他的心部中過鎗彈，此後彈未檢出仍生活安然無恙。一九一七年七月我任軍火部長時，我常以總司令貴賓身分參觀前線，穆敦是總司令的親信副官，常奉命與我同行，我對這位卓越的和勇敢的軍

官，發生了極大的尊敬和友誼。一九一九年我出任陸軍及空軍大臣，我派他擔任情報工作，他一直做了好多年。他是我的隣居，距我卻特威爾的住處僅有數里之遙。他經呈准麥唐納首相許可以後，可以自由和我談話，使我熟知事變的內情。他此時以及未來戰爭中成爲我最親密的顧問之一。直至我們獲得最後勝利始止。

我和威格拉姆也締立了友誼，那時他是外交部聲勢蒸蒸日上的人物，爲外交事務的中心人物。他在部中達到高位，有資格對政策發表負責的言論，和使用他支配大權對外發生接觸。他是一個惹人歡喜和什麼都不怕的人，他的根據於深刻知識和研究而來的信念，成了他生活中的支配力量。他同我一樣明白的看出，可怕的危險已經日漸迫近我們，但他有比我更爲確實的資料。這種共同的認識，使我們趨近合作。我常在北街他的寓處聚首，他和他夫人也常住在卻特威爾。也同其他高級官員一樣，他和我談話時，抱充分的信任心。所有這些，幫我形成和加強對希特勒運動的見解。就我一方面而言，其時我在德國、法國、和其他國家已有許多的聯絡，使我得以送給他相當數量的情報，由我們共同檢討。

自從一九三三年後，威格拉姆對於政府的政策及事態的演展，深感憂慮。一方面他的上司對他的能力日益器重，而他在外交部內的力量亦在增長中，他卻一再的想到辭職。他的談話非常有力量而得體，凡是曾經和他有過重要事務接洽的人以及許多其他的人，對他的見解，都越來越增加重視。

在這多年來，我竟能在這一個小圈子裏舉行徹底精確的討論，對我、也可以說對國家有重大的價值。不過在我自己方面，我也在國外方面收集和貢獻大量的資料。我和法國的若干部長以及法政府歷任元首，有過秘密的接觸。晨報著名社論撰者的賢嗣柯爾文，爲新聞記事報駐柏林的訪員，他深入於德國政治之中，和德國若干重要軍人，以及認希特勒運動將招致國家劫難的獨立有資格的人士，發生性質極秘密的接觸。有若干德國重要人士，曾和我促膝長談，向我傾吐他們內心的憤慨痛苦。其中大多數人，在戰時都給希特勒所處決了。在另一方面，我可以查考和供給關於我們整個空防局勢的資料。憑了這種方式，使我和許多關員一樣熟悉時局的真

相。我從各方面所得的材料，尤其是由國外來源所得的，時時報告政府。我和閣員及許多政府高級官員的個人關係，是密切而隨便的；我雖常常批評他們，我們之間仍維持同志的精神。在下文就可見到，他們有許多最秘密的技術資料，後來我正式成爲獲知的一員。從我擔任政府高職的長期經驗，我也獲悉國家最珍貴的祕密。所有這些，使我得以不憑報紙所載而確定和維持我的見解，雖則明眼人從報紙上亦可窺索出新的問題來。

在威斯特敏斯脫，我繼續提出印度與德國威脅的兩個主題，時常出席議會作警告的演說；這些引起注意的演說，卻不幸沒有使濟濟一堂、聽取演說、惶惑不安的兩院震醒，起而採取行動。關於德國危險問題，亦如印度問題一樣，我在議會中找到一批友人共同合作。它的組成分子，與印度保衛同盟大不相同。奧斯汀·張伯倫、項恩、格里格爵士、溫特敦勳爵、勃拉庚、克洛夫特爵士、以及其他若干人士，組成了我們的圈子。我們經常聚首，盡量集中我們的資料。閣員們對於這一個由他們自己的擁護者和前同事或上司所組成的並非敵視的重要團體，頗爲敬視。我們隨時可以引起議會的注意，和舉行正式的辯論。

這裏請讀者原諒，讓我提一件我個人的輕鬆的題外事件。

一九三二年夏季爲了我的馬爾波洛公爵傳之故，我訪問公爵舊時作戰之地的荷比和德國。我闖家連同「教授」一起同行，沿着一七〇五年馬爾波洛公爵著名的自荷蘭至多瑙河的長征路線，作愉快的旅行，在柯勃倫茲城渡過萊茵河。在我一路經過這些美麗的區域，由一個古代名城至另一名城時，我自然問到關於希特勒運動的問題，發現這是每一德國人心目中的主要話題。我感受到一種希特勒的氣氛。在白倫海姆野地過了一天以後，我驅車至慕尼黑，在那裏儘量的玩了一星期。

在里琪那旅館某一次的宴會中，來了一位不速之客。這位韓斯泰格爾先生談了一大堆關於「領袖」（指希特勒——譯者）的話，看光景他同領袖似乎有密切的關係。因爲他似乎是位有風趣的人，能操流利的英語，我

就邀他吃飯。他對了希特勒的活動和看法，作了一番有趣的報告。他說話之時好像着了魔似的。他也許是受命來和我接觸的，顯然他一心要博取我的歡喜。飯吃完後，他走鋼琴邊彈奏和唱了許多歌曲，因為技藝高明，使大家感到極愉快的享受。他似乎完全曉得我所歡喜的英國歌曲，他是一位極工應酬功夫的人，而且當時大家知道他是『元首』寵愛的人。他說我應該見元首，而且再便當沒有。希特勒每天五點鐘光景要到旅館來，很願意我談談。

當時我對希特勒並不存什麼民族的成見。關於他的理論或行跡，我只略有所聞，對於他的爲人，更全不知道。我欽佩在國家戰敗中起立奮鬥的人，即使我是站在他敵對的一面。如果他願意，他自然有做一個愛國的德國人的完全權利。我一向要求英國、德國、和法國人結成友誼。不過在我和韓斯泰格爾談話中，我隨便說起，『你們的領袖爲什麼對猶太人這樣的痛恨？憤恨曾經幹下了壞事或反對祖國的猶太人，是我能完全瞭解的；如果他們想在生活中任何方面獨占大權，因而加以抵制，也是我所瞭解的；但單是爲了一個人的出生，便加以反對，這是什麼意思呢？任何人對於自己的出生，怎麼能自己作主呢？』我一定把我這番話覆告了希特勒，因爲到第二天中午，他帶着很嚴重的神氣趕到我處，告訴我那天下午希特勒不能到旅館來，所以他向我說好的約見一事只得作罷。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普齊』（他的親暱名稱）。以後從此不再見面，雖則我們在旅館繼續住了幾天。希特勒失去了他和我見面的唯一機會。以後他大權在握後，曾幾次邀請過我，但那時已經時易世變，所以我都藉故推卻了。

在所有這個期內，美國仍熱切的專心致志於本身變動劇烈的國內事務及經濟問題。歐洲和遙遠的日本，以沉着的眼光注視着德國軍事實力的勃興。在斯坎底那維亞國家（指瑞典、挪威、丹麥——譯者）、『小協約國』（指波蘭、捷克、南斯拉夫及羅馬尼亞——譯者）、及若干巴爾幹國家內，發生了日益不安之象。法國現在對於希特勒的活動和德國的準備，已獲有大宗的資料，使全國處於惶惶憂急之下。我聽說，關於德國破壞和約的嚴重情形，有過一張清單，但當我問我的法國友人爲什麼不把這個問題在國際聯盟內提出，邀請或甚至最後傳喚

德國出席，以解釋它的行動和說明它正在做些什麼時，他們回答我說，英國政府一定不會贊成這一種危險的步驟。因之一方面獲有鮑爾溫充分權力支持的麥唐納，提創法國的裁軍，並由英國實行，以資創導，而德國的實力則可以飛躍增長，於是公開行動的時間到了。

爲保守黨公道起見此處必須一提的，就是自從一九三二年以來，每次保守黨全國大會中，由魯易助爵及克洛夫特爵士等名人所提出的議案，要求爲應付海外日漸增加的危機，必須立即加強軍備，幾乎每次都經全體一致通過。但此時下院中政黨督察員的議會統制，具有使黨員就範的充分力量；政府中的三黨和在野的工黨，暮氣沉沉和愚昧，陷溺已深，所有國內同志所提出的警告，以及時勢的徵象，和祕密情報部所得的證據，都同樣不足以動他們的聽聞。這是我們歷史上一再發生的非常時期之一，在這個時期中，高貴的英國民族似乎從高位跌了下來，喪失所有目的的觀念，對外禍的威脅震惶失措，在敵兵磨刀霍霍之時，卻虔誠地一味空談一些腐朽的議論。

在這個黑暗的時期以內，最卑劣的情感，得到各政黨負責領袖的接受或沒有非難的默認。一九三三年結成牛津聯盟的學生，在一位朱特先生的感召之下，通過了一個遺臭萬年的決議：『本院拒絕爲國王和祖國而戰』。這一類的插曲，在英國國內固然不妨一笑置之；但在德國，在蘇聯，在意大利，在日本，英國已趨於墮落退化的觀念，從此根深蒂固，支配了許多他們的打算。通過這個決議的傻孩子，他們絕沒有夢想到，在不久即將發生的戰爭中，註定如不成功，就須成仁，而且證明他們是英國從來所產生的最優秀的世代。比他們年長的一代，既不能在行動上以求自贖，更少曲恕的理由（註）

註：我忍不住要提一件故事。牛津聯盟有一次邀我出席演說。我辭謝了，但我說願意給他們一小時，由他們向我提出問題。有一個問題是，『你認爲德國是造成上次戰爭的罪魁麼？』我說：『當然是的』。有一位得羅氏獎學金資助在英留學的德國青年，站起來發言，說『對我祖國作如此的侮辱，我不能留在這裏了』，說完在一片喝采聲中大踏步走出了會場。我認他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孩子。兩年後在德國發現了他的祖上是猶太人，他在德國的前途從此完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我們在下院中又有一次辯論，我回到我的主要論題：

我們知道了（德國）超乎尋常的大量輸入廢鐵、鍊、和戰爭金屬；我們知道所有關於盛行全國的軍國精神彙聚的消息；我們看到正在以一種嗜血的哲學，灌輸於他們青年的心中，這種情形是自野蠻時代以來不曾有過的。我們看到所有這些在進行中的勢力；我們必須記得，這就是曾與整個世界作戰和幾乎擊敗世界的同一強大的德國；就是這同一強大的德國，在戰爭中它每死一人，對方就要死二個半人（俄國的損失不在內）。在你具有這種準備、這種理論、和這種公開提出的主張以後，那麼，對於德國整個四周國家的皇皇不可終日，也是無足驚異的了。

歐洲方面勝利者與戰敗者間相對的戰爭實力，發生這種可怕的變化之時，在遠東方面反對侵略和愛好和平的國家之間，也發生了一種完全缺乏協調的情形。這方面的事蹟，成了歐洲事態惡化的複本，同是因舊協約國和未來盟國領袖間思想行動麻痺所產生的結果。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的經濟大風暴，其給日本的影響，也不下於給世界其他部分的影響。自一九一四年以來，它的人口由五千萬增加到了七千萬；它的冶金工廠由五十家增加到一百四十八家。生活的費用不斷上漲。米的生產在靜止狀態中，食糧的輸入很昂貴。原料與國外市場的需要，甚為迫切。在經濟蕭條極為嚴重期間，英國和四十個其他國家，逐年越來越覺得不得不採取限制辦法或提高關稅，以抵制根據於與英美標準不同的勞動條件所生產的日本貨。中國不單一向是日本棉織品及其他製造業的主要輸出市場，也是日本取得煤鐵的幾乎唯一的供應地。因此重新確保對華控制，是日本政策的主要題目。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藉口當地紛擾，占領瀋陽和南滿鐵路沿線各地。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要求中國解散所有帶反日性質的團體。經中國政府拒絕後，日本於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以北登陸發動進攻。華軍英勇抵抗，雖然缺乏飛機坦克或任何現代武器，但堅守陣地達一月以上。至二月底經受極嚴重損失後，他們不得不撤離吳淞砲台，退守內地約十二哩外的新陣地。一九三二年初，日本成立了偽滿洲國一年以後，熱河省又被併入，至一九三三年三月日軍深入沒有設防的區域，直達長城界。這種侵略的行動，和日本在遠東勢力及

在海洋方面新海軍地位的增加，是表裏一致的。

日本對華的暴行，自從開第一鎗起，在美國便引起最強烈的敵意。但孤立政策是害人害己的。如果美國原是國聯的會員國，它無疑一定可以領導聯盟大會對日本採取集體行動，在行動中美國本身一定會成爲主要受命執行國家。就英國方面而言，它表示不願單是和美國一國共同行動；他們也不願在聯盟公約所規定的義務以外再捲入反對日本的漩渦中。在英國若干方面，對於英日同盟的終止，以及因此而致英國在遠東地位和所有歷史悠久的利益，發生削弱，抱有耿耿之心。英國政府處於嚴重的經濟情況和歐洲局勢日漸緊張之下，如果它在遠東方面未能追隨美國，擔任主要的角色，除非能希望在歐洲方面取得美國同樣的支持，那也是難怪的事。

不過中國是國際聯盟的會員國，雖然它沒有付清應納的會費，它向國聯提出呼籲，所要求者不過爲正義。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國聯要求日本撤退在東北的軍隊。十二月國聯任命了一個委員會，請李頓勳爵擔任委員會主席，赴當地調查。他不愧家風的賢子肖孫，過去曾任孟加拉省長及代理印度總督，在東方有過多年的經驗。委員會的經一致通過的報告，成爲任何認真研究中日糾紛所根據的基礎。東北問題的整個背景，在報告中會有縝密的敘述；其提出的結論是率直的：滿洲國爲日本參謀本部人工的產物，在組成這個傀儡國家時，與當地人民的願望無涉。李頓勳爵及其同僚在他們的報告中，不僅分析了情勢，而且提出具體的提議，以備國際的解決。其中包括宣布東北自治；它仍爲中國的一部分，在國際聯盟的保護之下，並由中日兩國訂立一個規定兩國在東北利益的一般條約。國聯之不能實行這種提議，這個事實，絕沒有削減李頓報告的價值。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曾說到這個文件：「它立刻成了、和迄今仍是關於報告所涉問題最顯著的公正的權威」。一九三三年二月，國聯宣布不能承認滿洲國。國聯對日雖未曾實施制裁，或採取任何其他行動，日本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退出了國聯。在上次大戰中德日是敵對國家，現在卻情隨境移，聲氣相通了。正在國聯的活動及力量最需要實力的支持之時，卻發現並無任何實力的支持。

我們必須認爲，在歷史之前應受重譴的，不單限於英國舉國一致、而實際上由保守黨占多數的政府，就是這個緊張時期內在朝和在野的工黨與自由黨，也一樣責有所歸。他們陶醉於聽來順耳的陳腐之論；只求博取好感和獲得選舉的成功，而不問國家的根本利益；真心誠意的愛好和平，但幼稚地認爲單是愛好就可成爲奠立和平的唯一基礎；聯合政府領袖之顯然缺乏智慧上的先見；鮑爾溫對於歐洲問題的全然缺乏認識，見了歐洲問題便表示頭痛；當時支配工黨的強大激烈的和平主義，自由黨的離開現實，一味感情用事；前戰時領袖勞合喬治未能挺身而出，繼續爲他未完的工作奮鬥，其緘默不動尤有惡劣的影響；整個都獲得國會兩院絕對多數的支持，以上種種合成了英國一幅頑愚和庸懦的全景，雖然並無譎詐的心理，卻免不了罪孽深重。英國雖然並不存什麼惡意或不良的打算，但對於世界之陷入恐怖和痛苦之中，也發生了確切的作用。這種恐怖和痛苦就當時已顯示的程度，已經是人類經驗上所從來沒有過的了。

第六章 黑暗的景色（一九三四年）

春季的警兆——六月三十日德國血的清算——裁軍會議的結束——七月二十五日陶爾斐斯被暗殺——興登堡去世——八月一日希特勒成爲德國元首——意大利左右爲難——十月九日亞歷山大國王及巴爾都在馬賽被暗殺——十一月賴伐爾任法國外交部長——十二月意大利、阿比西尼亞在華爾華爾發生衝突——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法意協定——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薩爾公民投票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之躍登總理職位，沒有引起羅馬的熱烈重視。納粹主義被認爲是法西斯理論的一種粗糙殘酷的翻版。大德意志對於奧地利及其在東南歐的野心，是大家都知道的。墨索里尼預料到在以上兩個區域，意大利和德國的利益是不會一致的。他並不需等待多久便得到證實。

德國占取奧地利，爲希特勒懷抱最切的野心之一。我的奮鬥的第一頁，就有這麼一句：『德國人的奧地利必須返歸於偉大的德意志祖國』。因此納粹德國政府從一九三三年一月取得政權起，目光便注意到維也納。希特勒此時的實力還不足以與墨索里尼對壘，後者對於在奧地利的利益曾經大吹大擂的宣布過。軍力上仍然荏弱的德國，即使對於滲透及地下活動，也必須加意審慎。不過對奧地利的壓力，在最初幾個月內就開始了。德國不斷的要求奧國政府，強迫它接納附庸的奧國納粹黨黨員加入內閣和擔任政府機要職位。在德境巴伐利亞，成立了一個奧地利團，以訓練奧國納粹黨員。在鐵道及遊客中心作投彈的暴行，德國飛機在薩爾斯堡和殷斯勃路克散發傳單，擾亂了共和國的日常生活。奧國陶爾斐斯總理對於國內社會民主黨的壓力，以及國外德國破壞奧國獨立的陰謀，同表反對。這還不是奧國國家所遇到的唯一威脅。奧國的社會黨人學了隣國的壞樣，曾經成立了私有的軍隊，用以推翻人民投票箱的決定。在一九三三年這兩方面的危險，逐漸升騰逼近陶爾斐斯。法西斯

意大利是他唯一可以求取保護的方面，而且他已經從那一方面獲得了支持的保證。一九三三年八月，他在里西奧尼與墨索里尼晤面，兩人之間獲得了個人和政治的密切諒解。陶爾斐斯相信意大利一定將為他的後盾，覺得他的地位已夠強固，可以來對付他敵人的一批——社會黨人了。

一九三四年一月，墨索里尼主要外交顧問蘇維區訪問維也納，作為向德警告的一種姿態。一月二十一日他作下列公開的宣言：

奧地利因為位於中歐的腹心和多瑙河盆地，所以它的重要性，為眾周知，是遠超過它領土及數字大小的。它如果要為全體的利益，完成幾百年來傳統和地理形勢所交付給它的使命，其本身的獨立與和平的正常條件，必須首先獲得保證。這是意大利關於政治及經濟條件根據不變政策所一向維持的立場。

三星期後，陶爾斐斯政府採取行動，反對維也納社會黨的組織。屬陶爾斐斯本黨、受費上校所領導的祖國陣線，奉命把受奧國社會民主黨支配的相類的同樣非法組織，解除武裝。後者猛烈抵抗，至二月十二日首都發生了巷戰。在幾小時內社會黨的勢力被打垮了。這一件事，不僅使陶爾斐斯和意大利較前更見接近，而且加強了他在下一階段中反對納粹深入和陰謀的工作。反之，許多失敗了的社會民主黨或共產黨人，憤激之餘，轉向投入納粹的陣營。在奧地利也同在德國一樣，天主教和社會民主黨的鵲蚌相爭，幫助了納粹得收漁翁之利。

直至一九三四年中止，英國政府仍握有無須冒險爭風險而支配全局之權。他們可以隨時和法國合作，通過國際聯盟的機構，對於使德國發生嚴重分裂的希特勒運動，作壓倒的打擊。這種壓力的施行，可以無須經過流血，但這個階段現在正在過去了。由納粹支配的武裝了的德國，正在走近發端。然而看起來似乎難於使人置信，麥唐納得鮑爾溫政權的支持，卻仍繼續努力法國的裁軍。我不能不援引二月七日我在議會中提出而不幸未蒙見聽的警告：

如果我們把法國陸軍裁減至與德國相等的水準，為德國取得了平等，以及歐洲方面對這種變化的觀感引起了所有反應以後，德國再進

一步問：「你怎麼能永遠限制一個有七千萬人口的大國，使之不能有一枝堪與海上最強大艦隊實力相等的海軍呢？」那麼以後的情形怎麼樣呢？你將說：「不；我們不同意。陸軍，那是別人的事。海軍，影響到英國的利益，我們不得不說：「不」。但我們將在那一種地位上說「不」呢？

戰爭之發生是很突然的。我曾經生活過的時期，那時也同我們今日的情形一樣，對於將來會發生點什麼，存焦灼和不安的心理。突然之間，可怕的、雷轟電掣的、壓倒一切的，不可抵抗的事突然發生了。讓我提醒本院，記着一九一四年發生的情形。那時德法之間絕無爭執可言。七月有一天下午，德國大使驅車至外交部，對法國總理說：「我們不得不動員對付俄國，宣戰在即，法國預備採取何種立場？」法總理提出事先經內閣同意的答覆，即法國將根據它所認為本身的利益而行動。德大使說：「你們不是和俄國有同盟關係麼？」法總理說：「一點不錯」。東線衝突的形勢原已嚴重，由此方式便把西線兩大國家捲入敵對之中，大大擴充和增加了戰爭的區域。但有時甚至宣告中立，還是不夠的。現在我們知道，在這一次德國大使曾經政府授權，如果法國人對他們的俄國同盟不履行義務，如果法國對於德國已經決定進行的戰爭有任何退出的表示，即要求法國將都爾及凡爾登要塞移交德軍，以保證法國宣布中立以後，不會再中途變計。……

我們如果沒有適當的安全地位，則在此地出席諸君的此生之中，我們可能有一天會遇到一位大使的光臨，要求我們提出答覆；如果答覆不圓滿，在幾小時內，在倫敦炸彈的爆裂聲響，和瓦石橫飛、煙火蔽天的光景，將警告我們注意到過去空防方面任何聽任存在的疏忽缺陷。我們今日之易於招致攻擊，是過去從未有過的。在戰前我常聽到對自自由黨政府的批評，……如果違背我們的意願和希冀，糾紛因任何事故而發生，今日執政諸公，將受性質遠為嚴重的批評。

過去的教訓，沒有一件被牢記過，沒有一件被採用過，目前形勢比從前不曉得要危險多少。那時我們有最強的海軍，而無空中的威脅。那時海軍是英國「確實的盾牌」。……現在我們不能這樣說了。那個該死的、萬惡的發明，和空中戰爭的發展，使我們的地位，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我們已不是一向過慣的、纔二十年前還是的島國了。

於是要求立即採取三種確切的決定。在陸軍方面，改組民營工廠，以便可以很快的轉移作戰時的生產，先由英國開始，以後由歐洲普遍採行。在海軍方面，我們應該恢復設計的自由。我們應該廢止倫敦條約，這個條約，阻止了我們去建造我們所需要的船艦，也阻止了美國，使它不能建造也許它所需要、而我們絕無反對需要的一艘主力艦。由於條約國之一（日本）也已決定恢復自由，我們應該易於進行。在空軍方面，不管法國強還是德國強，我們應該有一支實力與最強國相等的空軍。政府在上下兩院中都占壓倒的多數，所以他們無事不可為。他們在提出提議之時，只要對國家的安全保有信心和確斷，全國一定會加以支持。

在此時，歐洲方面出現了團結對付德國威脅的閃光。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英法意三國政府關於奧地利的獨立發出聯合的宣言。三月十四日我在議會中發言：

我們目前外交政策中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我們不斷要求法國減削自己的實力。我們怎麼提出誘導的呢？我們說：「你把實力削弱」，我們常使他們希望，他們如果實行減削實力和發生問題之時，我們一定設法出而援助，雖然我們並無可供援助的地方。我設想不到還有比這更危險了。無論主張孤立或主張聯盟，都有相當的理由；但你主張把大陸方面你將與之訂立同盟關係的國家，減削實力，你原意在於收拾混亂之局，結果將使你（更深）的捲入大陸的糾紛之中，那就無理可言了。這樣一來，你一定兩面落空，成為雙方攻擊的了。

羅馬人有句成語：「縮短你的武器和伸長你的國家」，而我們的格言，似乎是：「減削你的武器和增加你的義務」。不單此也，而且還要把你朋友的武器減削哩。

現在意大利在作最後的嘗試，以求實現前面所提羅馬人的成語了。三月十七日，意大利、匈牙利、和奧地利三國簽訂了所謂羅馬議定書，規定三國中任何一國如遇外來威脅，即實行互相諮商。但希特勒的勢力日益強大，至五月六月，奧地利全境的破壞活動，有變本加厲之勢。陶爾斐斯立刻把境內這種恐怖行為，敍成報告，交給蘇維區，另外附一個牒文，譴責恐怖行為對於奧國商業及旅客業所發生的不良影響。

墨索里尼這個文件在手，於六月十四日赴維也納，和希特勒作第一次的晤面。德國總理從飛機上下來，穿件褐色的橡皮雨衣，頭戴窄邊凹頂的氈帽。服裝輝煌的法西斯黨人，由煥發肥胖的墨索里尼率領，列隊歡迎。墨索里尼看見他的貴賓後，就向他的副官輕語：「我不愛他那個神氣」。在這次奇異的聚首中，除了對於德國及意大利式的獨裁制的美德互相作表揚的陳辭以外，對兩方的概念，僅作一般的交換。墨索里尼對於他那位客人的為人和用語，顯然弄得莫明其妙。他把他的最後印象歸結說：「嘮叨的和尙」。不過他確取得德國減輕對陶爾斐斯所施壓力的若干保證。在會議後，齊亞諾告訴記者說，「你們就可以見到，不會再出新花樣了。」

但會議以後，德國活動的停頓，並不是墨索里尼呼籲之功，而是由於希特勒自己因為要專心對付國內的問題。

取得大權以後，使領袖以及許多擁戴他出山的人士之間發生了重大的裂痕。褐衫隊在羅姆領袖之下，越來越代表黨內比較激烈的分子。在黨內高級人員中，例如熱中於社會革命的斯特拉薩，深恐希特勒一登大位以後，就將被現存的統治階級，包括軍部、銀行家、和資本家收買過去。他不會是第一個過河拔橋的革命領袖。在褐衫隊的羣衆看來，一九三三年一月的勝利，不啻就是使他們不單可以自由劫掠猶太人和發國難財者，也可以自由劫掠有錢人、社會的既得利益階級。關於他們領袖出賣黨的謠言，不久即流傳於黨內若干人士之間。總參謀羅姆根據於這種衝動全力進行。一九三三年一月，褐衫隊的人數約有四十萬人。至一九三四年春，他徵召和組織了近三百萬人。希特勒在他的新局面中，對於這個龐大機構的發展，感到了不安；這個機構，一方面宣稱熱烈效忠於他，大部分和他有深切的感情關係，但同時逐漸脫去他個人的統制。過去他有過一支私人的軍隊，現在他又有了國家的軍隊。他兩者兼而有之，並於事勢需要時，使兩者互相監視。因此他現在必須來對付羅姆了。在這時間內，他告訴褐衫隊的領袖們說：『我決心嚴厲制止推翻現有秩序的任何企圖。我將以最嚴峻的希望來反對第二次革命的風潮，因為再來一次革命，勢所必至將引起混亂。任何人如敢伸首反抗國家已有的威權，不管他地位如何，將受嚴厲的處置』。

不管希特勒內心的憂慮，他對於那位慕尼黑暴動中的同志的不忠，是不容易相信的。在過去七年中，羅姆一向是他的褐衫隊的總參謀。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黨和國家宣布合而為一時，羅姆成為內閣的一員。黨與國家合併的結果之一，是褐衫隊與德國陸軍的合流。全國重行武裝的迅速發展，使所有德國武裝部隊的地位及統率問題，成了政治上的首要問題。一九三四年二月中，艾登訪問柏林，在談話中希特勒暫時同意對褐衫隊的非軍事性質，作某種的保證。羅姆和參謀本部長官白隆堡原已經常發生過摩擦，此時他深恐他多少年來所建立起來的黨軍，受到犧牲，因之他不願關於他行為嚴重性的警告，於四月十八日公布明白的挑戰：

我們所造成的革命，不是一個國家的革命，而是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的革命。我們甚至將把「社會主義」一字特別寫出。我們的前進

團體，是現在反對反動的唯一堡壘，因為他們是革命觀念的絕對化身。褐衫隊中的戰鬥員，從第一天起便保證決定向革命之路邁進，他不會作分毫的背離，直至我們的最後目標實現為止。

在這一次，他把褐衫隊演說結尾時一定有的『向希特勒歡呼』一句省去了。

在四月和五月中，白隆堡繼續向希特勒訴說關於褐衫隊的驕橫和活動。領袖必須在嫌恨他的將軍們和得力的不少的褐衫流氓之間，擇取其一。六月初希特勒在一次長約五小時的談話中，對羅姆作撫慰和成立妥協的最後努力。但對這一個爲野心吞食了的變態的熱狂分子，妥協是不可能的。在希特勒夢想的實行階級統治的大德意志，與羅姆所希望的由民軍統治的無產階級共和國之間，中間隔着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

在褐衫隊體制以內，有一羣人數少而受高級訓練的中堅派，他們穿黑衫，稱爲希特勒衛隊，後來或稱爲黑衫隊。這個組織，用意在於保護領袖個人，和擔任特殊的與秘密的工作。他們歸以前養雞農戶而事業不成的希摩勒所指揮。他預料到在一方面是希特勒和德國陸軍，和另一方面是羅姆及褐衫隊之間，即將發生衝突，他設法把黑衫隊投入到希特勒的陣營。反之，羅姆獲有黨內有力分子的支持，例如斯特拉薩，認他們的凶暴計劃，正在爲社會革命布種。德國陸軍也有它的叛徒。前總理施萊轍對於一九三三年一月的恥辱，和軍部首長之未能同意推選他繼承興登堡的位置，始終耿耿於心。在希特勒和羅姆的衝突中，施萊轍看見機會來了。他甚至輕率的向法國駐柏林大使暗示，希特勒下台之期已不在遠。這是重新表演在白魯寧風潮中他所採取的行動，但現在的時勢，使這種行動更危險了。

究竟是否因爲羅姆的陰謀已經箭在弦上，纔迫使希特勒下最後的毒手，還是因爲希特勒和他的將軍們深恐將來可能發生的情形，所以乘他們握權之時，先下手爲強，來一次斬釘截鐵的清算，這將成爲德國爭論不已的問題。希特勒和勝利一派人的利益，顯然要成立陰謀的說法。羅姆和褐衫隊員大概還沒有到這一步。他們支持的是一種威脅運動，而不是一種政府陰謀，但這兩者的界限，是隨時可能突破的。他們的確是在整頓實力，也的確受到了當頭打擊。

現在事態變化得很快。六月二十五日德國陸軍奉令留守軍營；並以實彈發給黑衫隊員。在反對方面，褐衫隊奉令準備，羅姆經希特勒的同意，定六月三十日召集全部高級領袖在巴伐利亞湖的威西舉行會議。二十九日希特勒得到事勢嚴重的警告。他坐了飛機到高特斯堡，在那裏他和戈倍爾會見，由戈倍爾向他報告柏林即將發生變亂的驚人消息。根據戈倍爾，羅姆的副官恩斯特曾發出實行暴動的命令。這件事似乎不大像，因為此時恩斯特實在正在白里門，就要動身離港作蜜月的旅行。

希特勒根據這一個也許真也許假的新聞，立即採取決定。他命令戈林接管柏林。他搭機飛往慕尼黑，決定親自逮捕他主要的敵人。在現在已經臨近的生死最後關頭中，他表顯出他一種可怕的性格。在整個旅程中，他坐在副駕駛員的位置上，沉陷於穩秘的思想之中。飛機於六月三十日清晨四點鐘在近慕尼黑的一個機場降落，與他同行的除戈倍爾外，還有一打左右的個人衛隊。他驅車至慕尼黑城褐衫大廈，召見當地褐衫隊領袖，立即當場把他們逮捕起來。到六點鐘，他帶了戈倍爾和少數衛隊驅車至威西。

一九三四年夏季，羅姆因病至威西療養。他選定主治他的醫生的小別墅，作他的住所。選定這一個地方作總部，從策動目前的革命而言，可說再糟沒有了。別墅位於一條狹隘的死巷的盡端處，有人進出很容易被人注意。別墅內沒有一個房間，大到足以做褐衫隊領袖們據稱即將舉行的會議議場。全別墅只有一架電話。這些事實，與暴動迫在眉睫的說法不合。如果羅姆和他的信徒正在着手政變，那他們真是未免太草率了。

七點鐘，領袖的一列汽車到了羅姆別墅的門前。希特勒獨自赤手空拳，上樓走進羅姆的臥室。兩人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將成爲永遠的祕密。這完全出於羅姆的意料之外，羅姆和他個人的僚屬俯首被捕，沒有出什麼亂子。這一小羣人帶了俘虜重新登車回到慕尼黑。在半路上，他們遇到一隊載運武裝褐衫隊員的卡車，這批人是應召到威西來出席中午的會議爲羅姆捧場的。希特勒走上汽車，傳見他們的指揮官，以充分自信的威權，命令他把全體人員帶回去。他的命令獲得立刻的服從。如果希特勒遲了一小時，或者這批褐衫隊早一小時到，那麼事態的演變，又將取不同的路徑了。

到了慕尼黑以後，羅姆和他的一行，被囚於十年前他和希特勒曾監禁的同一獄中。那一天下午，處決開始。在羅姆的獄室中，放了一枝手鎗，但因為他不屑領教，於是就把獄門打開，幾分鐘內，他全身為鎗彈所洞穿了。整個下午，處決頻頻進行。執行鎗斃的八人一班，時時輪換，以減除兵士心理的緊張。但每隔十分鐘光景，就可以聽到一排鎗聲，一直連續到好幾個鐘頭。

同時在柏林方面，戈林聽到希特勒的消息，採取同樣的步驟。但在這裏首都方面，被害者超出褐衫隊系統以外。施萊轍和以身護衛他丈夫的夫人，同在家內中鎗斃命。斯特拉薩被捕後遭處決；巴本的私人秘書及其接近人士同遭非命，但他自己因為某種外面不知道的原因，卻逃出了大難。恩斯特在白里門逮回柏林來渠斐爾特軍營，面臨劫數；在此處也同在慕尼黑一樣，整天聽到排鎗的鎗聲。在二十四小時中，德國全境內有許多與羅姆陰謀無關的人士，都在亂中失蹤，成為私人挾嫌、有時為了算很老舊帳的犧牲者。例如在巴伐利亞首長任內鎮壓一九二三年暴動的喀爾，他的屍體發現丟在近慕尼黑的森林裏。此次被『清算』的全部人數，各方估計不同，自五千人至七千人不等。

在這浴血一天的下午，希特勒坐飛機回到了柏林。屠殺正在隨時蔓延，現在到了加以制止的時候了。那天晚上，有些希特勒衛隊（黑衫隊）人員因為鎗殺囚徒熱心太過了頭，自己成了被鎗斃之列。到了七月一日清晨一點鐘左右，鎗聲停止了。那天夜晚希特勒在總理府陽臺上出現，接受柏林羣衆的歡呼，羣衆中有許多人認為希特勒本人曾為這次變亂的犧牲者。有些人說他的面色憔悴，也有些人說他露出勝利的神色。也許他兩者兼而有之。他的迅赴事機和不顧一切，已經保全了他的目標，也無疑保了他的生命。在那個被稱為『大刀相搏的晚上』，保全了國社黨德國的團結，使之得以把禍難散布及於整個世界。

兩星期後，希特勒向對他効忠或敬憚的國會致詞。在長達兩小時的演說內，他對於自己的行動，作娓娓動聽的辯護。這篇演說辭，表示出他對德國人心理狀態的知識以及他自己的無疑的辯論力。演詞中的最高點為：

必須以閃電的速率採取行動，等於說在這個有決定性的時間內，我僅有極少數的同志。……雖然只有幾天以前，我還準備實施寬大，但到了此時，已無任何此類考慮的地位了。叛亂行爲已經根據終古不變的鐵的原則加以平服了。如果任何人向我指斥，問我爲什麼惡處犯者不採取尋常的法院路徑，我所能對他說的，就是如此：在這個時間內，我負德國民族命運的責任，因此我成了德國人民最高的裁判者……我不願把這個新帝國，重走上舊帝國的覆轍。我下令鎗斃這次叛國運動中那些元兇人物……

接着就是下面一段駁雜的但可以表現意思的譬喻：

我再下令把毒瘡燒光刺鮮肉爲止。這些瘡，正在毒害我們國內生活的根源，和毒害外面的世界。

不管這種屠殺如何可以用正在發生作用的惡毒勢力來解釋，總之，它顯示出德國的新主人是什麼都不能使他們半途而止的，也顯示出德國的情況，與文明國家全無相同之處。一個根據於恐怖之上的帶血腥氣的獨裁制度，現在已面臨到世界之前了。德國反塞族（猶太）運動是凶暴和不識羞恥的；集中營制度已充分實施，用以應付所有討厭的或政治上立場不同的階級。這一個插曲，對我發生深切的影響，而現在已有強大證據的德國重行整軍的整個步驟，在我看來，都帶有一種殘酷的慘澹的色調。它閃爍和照射着。

現在我們可以暫時回到下議院。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中，日內瓦裁軍會議的常設委員會作無定期的休會。七月十三日我說：

我很高興裁軍會議已在成爲歷史陳跡。把裁軍和平混爲一談，這是最大的錯誤。在你享有和平之時，你就須實行裁軍。但在最近這些年來，列國間的關係發生了着着的惡化，惡意着着滋長，在所有這些年中，不管那些成爲這時代特徵的不斷出現的演說、雄辯、用意甚善的情感演說，軍備仍有着着的、實際上很快的增加。

如果歐洲國家不再感覺到處於嚴重危險之中，像現在有許多國家所感到的，那歐洲就安全了。那時軍備的壓力和負擔就會自動解除，這也是長期和平理所應然的；那時也將很容易根據某種一般的協議，採取一個裁軍性質的運動。我實在希望，我們政府壓迫法國——沒有軍國主義的和平法國——使之減削武裝實力的時期，現在已到了告一結束之時。我所引以爲幸的，就是法國並沒有接受由各方面所任意提出的、和無疑將受反對黨領袖（蓋斯伯雷）所熱烈支持的勸告。

這不單是我們將及身見到的德國，而且我們還要考慮到，在目前兩三個人，不管他們的情形如何窮極無聊，已經掌握了那一個偉大圖

家的全部實力；掌握了那個非常科學的、知慧的、馴順的、和勇敢的民族，人數在七千萬以上；在那裏並沒有像帝制所產生的王朝利益，因為要瞻望較遠的將來和顧慮到嚴重的損失，對政策發生一種約束的作用；在那裏，除了由廣播和統制新聞等新的工具所製造出者外，並無公衆的輿論。德國的政治情形，與這裏的不同。在那裏，你離職以後，並不是站在反對黨的地位。你離開政府席次後，並不是就坐在政府黨與反對黨中間的席次。你可能在一小時內接到通知，離開你的高級職位，趕到警察局去聽受訊問，此後你也許很快的還要受一番更為嚴重的考驗。

在我看來，站在這種地位上的人，似乎更容易受誘惑做出甚至連軍事獨裁所不願幹的事體來，因為軍事獨裁固然有其種種缺點，至少是以對真正事實作精密研究為根據的；在這種獨裁制中的危險性，比軍事獨裁中可能有的還要大，因為在這種獨裁中的人物，為了解除他們在國內所遇到的大禍患，很容易轉向從事於在國外作對整個世界發生最危險的有破壞性的冒險。

作這種對外冒險的第一次誘惑，不久就發現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由巴伐利亞至奧地利的山路上，冠蓋相望，至七月底，有一個德國信使，落入奧國國界警察的掌握中。他身邊帶有許多文件，包括秘密電碼，由電碼發現了一個即將瓜熟蒂落的暴動計劃。政變的組織者，為奧國當時駐意公使林特倫。陶爾斐斯及其閣員對於危機迫近的警告，和二十五日清晨顯然可以看出即將發生變亂的徵象，遲遲沒有反應。那天早上，維也納的納粹信徒集中待命，至下午一點鐘，一隊武裝的叛徒衝入總理府，陶爾斐斯身中兩彈，流血不止而死。另一隊納粹分子，占領了播音站，宣布陶爾斐斯已告辭職，由林特倫繼任。

但陶爾斐斯內閣的其他人員，作了堅決的和有力的反應。總統密克拉斯博士正式明令不計任何代價，只求恢復秩序。司法部長舒斯尼格負起政府的責任。奧國軍警多數人員擁護政府，把由少數叛黨占據的總理府圍圍包圍，其時陶爾斐斯正在總理府內奄奄待斃。同時各省內的變亂亦經平服，在巴伐利亞的奧國軍團正越界入境。此時墨索里尼也聽到奧國政變的消息。他立即打電報給奧國國防軍領袖泰亨堡親王，答應意大利決定維護奧國的獨立。他特別飛往維也納，接見陶爾斐斯的遺孀，加以百般的撫慰。同時有三師意大利軍，奉命開至意奧邊境的白倫納山口。希特勒到此地步，知道他力量的限度，中途住手。與暴動有關的駐維也納公使李斯及

其他德國官員，都奉命撤回或解職。暴動之舉失敗了，還需要一個更長的部署。在血鬪中新獲倖免的巴本，被命爲駐維也納的公使，奉令用更巧妙的方法進行工作。

巴本之任命爲駐維也納的公使，其顯然的目標，即爲布置推翻奧地利共和國。他負有兩重的任務，第一、鼓動奧國地下活動的納粹黨，此後每月由德國補助經費二十萬馬克。第二、破壞或收買奧國政治上的首要人物。在他受命之初，他的態度十分坦白，對他在維也納的美國同僚幾乎到洩漏祕密的地步。

巴本以最大膽和最揆穿的方式告訴我（美國公使），所有歐洲西南部直至土耳其止，都是德國天然的腹地，他負有任務，把這整個區域置於德國經濟的和政治的支配之下。他溫順而直接的說，控制奧國是達到目標的第一步。他打算利用他自己已是良好天主教徒的聲譽，與奧地利人如殷尼齊大主教締交。德國政府已經決定控制西南歐洲，沒有什麼可以使他們半途中止。美國的政策，也同法國和英國的一樣，都不是「實事求是的」。

在這些悲劇和恐慌之中，高年的興登堡好幾個月來早已幾乎老耄失聰，因之成爲道地的德國軍部的傀儡，現在與世長辭了。希特勒繼任爲德國元首，同時保持德國總理的職務。他現在成了德國的最高至尊。他向德國軍部的交易，已由血的清黨而決定和結束。褐衫隊員回到服從的地位，重新申述向領袖效忠。他們隊伍中所有的敵人和可能的競爭者，已經清除殆盡。從此以後，他們的勢力喪失無遺，成了達到典禮儀式時作警衛點綴品。反之，黑衫隊員人數一天天增加，因具有特權和特殊紀律而日益加強，在希特勒指揮之下，成了護衛領袖個人的衛隊，與陸軍領袖和軍人階級分庭抗禮的部隊，以及配備大量軍力、從事日益擴大的祕密警察活動的政治部隊。這種權力，祇須經過受操縱的人民投票的核准，就可以使希特勒實行絕對的和完全的獨裁了。

奧地利的事變，促成法國和意大利的接近；陶爾斐斯被暗殺後的激動，使兩國的參謀本部進行協談。奧地利獨立的發生威脅，鼓勵了法意的調整，這不僅涉及地中海和北非方面的均勢，也影響到西南歐方面法國與意大利的相對地位。但墨索里尼不僅亟於保障意大利在歐洲的地位，以抵制德國潛在的威脅，還同時亟於保證在

非洲方面帝國的擴張。爲抵制德國，與英法合作，自然是有用的；但在地中海和非洲方面，與英法勢所必至發生爭執。墨索里尼自己忖度，意法英所共感的安全需要，會不會促使意大利過去的兩同盟國家接受意大利在非洲的擴張計劃呢？無論如何，這似乎是意大利政策的一個最有希望的途徑。

在法國方面，自出醜的斯泰維斯基舞弊案件和二月暴動以後，達拉第繼起在杜美總統下組成右翼政府，以巴爾都爲外交部長。自從羅加諾公約簽字以來，法國即迫於希望東歐方面根據安全的措施，成立正式的協定。但因爲英國不願接受萊茵河以東的義務，德國的拒絕和波蘭捷克訂立有束縛性的協定，小協約國對蘇聯用心的戒懼，和蘇聯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懷疑，合起來使這個計劃無從實現。但至一九三四年九月，巴爾都決心作進一步的行動。他的原來計劃，是想訂立一個包括蘇聯、德國、波蘭、捷克、和波羅的海國家在內的東方公約，由法國保證蘇聯的歐洲國境，由蘇聯保證德國的東部國家。德國和波蘭對東方公約同表反對，但巴爾都終於使蘇聯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八日加入了國際聯盟。這是一個重要的步驟。代表蘇聯政府的李維諾夫，對於外交事務的每一方面，都熟習如數家珍。他投合於國際聯盟的空氣之中，用它道德的口氣發言，非常成功，他立即成爲一個顯著的人物。

德國在默許之下，日益壯大，法國爲尋求同盟加以抵抗起見，其眼光會轉到蘇聯身上，和打算重新造成戰前的均勢狀態，原是很自然的事。但在十月裏，卻發生了一幕悲劇。法國爲推行在巴爾幹的政策起見，邀請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正式訪問巴黎。他在馬賽登岸，巴爾都在埠迎迓，他們和喬治將軍一起驅車而進，路上人民夾道歡迎，國旗鮮花點綴得極爲熱鬧。在克洛茲人和塞爾維亞人地下活動的密室裏，又發生了一個在歐洲舞台上施行的惡毒的暗殺陰謀；也像一九一四年在薩拉其武（爲塞爾維亞人暗殺奧國皇儲之地，並成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直接導火線——譯者），一羣準備犧牲自己生命的凶手，在旁躍躍欲試。法國人的戒備是隨便沒有秩序的。忽然從歡呼的人羣中，竄出一個人搶上汽車的腳踏板，用他的自動手鎗朝向國王及其他同車的人連連發

射。凶手是由共和國馬巡隊背後溜進來的，行凶後立刻爲巡隊衝倒打死。接着發生一陣大騷亂。亞歷山大國王差不多立即斃命，喬治和巴爾都身上流血跑出車子，那位將軍奄奄一息不能行動，但立刻獲得醫藥急救。那位部長跑出人羣，二十分鐘後纔被人注意到。他不得走上省長公署的樓上，以便獲得醫藥的治療；醫生然後在傷處的下面施行止血器。他已經流血過多，他今年七十二歲，幾點鐘後卒告不治。這對法國的外交政策是一個重大的打擊，這種政策，在他指導之下正在開始取得條理分明的形式。他去世後，外交部長一職，即由賴伐爾繼任。

我們不可因賴伐爾後來可恥的記錄和命運，忘記了他個人的衝動和能力。他具有一個清晰的和強烈的見解。他相信法國必須不計任何代價，以求避免戰爭，他希望與意大利和德國的獨裁者進行交涉，以實現這個目標，關於德意的制度，他並不存有厭惡的成見。他懷疑蘇聯；他對英國除了有時口頭表示友善外，深爲憎惡，而且認爲是一個沒有用的聯盟；英國那時在法國的名譽，實際也的確不大響亮。他的第一步目標，是和意大利成立確切的諒解，而且他認爲此時進行時機已經成熟。法國爲了德國的威脅，慄慄於中，準備對意大利作重大的讓步。一九三五年一月，賴伐爾有羅馬之行，簽訂了一系列主要目標在於解除兩國間困難的協定。兩國對於德國重整軍備的非法，見解一致。他們同意如奧地利的獨立將來發生危險時，即進行諮商。在殖民地方面，法國答應對突尼西亞意籍居民的地位，作行政上的讓步，以利比亞與索瑪利蘭兩地邊境的若干土地，割讓給意大利，再加上給予意國傑部地至阿的斯·亞巴巴鐵路之百分之二十的股權。這些談話，用意在於爲法意英舉行更正式的會議打好基礎，以成立共同陣線，對付日益增長的德國的威脅。以後幾個月中，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進行侵略的事實，卻把這些一起打破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亞軍隊在阿國與索瑪利蘭邊界處華爾·華爾水源地，發生了衝突。這是意大利後來向全世界宣布對阿國要索權利的藉口。在歐洲方面約束德國的問題，此後因此就和阿比西尼亞

的命運混成一起和變成面目全非了。

在這一方面還有一件事應該一提的。根據凡爾賽和約的條款，藏煤豐富和有重要鋼鐵廠的屬於德國的一片土地薩爾流域，應於十五年後舉行公民投票，讓居民自行決定願否重歸德國。舉行投票的日期決定爲一九三五年一月。對於投票的結果，事前已很明白不能懷疑。居民當然多數會投票贊成加入德國祖國；而且薩爾區名義上雖稱由國際聯盟所管理，實際上卻受當地納粹黨組織的控制，使投票更獲得加倍的保證。巴爾都知道薩爾最後勢所必至會重歸德國的，但他想堅持替那些投票反對立即併入德國的人，取得若干的保障。他的遇弒逝世，改變了法國政策的格調。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日，賴伐爾關於煤礦問題和德國人作直接的談判，三天以後，他在國聯中公開發布，法國將不反對薩爾歸屬德國。正式的投票，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在國際監督之下舉行，英國曾派軍參加；這一小片包圍在圈子裏的地方，是除但澤外唯一受國聯主權統轄的土地，居民以百分之九〇・三多數票贊成併入德國。這雖是一種正常和勢所必至的程序的結果，但國社主義的這種道德上的勝利，增加了希特勒的威望，這一個人民意志的真誠的模範，似乎成爲對他權力的酬庸。希特勒並沒有因國聯的公正或公平交易而態度變爲和緩，更沒有因而有所感動。它無疑坐實了他認協約國都是些沒落傻子的理論。在他自己方面，他就進行集中全力於他的主要目標：德國空軍的擴充。

第七章 空中的均勢失去了（一九三四——三五年）

德國的捷徑——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東福爾漢姆的選舉——鮑爾溫空中均勢的保證——工黨對擴充空軍提出證實——自由黨的敵視——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提出確切的警告——鮑爾溫的矛盾——一九三五年三月希特勒自稱德國已達空中均勢——麥唐納的驚惶——五月二十二日鮑爾溫的認錯——工黨和自由黨的態度——空軍部的觀點——坎列夫·李斯特爵士現在繼任倫敦特萊助爵

德國的參謀本部不相信德國的陸軍能在一九四三年以前重新建立起來，規模過於法國，具備適當的兵工廠及配備。德國的海軍，除了潛水艇以外，在十二年或十五年內也決無恢復舊觀之望，而在重建時，不免與其他擴軍的計劃，發生劇烈的競爭。但一個欠成熟的文明，不幸發明了內燃機和飛行的技術，使場面上忽地出現了一個可供列國對壘的新武器，可以在遠較短的時間內很快改變各國相對的戰爭實力。假定一個第一等的大國，得在人類不斷積累的知識中和在科學的進展中，分享一分，專心致志，可能祇須四五年的時間，建立起一枝強大的、也許是最高無上的空軍。這個時間，如有任何未雨綢繆的準備工作和考慮，自然還可以縮短。

德國空軍的重建也同陸軍的情形，經過長期的和縝密的祕密準備。早在一九二三年，塞克便決定未來的德國空軍，必須是德國戰爭機構的一部分。暫時，他安心在『沒有空軍』的陸軍裏面，建立起一個有良好連繫而外面人不易、至少在最初幾年內不易看得出的空軍骨架來。在所有各種軍事力量的形式中，空軍軍力是最難測量的，或者甚至最難以確切的用語表現出來。在任何時期內，民用航空工廠和訓練機場的軍事價值和重要性，究竟達到了何種程度，都是不易判斷的，要加以確切的規定那就更難了。掩飾、偽裝和違背條約的機會是很多的和變化多端的。在空軍方面，也祇有在空軍方面，可以給希特勒機會第一步做到分庭抗禮，第二步在這一重要軍備方面。佔取壓倒的優勢。但英法預備怎麼辦？

至一九三三年秋季，事實顯然，英國裁軍的努力，無論我們如何言之諄諄，或自己做一榜樣，都不會有成

功之望。工黨和自由黨的和平主義，甚至就是德國退出國際聯盟的重大事件，也沒有使之改變主張。兩黨繼續在和平的名義之下，主張英國裁軍，凡是持異議的人，一概被稱爲「好戰分子」和「恐怖論者」。他們的觀感，似乎受到人民的支持，自然人民並沒有瞭解當前事態的意義。在十月二十五日東福爾漢姆的補缺選舉中，和平情緒的潮流把工黨的票數增加了近九千票，保守黨的票數減少了一萬票。勝利的當選人威爾摩特在投票後演說稱，「英國的人民要求……英國政府由立即採取一個一般裁軍的政策，使世界有所領導。」當時工黨的領袖藍斯伯雷演說稱所有各國必須「把軍備裁減到德國的水準，作爲全面裁軍的初步。」這次的選舉，對鮑爾溫發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三年後一篇非常的演說中提及過。十一月德國國會舉行選舉，競選者非經希特勒贊成一概不得參加，在全數所投的票中，納粹獲得了百分之九五。

在判斷英國的政策時，如果忘記了鼓動英國大多數缺乏瞭解、和受錯誤引導的人民追求和平的熱情，以及任何敢採取不同立場的政黨或政治家，在政治上似乎都有被清除之虞，那就錯了。自然，這不能作爲曲恕那些沒有充分盡職的政治家的理由。政黨或政治家與其禍國，還不如寧可下野好些。而且在我們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任何政府要求議會和人民採取必要防衛措施而遭到拒絕過的紀錄。無論如何，那些恐嚇怯懦的麥唐納·鮑爾溫政府、使之走入歧路的人，至少應該保持閉口。

一九三四年三月的軍事預算總數僅爲兩千萬鎊，包括成立四個新空軍大隊的費用在內，或者說即把第一線的空軍實力從八五〇架增加九八〇架。第一年中中的包括費用爲十三萬鎊。

關於這一點我說過：

「大家承認我們空軍實力方面僅佔第五位——如果有地位可言。與我們最鄰近的法國比起來，實力僅有法國的一半。德國正在很快的武裝，沒有誰打算去阻止它。這似乎十分明白的事。沒有人提議作一個防禦的戰爭，以終止德國的破壞凡爾賽和約。它正在進行武裝；它正在幹；而且已經幹起來了。我不知道詳細的情形，但事實很明顯，這些稟賦很高的人民，以他們的科學和他們的工廠——以及他們所稱的他們的「空中運動」——，可能在極短的時間之內，以極大速率建立起一支擔任攻守各種用途的最強大的空軍。」

我恐恐有一天，威脅英帝國心臟的手段會落入德國現統治者的手中。我們一定會落到一個地位，將使每一個珍視行動自由和獨立的人

感到憤恨；這種地位對於從事日常勤勞工作、密集的和平的人民，將發生極大的危險。我深怕有那一天，但也許不太遠了。也許祇有一年了，或者也許有十八個月之遙。它還沒有來——至少我如此相信，或者我如此希望祈求；但距出現已不太遠了。現在是我們採取必要措置的時候了，但我們所要求的是種種措置。我們要有達到空中均勢的措置。像我們一樣參加或希望參加世界舞臺的任何民族，並無讓自己處於可以受人嚇詐地位的權利的。

勝利者和戰敗者間的怨仇，並沒有得到過糾正。侵略性的民族主義精神的倡歎，是歐洲和世界所從來沒有過的。在羅加諾會議的時代，我們對於歐洲全家大團圓抱光明的希望，現在距那個時候很遠了。

我向鮑爾溫提出要求，因為他是握有行動之權的人。他有權力，他也有責任。鮑爾溫在答覆中說：

如果我們關於成立協定的所有努力失敗了，如果在這些問題方面，不能照我所說過的取得平等，那麼本國任何政府，特別是舉國一致政府和本政府，即將保證使本國在空中實力和空中軍力方面的地位，不再較任何其攻擊力量可達本國海岸的國家為劣弱。

這裏是一個莊嚴的和確切的保證，其提出之時，如果劍及履及，採取大規模的行動，那麼這種保證幾乎一定已經實現了。

德國現在雖然還沒有公開破壞和約中禁止它成立空軍的條款，但民用航空和滑翔事業的重大發展，已到了可以很快加強、和擴充早經成立的祕密非法空軍的地步。希特勒的叫囂攻擊共產主義和布爾塞維克主義，卻並沒有阻止德國以武器暗中運往蘇聯。反之從一九二七年以後，有許多德國空軍人員，在蘇聯境內受飛行的軍事訓練。兩國間的關係有過許多波折，但根據一九三二年英國駐柏林的大使報告，德國陸軍與紅軍已有密切的技術聯繫。正同意大利的法西斯獨裁者一樣，差不多一上臺便捷足先登，和蘇聯第一個訂立商業的協定，同樣現在納粹德國和龐大的蘇維埃國家間的關係。似乎並沒有因公開的意識形態上的爭執而受到不利的影響。

雖然如此，當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政府提出若干已經嫌遲和不夠充分的提案，預備須待五年纔能全部完成的添建四十一大隊或飛機約八二〇架，以加強英國空軍軍力時，工黨經獲得自由黨的支持，在下院中對這種提議提出譴責決議。

提案中引以為憾的稱：

王家政府既非因為發現新的任務，也不是由於着眼增加國家的安全，而竟採取一種加強軍備的政策，一定將危害國際裁軍的前途，和鼓勵重新對戰備作危險而浪費的競爭。

為擁護反對黨這種完全拒絕接受任何加強我們空軍實力的措置，艾德禮代表反對黨的名義說明，「我們否認有增加空軍軍備的需要……我們否認實力加強後的英國空軍可以保障世界和平這個前提，我們也完全拒絕達到平等的要求。」自由黨擁護這個譴責案，雖然他們原本贊成他們自己的文字如左的原案：

本院對於世界各國恢復證明常為戰爭先奏的軍備競爭的趨勢，抱嚴重的憂慮；除非裁軍會議已經顯然失敗了，除非有了確切的理由，本院對於我國軍備的任何擴充，將不允通過；所提議的關於空軍軍備額外支出二千萬鎊，既然缺乏這些條件，本院拒絕同意。

自由黨領袖薩繆爾爵士在他的演說中說：「德國的情形怎麼樣呢？就我們迄今所看到或聽到的，並無跡象表示我們現有的空軍實力薄弱，不足以應付此時在這方面的任何危險。」

我們如果記着，這是政黨負責領袖經過慎重考慮後所用的文字，那我們國家的危險也就顯然可見了。這時尚在醞釀的時期，此時如果我們作最大的努力，也許可能保持保證我們獨立行動的空軍實力；如果英法在數量上分別和德國保持相等的地位，則英法聯合起來，實力便可以比德國強一倍，希特勒的暴力事業，或者用不到死一個人，早在它萌芽之時便已被摘除了。錯過此時便嫌遲了。我們不能懷疑工黨和自由黨領袖的誠意。他們完全錯了和誤解了，他們須在歷史之前擔當他們所負的責任。所可怪者，倒是工黨在以後的各年中，竟曾努力自稱具有優越的先見之明，反斥責反對他們的人未能為國家的安全，作未雨綢繆的功夫。

我現在又可以重享政府辯護者姿態，來敦促重整軍備的便宜了。因此，在保守黨方面我受到一次超乎尋常的友善的傾聽。

一個人一定認為，由於王家政府的性質以及政府中主要閣員的紀錄，定可使反對黨以相當的信心和相當的重視，來考慮增加國防的要求。這樣一個和平心理的政府，我認為是前所未有的。我們的首相，在戰爭期中曾以極端的方式和最大的勇氣，證明過他的信念，以及為了他所信仰的和平目標願意接受犧牲的程度（按麥唐納第一次世界戰爭中以反戰曾被捕入獄——譯者）。我們的樞密院大臣（鮑爾溫），

在公衆心理上一提到他，便聯想到斯蔣中一再覆述的話：『在我們的時代中給我們和平』。一個人一定會認爲，像這樣的關員，也不得不出來說他擔感到職責攸關，要求對他們所有的保衛公衆安全的工具，作若干小小的增加，一定將使反對黨重視，和被認爲時局嚴重的一個證據，政府目標即在保護我們不受這種的危險。

現在請看政府所提出的辯護。它所提出的的提案，措詞之極端溫和，是沒有其他人所能提出的。自從這個題目開始辯論起，他們所用的每一個字，都以謙遜著稱。我們聽到說，我們可以自己看出提議的要求如何渺乎其小。我們也得到保證，如果日內瓦（裁軍會議）成功，這個提議隨時可以立刻終止。我們也得到保證，我們正在採取的步驟，雖然在若干淺見的人心中認爲和國家自衛的觀念有關，實際上祇是爲了集體安全的大原則。

但所有這些低聲下氣的辯護方法，受到反對黨悍然的拒絕。對於這些與他們和解的努力，他們唯一的答覆，就是這一個將於今天晚上決定的譴責案。在我看來，關於這個題目，我們和輿論若干方面，已快到不再值得作和解努力的山窮水盡之境了。我們當前的形勢，正在企圖造成一種輿論的暴政，如果這種的統治可以繼續下去，國家的穩定與安全定將受嚴重的損害。我們是一個富有而容易的犧牲者。沒有國家像我們這樣的容易受破壞，也沒有國家像我們這樣，劫掠可有豐饒的收穫……在我們此地的宏偉的京師，世界最大的目標，好像總好一頭肥大寶貴的乳牛，引誘猛獸的注意。我們今日所處的地位，是我們從來所沒有過的，也是現代其他國家所沒有的。

讓我們記牢這一點！我們的弱點不單連累我們自己；我們的弱點，也連累到歐洲的安全。

接着我進而申述德國已經隣近取得與英國相等的空軍地位：

第一我斷言，德國破壞和約，已經創設了一枝空軍，其實力現在已近於我們現有防衛本土的空軍實力的三分之一。那是我向政府提出，供他們考慮的第一次所說的話。第二，德國正在支出大量的款項，很快的增加空軍的實力；這些錢不單包括預算中列出的經費，還包括德國全國現在、和過去相當期內即已實行的公衆捐款——往往幾乎是帶強迫性質的捐款。至一九三五年底止，即使我們政府現在的提議實行了，到那時德國空軍在數量方面和效率方面，將近相等於我們防衛本土的空軍。

第三段說明德國如果繼續這種的擴充，而同時我們繼續實行我們的計劃，那麼差不多到一九三六年，德國的空軍一定在實質上超過英國的空軍。第四，這也是引起不安的一點，他們一旦領先以後，我們也許永遠追不上去了。如果這些斷言不能有異議可言，那麼本院各方所發生的憂慮是有原因的，這種憂慮還不單爲了德國空軍的實力，而且我不得不說，也是爲了現德國獨裁制度的特色。如果政府必須承認，在以後幾年內，任何時候德國空軍實力會強過我們的空軍，則他們應負起，我應認他們理合負起未能善盡他們對國家的主要責任。

我以下面一段話作結束。

反對黨也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對於德國納粹政府的行爲措詞極爲率直。沒有人的批評比工黨或坐在我前面的自由黨一派，更爲嚴峻

的。他們的報紙，現在爲了共同目標團結一致，就實難的辛辣而言，居於領先的地位。但那些已經把德國放在掌握之中的有強大勢力的人士，對於這種批評，卻深惡痛恨。而我們現在卻要解除我們友人的武裝，我們要去冒犯強大的國家，我們也完全忽略我們自己的防衛。那是一種很悲慘和危險的情勢。實際上，他們憑其會違行的路徑，和憑他們要求我們接受的投票，想使我們置身於一種極端可怕危險的地位之中；今晚如果我們投票反對他們，就可希望發現一條比他們所要領導我們走的路，更爲高明的保障國家安全的大道。

工黨的譴責案，自然經絕大多數的反對被否決了。我深信不疑，關於這些問題，如果經過適當準備向全國呼籲，也可以使全國同樣的支持其他爲國家安全所必需的措置。

在敘述這段故事時，不能不把我們由安全至死亡之口的長程中的紀程碑紀錄下來。現在回看起來，我對於我們所有的時間之長，不勝詫異。在一九三三年，甚至即使到了一九三四年，英國很可能建立一個強大的空軍實力，足以對希特勒的野心作必要的箝束，或者也許會使德國的軍事領袖，得以約制希特勒的激烈行爲。現在距我們到最後關頭，還有整整五個年頭，即使遲至此時，如果我們的行動，以合理的審慎與健全的努力爲基礎，也許最後關頭根本不至發生。英法憑藉優越的空軍，就可以安然請求國際聯盟的援助，所有歐洲其他國家可以團結作他們的後盾。國際聯盟原可第一次成爲具有威權的機構。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國會冬季集會開幕時，我以若干友人之名（註）提議在國會致詞中添下列的修正，宣稱：「我們國防的尤其空防實力，已經不復充實，不夠保證陛下忠實臣民的和平、安全和自由了。」議會中人山人海，都準備傾聽。我在引申了種種理由，強調我們和全世界所遇到的嚴重危險後，進而講到確切的事實。

第一，我斷言此時德國已有一支空軍——那就是說空軍大隊，具有必要的地上服務、受過訓練的人員和物料有必需的儲備，祇要一聲令下，便可集合作公開的結隊；而且這次非法的空軍在品質方面，已經很快的和我們等量齊觀了。第二，從現時起的今後一年內，如果德國執行他現有的計劃，並沒有加緊步伐，同時我們也照目前的基礎，執行我們的計劃，不發生中途延遲的情形，實現議會於本年七月內所

宣布的增加數，那麼到了明年今日此時，德國空軍軍力至少便可和我們相等，也許還要比我們更強。第三，根據同樣的基礎，那就是雙方都照目前的辦法推行現有的計劃，則再過一年，即今後約第二年一九三六年，德國空軍實力將超過我們約百分之五十，至一九三七年便可超過我們近一倍。所有這些，如我所說的，都是假定德國並不加緊步伐，而我們沒有中途延遲的情形。

鮑爾溫立即起立，正面這個問題，根據了他空軍部顧問的資料，對我作直接的抗辯：

說德國正在很快的和我們等量齊觀，不合事實。我指出過德國的數字，乃是全部的而非第一線戰鬪力的數字，我也曾提出我們第一線的數字，而且說明僅是第一線的數字，在他們後面我們所可使用的後備要遠為大得多，即使以德國空軍軍力與英國立即可在歐洲使用的空軍軍力比起來也是如此。德國現在正在積極從事製造軍用飛機，但它的真正實力還不到我們今日在歐實力的百分之五十。至於講到從現時起一年以後的情形，如果德國執行他現有的計劃，並沒有加緊步伐，而我們照核准的速率，繼續實施本年七月向國會宣布的擴充，那麼德國的空軍實力，非特不會和我們相等，或比我們更強，照我們的估計，我們單在歐洲仍將佔有近百分之五十的超額。我不能預料到兩年以後的情形。邱吉爾說到一九三七年所可能發生的情形，就我會能做過的調查研究，使我相信他的數字大大的渲染過當了。

這位事實上的首相這番斬釘截鐵的保證，安了大部分感到驚惶的人的心理，使許多批評者啞口無言。每個人都樂於聽到我的確切的說明，已經無可非難的權威方面所否認了。但却完全沒有使我信服。我相信鮑爾溫的顧問們，沒有把真相告訴他，無論如何他不知道事實。

冬季幾個月就這樣的溜過了，直至春天我纔再有舊事重提的機會。我提出詳盡和精確的通告。

邱吉爾致鮑爾溫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七日我提議在星期二提出空軍預算時，重新再舉行上年十一月我們的討論，和我盡力之所及，來分析你提出的關於各不同時期英國與德國防守本土空軍實力的數字，即提出的那個時候，現在和一九三五年平常年度與財政年度底等。我相信德國的實力已經和我們相等，或甚至已經強過我們；如果我們實施規定的新計劃，則至一九三五年年底或一九三六年初，德國實力將超過我們百分之五十。你可以看出，這和你上年十一月所說到那時我們可有百分之五十的優勢相反。自然我將提到你在一九三四年三月所作的保證，即『本國的地位將不再較任何其攻擊力量可達本國海岸的國家為劣弱』，我們根據我所曾得到的資料，說明這些保證並沒有在兌現，事實將很快的加以證明。

我想，我這次也同上次一樣，把我辯論一般的路線先行通知你，對你一定方便；如果任何代表政府發言的人，能夠證明事實相反，則沒有人比我更感高興了。

空軍預算於三月十九日提出下院。我重新申述上年十一月我說的一番話，直接非難鮑爾溫所提出的保證。空軍部次長作了一個充滿自信的答覆。但到三月底，外相和艾登赴德訪問希特勒，在一次重要的談話中，希特勒親自告訴他們，德國空軍的實力早已和英國的相等了。這次談話經記錄在卷。政府於四月三日將事實公布。五月初首相在他自己的機關報新聞報上做了一篇文章，文內他強調德國重整軍備的危險性，其措詞和我一九三二年來所常常採用的極爲相似。他用了『埋伏』一個揭露真相的字，這一定出於他內心焦慮而採用的。實際上我們已陷於伏中。麥唐納自己領導辯論。在他先宣布德國意圖建立一枝超過凡爾賽和約規定的海軍和建設潛水艇後，他論到空中的形勢：

在上年十一月的辯論中，曾經根據當時關於德國空軍實力的估計，提出了某種估計數字，樞密大臣曾經代表政府提出保證，不管德國將來建立怎樣的空軍，我們在無論何種情形之下不會接受較他們爲劣弱的地位。如果要不是如此，那就將使我們處於一種爲本政府和空軍部所充分瞭解的難堪的地位。正如四月三日已經告訴本院過的，在三月底外交大臣和掌璽大臣訪問柏林之行中，德國總理說明德國在空軍方面已經達到和英國相等的地位。這一句話，以空軍實力而言，不管作如何確實的解釋，要之無疑的表明了德國空軍的發展，早已遠超過我們上年在本院中所能提出的估計以上了。這是一個嚴重的事實，政府和空軍部對這個事實已經採取立即的注意。

等到經過相當過程，輪到我發言時，我說：

即使到現在，我們並沒有採取與我們需要相配稱的措置。政府已經提出了這些增加。他們必須面對當前的風暴。他們將必然遭到各種形式的不公正的攻擊。他們的動機將被曲解。他們將被誹謗和被譏稱爲好戰分子。國內許多強大的、人數衆多、聲音極端響亮的勢力，將舉起對他們作各式各樣的攻擊。但他們無論如何要把它通過的。那麼，爲什麼不奮鬥去爭取那些可以給我們安全的東西呢？那麼爲什麼不去堅持關於空軍的設備應該充分，這樣一來，不管他們將會遇到如何嚴峻的譴責，如何叫罵的濫罵，至少可以有這個滿意的結果——即可以使政府感覺到，在政府所有應該負責的最重要責任上，他們已經盡了職責。

雖然下院極端注意的聽我發言，我感到了一種絕望的感覺。一方面對於一個有關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既抱有這樣深信不疑的見解，另一方面卻不能使國會和全國接受警告，以行動來對付鐵證，這在我是一種最痛苦的經驗了。我接下去說：

我承認言語不能盡我之意。一七〇八年聖約翰大臣伴作無心洩漏秘密，向下院宣露，阿爾曼柴之戰的失敗早在前一年的夏天便決定了，因為下院投票通過的擔任作戰的英國部隊二萬九千人，真正開到西班牙的祇有八千人。一個月以後，這個宣布經政府證實，根據紀錄，全院默坐者達半小時之久，沒有一個議員想發言，或想對這樣一個使人震顫的宣布有所評述。但那次的事如與現在我們要應付的局勢比起來，那是何等渺乎其小。那次祇是政策上發生了一個挫折。在那次戰爭中西班牙方面所可能發生的一切，其中沒有可能成爲有攸關生死的危險形式的。

今晚本院對於外交政策，意見相同的地方很多。我們必須和法國意大利以及其他亟於保持和平的大小各國作共同的行動。任何凡是顯然與那個標準相合的政府，祇須它願意在國際聯盟的權力與裁可之下工作，我決不拒絕他們的合作。這一種的政策，並不是在於關閉修訂和約的大門，而且在於取得一種安全感，和在可以進行關於那個問題（修訂和約）的任何研究以前，使所有講道理的國家，爲自衛而團結起來。在這個集體安全的莊嚴結合之中，我們必須建立起各種防衛的武力，和與我們友邦的武力聯合起來，共同行動，由此我們也許可以自在的過着安逸太平的生活，和脫出於那些可以招惹禍患的估計錯誤之外。現在我們是這些錯誤的受騙者，如果更不及時接受警告，也許就有成爲其犧牲者的一天。

此時在我的記憶中，記起一位無名作家爲火車失事而作的幾句詩。我是從笨拙雜誌諷刺畫集中讀到的；我
是從八九歲在勃賴敦上學起，便很歡喜讀這份雜誌的。

誰是掌管這輛戛戛作響的火車的人？

車軸輾軋作聲，軸節轉得十分緊張；

速度是猛烈的，快近了轉軸器處，

睡眠使司機的耳朵似聾的充耳不聞；

在夜間空自閃照着信號，

因爲死亡掌管了這輛戛戛作響的火車。

不過我可沒有加以重述。

直至是年五月二十二日，鮑爾溫提出了他的出名的自己認錯。此處我不得不援引原文：

『首先，關於上年十一月我所提出的德國飛機的數字，自那時以來就我所知，絕沒有想到這些數字是錯誤的。我當時完全信以為真。我所錯的，是我關於將來的估計，在這一點上，我完全錯了。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的見解完全錯誤……』

我在此處願意重新申述，依我看來，鑒於我們現在正在做的，此時絕非恐慌之時。但根據我所有對局勢的知識，我願慎重聲明，如果任何政府，採取的步驟不及我們現在採取的這樣堅決，在這樣的政府中我決不願作片刻的戀棧。我認為在此應該說明，在報紙和口頭上對空軍部會有大量的批評，好像計劃的不完備，未曾作更快的邁進，以及其他等等，都可能應由他們負責。我祇須在這裏覆述一遍，不問責任如何，我們也十分願意接受批評，總之，這不是任何關員個人的責任；而是整個政府的責任，我們全都負責的，我們都有受責備的地方。

我希望這種聳人聽聞的認錯，將成爲一件有決定性的事件，至少議會將成立一個由各黨代表所組成的委員會，對於這些事實和我們的安全狀況，進行調查提出報告。可是下院卻作了不同的反應。反對黨的工黨和自由黨，躊躇不決，缺乏力量；九個月前，他們對於政府所採取的最溫和的步驟，甚至曾提出或支持過一個譴責案。他們正在展望未來的大選，預備以反對『保守黨武裝政策』爲號召。工黨或自由黨的發言人對於鮑爾溫的揭露和自供，本身都缺乏準備，他們也沒有打算改動他們的演說詞，以圖適應這件重大的插曲。艾德禮說：

就一個政黨而言，我們不支持片面的裁軍……我們擁護通過國際聯盟的集體安全。我們反對以使用武力爲政策的工具。我們擁護裁減軍備和共同的安全……我們已經說明，有所準備，俾對集體安全盡一己的貢獻。我們的政策，不是由擴充軍備，而是由裁減軍備以實現安全。我們的目標爲裁減軍備，並由此而完全取消國家的一切軍備，和建立一支受國聯指揮的國際警衛軍。

至於這個崇偉的政策一時不能實現，或在實現以前應該怎麼辦，他卻沒有說明。他對於國防白皮書中所稱，鑒於美國的情形，解釋擴充海軍的必要，以及鑒於蘇聯、日本、美國的空軍，解釋有擴充空軍的必要，表示不滿。『那些都是舊式的議論，不在於集體安全制度範圍以內。』他承認德國重整軍備已有咄咄逼人之勢的事實。『要抵制任何一國的武裝部隊，不是靠我國或法國的武力，而是要靠國聯全體忠實會員國的聯合武力。我們必須使一個侵略者明白，如果他甘冒不韙向世界挑戰，他將遭到不是若干國家不甚聯絡的軍隊，而將面對世界的協力一致的大軍。』唯一的出路，是把所有的空軍交給國際聯盟之手，各國的空軍必須聯合起來，並使之成爲事實。同時他和他的政黨，投票反對政府的提議。

辛克萊爵士代表自由黨要求政府

召集一個新的經濟會議，和使德國不僅參加國際政治的友誼關係，並且在所有文明事業方面和提高兩國人民生活水準方面，和我們作積極的合作……請政府關於廢止空軍和管制民用航空訂定一個詳盡確切的提議。如果提出後而遭拒絕，讓大家明白和肯定責任之所在。

不過（他說），一方面仍應努力進行裁軍，作為政府的主要目標，另一方面，一個非國聯會員國的國家，具有最強大的陸軍，和具有在西歐方面也許是最強的空軍，而且其發展比例起來較任何其他空軍為大，這種情勢……也是不容忽受的。……在有了明白的證據，證明有採行國防措置必要之時，自由黨自必加以擁護……因此增強國防，勢必與我們在集體安全制下的義務發生舛觸的說法，我不能同意。

接下去他詳論『藉他人的死亡從中謀取私利的問題』，而且引了教育大臣哈里法克斯助爵新近發表的一篇演說詞中一段，即稱英國的人民『認為把戰爭武器的製造，交託給不像國家本身那樣負責的任何人之手，未免太危險太嚴重了。』辛克萊爵士認為空軍軍備的迅速擴充，應由國家工廠處理；至於空軍擴充一事，他說已經證明了事屬必要。

私人軍火工廠的存在，一向就是自由黨和工黨人士心中的一個鬼胎，常成爲作通俗演講的題目。自然在目前，認為單靠國有工廠便可完成已經承認有必要的空軍擴充，那是荒謬之談。國內一大部分的私有工業，正亟待予以立刻的改裝，以加強我們現有的生產供應。在反對黨領袖的演說中，沒有片言隻字，和他們承認我們當前所處的危局，或和我們現在知道的在危局背後更爲嚴重性的事實，有絲毫的干係。

至於就政府多數黨本身而言，鮑爾溫的坦白認錯，似乎把他們迷住了。他具有各種資料來源，而對於這一個他所負責的主要問題，竟自承完全錯誤，但大家因爲他在宣布錯誤和自己應該負責時，措詞坦白誠摯，認爲已可補贖罪愆了。大家對於一個毫不躊躇認錯的閣員，甚至還有一種奇怪的擁戴之忱。實際上有許多保守黨員，對於我使他們信任的領袖，處於尷尬的情況之下，大爲憤怒。鮑爾溫靠了他天生的剛毅和誠實，把自己救了出來，但不幸沒有使他的祖國得救。

倫敦特萊伯爵是我的親戚，也是我的總角之交。他是拿破侖時代著名的喀塞爾雷（即第二代倫敦特萊伯

爵，於一八一二——二二年任外交大臣及下議院議長，爲領導全歐反抗拿破侖之元勳——譯者）的直系子孫，具有毫無疑問的忠誠和愛國心。自聯合政府成立以來，他就擔任航空大臣之職。在此時期內，我們的問題因爲前面所述的嚴重變化，情形十分慘澹，使空軍部成爲國家最重要的機關之一。在這些節約和裁軍的各年內，他和他的部內人員，曾竭力從一位嚴峻而專斷的財政大臣手上，維持原有和儘量爭取最大的經費。到一九三四年夏，內閣採納了他們的一個添設四十一空軍大隊的計劃，曾使他們十分歡欣鼓舞。但在英國政治中，一熱一冷變化得很快。等到外交大臣由柏林返國，整個內閣爲了希特勒宣稱他的空軍實力已與英國相等，不勝震驚之餘，變成十分關切。鮑爾溫必須根據一般人已經承認的新情勢，來處理他上年十一月對我的駁斥了。內閣不瞭解別人在空軍方面已經趕過了他們，反照例如此的用查究的眼光，注視有關的部和該部的長官。

空軍部沒有瞭解，有一筆新的產業等着他們哩。現在財政部的束縛已經打破了，他們對更多的經費，只要開口要求好了。但他們不此之圖，卻對於希特勒宣稱已獲得空軍均勢之舉，作強烈的反響。他們的發言人倫敦特萊甚至相信下面的話：『在西門與艾登赴柏林之時，德國僅有作戰的飛機一大隊。從他們訓練設備中，他們希望在那個月底，可以組成十五至二十個編隊』（註）。這些都是一個詞彙的問題。因爲缺乏任何共同的「標準」，以及什麼叫「第一線的空軍力」，什麼叫「作戰單位」，解釋不一，對空軍加以分類自然是極困難的，空軍部現在引導他們的首長，去對他們過去的行爲，作周密的辯護，結果和現在真正感到了恐慌的政府和公衆，氣味大不相投。此時空軍部的專家和官員，曾將數字和預測告訴了鮑爾溫，他在十一月中即用了這些來答復我。他們希望他能爲這些數字和預測，加以辯護；但這在實踐政治上，已無必要。此時空軍部的這些專家和官員，顯然不但自己走錯了路，而且還要使他們的長官亦走錯路。一枝至少和我們旗鼓相當的龐大空軍，掩藏已久的，終於在德國脫穎而出，公開出現了。

倫敦特萊若干年來總是要求更多的經費，而結果一下竟變成爲沒有提出充分的要求，這對他誠如他書中所

說的，是一個奇特的和痛苦的經驗。但除了所有以上之外，他的政治立場不夠使他能夠做一部的首長，此時這一部是我們問題的真正關鍵所在，和幾乎是問題的頂點。此外，每個人都可以看出，在這種時勢中，空軍部長應為下院中人。因此該年年終麥唐納辭去首相之職時，同時當時殖民部大臣坎列夫·李斯特爵士被任為空軍部長，作為努力擴充空軍實力的新政策之一部分。倫敦特萊劭爵士極勉強的改任為掌璽大臣和上議院議長；但等到普選以後，鮑爾溫把他這項職位都免去了。他在空軍部任內的大成就，就是設計和提創名垂久遠的旋風和噴火式戰鬪機。這兩種機的原型，分別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和一九三六年三月試飛。倫敦特萊在他辯護中沒有提到這層，但他既然有許多代人受過的地方，他也許很可引以自解。新任航空大臣在有利空氣和新潮流的鼓盪下，命令立即大量製造這些戰鬪機儲備有恰好的數量。坎列夫·李斯特比起他的前任來，是一位權勢大得多的政治人物，有更好的機會，和一個更奮激的工作。他把一種更強大的力量，灌注於我們的空軍政策及管理組織之中，和親自努力工作，以趕補自一九三二年至三四年內閣所損失的時間。但他犯了一個嚴重錯誤，他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離開下院，成為上院議員，因而把他改任為航空大臣的理由之一打消了。這一個錯誤在幾年後終於使他去職。

第一等的大禍臨到我們的頭上來了。希特勒已經獲得和英國平等的地位。此後他祇須驅使他的工廠和訓練學校，開足速率，不單用以保持他在空中的領導地位，而且不斷的向前改進。從此以後，空襲倫敦的未知的和無從衡量的威脅，將成為我們無論作何決定時都須顧到的確切而咄咄逼人的考慮因素了。而且我們絕對沒有迎頭趕上的希望，或者至少政府是絕對趕不上的。英國空軍的効率之高，是應該歸功於政府和空軍部的，但維持空中均勢的保證，無可挽回的成為泡影了。德國空軍緊接以後的發展，誠然沒有保持它獲得均勢那一時期的速率。德國人為了一躍而取得這種控制的地位，和在外交方面支持和利用這種地位，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他給了希特勒繼續侵略行為一個基礎，這種侵略行為他早已計劃在先，現在就快要發生了。在以後的四年中，英國政

府會作極大的努力，就空軍的品質而言，我們無疑佔有優先的地位，但就數量而言，我們從此望塵莫及了。至戰事爆發時，發現我們的數量僅及乎德國的一半。

第八章 挑戰和反響（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希特勒下徵兵令——法國實施軍役兩年制——三月二十四日西門爵士和艾登訪問柏林——斯特拉薩會議——五月二日法蘇公約——六月七日鮑爾溫出任首相——霍爾爵士任外交大臣——艾登受任國聯事務大臣——英德海軍協定——其危險——在歐洲深遠的影響——外交大臣的辯護——德國軍隊的擴張——法德的人力

歷年的地下潛伏、祕密的或掩飾的準備，現在都已成過去，希特勒終於感到他的實力足以從事第一次公開的挑戰了。一九三五年三月九日，德國空軍正宣布成立，十六日，復宣布德國陸軍此後將以全國徵兵制為基礎。實施這些決定的法律不久也即行公布，但實際行動早已開始。法國政府對於行將發生的一切，有詳細情報，所以也在這同一重要日子早幾小時的時候，宣布將其軍役延長為兩年。德國的行爲，對於組成國際聯盟的和平條約，是一種公開的、正式的侮辱。在限於以規避或託辭的方式來破壞條約時，勝利國家一方面惑於和平主義，一方面又正忙於國內政治，還比較容易推託避免宣布和約已被破壞或違背的責任。但現在問題之來，率直而又殘酷有力。差不多在同一天，阿比西尼亞政府爲了意大利恐嚇性的要求，向國際聯盟提出呼籲。在這種背景之前，三月二十四日西門爵士偕同掌璽大臣艾登應希特勒之邀請問柏林。法國政府認爲不合時機，法國現在所面對的問題，已不是一年以前麥唐納竭力迫使他們要實行的裁軍工作，而是要將強迫兵役由一年延長為二年了。鑒於當時流行的輿論，這實在是一件吃力的工作。不單共產黨，即社會黨亦投票反對這個議案。社會黨領袖白勒姆說：「法國工人將起而抵抗希特勒的侵略」，共產黨的陶萊茲在親蘇黨羽的歡呼聲中，回答道，「我們不能容許勞工階級，被人拖入所謂防衛民主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漩渦中。」

美國除了對每一個人都表示好意外，但對於歐洲的一切事件，已經表示不願過問，並且深信以後將永遠不

爲歐洲再自尋煩惱了。但法國、英國還有當然的意大利，雖然彼此之間意見不一，但都覺得對於希特勒這種斷然違背和約的行爲，有反抗的必要。於是在國際聯盟主持之下，以前的主要的協約國家在斯特拉薩召開了一次會議，各種問題都經提出討論。

在近十年中，艾登幾乎完全致力於外交研究。他從十八歲離開伊頓公學參加世界大戰起，他在第六十來福鎗隊中服務四年，經過多次血戰，因殊功而升任上尉，並獲軍事勳章，一九二五年當選下院議員，不久他擔任鮑爾溫先生第二次執政時外交大臣奧斯汀張伯倫的國會私人祕書。一九三一年，麥唐納鮑爾溫組織聯合內閣，他被任爲外交部次長，在新外交大臣西門爵士下服務。次長的職務雖常有變動，但他的責任終是有限的。他須助理其長官實施內閣決定的政策，但他自己並非內閣的一員，亦不能參預內閣會議。他在祇有牽涉到他良知和榮譽的極端情形下，纔可以對於外交政策表示異議，以至於作公開爭論或辭職的地步。

不過在這許多年中，艾登對於外國實況，有極廣博的觀察，對於許多事都待其決定的這一大部的生活和思想，亦有極親切的認識。一九三五年西門爵士外交上的措置，反對黨或保守黨中有勢力的各派都不贊同。艾登以其知識及其非常的天賦，逐漸受人注意。因此，在一九三四年末受任掌璽大臣後，他應內閣之請，仍和外交部保持非正式的但極密切的聯繫；並亦因此而被邀偕同他的舊上司西門爵士，作這次不合時宜但也不是一無結果的柏林訪問。外交大臣在和希特勒會晤之後返回倫敦，帶來了前面已經提到的重要消息，即依照希特勒的意見，德國現在已和英國空軍均等了。艾登奉命訪問莫斯科，在那裏他和史太林取得連絡，這種連絡在幾年以後經重行恢復，獲益非淺。在歸程中，他的飛機遭遇猛烈而長期的風暴，經過危險的飛行後登陸時，他幾乎人事不省。醫生們宣布他不能和西門去出席斯特拉薩會議，他實際上一病數月。在這種情形之下，首相便決定親自和外交大臣前往參加，雖然此時他自己的健康、眼力、和智力，顯然都已在開始衰退。所以在這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中，英國的陣容極弱，而在另一方面，法國由佛蘭亭、賴伐爾代表出席，意大利由墨索里尼和蘇維區

代表出席。

當時一般同意認為，公開破壞死了好幾百萬人纔訂成的莊嚴條約，是不能予以寬容的。但英國代表在開始時即明白聲言，縱使和約受到了破壞，他們也不願考慮制裁的可能性。這當然使會議的範圍祇限於文字了。會議一致通過了一條議決案，宣稱不能接受片面的——即單方的——破壞和約，和邀請國際聯盟的行政院宣布已經發表的情勢，在會議的第二個下午，墨索里尼竭力支持這一行動，並率直反對由一國來侵略他國。會議最後的宣言如下：

三國政策的目的，爲在國際聯盟的機構下維持集體和平，茲一致協議用各種可以實行的方法，反對片面廢棄和約，危及歐洲和平，並願爲這目的作密切真誠的合作。

意大利的獨裁者在其演說中，曾着重「歐洲和平」的幾個字，並用引人注意的態度在「歐洲」之後停頓片刻。他的如此着重歐洲，立刻引起了英國外交部代表們的注意。他們豎起了耳朵，很明白墨索里尼的意思。墨索里尼雖願和英法合作以阻止德國的重整軍備，但他將來也許要在非洲對阿比西尼亞長征，所以要作這種保留。這一點應否在會議中提出？當天晚上外交部人員即舉行會議，加以討論。每一個人都亟於希望取得墨索里尼的支持共同對付德國，都以爲不宜在這時候對他提出警告，要他不侵犯阿比西尼亞，因爲如此做了，顯然要使他大爲不快。所以這個問題，在會議中沒有提起，在置之不理的狀態中過去了；而在墨索里尼則以爲協約國已默許他的陳述，讓他可以自由對付阿比西尼亞。這在某種意義上，他顯然不無理由的。法國對於這問題始終保持緘默，會議於是閉幕。

跟着在四月十五至十七日，國際聯盟行政院審查德國命令普遍強制兵役這一所謂違背凡爾賽和約的行爲。在行政院中列席的國家有：阿根廷共和國、澳洲、英國、智利、捷克、丹麥、法國、德國、意大利、墨西哥、

波蘭、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和蘇聯。各國都投票贊成不可以「片面」行動廢棄和約的原則，並將這個問題交給國際聯盟全體大會討論。同時，斯坎底那維亞半島瑞典、挪威、丹麥三國和波蘭的外交部長，因深切關心於波羅的海方面的海軍均勢，也集會以作一般的支持。提出正式抗議的國家，總數有十九國之多，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集團的國家準備甚至在最後關頭施用武力，他們的投票真是一場空勞！

賴伐爾原本無意用巴爾都那種堅決的精神和俄國接近。但此時法國卻非如此不可。凡關心於法國前途的人，對於在三月間勉強得到過半數通過的兩年兵役，深覺有取得全國一致支持的必要。祇有蘇聯政府能使向蘇聯效忠的一部分重要法國人士改變立場。此外，法國一般人都希望恢復一舊有的聯盟或類似同盟的關係。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法國政府簽署了法蘇公約。這個措詞含糊的文件，保證在五年之內遇到侵略時，兩國互相援助。

爲了使在法國政治方面可以取得確實的結果，賴伐爾現在趕到莫斯科作三日的訪問。在該地，他受到史太林的歡迎。他們舉行了長時間的會談，其中有從未公布過的一段，可以記錄在這裏。史太林和莫洛托夫所急於要知道的，當然是法國軍隊在西線的實力：究竟有多少師？服役的期間如何？在這一方面經過討論了以後，賴伐爾說：「你不能設法對於俄國的宗教和天主教徒給以一些鼓勵？這將對於我和教皇的關係，有極大的幫助。」「唔！」史太林說。「教皇！他有多少師軍隊？」賴伐爾的回答：我未據報告；但他當然很可能提出在游行中不常看見到的許多軍團。賴伐爾始終無意使法國受到任何特殊義務的拘束，這是蘇聯慣常要提出要求的。不過，他終於使史太林在五月十五日作公開宣言，贊成法國所實行的國防政策，以維持爲安全標準所需要的兵力。法國共產黨受到了這種訓令，立即轉過頭來，熱烈支持國防計劃和兩年的兵役制。從歐洲的安全立場論，法蘇公約並沒有規定在德國侵略時，對於任何一造有拘束力的約定，所以其效力極爲有限。法國實在並沒有和俄國作真正的聯合。加以法國外交部長在回程中停留在克拉科，參加畢蘇斯基元帥的葬禮。在這裏他

遇見了戈林，並作極親熱的會談。他的不信任和嫌惡蘇聯的表示，都由德國的路線完全轉達到莫斯科。

麥唐納的健康和能力逐漸衰退，已使他無法繼續擔任首相職務的地步。他在保守黨中，從來沒有為衆望所歸，他們因為他的政治和戰爭紀錄和他的社會主義信仰，所以一向對他持有偏見，在後來的幾年中祇是因可憐他而纔略見緩和。他是工黨所最痛恨的人，並且他們的痛恨他，顯然是有理由的，因為工黨的成立，以他之力為多，但在一九三一年由於他的被他們認為「背叛遺棄」，又使該黨一蹶不振。在政府的絕對多數黨中，同黨中贊助他的人祇有七個，他個人盡了最大力量以求推行的裁軍政策，現在經證明已經完全失敗。普選之期已不在遠，而在普選中他勢將無能為力。在這種情形下，六月七日宣布他和鮑爾溫互調職責，和鮑爾溫第三度出任首相，自然沒有什麼可異。外交大臣亦同時易選。霍爾爵士在印度事務部辛勤工作，因印度政府法案的通過而獲得全部成功，他現在可以有餘力來注意更直接重要的方面了。和政府有密切聯繫的有勢力的保守黨員，對於西門爵士的外交政策，久已攻擊不遺餘力。他現在被調長他所熟手的內政部，外交部大臣即由霍爾爵士繼任。

同時，鮑爾溫採用了一種新奇的權宜制度。艾登在這時候聲譽日隆，並已恢復康健。他便任命艾登為國際聯盟事務大臣，在外交部辦公，地位與外交大臣相等，並有審閱一切文件及指揮部內人員之權。鮑爾溫的目的，無非表示他重視聯盟，重視我們在日內瓦事務的處理，藉以和國際聯盟同志會推動下強有力的輿論相調和。大約在一個月以後，當我有機會來批評這我認為是「有兩個平等的外交大臣的新計劃」時，我提出它的缺點：

昨天首相說這祇是一種暫時的試驗，這實在使我也不相信這會長久，或在將來會重被採用……我們需要一個有完整思想的個人來負責外交部，處理其全部的問題，並使每一種因素和每一個事件都能對於國會所同意的一般目的，有所貢獻。外交大臣，不問他是誰，也不問他是怎樣的，必須在他的部裏面有最高權，而在這偉大的部裏的每一個人，也都應該聽命於他，聽命於他一個人。我記得在戰爭時，我們曾討論到統一指揮問題，勞合喬治說，「這並不是一個將軍比另一個將軍好的問題，而是一個將軍一定比兩個將軍好。」在這樣困難的時候，本無理由為什麼不應該有一個強有力的內閣委員會，每天和外交大臣一起研究，或為什麼首相不能隨時召見他或他的下屬；但在問題

極爲繁複重大時，在問題變動頻仍時，我以爲這種混亂的局面，將因雙重的忠順和同樣雙重的責任而弄得更糟。

這些當然在後來都爲事實所證明了。

在這樣人和事的情形之下，英國政府做了一樁極可驚異的行爲。這件事的發動，至少有一部份來自海軍部。由士兵、水手、或空軍人員來玩政治，始終是一件危險的事。他們離開舊地到了新境界中，其中事物的價值意義，和他們所熟知的完全不同。當然，他們是根據了海軍大臣和內閣的意向或甚至指示而做的，因爲祇有他才負這個責任。但海軍部方面，對於這件事始終有着強有力的贊成空氣。英國和德國海軍部之間，從事關於兩國海軍比例的談判已有多時。按照凡爾賽和約規定，德國除准有萬噸巡洋艦六艘之外，排水量達一萬噸的戰艦，不准超過四艘。英國海軍部最近發見德國在建造中的最後兩艘袖珍戰艦，即沙恩霍斯特號和格納森諾號都遠超過了和約所准許的大小，並且是完全不同的型式。事實上，牠們是二萬六千噸的輕型戰艦巡洋艦、或最高級的商船的死敵。

這種厚顏的、欺詐性的破壞和約行爲，至少在兩年之前（一九三三年）即早經詳細計劃，開始建造，而海軍部現在竟以爲有訂立一個英德海軍協定的必要。英國政府並不諮詢它的法國同盟，也沒有通知國際聯盟就這樣做了。英國政府自己一方面正在向聯盟控訴，要求會員國的支持向希特勒抗議他破壞和約中軍事條款，同時他們卻暗中進行協議的方法，把同一條約中的海軍條款，一下打消了。

協定的要點，是德國海軍不得超過英國的三分之一。這一點對於海軍部有極大的誘力，因爲他們想起在大戰以前的時代，兩國的比例不過是十六與十。爲了達到這個形勢，同時誤信了德國的保證，他們承認德國有權建造原爲和約中明白規定不許有的潛水艇。德國可以建造英國潛水艇實力的百分之六十，如果德國認爲情勢非常之時，並得造百分之一百。當然德國保證他們的潛水艇將永遠不用來對付商船。那末他們爲什麼要潛水艇呢？因爲如果協定的其他部份都能遵守，則專就戰艦而論，潛水艇顯然無法影響海戰最後的決定。

以德國艦隊限於英國艦隊的三分之一，爲完成德國的新造艦計劃，將使德國的船塢至少在十年之內，作最高度的活動。所以這對於德國海軍擴充，實在沒有什麼事實上的限制或任何束縛，他們可以儘力之所及的趕造。事實上根據英國計劃，德國所得的船數已超過了德國認爲適宜的程度，這當然一部份是由於戰艦和坦克車二者競用鋼甲板的關係。德國得准建造的，有主力艦五艘，航空母艦二艘，巡洋艦二十一艘，和驅逐艦六十四艘。但事實上在戰爭爆發時已完成及將完成的，祇有主力艦二艘，巡洋艦十一艘，和驅逐艦二十一艘，沒有航空母艦，亦即還不到我們慨然答應他們的建立數的一半。如果他們犧牲戰艦而將可以利用的資源集中於巡洋艦和驅逐艦的製造，則他們在一九三九年或一九四〇年對英戰爭時可能佔到優勢。我們現在知道，希特勒會對李特海軍上將說過，對英戰爭不致在一九四四至四五年以前發生。所以，德國海軍的發展計劃是以長時期爲基礎的。僅在潛水艇方面，他們建造到文字上所許可的限度。在他們超過百分之六十的限制時，立即援用准許他們建造百分之一的規定，到戰爭開始時，經確實完成的有五十七艘。

關於新戰艦的設計，因爲德國不受華盛頓海軍協定或倫敦會議的拘束，所以他們多一層便宜。在英法美三國都受三萬五千噸的限制之時，他們立即着手建造的俾斯麥號和鐵辟茲號，這兩艘大船計劃中的排水量都超過四萬五千噸，一旦完成以後，成爲世界海面上最強有力的兵艦。

在這個時候，這個協定同時亦使希特勒在外交上得到大大的便利。它分裂了協約國，其中現在已有一國寬恕了他破壞凡爾賽和約的行爲，現在他又可藉和英國的協定而重獲重整軍備的完全自由。協定的被公布，又給了國際聯盟另一打擊。法國人有充分理由的訴說，英國准許德國建造潛水艇，影響了他們的基本利益。墨索里尼認爲從這一件事中，證明英國對盟友並無守信誠意，祇要牠的特殊海軍利益獲得保障，顯然願以任何方法使德國滿足，至於對那些爲德國陸軍擴充而忍受威脅的友邦發生什麼不利，它是不管的。他爲英國這種無是非之心的自私的態度所鼓勵，繼續推行他對於阿比西尼亞的計劃。至於斯坎底那維亞半島的各國，祇在兩星期以前，還勇敢地擁護對希特勒在德軍中實行強迫兵役的抗議，現在忽然發見英國在幕後已經同意德國建立海軍，

其實力雖僅及英國的三分之一，但即在這個限度內，已經足夠稱雄於波羅的海中了。

英國大臣對於德國願意和我們合作廢除潛水艇的建議，頗賣了一番力氣。德國人明知這個建議附有條件，即各國必須同時同意，並且明知其他國家顯無同意的可能，所以他們提出這個建議，實在是最妥當也沒有的。德國的同意限制使用潛水艇，使潛水艇戰爭不能作不人道的行爲，其用意也是如此。誰能相信德國人在有了一大隊潛水艇後，看到了他們的婦孺爲英國封鎖而受到飢餓時，還能節制而不完全利用這種利器嗎？我稱這種見解爲輕信之尤者。

這個協定，不單沒有接近裁軍一步，如果實行了幾年以後，並將無可避免的引起全世界的新造艦競爭。法國海軍除了牠最後建造的船隻之外，都須重建。而法國造艦又將在意大利發生反響。在我們方面，顯然我們就應該大規模進行重建英國的艦隊，俾得在新式船隻方面可以維持三對一的優勢。也許我們的海軍部認爲，德國海軍既爲英國的三分之一，亦即是說英國的海軍要三倍於德國。這也許可以使我們從容除舊布新，把艦隊作合理的重建。但那些政治家在什麼地方呢？

這個協定由海軍大臣愛利斯·蒙賽爾爵士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向國會宣布。在一有機會，即在七月十一日，其後復在七月二十二日，我曾加以抨擊：

我不相信英國這種孤立的行動，會有利於和平。此舉的直接反應，是使德國艦隊的噸位日益接近到可以絕對控制波羅的海，不久以後，可以阻止歐洲戰爭的因素之一，即將逐漸消失。至就地中海的情形而論，我以為我們遭遇的困難更大。當然，在法國爲對抗德國不得不將其艦隊現代化，而意大利又跟着如法泡製的時候，一定會製造出大量的新船，看了那種情形，我們亦將被迫而重建我們艦隊，使我們在地中海的地位不致受到影響。但最壞的是對於我們在世界其他各地地位所生的影響，如在中國和遠東。這對於日本真將是一種何等意外的收穫！試看看所生的結果。海軍大臣說，「正視事實」。但當這個計劃完成以後，英國的艦隊將大部份停駐北海。其意義即遠東的全部形勢將大爲改觀，有損於英美，亦有害於中國……

我所認爲遺憾的，關於德國海軍軍力復活問題，我們並沒有和親附我們的歐洲各國，以及和我們一樣因德國軍備大事擴張，而其命運受到影響並發生恐懼心的國家，協同處理。德國軍備現被擴充到如何程度，沒有人能加以正確的估計。我們已看到遠比我們想像所及更爲強大的船隻，可以被建造出來，事前即連我們的海軍部也不知道。我們已看到在空中所做的。我相信，如果本財政年度內德國的支出數

字能夠加以確定，那末這國家用於備戰的龐大支出，必將使本院和全國大為震驚，這個強大的德國，現正在蛻變為一個軍火庫，差不多已在接近動員的邊緣了。

爲了答復國內和歐洲許多的批評起見，霍爾爵士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一日作受任外交大臣後的第一次演說。其中他提出了相反的辯論，這裏也有加以記敘的必要：

英德海軍協定完全不是一件自私的協定。我們決不會訂立一個在我們的見解中不利於其他海軍國家的協定。我們所訂立的協定，我們以爲非但不會妨礙、而且確實應該可以促進一般的協定的。海軍裁軍問題向來和陸軍、空軍裁軍問題分別處理，海軍問題向來是被單獨處理的，並且就我所知，單獨處理也向來是各海軍國家的意向。

但除了法理方面以外，我們以爲爲了和平起見——這是英國政府的主要目的——實有充份理由應該締結這個協定。依我們海軍專家的意見，我們應該接受這個協定，因爲牠對於英帝國是一個安全的協定。在這裏，我們又發見一個稍縱即逝的機會，可以消除引起大戰前懷恨心理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德國海軍的軍備競賽。乘便應該提到的是，在討論之中，德國政府曾發表了一個極重要的宣告，即就他們而言，他們此後將消除使戰爭成爲非常可怕的原因之一，即取消潛水艇對商船無限制的攻擊。第三，我們確實以爲乘機可以訂立一個協定，使在海軍的立場上顯然有利於其他的海軍國家，包括法國在內……以現在的法國艦隊約略和我們比較，這個協定可使法國比德國艦隊永佔百分之四十三的優勢，在戰前牠實在比德國約少百分之三十……所以我膽敢相信，世界對於這些結果作冷靜的觀察後，極大多數贊成和平和贊成限制軍備的國家，都將說英國政府不但採取了一個明智的措置，並且採取了在現在環境下唯一可能的措置。

但是事實上所做的，是准許德國在以後五六年中，儘力建造擴充。

同時，在軍事方面，德國於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正式實行的徵兵制度，實在是對於凡爾賽和約的根本挑戰。但德國軍隊現在用以實施擴充和改組所採的步驟，不僅具有技術上的興趣；這個國社黨國家內軍隊的全部功能，實在都需要加以研究。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法律的目的，是將祕密訓練的專門技術精兵擴充成爲全國武裝。德國陸軍一名經改爲國防軍。軍隊歸最高領袖所統轄。每一個士兵，不像以前那樣對着憲法、而是對着希特勒個人宣誓。陸軍部直接聽命於元首的命令。兵役是人民的主要義務，陸軍的責任在於澈底教育和統一

國內的人民，法律的第二條是：「國防軍是德國人民武裝力量和受軍事教育的學校」。實際上這就是希特勒於我的奮鬥中下面一段話的正式而合法的具體表現：

將來的國社黨不應再蹈以前覆轍，將陸軍所沒有和不應有的任務交給牠。德國陸軍不應成爲維持特殊階級利益的學校，而應成爲促進所有德國人之互相了解和適應的學校。國家生活中不論任何分裂，都應由陸軍來加以統一。它並應將青年人從其狹小的鄉村範圍中提出來，放在德國整個國家之內。他必須學習尊重的，不應是他出生地的疆界，而應是他祖國的疆界；因爲這纔是他將來所要加以保衛的。

根據了這些思想上的基礎，法律亦規定了一個新的區域組織。陸軍現被組成爲三個司令區，分設司令部於柏林、卡塞爾和德勒斯登三地。其下再分成十個（後來改爲十二個）地方軍力（軍區）。每一個軍區有包括陸軍三師的一個集團軍。此外並計劃組織一種新機構——即機械化部隊，不久之後，即有機械部隊三師經組織成立。關於兵役的詳細計劃亦經決定。新政體的主要工作是組織德國青年。從參加希特勒青年團起，德國孩童到了十八歲起，須自動參加褐衫隊兩年。根據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的法律，勞工大隊或勞動服役團成爲每一年齡達二十歲德國男子的一種強迫服役。他應該爲國家服務六個月，建築道路，建造營舍，或填平沼澤，如此使他在肉體上道德上適合於盡一個德國公民的最高義務，——即服役於軍隊。在勞工大隊中，着重的是廢止階級，加強德國人民的社會統一；在軍隊中，着重的是紀律和國家的地域統一。

根據了塞克的技術觀念，訓練新軍和擴充幹部的重大工作現已開始。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再度破壞凡爾賽和約的規定，德國參謀大學在希特勒親自主持之下，會同了各軍首長正式舉行開學典禮。參謀大學是金字塔的頂點，牠現在的基礎已穩固建築在無數的勞工大隊上。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七日，於一九一四年出生的一級青年應召入伍；共有青年五十九萬六千人，即將受戰爭技術的訓練。因此，一舉手之間，至少在文字上，德國的陸軍被提高到包括七十萬人的大軍。

隨着訓練工作而來的，是籌款重整軍備和擴充德國工業以應新國軍需要的問題。根據祕密命令使沙赫特博

士被任爲德國事實上的經濟獨裁者。塞克的開路工作，現在受到了最高的試驗。主要的困難有二，一即擴充軍官團，二即組織特殊兵種，如礮兵、工兵和通訊兵。到一九三五年十月，組成的軍團有十個。一年以後，又組成了兩個軍團，至一九三七年十月又加了第十三軍團。警察組織亦被併入軍隊之中。

當時發見在一九一四年級應召以後，跟着幾年中新兵數量將逐漸減少，這是因於世界大戰期間內生產率的降低，其情形在德國和在法國一樣。因此，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中，德國兵役的期限被提高爲兩年。一九一五年級的約四十六萬四千人，再加上一九一四年級留下來的，合起來使在一九三六年參加正式軍事訓練的德國人數，可達一百五十一萬一千人，黨方面類似軍隊的組織和勞工大隊，尙未計算在內。同年中法國軍隊的可戰的力量，不計後備軍在內，有六十二萬三千人，其中祇有四十萬另七千人留駐法國。

會計人員可以相當正確預見的下列數字，很可表示一斑：

法德一九一四至一九二〇出生，一九三四至一九四〇應召入伍士兵人數比較表：

級	國	
	德	法
一四	五九六、〇〇〇人	二七九、〇〇〇人
一五	四六四、〇〇〇	一八四、〇〇〇
一六	三五一、〇〇〇	一六五、〇〇〇
一七	三二四、〇〇〇	一七一、〇〇〇
一八	三二六、〇〇〇	一九七、〇〇〇
一九	四八五、〇〇〇	二一八、〇〇〇
二〇	六三六、〇〇〇	三六〇、〇〇〇
共計	三、一七二、〇〇〇	一、五七四、〇〇〇

在一年年過去這些數字成爲事實之前，牠們祇不過是警告的陰影。法國陸軍和其龐大的後備軍從大戰後到一九三五年時期內所做的一切，遠沒有充分發揮能力，不要說牠還有許多強有力的同盟國可加協助。即在這個時候，仍不難利用國際聯盟的權威而作一決定，或許也仍舊可以阻止這一切的發展。德國可以被傳到日內瓦聽受裁判，亦可以被請來作詳盡的說明，並准同盟國合組的調查團來考察牠破壞和約後的軍備和軍事組織實況；如遭拒絕，萊因河橋頭堡壘可以立即加以重新佔領，至德國能完全服從和約爲止。這種措置不致引起有力的反抗，亦不致有流血的可能。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能因而避免，或至少無期的阻延。許多事實和其一般的趨勢，爲法國和英國參謀本部所熟知，亦爲兩國政府所知道。但法國政府正忙於黨爭的玩意，英國政府則用了但求無過的相反方法，結果陷於同樣的錯誤，以致同樣的無力作任何劇烈的明確的行動，雖然這種行動，爲和約、爲一般的謹慎起見都是極正當的。法國政府並未接受同盟國的壓力而減少軍隊，但這些軍隊和英國的一樣，仍無法有效反抗塞克在當時所謂「德國武力的復活」。

第九章 空中和海上的問題（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九年）

技術上的插曲——德國的敲詐力量——會見鮑爾溫和首相——地面和空中——鮑爾溫的邀請——空防研究委員會——幾條通則——我們工作的進展——雷達的進步——華孫·瓦特教授和無線電回波——提柴特報告——海邊連鎖站——空軍元帥陶廷的電話通訊網——「齊柏林伯爵」號飛臨我們的東岸：一九三九年春——辨別友敵器——一九三九年往訪馬脫爾鄉——我和海軍部的接觸——艦隊空軍——建造新戰艦問題——大砲的口徑——側面發射的重量——砲塔的数量——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我給霍爾爵士的信——海軍部的主張——四砲砲塔——一個不幸的結果——往訪波特蘭港：「潛水艇偵察器。」

現在我們應該把那些影響我們未來安全的有重要結果的技術性決定，加以敘述，茲為便利起見，本章之中將包括現在到戰爭開始時四全年中的全部過程。

在失去空軍均勢之後，我們即有受希特勒敲詐的可能。如果我們能及時設法創立空軍，實力能及德國違背和約後所能生產的一半或一倍，我們應該可能保持對將來的控制權。但即使沒有人能指為侵略的空軍平等，也能使我們在這些危急的年頭中，具有可以防禦的信心，並可以使我們有一個廣泛的基礎，在外交上作有力的活動，或擴充我們的空軍。但我們已失去了空軍均勢。過去我們在這一方面的努力，都歸失敗。空軍在前一次戰爭中，曾佔相當重要地位，在我們現在的時代中，這種武器已成爲人心中所念念不忘的、並亦成爲一最重要的軍事因素。關員們應該想像得到，如果我們和德國獨裁者衝突時，在倫敦將發生如何可怖的毀滅和屠殺的景象。雖然這些並非是英國特有的情形，但他們影響了我們的政策，結果也影響到全世界。

一九三四年的夏季，林特曼教授投函泰晤士報，指出在空中防禦研究方面，可能獲得決定性的科學結果。八月中，我們設法不單促使已在活動的航空部官吏，並促使在政府中的他們的主人們，注意這個問題。九月中，我們由坎城游歷到亞斯雷邦，和鮑爾溫作了一次很快意的會談，他對於這個問題，似乎深感興趣。我們要

求，應在高級方面舉行一次調查。我們回到倫敦時，因航空部內面發生困難，這事暫時被擱置不提。早在一九三五年，組織成立了一個由科學家組成的航空部委員會，奉命研究將來的發展。我們記得，鮑爾溫於一九三三年曾經根據航空部的意見，發表了一篇引起深刻印象的演說，主張空中是無法防衛的。『轟炸機總可以穿入防線』。因此，我們對於任何航空部的委員會都不加信任，認為應該把這個問題由航空部移歸帝國國防委員會處理；在這個委員會中政府的各領袖，國內最有力的政客將能監督其行為，並使必需的經費不致被拒不支付。奧斯汀·張伯倫爵士在這個階段中加入了我們，我們仍不時為這個問題對閣員發表演說。

二月中，麥唐納親自接見我們，我們便將這事向他提出。我們之間，在原則上一無差異。在我指出問題的和平方面時，首相尤表同情。我說，沒有比掃除突然空襲平民的思想，更能減少現在籠罩於各國之上的恐怖和焦慮了。此時麥唐納似乎眼疾甚劇。他茫然凝視着窗外的皇宮廣場，對我們保證說，他將硬起心腸來克服部分面的阻礙；而在航空部方面，對於外間或上一級的團體來干預他們的特殊事務，深為憎惡，於是暫時一無結果。我因此於一九三五年六月七日在下議院中提出這個問題：

問題【我說】極狹，並且在其性質上，大部分是屬於科學的。這有關於發明、採用，或發見各種方法，使能由地面來控制空間，使能由地面上實行控制——實在應該是支配——高高在其上空的飛機，以為防衛……我的經驗是，在這些事中，如果軍事和政治當局能詳盡說明其需要時，科學一定能供給可用的東西。人們說過，我們無法和潛水艇奮鬥，但在水面下望息潛水艇的方法，終被發見，這個問題不一定比抓下入侵飛機更為困難。在戰爭中採用的許多東西，都會經被人認為是技術上所不可能的，但忍耐、堅持，尤其是在戰爭情形下為需要所刺激以後，使人們的頭腦增加活動力，科學便應合了這種需要……

以屠殺婦孺的手段使徒手的平民受到恐怖而促使國家投降的可恨觀念，僅在這二十世紀中，始為人們所接受，所贊助。這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問題。如果終於發見了由地面上發動的設備；以控制轟炸機的活動，則每一國家都可覺得比較安全，而使國家日益接近另一禍患的恐懼和疑慮，亦將因此可以消除……我們不但恐懼攻擊我們大城市內的平民，在這一方面我們實比世界上任何一國更容易受到損害；我們並恐懼攻擊我們船塢和其他技術設備，沒有了這些，現在仍為我們主要防衛力量的艦隊，將被麻痺或甚至毀滅。因此，不但為了為世界關係而須消滅這引起疑慮和戰爭的最壞原因之一，也是為了要恢復我們這島國的舊有安全。我國和我政府中最偉大人物，對於這個問題，應該作最竭力的思考，並須用英國科學所能供給、和我們國富所可負擔的一切資源來敦促推進。

即在下一天，前一章中紀錄過的內閣變動發生，鮑爾溫受任首相。坎列夫·李斯特爵士，即不久以後的斯溫登助爵繼倫敦特萊助爵任航空大臣。一個月後有一天下午，我在下議院吸煙室中時，鮑爾溫走進來。他坐在我身旁，就說：「我有一個建議。腓力（即坎列夫·李斯特）極希望你參加新設的帝國國防委員會空防研究會，我也希望你參加。」我說，我是批評我們空軍準備的人，必須保持我的行動自由。他說：「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除了你在委員會中聽到的祕密事件以外，你當然可以有絕對的自由。」

我的條件是林特曼教授至少應做技術小組的委員，因為我須靠他的幫助。幾天以後，首相來函說：

我很高興與你已見過漢蓋。你的信我已視為你願意參加委員會的表示。

我很高興，我並以爲你在這種重要的調查中必能有真正的幫助。

當然，你可以和空氣一樣自由（在這種情形中，這真是最正確的表示！）爲政策、計畫，和有關於空軍的一般問題而作任何辯論。我的邀請並非指制你發言，而是對一個老同志表示友善的一種姿態。

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

因此在此後的四年中，我出席會議，對於我們空防的這重要部門，得到全部的認識，並在年復一年和林特曼密切而經常的討論中造成了我對於這問題的概念。我立即爲委員會預備了一個備忘錄，其中包括在官方以外我和林特曼談話和研究時得來的，以及再加了由我自己軍事概念所得的思想和資料。這文件的重要，因爲它可表明一九三五年七月間的情形。在那個時候，沒有人想到可以利用無線電光線以引導轟炸機。訓練大量飛行員的困難是很顯然的，當時一般人相信，夜間大隊的飛機，將由少數的主轟炸機引領出發。在這國家的生命陷入危險之前的四年中，各方面都有大量的進步；同時，採用無線電光線引導轟炸機之後，在戰術上引起了非常的變化。因此，當時所寫的大部分已不復適用，但有許多在我當權時會由我親加試驗的——並沒有都獲成功。

我以極謙卑的態度，提出這個備忘錄，並因不久即將開會，所以亦極匆促，但仍希望牠對我們的綜合思想可以有所貢獻。

一般的戰術概念和在技術上可能的東西，兩者之間有相互的作用和反作用。因此，科學家應知道空軍需要些什麼設備，飛機設計也應配合和完成特定的作戰計畫。

在這裏，我們必須有一可能的戰爭假設，即英國、法國，和比利時受到德國的攻擊。

戰爭一經爆發，主要的事將是大陸各國軍隊的動員。這將至少經過二週始能完成，要看機械化和摩托化部隊侵入後所加的牽制和妨礙而定。法國和德國參謀本部將專注於軍隊的集結和展開。對這第一次主要衝突，兩國均不願顯然落後一步。希望在二三年中，德國還不能完成作戰準備，在這種戰爭之中海陸軍均將負起重大的任務。現在他們的海軍微不足道；他們還沒有得到波羅的海的制海權；同時他們的重砲似乎仍嫌不夠。要建造一個海軍，製造重砲和訓練人才，不是幾個月而是須要幾年始能辦到的事。

德國一大部分的軍火生產，集中在魯爾，這個地方極容易受到敵人的轟炸。她一定知道許多由國外輸入的重要戰爭原料，供給將被切斷，（銅、鎢、鈦、鈳、汽油、橡皮、羊毛等等），如果她不能在波羅的海佔到優勢，甚至鐵的供應亦將減少，所以她還沒有達到可以長期作戰的地位。當然，她正在爲克服這些障礙而努力，例如將某種工廠由邊疆移至德國中部，製造人造汽油和橡皮，並大量囤集存貨。但在一九三七年或一九三八年，德國如想發動可能延長至幾年的海陸空軍的戰爭，而且在戰爭中大概不會有同盟國的援助，是絕無勝利的希望的。

在這一種戰爭中，英法空軍的第一個任務，將爲破壞敵人交通，如他們的鐵道、公路、萊茵橋、懸橋之類，並對他們的裝配區域和軍火庫，作儘量的騷擾。第二個攻擊的目標，將爲最容易侵及的製造各式戰具的工廠。大概所可斷言的是，如果我們從軍事行動開始時即集中力量在這些重要的目標上，我們應該強迫敵人實施一種類似的政策。要不然，法國軍隊就可以毫無阻礙的實行動員，在大規模的陸地戰爭中取得領導的優勢。如此，德國原想用以對英法平民加以恐怖行爲的一切飛機，均將不得不擱置利用，力量分散了。

但是我們仍應該準備着，因爲即使在海陸空三軍的戰爭中，敵方仍可能要用焚毀倫敦、或其他容易及到的大城市的方法，來試驗處在這可怖磨難下政府和人民的抵抗意志。第二，倫敦港和爲艦隊生命所繫的許多船塢，亦將成爲軍事目標被炸，而發生重大的後果。

但在德國的當權者，可能會以爲可以用了猛烈的大規模空中轟炸，在很短的幾個月時期中，或甚至在幾個星期中，使一個國家屈服。心理恐慌戰術這個概念，對於德國人有極大的引誘力。他們是對是錯，與本題無關。如果德國政府相信能在全盟國軍隊動員或前進之前，用空中毀壞大城市及屠殺平民的方法，迫使一個國家祈求和平，這很可能使他們單用空軍，發動戰爭。如果能使英國和法國分開，英國尤其容易成爲這一類侵略的合適的犧牲者。因爲英國主要的反攻方式，除了空軍報復之外，祇有海軍封鎖，而海軍封鎖是須經相當時間之後，始能收效的。

如果空中轟炸城市，可以加以限制或預防，那麼以『恐怖』來破壞我們士氣的機會（這可能祇是一種空想）將歸消失，戰爭的結果終久將由海陸軍來決定。我們的防衛愈受重視，也愈足以防止純粹空軍戰爭的發生。

我貢獻的意思有二，說明可見附錄。在這裏應記着的是，從一九三五年到無線電偵察方法的應用，中間還有四年以上的間隔。

委員會的工作是祕密的，我和政府的關係亦未經公布。我對政府的其他部分，仍加以更猛烈的批評和攻擊。在英國，有經驗的政治家對於這一類的行爲，常並不以爲異，恰如政治上最劇烈的爭論，有時並無礙於個人的友誼一樣。但是科學家是一個遠較嫉忌的團體。到一九三七年時，技術小組的科學家和林特曼教授之間，意見發生了紛歧。他的同僚不滿他和我的密切連絡，亦不滿我將他的見解向委員會中提出。他們以爲，在委員會中應祇望提柴特爵士代表說明他們的集體意見。因此林特曼被請退職。他把有關辯論的各項事實供給給我，這是完全不錯的；事實上這是我們兩人參加這樁工作的條件。但是，雖然他已離開，我爲了公衆的利益，並得到他的完全同意，仍繼續爲委員；到了一九三八年，如我下面就要提到的，我終於能使他復職。

早在一九三〇年代中，英、美、德、法各國許多的科學家，似乎就會想到利用由飛機和其他金屬物反射回來的無線電光波的可能性。我們稱它作 R·D·F·（無線電方向測定器），即後來的雷達。它實用上的目的，是不由人類的感官、眼或耳，而用由無線電光波送回來的回聲以辨別敵機的臨近。大約在離地七十英里以上，有一種反射的天幕（離子層），因爲有了它，所以普通無線電光波，可以不致消失在空間中，並亦因此而使長波無線電通訊，可以成功。以很短的波動發射出去，再觀察其回聲的技術，由我們科學家加以積極研究者已有多年，其中尤以亞潑萊頓教授爲最著。

一九三五年二月，政府研究科學家華孫·瓦特教授，第一次向技術小組說明用無線電回聲以發見飛機的所在也許是可能的，並建議應即加以試驗。小組深爲感動。當時假定，如果要偵察五十英里以內的飛機，須經五年始能成功。到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空防研究會舉行第四次會議，亦即我第一次出席時，提柴特提出了他

對於無線電尋向的報告。初步試驗舉行了，證明有在行政上採取進一步行動的必要。軍事各部門經召集會議，制定計畫。於是成立了一個特殊組織，並在多維爾奧爾福納斯區域設立了一串試驗站。用無線電尋求船隻位置的可能性，亦在加以研究。

一九三六年三月，沿南岸一帶的各站都已開始建造並加設備，希望到了秋季可以實行試驗。在夏季中，建築方面發生相當的耽擱，和驟然發生敵意的障礙電波的問題。一九三七年七月，航空部再度提出計畫，經空防研究委員會同意後，準備以一百萬鎊以上的費用，在一九三九年以前在威地島到提茲河之間設立一連二十個站。現在所試驗的是設法偵察已入陸地上空的敵機。到年終時，我們可以偵察得出一萬英尺高度三十五英里範圍以內的敵機。對於船隻的偵察，亦有進步。由空中確定九英里以內船隻的位置，經證明已屬可能。本國艦隊中有兩艘上已裝備偵察飛機的儀器，同時飛機測距器、高射砲發射機，和探海燈指揮機的種種試驗，亦經分別進行。工作日有進展。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時，計畫中二十個新站已有十四個裝了臨時設備，可供應用。由空中測定船隻方位，現在亦被推廣到達三十英里。

一九三九年，航空部用了比較長的長波無線電（十米突）建成了所謂海岸無線電網，使我們能發見由海面約六十英里以內臨近的飛機。在戰鬪機司令部陶廷空軍元帥的指導之下，又造成了一個精密的電話通訊網，將所有的各站聯繫起來；另在烏克斯勃里奇設立中央司令站，經各方觀察到所有飛機的行動都可以在那裏紀錄在大地圖上，由此以控制我們自己飛機的行動。所謂 I. F. F.（辨別友敵器）的儀器，亦經設計完成，這使我們沿海的連環雷達站，可以辨別帶着這種儀器的我們自己的飛機和敵機。後來發見這些長波站不能發見在海面上低飛而來的飛機，爲了對抗這種危險起見，又造了一組補充站，統稱爲 C. H. L.（國內低飛連環站），使用着極短的電波（一米突半），但這些補充站效力所及的距離較短。

在敵機已經侵入內地以後，我們就不得不依靠皇家觀察兵團，來偵望蹤跡了。這個兵團雖專靠耳目，但用所有的電話交換機連繫以後，證明也有極大的價值，在早期不列顛之戰中，而且是我們主要的基礎。單單能偵

察到由海面來臨的敵機還是不夠，雖然這可以使我們有至少十五到二十分鐘的預報。我們還得設法引導我們的飛機對向攻擊者，在陸地上空加以截擊。爲了達到這目的，又建造了許多稱爲 G · C · I 的站（地面控制攔截站）。但這一切在戰爭開始時，都僅具雛型而已。

德國人這時也正忙得可以，在一九三九年春，齊柏林號飛臨英國的東岸。德國空軍通訊局局長馬戴尼將軍預先在飛艇上裝有特殊的聽聲設備，以偵探英國是否有雷達通訊設備。這個企圖失敗了，但如果牠的聽聲設備能正常工作，齊柏林必然的會將我們有雷達的情報帶返德國，因爲我們的雷達站在那時不但已在工作，並偵察出牠的行動，探到了牠的意向。德國人如果聽到了我們的雷達的波動，也一定不會有驚奇之感的，因爲他們此時已造成了一種技術上有效的雷達制度，在有幾方面且較我們的進步。但可以使他們驚異的，是我們已將我們的發見加以實用，並配合於我們防空制度中的程度。在這一方面，我們居於領導世界的地位，英國的成就並不在於設備的新奇，而在運用的效率。

防空研究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一日舉行。由樸茨茅斯到斯加伯·弗洛，那時一共有二十個雷達站，能夠偵察飛行一萬英尺以上、距離五十英里至一百二十英里以內的飛機。一個可使人滿意的防止電波擾亂的儀器和一個簡單的辨別友敵器現在已經真正在製造。裝有試驗中的儀器的飛機，從事試飛，俾將來可用以對付敵機。由空中尋覓船隻位置的試驗儀器證明過於笨重，不適空軍之用，經交給海軍部以研究可否在船上加以利用。

我還要提到一點。一九三九年六月中，提柴特爵士應國務大臣之囑，邀我在一架相當簡陋的飛機中，視察在東岸的各種設施。我們整整飛了一天。我將我的觀感送給航空大臣，現在便印在這裏，因爲由這裏面可以看到一些在大戰前夕我們在雷達一方面的情形。

邱吉爾致伍德爵士。

……我這次在提柴特引導之下，遍遊馬脫爾及波特賽，極饒興味，並極興奮。如果我將我心中所想到的各點提出，或亦可以有所幫助：

這些重要的無線電方向測定器站有立即加以保護的必要。我們最初擬以極少的代價，建造一倍或三倍以上的偽裝站；但經考慮之後，我認為似乎真可以利用煙幕……

在這可驚的發展中，唯一的弱點，自然是敵機空襲越過海岸以後，便脫離無線電方向測定器的領域，這時我們祇有依賴觀察兵團。這一來，好像從二十世紀中葉突然回到了早期石器時代。雖然我聽到從觀察兵團得到的結果很可滿意，我仍以爲有適用類似無線電方向測定器的儀器，追蹤侵入內地敵艦的必要。在無線電方向測定器站能亦向內地試用時，將經過相當時候，並且亦僅在空戰猛烈的場合，始有這種必要……

無線電方向測定器的進步，尤其關於探測目標的距離時，對於海軍亦必有極端重要的影響。這將使海軍能不論視線如何，均得與敵人會戰。如果當時我們能透過濃霧，則一九一四年德國戰艦巡洋艦攻擊斯加波洛和哈得爾浦時，牠們的命運將如何的不同！我不明白爲什麼海軍部到現在還不在這一方面急起直追。提柴特亦指出這對於驅逐艦和潛水艇的巨大價值，因爲牠可以不問日夜及視線如何，使魚雷瞄準準確。我以爲這應該是一件久已採行的重大事，何況又都是對於我們有利的。

辨別敵友的方法，對於海軍亦有極端重要的效果，應該用以完全代替有種種危險性的認識信號制度。我假定海軍部所早已知道的了。最後，請讓我恭賀你已有的種種進步。我們已踏到使我們海島無限安全的門檻上。不幸的是，我們要比踏到門檻還要進一步，而時間又是十分的短促。

在本書以後有一卷中，我將說明如何憑藉了這些或其他的設施，使一九四〇年秋冬兩季德國對英的攻擊，大大受到阻礙。我們的戰機所以能得到這種貴重無比的增援，全靠在斯溫登公爵和其繼任人主持下航空部和防空研究委員會的工作。這是毫無疑義的。當一九四〇年主要的責任落到我身上，我們國家的生存有賴於空軍的勝利時，我因爲會根據最詳盡的官方的和技術上的情報，作了四年長時間的研究和思想，所以對於空戰問題已有相當的認識。雖然我從未想學習技術上的事，這種認識對於我極有幫助。我知道棋板上各顆的棋子和牠的移動，旁的人對我講的關於玩意的一套，我也都能夠全部明瞭。

在這些年中，我和海軍部的接觸，也始終不斷，並極密切。一九三六年夏，霍爾爵士受任爲海軍大臣，他

准許他的官吏和我自由討論關於海軍部的事；我對於海軍既有熱切的興趣，我便儘量利用這些機會。我從一九一四年俾替時代起，即認識海軍首席大臣謝脫菲爾特海軍上將，我和他討論海軍問題的信件則始於一九三六年。我和海軍第三大臣主管審計的漢特遜海軍上將亦有多年的交誼，他專管建造和設計問題。（按英海軍部包括十人，除由海軍大臣出席內閣，其他各員共有十人，組成委員會，分首席、二席、三席……等分別專司一職）譯者）他是在一九一二年時我們最好的槍砲學專家，當時我是海軍大臣，常常出去巡閱戰艦在由建築者接收砲架之前的試砲，所以我對於他的工作有極良好的印象。這兩位在他們事業鼎盛的時候，都對我有極端的信任，雖然我的意見有時和他們的不同，並嚴厲批評過許多他們所做的或沒有做的事，但從未有過因抱怨或對人的責備而妨礙我們的交往。

艦隊的飛機究應屬於海軍部或航空部的問題，在這兩部和兩軍之間發生了劇烈的爭論。我贊成海軍的見解，我在國會中如此主張，使海軍首席大臣寫了一封懇切的謝函給我，其中他討論了海軍全部的政策問題。殷斯基伯爵士到卻特威爾來看我，徵詢我關於這微妙的均勢問題的意見。我爲他擬了一個備忘錄，因爲這個備忘錄幾乎全部由英政府加以採用，所以已附印於附錄中。

在最後決定重行開始建造戰艦時，牠們的設計問題，引起我最大的關心。直到這時爲止，皇家海軍所有的主力艦，幾乎全是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五年我任海軍部大臣那一長期間內建造或設計的。祇有納爾孫號和羅德尼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建造的。我曾在世界危機中詳述我第一任海軍部時重建海軍的步驟，和依利薩伯王后號級快速戰艦的設計，當時我得充分利用裴雪助爵的天才和靈感。所以對於這個問題，我常常能用我由許多其他專家方面得來的意見、綜合而成的我自己的思想，迄今我仍持有強烈的見解。

我聽到造艦程序經內閣同意後，我立即斷定我們的新船應繼續裝設十六吋徑砲；如用三個以三尊十六吋徑砲爲一組的砲塔以後，是可以在三萬五千噸排水量的範圍內成功的——三萬五千噸是祇有我們加以嚴格遵守的

條約限制。我和霍爾爵士有過幾次會談和通訊；因為我聽到的辯論不能使我信服，我開始在下議院提出質詢，詢問關於裝十四吋徑砲的船和十六吋徑砲的船、其側面發射的比較重量。爲了我私人的參考起見，他們給了我下列的數字：

十四吋徑砲九尊側面發射 六·三八噸
 十六吋徑砲九尊側面發射 九·五五噸
 十六吋徑砲的數字，並不是根據納爾孫號現有十六吋徑砲，而是根據於美國人預備爲他們新主力艦裝置的一種假設的十六吋徑砲。

我對於十六吋側面發射的優越數量，深爲感動。我於是寫信給霍爾爵士：

邱吉爾致霍爾爵士。

你重視我的意見，使我十分感激，實在其中確有問題。我無法解答爲何延宕如此之久。這一次又是我們單獨受到了條約的損害。我深信在一艘三萬五千噸的船身中，裝了三個以三尊十六吋徑砲爲一組的砲塔以後，這條船將遠較以任何方法來裝置十四吋徑砲的船，爲強而有力。她不但將成爲一艘更好的船，她並將被任何人認爲是一條更好的船，認爲是海軍威力的一個更有力的象徵，包括在其中服務的人員在內。請記着，德國人由他們重砲的每一吋口徑中，得到了遠過於我們的效果。他們發射的砲彈遠較我們的爲重，爲準確。我們的答案是須用更大的撞擊。不但側面發射的重量大爲增加，一個十六吋徑砲彈的爆炸火藥量一定也遠較十四吋的爲大。如果你能穿過鋼甲，自然值得在爆炸中再做點功夫。

另一方面是砲塔的數量。每一座砲塔的重量我假定應爲二千噸，那麼如果有了三個，已經能夠作更重的打擊，第四個砲塔真是一種浪費了！用了三個砲塔，則用以抵抗砲火和魚雷的鋼甲，可以更爲集中，而甲板也可清出來，供高射砲位之用。如果你請你的人給你設計一個十六吋徑砲的船艦，我深信他們會給你一個斷然比十四吋更好的勻稱。當然，在發砲控制、彈丸散佈等各方面，可能尚有商討的餘地，這些我是不熟悉的。但我仍舊以爲用了交替的四彈和五彈排砲，一定仍能達到最適宜的砲戰效力。

如果我處於你的地位，沒有一樣東西能誘使我屈服接受十四吋的辦法。海軍部如果答應建造兩艘十四吋徑砲的船，而讓日本和美國在幾個月以後競造十六吋的，那真將成爲愚不可及。我想還是停下了等着，倒可省掉六個月的建築。化了每艘七百萬鎊來造的英國戰艦，如果故意使之不能成爲世界上最有威力的船，這是如何的可怕！像老裝雪常說的：「英國的海軍出去一定要算第一流。」

不過，這祇是些預言！這一切我在過去都已經歷過的，否則我也不敢來瞞你注意。我將根據你的建議，和謝脫菲爾特取得聯繫。

海軍大臣對我的議論，絕無反感，我們之間此後時有函件往返；我並且和他的海軍首席大臣有數度會談。在霍爾爵士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底離開海軍部前，他交給我兩個海軍參謀部撰擬的備忘錄：一個討論戰艦問題；另一個討論巡洋艦問題。海軍部對於戰艦設計的主張是，自從華盛頓條約以來，英國既已爲了經濟原因而繼續主張減少排水量和砲口的口徑，因之英國到一九三六年終於獲准建造新戰艦時，不能拋棄十四吋徑砲或三萬五千噸船的條約限制。英王喬治五世級戰艦的設計，在確知其他國家在最近的將來願否繼續接受這些限制之前，不得不即行開始。事實上，英王喬治五世級的砲塔直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始行定造。如果海軍部到一九三七年四月還是延不決定設計，則到一九四一年可以利用的船，將僅有兩艘而非五艘。假使外國超過華盛頓條約的限制，那末一九三八年計畫建造船隻的設計，即應該在一九四二年完成中的，可以採用較大的噸位和口徑。

但是，如果我們終於被迫不得不建造完全均稱的十六吋徑砲艦，而同時又不願犧牲英王喬治五世級的結構的力量和它的特性，則排水量勢非大爲增加不可。結果造成的船隻將不能通過巴拿馬運河，除了增加每一艘船的造價以外，我們並須擴大我們的船塢。海軍部同意我的主張，認爲三座砲塔九尊十六吋徑砲的船優於四座砲塔十尊十四吋徑砲的船。他們設計的戰艦，都是有三座「連發砲塔」的船。

在研究了這長而詳細的文件後，我承認我們不能爲了要在第一個五艘戰艦中安置較大的砲而再事延擱。決定了的已經無可更改。但我仍要求爲謹慎起見，應早日設計較大的砲徑和砲塔，同時即使要化相當費用，對於建造口徑較大重砲的工廠等所需的工具和用具，仍應即予製造。

我和海軍部討論戰艦設計時，我並沒有知道他們已經設計、並在進行作圖十四吋徑砲的四砲砲塔，使達十二尊砲的總數。如果那時我已經知道，我的意見必會重行考慮。所謂「連發砲塔」的用語，使我發生了這種誤會。三座四砲砲塔，可能避免我在四座砲塔船隻中料到的許多缺點，並且十二尊十四吋徑砲，威力雖不能和九尊十六吋徑的相等，但在金屬的重量方面，已有重大的進步。

但是，海軍部這種政策的後果，是極不幸的。在設計這種完全新奇的十四吋徑砲四砲砲塔時，發生了嚴重

拖延。根據計畫，工作開始不久，海軍部委員會忽然決定將重疊於前的第三座礮塔改為雙礮塔。因此，組成這些奇異機械的二三千件配件，都須要重新設計製造，計畫的變更更使英王喬治五世號和威爾斯親王號的完成，至少又遲延了一年之久。更有進者，我們的新船現在已減少為十尊礮，那我以前對於牠側面發射和十六吋徑礮船隻側面發射力量的優劣比較觀，現在又復有力。同時，美國人解決了將三座三尊十六吋徑礮塔裝置在三萬五千噸的船身中的問題。法國和德國人選定了十五吋徑礮，法國人在二座四礮塔上裝置大礮八尊，德國人在四座雙礮塔上裝置八尊大礮。不過德國人也像日本人一樣，無意接受任何條約的限制，俾斯麥號的排水量便超過了四萬五千噸，因此得到一切的利益。祇有我們，經過了這許多年，才決定建造五艘為我們海軍生命及我們海上權力所繫的戰鬪艦，但結果還是從十六吋徑礮回到了十四吋徑的，同時旁的國家則增加了他們的口徑。因此我們建造了一組船隻，每一艘船都用了五年的功夫纔能完成，但都沒有牠們所應有的更重的礮火力量。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海軍首席大臣引我到波特蘭去給我看「潛水艇偵察器」。這是一種偵察水面下潛水艇的儀器，其方法是用聲波穿過了水中，如果聲波遇到任何鋼質構成物，便可以傳出回聲。用這種回聲以測定潛水艇的地位，可以相當正確。我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這種發明已經開始。

我們在旗艦上過夜，和海軍總司令福俾斯爵士作了一次長談。次日的早晨，全部都消磨在反潛水艇學校中，在大概四個小時之內；我得到了很詳盡的報告。我們於是乘驅逐艦入海，當天下午和晚上為我舉行了一次極有趣味的演習。幾條潛水艇分佈在海外。我站在用着「潛水艇偵察器」的驅逐艦艦橋上，另一艘驅逐艦約在半英里外，始終和我們保持連絡，我看到並聽到了全部的經過。這是海軍部神聖的寶物，海軍部專心致志化了二十年心血所獲得的成績。我曾常常批評他們的政策。在這場合之下，我無疑的和他們一樣，對於他們成功的重大，加以極高的評價，一時忘記了海洋是如何的遼闊。不過，如果這二十年的研究，如果不曾用了龐大的經常費用，和專門雇用訓練的成千技藝精良的官員和人們，那麼我們處理潛水艇的問題，雖經證明是如此的悲慘，

但結果也許祇有失敗、別無他路了。

我寫信給謝脫菲爾特：

我常常回想到你給我看到的一切，我深信國家對於海軍部和管理牠的人們欠了一筆無可估計的債務，因為牠許多年來忠心的服務，使我們得以避免了最大的危險之一。

使我驚奇的是〔潛水艇偵察器〕指示清晰而有力。在我意想中，原以為是隱約的，模糊而可疑的東西。我決想不到我會聽到這樣一件東西，會來自投羅網。這是一種非常的方法，也是一件非常的成功。

潛水艇偵察器並沒有克服潛水艇；但如果沒有潛水艇偵察器，潛水艇將始終沒有辦法來加以克服。

第十章 制裁意大利（一九三五年）

一個第二個重大打擊——阿杜瓦的紀念——審慎時期——在外交部的談話——和平投票——地中海的英國海軍實力——霍爾在日內瓦的演說和英國海軍的移動——我在卡爾登俱樂部的演說——墨索里尼侵犯阿比西尼亞——英國境內的強烈反應——蘭斯伯雷辭去國會勞工黨領袖職務——虛偽的制裁——包爾溫的和平決定——保守黨會議——包爾溫對選舉的行動——他的偉大的大多數——霍爾、賴伐爾協定——國會的騷亂——我在國外——墨索里尼征服阿比西尼亞對於歐洲的影響

世界的和平現已受到了第二個重大打擊。在英國喪失了空中平等之後，跟着就是意大利的移轉投向到德國方面。這兩個事實合在一起，便使希特勒可以依照他那預定的惡毒方針進展了。我們曾經看見墨索里尼對於保護奧國獨立，以及有關中歐及東南歐的一切，曾有何等的幫助，現在他卻走到相反的陣營中去了。納粹的德國，就此不再孤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主要協約國家之一，竟會很快的和德國攜手。安全的平衡上發生這樣向下轉的變動，真使我心中苦痛。

墨索里尼對於阿比西尼亞種種舉動是不合於二十世紀的倫理的。這些舉動還是黑暗時代的行爲，那時的白種人都以爲他們有征服黃種、棕種、黑種、或紅種人的資格，用他們的優越武力及武器來迫使這些異種人服從。在我們現在的進步時代，人們所犯的罪惡與殘忍，都是以前野蠻人所畏縮而不敢犯，或至少沒有能力去犯的，像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這種舉動，是非但陳舊、而且不可道宥。不但如此，阿比西尼亞乃是國際聯盟的一個會員國。說來奇怪，一九二三年，硬要把阿比西尼亞加入國際聯盟的，就是意大利，而反對阿國加入國際聯盟的，乃是英國。那時英國的見解，認爲阿比西尼亞政府的性質，和這塊野蠻地域中所流行的暴君專制，奴隸制度及部落戰爭等情形，都是不適合國聯會員的資格。但是意大利偏要任意而爲，於是阿比西尼亞便成了國聯會員之一，享有國聯一切權利及國聯所能賦予的保障。阿比西尼亞問題，的確是測驗世界政府是否足以滿足一

切善良人類的希望的一個案件。

意大利的獨裁者並不是純粹受着擴展領土慾的激動。他的統治，他的安全，是依靠着威望來維持的。四十年前意大利在阿杜瓦所受的戰敗恥辱，以及那時一枝意國軍隊不但遭受殲滅或俘虜而且很受辱的支離破碎，引起世界訕笑的情形，在所有意大利人的心理中，莫不餘痛猶在。他們曾經看見英國人，於經過若干年後，如何報復卡爾杜姆及馬茹巴戰敗之辱（爲英國分別與蘇旦人及南非人戰敗之地——譯者）。在意大利，向成年人宣布報復阿杜瓦的仇恨，簡直就像法國要想收回亞爾薩斯和洛林兩州一樣。墨索里尼要想很容易的，不冒重大危險，不費重大代價，來鞏固他本人的權力，或者就如他心中所想一樣，來增高意大利在歐洲的威勢，似乎除了湔洗以前幾年所蒙的污辱和把阿比西尼亞併入最近建成的意大利帝國版圖而外，更沒有其他的方法了。所有這些思想，都是錯誤的卑劣的，但是，因爲知彼知己總不失爲聰明的事，所以這些思想，或許可以記下來。

在我已經能夠覺着，反抗純粹德國重整軍備的可怖鬪爭已在大踏步的迫近的時候，我實在不願意看見意大利心懷離貳，甚至跑到和我們相反的陣營中去。復活的德國的強力，和可怕的希特勒威脅，祇有集合各國的勢力，纔能控制得住。如今一個國聯會員國攻擊另一國聯會員國，假使人們對此處之漠然，那末，結果便會把這個足以集合各國勢力的原動力國聯，弄得破碎，這是毫無疑問的。這樣一來，說不定不單意大利，以後還有許多事實，變成不受國聯的法律莊嚴所管束，有的不許國聯管，有的將移轉到別處去討論。所以假使國聯準備用各會員國的聯合力量來遏制墨索里尼的政策，我們英國，在責任上是無可規避的，應該忠實的參加。不過在一切情勢上看，英國似乎沒有做開頭領導的義務。她還有一個責任，就是，在面臨德國重整軍備的當中，必須顧慮到她自己因爲喪失空軍平等而致成的弱點，甚且更須顧慮到法國的軍事情狀。有一件事，是明顯而確定的。假使英國來做應付意國事件的首領，他就不能姑息，因爲姑息手段，於國聯毫無用處，而於英國卻是有害。假使我們以爲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從事死鬪，於維持歐洲的法律和幸福方面，確是正當而且必需的，我們亦必須把墨索里尼打倒。打倒了這個較小的獨裁者，或許可以把所有一切勢力連成一起，使其發生作用。

而且這些勢力，現在仍是足以收鎮懾之效——而使我們可壓制那個較大的獨裁者，從而防止第二次的對德戰爭。

這些一般的回想，就是本章記述的前奏。

自從斯特里薩會議以來，墨索里尼企圖征服阿比西尼亞的準備，已趨明顯。對於這樣一個意國侵略行爲，英國的輿論，一定是反對的。我們當中，那些認爲希特勒的德國非特危害和平而且危害人類生存的人，對於那時已經列入一等強國的意大利，有此種從我們這邊倒到那邊的舉動，都是引以爲憂。我記得有一次宴會，在座有文西泰爵士及柯柏，那時柯柏還祇是一位次長。在這回宴會中，已經明顯的預先見到了歐洲均勢上這種不幸的轉變。於是大家便討論到一個計畫，就我們當中請幾位去和墨索里尼相見，對他解說如果他發動侵略，在英國即會發生不可避免的結果。這件事情結果沒有下文，真實行了亦不一定有什麼用處。墨索里尼，像希特勒一樣，以爲英國是一個已經被嚇倒的、精神萎靡的老婦，即使情形最惡化，也祇能虛張聲勢，而且，隨便怎樣，他已沒有作戰的能力。和他友好的魯易勳爵曾經說起，一九三三年牛津大學畢業生發表拒絕「爲君王及國家而戰」的朱特決議，曾引起墨索里尼的注意。

七月十一日，我曾在議會裏發表我的憂慮：

我們似乎已經承認了一個觀念，就是，我們自己，像一隻掛了鈴子的羊或一個嚮導者一樣，正在向前進行，領導着歐洲人士的意見，去反對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圖謀。甚至有人建議我們自己單獨行動。我很愉快的聽到了外相說明此說並無根據。我們必須盡我們的責任，然而我們必須祇就其他各國同樣承認的義務方面，和其他各國共同去做責任上的事。我們並沒有強大到可以去做全世界的立法者及發言人。我們要盡我們的責任，但我們不能接受任何請求，去做超乎我們對於此事應盡責任以外的事……

在我們今日之下，無疑的是一團烏雲，籠罩着英意兩國的深交舊誼，這一團烏雲，在我看來，固然人人都希望它消散，恐怕不易消逝。我們之間曾有一個老的交情，而且我們千萬不要忘记，有一件不甚著名的事實，就是，在上一個世紀，意大利加入三國同盟的時候，

曾經特別的在條約上規定，不論在任何情形之下，她在同盟條約下的義務，不能使之和英國發生武裝衝突。

八月中，外相曾請我和反對黨的領袖們分別到外交部拜訪他，這種磋商的事實，已由政府公佈了。霍爾爵士告訴我外間對於意國侵略阿比西尼亞的焦慮日益加甚，並且問我，準備以何種程度來反對此事。我在答覆之前，因為要想更知道一些關於這個兩頭政治外交部的內部及個人情形，便問艾登的見解如何。霍爾說『我去叫他來』，於是，幾分鐘後，艾登面露笑容的來了，態度極為良好。我們舉行了一個順利的談話。我說，我想外相用着像他所能拉住法國一樣的程度與國聯從事反對意大利，不失為正當之舉，但是我又說，他不應該去逼迫法國，因為法國是與意大利訂有軍事的條約，而且她還有對付德國的心事；所以在這種情勢下，我並不希望法國對於此事能夠做到了不起的程度。我於是又談到白倫納山口意大利的各師軍隊，談到沒有防衛的法國南部國境以及其他軍事形勢等情形。

大體上我堅決勸告各部大臣，不要試圖去做領頭的人，亦不要過於昭著的把他們自己列在前茅。我所以要如此，自然是受了恐怖德國及我國國防式微情形的壓迫所致。

在一九三五年的先前幾個月中，人們為擁護集體安全並為支持國際聯盟盟約起見，組織了一個和平投票。此一計畫，曾經受着國際聯盟同志會的擁護，但發起人為由工黨及自由黨所支持的另一組織。以下就是所設的問題：

和平投票

- 一、英國是否應該仍為國聯的會員？
- 二、你是否贊成用國際協定來實施普通裁軍？
- 三、你是否贊成用國際協定來實施普遍廢除陸軍和海軍的航空部隊？
- 四、國際協定是否應該禁止為私人利益的軍備製造及販賣？

五、假使有一個國家堅執的攻擊另一國家，你以為其他國家是否應該聯合起來採用（一）經濟的及非軍事的手段；或（二）於必要時採用軍事手段，來強迫他停止攻擊？

六月二十七日宣布的投票結果，有一千一百萬餘人具名作肯定的表示。在起初，各部大臣對於和平投票，似乎有點誤會。它的名字掩蔽了它的目的。它當時把裁減軍備和強制抵抗侵略兩個互相矛盾的命題，聯在了一起。可是有許多人士都認它是和平運動的一部分。反過來說，第五個問題提出了一個積極的勇敢的政策，在這個時際，如果加以採行，定可獲得民衆的大規模擁護。薛西爾勳爵以及國際聯盟同志會其他領袖，在這個條文宣布之時，一如不久事實所表現的，都願意、而且決心為正當的理由而戰；祇要一切必需的行動，是在國聯提倡之下實施。在以後幾個月，他們對於事實的估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整整一年中，實際上我都在和他們從事於調和我所謂的『整軍經武與擁護盟約』的政策。

夏季逐漸臨近了，意大利運兵船穿過蘇彝士運河的行動繼續不停；大量的兵力和軍需都集中在阿比西尼亞東部邊境一帶。當我在外交部談話以後，突然間一個奇特的、十分出我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了。八月二十四日這天，內閣一致決定而且宣佈英國要維持在各種條約下及國聯盟約下的義務。這一來，就使地中海立刻發生了一個危機；我因為外相最近徵詢過我的意見，認為應該請他於海軍局勢方面，再給我一個保證。

邱吉爾致霍爾函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我可以確定，你一定會很審慎將事，不致鑄成外交走在海軍準備以前的重大錯誤。我們在一九一四年已經注意過這個問題。

艦隊究在那裏？他們情狀良好？他們是否充分？他們是否能夠迅速的完全的集中？他們是否安全？他們在以前可曾接到戒備的警告？你要記得，你是在把極度的壓力，加到一個或許會不顧一切拚命亂幹的獨裁者。他或許會用他的升斗很準確的計量你的殺來。他在以後的兩週內任何時間，或許會把遠非內閣現時意料所能及的計謀，要你來負責對付。當你在談論賢明的、精密規定的方式之時，他或許會採暴力行動。最好是不要把誘惑的東西放在他的眼前。

我在報紙上看見，地中海艦隊正在離開馬爾太前往中東。當然，最好是（為艦隊着想）離開馬爾太，因為我曉得，馬爾太是完全缺乏防空設備。在亞歷山大特里亞港等處作根據地的地中海艦隊，理論上——這是所有我們在過去認為正當的理論——都遠比意國海軍為薄弱。

今天我曾花了一些時間檢討戰事以來兩國巡洋艦及小艦隊的建造。在我看來，你所有的現代式巡洋艦及驅逐艦，其實力還抵不上意國的半數，而現代的潛艇，更為缺少。所以，在我看來，最須研究的問題，就是現在應該很仔細的向海軍部問清，中東的英國艦隊究竟形勢如何。這支艦隊，足夠使我們陷於重大的損失。它是否有防衛它自身的足夠實力呢？它距離可以增援的大西洋艦隊和本國艦隊所在地，超過三千哩之遙。恐怕增援的艦隊還未曾開到和他們會師的時候，早已有許多事故發生了。我對於海軍部已經注意研究此種情狀一節，並不懷疑，的確不敢懷疑。我希望你會確信他們對於這些建議的答覆是充分的。

我在先時，曾經聽得有人談到一旦和意國開戰時，就把艦隊退出地中海，祇守着直布羅陀海峽和紅海的計畫。現在地中海艦隊移往中東，看起來像是這個計畫的一部分。假使果然，我希望這個計畫已經設計好了。假使我們在和意國發生戰爭或類似戰爭狀態的時候，便放棄地中海，那就沒有什麼可以阻止墨索里尼的軍隊在埃及和登陸而佔領蘇彝士運河。那時除法國以外，更沒有其他可以阻止他們的力量。是否海軍部確得定法國能夠出力應付這樣一種意外的局勢？

勞合喬治，他現在正和我在一起，鑒於局勢的危急，以為我應該寫這封信給你。我並不要求你詳細答覆；不過我們希望你對於海軍部的處置，確切認為滿意。

外相於八月二十七日來信答覆道：

你可以放心，你所講的各點，已經、和現在還在作積極的討論。我完全了解你所說的種種危險，我決盡力注意，不令疎忽。如果你有任何你所認為必要的建議或警告，請你立刻通知我，不要猶豫。你對於像這種局勢的危險性，比任何人更為知道，並且，對於我們帝國國防的現況，你亦比任何人、至少比政府以外的人，更為知道。

艾登先生，是國聯事務大臣而且差不多是和外相同等的人，在日內瓦已經有好幾星期；他在該地會重新召集大會商討一個『制裁』意大利的政策，要想在一旦意國侵犯阿比西尼亞的時候拿來實施。這一個他所膺任的特殊職務的性質關係，已經使他的注意力，偏重於阿比西尼亞問題，而不十分顧到其他方面。所謂『制裁』，就是斷絕意大利的一切財政援助和經濟供應，而把所有這些援助供給去支持阿比西尼亞。對於像意大利這樣一個國家，許多的軍事上需要物品都得仰賴國外源源輸入，所以制裁的辦法，的確是一個可怕的箝制力量。艾登的熱忱和演說，以及他所宣布的原則，在會議中已佔了優勢，九月十一日，外相霍爾一到日內瓦，就親自作如下的演說：

我要開始重申我所代表的政府對於國聯的支持，及英國人民對於集體安全的關切……國聯盟約中所包含的概念，尤其是要想在國際事務方面建立法治的希望，已成為我國國民意識的一部分。英國國民所表示信奉的，是國聯的諸種原則，並不是任何特殊的表示。任何相反見解，都是輕估了我們的真誠信仰，和懷疑了我們的誠意。國聯為遵守他的明確的義務，要做到集體維持盟約的完整，尤其要做到，對於一切無故侵略，作集體的有效抵抗，而我們英國是始終和國聯站在同一的立場之上。

雖然我對於德國的事情十分焦慮，對於我們處理事情的辦法十分不快，但我記得我在里維拉陽光下讀到這篇演說時，曾經為之感動。這篇演說，激動了每一個人，而且轟傳於美國全國。它把英國國內所有準備毫無畏懼的將公理和武力聯成一氣的諸種勢力，打成一片。在這兒，至少是一個政策。在那時候，這位演說家如果知道將他手裏所把握着的種種可怕力量，他或許真的已經在一個短時間內領導了世界。

這些發表的話，所以發生效力，也像許多過去經人們證明為人類進化及自由所必需的目標一樣，是因為在它們後面，有英國海軍為之支持。從開始以至末了，似始終有着一個永久的武器可供國聯的指揮。這就是現成的國際警察，靠了它的最後權力，就可用以實施各種外交上及經濟上的壓制和勸導。九月十二日，就是這篇演說發表的第二天，英國戰鬪巡洋艦賀德號及榮譽號，由第二巡洋艦分隊及一驅逐艦小隊伴行，到了直布羅陀，各方面都以為英國準備以行動來做言語的後盾。在英國國內，這種政策和行動，都得到了迅速的及聲勢浩大的擁護。當然，人們都已認為，海軍部對於地中海方面究需若干艦隊方可使我們的事務妥善一節，一定已有審慎的、專門的計算，否則就不會發表這種演說，也不會有軍艦的移動。

在九月底，我在一個有相當勢力的正派團體卡爾登俱樂部發表演說。那時我已設法給墨索里尼一個警告，而且我相信他曾經讀到這個警告：

發動一支差不多有二十五萬人的軍隊，集合意大利男子的精華，違反整個世界的善意，而且沒有制海權，開到一個距本國二千哩的荒瘠海岸，在這個地方從事很可以說是連續的戰事，來攻擊一個民族，而這個作戰地點是四千年來沒有一個征服者曾經以為有征服價值的區域，這真是任何歷史所無的孤注一擲。（註）

（註）參看我和格倫底的談話，見第一卷附錄甲。

奧士汀·張伯倫爵士寫信給我，對我演說表示同意，而我回答他道：

我對於你贊成我對阿比西尼亞事情所地方針，甚為愉快；但是我對此事極不歡欣。和意大利衝突，恐怕是一件可怖的舉動，而且會使我們耗費重大的代價。這幾年來，我們總是請求法國對意大利和解，而現在又要強迫法國決定究竟傾向我們還是傾向意大利，這真是何等的奇怪！我並不以為我們應該以這樣的激烈方式來做領導者。假使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早有如此強烈的反感，我們必已在兩個月以前警告墨索里尼了。假使早採取這個賢明步驟，在夏初時候，必已逐漸增強地中海的艦隊，而讓他看看這件事是何等嚴重。現在他能做什麼呢？我預料戰爭（阿比西尼亞戰爭）一起，熱度就會發生嚴重的增高。

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

十月間，墨索里尼並沒有因為英國海軍遲遲發作的移動而懼服，竟發動意大利軍隊進攻阿比西尼亞。十日這天，由於各主權國家五十對一的投票，國聯大會決定採取集體手段反對意大利，並成立一個十八人委員會，進一步的努力促成和平解決。面臨困難的墨索里尼，便以非常巧妙的安排，發表了一個簡潔的聲明。他不說「意大利將以戰事應付制裁」，卻說「意大利將以紀律、節儉、及犧牲來應付制裁」，然而同時，他又作暗示道：任何足以妨礙他侵犯阿比西尼亞的制裁加到他身上，他決不加以容忍，如果他的侵阿事業遭受到危害，他就會對任何擋住他的路的人作戰。他說道：「五十個國家！五十個國家，領導的不過一個國家罷了！」這就是英國解散國會、及依照憲法現在又將屆臨的普選以前數星期中的局勢。

阿比西尼亞的流血，人們對法西斯主義的憎惡，國聯的提出制裁，使英國工黨內部發生了一個動亂。工會主義者，其中著名的是貝文，在氣質上說並不是和平主義的人。強大的工資階級全體都激烈的主張一個極堅強的要求；要求和意大利獨裁者作戰，要求實施決定性的制裁，及必要時使用英國艦隊。在各種有刺激性的集會中，都講着粗暴而難聽的言語。有一次，貝文發出怨言，說「他對於蘭斯伯雷在一次復一次的會議上表示正義觀念，實在聽厭了。」議會內工黨中的許多黨員，亦同抱工會的情緒。此外在更大的範圍內，國際聯盟同志會各

領袖，都覺他們自己負有擁護國聯目標的義務。現在已顯然牽涉到「和平投票」的第五款了。這裏有種種原則；要服從這些原則的話，就是終身主張人道的人也要準備去死，而且，假使準備去死，就還要準備去殺人。十月八日，蘭斯伯雷就辭去了議會勞工黨領袖的職務，由戰時曾有良好戰績的艾德禮少校繼任領袖。

但是這種國民的覺醒，和鮑爾溫的見解或意向不合。選舉實行後不到幾個月，我已開始了解「制裁」所根據的這些原則。首相曾經宣稱，所謂制裁就是戰爭的意思；第二點，他是決意不要有戰爭，第三點，他決意採用制裁。要把這三種情形調和在一起，顯然是不可能的。擔任計畫各種制裁的國聯委員會，在英國的指導和賴伐爾的壓制之下，把任何足以激起戰爭的情事，一概避免。大量的商品，內中有幾種是戰爭需要品，都被禁止不得輸入意大利，一個洋洋大觀的制裁品目錄也編好了。但是維持阿比西尼亞戰爭所必不可缺的汽油燃料，卻繼續很自由的輸入意大利，因為大家瞭解，如果禁止油類輸意，則即將不免發生戰爭。美國不是國聯的會員而是世界供給油類的主要國家，雖然用心很好，她的態度，卻捉摸不定。不但如此，要停止油類輸入意國，就不免要將德國的油類輸入亦予停止纔行。鉛礦的輸往意大利，是嚴格禁止的；但是鉛礦差不多是意國唯一大量出產的金屬，其產量超過自己的需要以外。廢鐵和生鐵的輸入意大利，被人們以公衆正義的名義，堅決否決。但是，因為意大利的冶金工業對於廢鐵和粗鐵並無多大用處，並且，因為鋼片和銑鐵並不遭受干涉，意大利沒有感受到障礙。所以，這樣的大模大樣的強硬措置，並不是可使侵略者麻痺的真正制裁，而祇是侵略者所能容忍的不澈底制裁，而且這些制裁，縱然麻煩，事實上反可刺激意大利的戰爭精神。因此，國聯所進行的援救阿比西尼亞計畫的原則，乃是切不要做出妨害侵略的意國軍隊的事。英國民衆，在選舉時候，全不知道這些事實。他們熱誠的擁護制裁政策，且相信這種制裁政策是的確是可以終止意國攻擊阿國的方法。

艦隊的調動更加不是英國政府考慮所及。各色各樣流言，盛行一時，講起意大利的決死的急降轟炸機隊，將直衝到我們軍艦的甲板，與各艦同歸於盡。在亞歷山大特里亞的英國艦隊，實力現已增加了。它可以用一種

姿態，迫使意國的運輸船由蘇彝士運河退回，由此結果將和意國海軍發生決戰。據說我們是不能應付這樣一個仇敵的。我曾開頭提出過這個疑問，但是別人叫我放心。我們的主力艦當然是舊了，而且現在看起來，我們還缺乏空軍的掩護，而且很少防空彈藥。可是，消息透露，說海軍司令對人家說他力量不足以從事艦隊作戰，深為憤慨。照樣子看起來，在海軍開始決定反抗意國侵略以前，英國政府必已仔細的把方法和手段考慮妥當，和已立定決心了。

根據我們現有的知識，無疑的知道，如果我們下了果敢的決心，或許早已把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亞的交通截斷了，而且在此後可能發生的海戰中，一定可以獲勝。我從來不贊成英國採取孤立行動，但是，既經走得如此遠了，要突然後退，自然是一件貽害無窮的事。不但如此，墨索里尼是決不敢和一個堅決的英國政府來搏鬥的。差不多全世界都在反對他，如果他單獨和英國作戰，他的統治即將岌岌可危，因為在地中海中，艦隊的決戰將成爲很早的和有決定性的測驗。意大利怎麼能夠從事這種戰爭呢？它除了在現代化輕巡洋艦方面略佔有限的優勢外，她的海軍，數量上祇及英國海軍四分之一。她那龐大的徵召入伍的陸軍，號稱百萬人，都是不能作戰的。她的空軍，在量的方面和質的方面，甚至遠遠比不上我們的平庸的編制。她立時可以受到封鎖，在阿比西尼亞的意國陸軍，就將有缺乏軍需和彈藥接濟之虞了。德國現在還不能予以有力的援助。爲了光明正大的目標，冒最少的危險，而予敵人以決定性的打擊，天下如有這種機會，機會就在此地此時。英國政府的膽力不副時勢所望，祇好說是爲了誠心愛護和平，除此以外，無可原諒。實際上，英國的畏首畏尾，成了引起一個更爲無限恐怖的戰爭的因素。墨索里尼的虛聲恫嚇，居然馬到成功，從這個事實中，一個重要的旁觀者，由此引出影響深遠的結論。希特勒早已決心用戰爭的方法，爲德國開疆拓土。他現在已經看定了英國的墮落，英國後來雖圖奮發，但無論爲和平計爲防止希特勒計，可惜都嫌太遲了。在日本，也是有同樣的沉靜旁觀者在。

全國逐漸團結，以求應付當前的嚴重問題，以及與大選不能分離的黨派利益的衝突，這兩種互相反對的步

驟，同時並進。這種情形，對包爾溫和他的擁護者，大爲有利。政府的選舉宣言是這樣說：『國際聯盟，仍將和向來一樣，爲英國外交政策的拱心石。』『防止戰事和建立世界和平一定永遠是英國人民的主要意志，而國際就是人類爲達到這些目的而建造的工具，亦就是我們爲達到這種目的所仰賴的工具。所以，我們將繼續盡我們所有的力量來維持國聯盟約，並維持及增大國聯的效率。在現在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亞間不幸的糾紛之中，我們向來所抱的政策，將並不因之發生動搖。』

反之，工黨的意見頗不一致。他們大多數是和平主義者，但是貝文的積極運動，在羣衆中，竟獲得許多的擁護者。所以正式的領袖們，爲使一般滿意起見，同時指向兩個方向，一方面，他們大聲疾呼，要求對意大利獨裁者採取堅決行動；他方面，他們譴責重整軍備政策。於是十月二十二日，艾德禮在下院宣稱：『我們需要有效的制裁，並且要有效的實施。我們擁護經濟制裁，我們擁護國聯制度。』但是，後來於同一演說中又說：『我們並不信服堆積軍備就是保安之道；我們並不相信在這個時候，有國防一類的東西。我們認爲，你們必須繼續進行裁減軍備，不是堆藏軍備。』在選舉時期，雙方通常都沒有許多可以獎誇的地方。首相本人，當然已經曉得，在政府外交政策幕後的實力，正在逐漸增長，不過決心在無論怎樣情形之下，不要捲入戰爭的漩渦。照我從局外觀察種種行逕看來，他是極想儘力取得別人的擁護，用以在適當的規模內，開始重整英國的軍備。

在墨索里尼開始攻擊阿比西尼亞和他的炸彈向阿杜瓦投落的這天，英國保守黨在包尼穆斯舉行會議。鑒於這種情勢以及現在即將舉行的大選舉，我們都以黨員的身分，棄仇釋嫌，團結一致，擁護下面一致通過的決議：

- (一) 修正帝國國防上的重大缺點，尤其是，第一須把我們的工業，在必須時迅速變成國防工業。
- (二) 繼續努力，在空中方面和任何其攻擊力量可達本國的外國最強大的空軍，取得相等地位。
- (三) 重建英國艦隊，增強帝國海軍，以保護我國的糧食及生活，並保持英帝國的聯絡。

這幾年來，我一逕是不歡喜做官，因為我做夠了，而且還反對政府的印度政策。但是，因為這個要費好幾年功夫纔能實行的印度議案已經通過了，我就把這個不願做官的成見打消。加以德國威脅的日漸加甚，使我亟於想伸手來管理我國的軍事機構。我現在很銳敏的覺得前途即要發生些什麼東西。惶恐不寧的法國和膽小而愛和平的英國，立刻就要遭遇歐洲各獨裁者的挑戰。我對工黨的改變態度，深表同情。這真是建立一個真正舉國一致政府的機會。大家知道海軍部就會有空缺，假使保守黨重復得勢，我極願擔任海軍部的職務。自然我曉得鮑爾溫的若干主要同僚，並不贊成我的願望的。我代表一個政策，大家都知道我不管在朝在野，都是會努力以求貫徹的。假使他們能夠不要我，他們一定會很愉快的。不過這事件，多少要看他們的能否保持多數而定。

在大選中，首相用強烈的語氣說明重整軍備的必要，而他的主要演詞，是特別提明海軍狀況的欠缺。不過，他在制裁和重整軍備的計劃方面，獲得了眼前看得到的一切以後，覺得心又不安，亟亟於安慰國內那些職業的和平主義者，使他們心中因他的海軍談話而可能發生的恐怖，得以解除。在十月一日，就是選舉投票以前兩星期，他在倫敦市會議堂又對着和平協會發表演說。在演說中，他說道：『我向你們保證，將來不會有大的軍備。』鑒於政府所有的關於德國努力備戰的資料，這句話是一個奇怪的諾言。由此，希望全國準備以抵禦未來危險的一派人，和相信讚美和平的好處就可保持和平的一派人，都異途同歸一起投了首相的票。

我在厄平區競選中，對重整軍備的需要及主張嚴格的真正的制裁政策兩點，作熱烈的論戰。大體說來，我是擁護政府的，而且，雖然我那差不多連續不息的評論政府措置，使保守黨中許多我的朋友深為不快，可是投票結果，我以很大的多數獲選。在宣布選舉投票時，我認為理應保持我自己的立場。我說：『鑒於我所作的各次演說，我從你們的投票中，認為你們希望我一個國會議員的身分，運用我獨立的判斷，而且希望我依照議會最高貴的傳統，很自由的、毫無畏懼的把我知識上和經驗上的結果，發表出來。』大選的結果，為鮑爾溫的

勝利。他所得的票數，比其他競選者合得的票數，還要多出二百四十七票，並且經過五年任期之後，達到了大戰結束以來任何首相所不曾有過的權力地位。他憑了那熟練而幸運的在國內政治上的策略，以及人民普遍對他個人人格的尊重，使人民對他得投再度信任的票，所有爲了印度問題或因爲忽略國防的理由而反對他的人，亦爲此次的再度信任投票變成可笑。一個我國有史以來最不幸的政府，目擊它本身的錯誤和缺點，受到人民的喝采。但這一篇總賬是要付的，新的下院費了差不多十年的功夫纔能給付。

當時盛傳，我應該加入政府，擔任海軍大臣。但是鮑爾溫等他的勝利票數發表以後，便亟不及待的經中央局宣布他無意要我加入政府。他這樣一來，就算是對於選舉施行前幾天所接見的和平主義代表們，有了一點交代。當時報紙上對於我被擯棄一節，頗多譏笑。但現在人們可以看見，我是何等的運氣。在我的頭頂上，是有許多無形的羽翼，在振展庇護着我。

而且我另有愉快的安慰。我不等國會開會，就帶了我的彩色箱子到更溫和的地方旅行去了。

鮑爾溫的勝利，發生了一個尷尬的後果；爲這個後果，我們此地不妨把時序丟開。他的外相霍爾，在一次很難得的溜冰休假中，由巴黎旅行到瑞士，曾和那位仍舊做法國外交部長的賴伐爾舉行談話。談話的結果就於十二月九日成立了霍爾賴伐爾協定。我們很值得來看一看這個著名事件的背景。

英國領導國際聯盟反抗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黨侵犯阿比西尼亞，這個概念，已使英國全國，演成一個盛大熱烈的衝動。但是，一旦選舉結束，大臣們看見他們自己都有多數人民的擁護，可能在今後五年內繼續執掌國政，便要想到多生事故的麻煩了。在所有他們的背後，即爲鮑爾溫所說的『一定不會有戰爭』及『一定不會有大量軍備』。這位出色的黨派經理會以領導世界反抗侵略的題目來取得選舉的勝利，後來卻確信我們必須以任何代價來保持和平。

不但如此，在外交部方面，現在又來了一個有力的攻擊。文西泰勳爵始終是目不稍瞬的注視着希特勒的禍害。在這一點上，他和我是彼此一心。而現在英國的政策，已強迫墨索里尼變更傾向了。德國已經不是孤立了。歐洲四個強國，從前是三國對付一國，現在變成二國對抗二國了。我國問題的這種顯著惡化，加重了法國的憂慮。法國政府，早於正月間訂立了一個法意協定，跟着又和意大利成立軍事公約。據估計，這個軍事公約，可以使法國節省了駐在和意國接壤地方的十八個師團，移調到與德國接界之處。賴伐爾在和意國的談判中，一定超乎暗示的向墨索里尼表示過，法國決不會自尋煩惱，來干預阿比西尼亞方面可能發生的任何事故。法國人有與英國各大大臣爭論的很正大的理由。第一，幾年來，我們都一直嘗試要使他們裁減一切賴以生存的陸軍。第二，英國領導國聯反抗墨索里尼已經遠走在前，甚至有人用了它贏得選舉的勝利；而在民主國家中，選舉是很重要的。第三，我們（和德國）曾經締結了一個一般以為對於我們自己很為有利的海軍協定，使我們除了潛艇戰爭以外，在海上十分安全。

但是法國前線的情形又如何呢？她應該怎樣配置人力，以抵抗那日漸增長的德國軍力呢？在最初六個月內，英國所可能派遣的遠征軍祇有兩師人，而且還外加許多保留的條件。事實如此，所以他們不應多講空話。現在英國政府、激於軍事的、道德的及世界的熱烈情緒，『由一國領導着五十國』，正在和意大利結成死仇了，法國有許多着急不安的地方，祇有很愚蠢的人，纔能對這種情形完全置諸不理；而每一國家裏，這種人卻是非常之多。假使英國已用她的海軍力，封鎖蘇彝士運河，並於一普通交戰中擊敗意國海軍，她或許早已得到執歐洲牛耳之權了。但是，偏偏相反，她竟確切宣稱，無論什麼事情發生，決不為阿比西尼亞而引起戰爭。正直的鮑爾溫，在選舉區獲得勝利的投票；一個堅強的可以繼續執政五年的保守黨多數黨；而且種種公理義憤的表現；可是沒有戰爭，沒有戰爭！所以，法國人很強烈的感覺到，他們不應因為英國突然發動一切強烈感情反對墨索里尼，便和意國永遠斷絕關係。他們記起英國在地中海方面曾對意大利海軍屈服過，和一旦遭受德國侵犯時英國在初期所能予援助的，充其量祇有兩師團人，尤其要感到這層。此時賴伐爾的見解，是人們當然

能瞭解的。

現在，到了十二月，又有一套新的議論出來了。據一般人私底下議論，認為墨索里尼受了制裁的苦痛壓迫，並在『一國領導五十國』的極重大威脅之下，會歡迎對阿比西尼亞事件成立一個妥協。毒氣戰爭，雖然用在對付阿比西尼亞的土著極為有效，可是絕不會提高意大利在世界的名聲。阿比西尼亞人正在戰敗之中，據說他們並不準備作重大的讓步和割讓大片的土地。如果把意大利會陶陶要求的東西予以滿足，同時讓阿比西尼亞保持她全部帝國的五分之四，是不是便可成立和平呢？外相經過巴黎的時候，文西泰剛巧也在巴黎，因此便參預此事。可是，我們對於文西泰，切不可加以誤斷；他對於德國的威脅，始終念念不忘，極願英法為應付當前這個大危險，成立最有力的組織，同時要使站在他們後方的意大利，成為他們的友人而不是敵人。

但是英國國民，不時會發生見義勇為的精神。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比英國還要不肯輕易為了一個目標或一個問題而準備作戰的，因為在她的心理和靈魂中深信在戰爭中決不能得到任何重大利益。鮑爾溫和他的各部分大臣，他們在日內瓦從事抵抗墨索里尼之時，已經把英國抬得很高了。他們已經造成騎虎之勢，現在祇有不顧一切的幹下去，纔能保持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除非他們是準備以行動作言語和姿態的後盾，否則恐怕最好還是像美國一樣，什麼都不管，聽其自然，看它發生些什麼。這裏是一件可供討論的計畫，可是這並不是他們已經採用的計畫。他們已經向億萬的人民籲訴過，而這些沒有武裝的、過去不用心的億萬民衆的答覆，壓倒了其他一切呼聲，他們喊着：『是的，我們將邁進去反抗惡敵，我們現在就將踏步前進，拿武器給我們。』

新的下議院是一個氣勢雄盛的團體，鑒於此後十年中所面對的一切，他們也非氣勢雄盛不可。所以，當他們受選舉刺激之餘，得到了霍爾和賴伐爾對阿比西尼亞事情成立妥協的消息，受到了可怖的震驚。這個危機，幾乎犧牲了鮑爾溫的政治生命。它使英國國會及全國發生了根本的動搖。鮑爾溫差不多一夜之間，由公認的最高領袖的地位，降落到被嘲笑鄙視的深淵。這些日子當中，他在議院的地位，確是可憐。他從來不曾明白，為什麼民衆要對這些討厭的外交事情發生焦急。他們已經有了一個占多數的保守黨，有了沒有戰爭的保證，他們

還能要些什麼呢？但是有經驗的引港員，已經感覺到、而且計算到這個風潮的強力了。

內閣於十二月九日批准了霍爾與賴伐爾的阿皇與意大利共分阿比西尼亞的計畫。十三日，霍爾賴伐爾建議的全文就提交國聯。十八日，內閣放棄霍爾賴伐爾的建議，結果便是霍爾辭職。在十九日的辯論中，鮑爾溫說道：

我覺得這些建議太過分了。人們對於此種建議所表示的感情，我全不感到驚奇。我不料全國許多地方，對於我所謂良知及義理的基礎，竟表顯出更深切的情感。我一達到這種情形，便知道曾經詬誶我國國民最深切感情的事發生了，引起反應的聲音響了。我再度檢討我所做的一切，我覺得……在我國裏，對於這些建議，甚至作為談判的條件，都是不能予以支持的。現在，這些建議顯然已經絕對的完全的壽終正寢了。本政府當然不會設法使它復活。假使在我知道我自己是不錯的時候，遇到風潮發生，我寧可當風潮之衝，我不是屹立無恙，便是隨流而去。假使，在我審察自己以後，發覺那個風潮當中有些事實表明我所做的事，有不智和不正當之處，那我將對它表示屈服。

議院接受了這個申辯。危機過去了。艾登從日內瓦回來以後，首相便召他到唐寧街十號，討論霍爾辭職後的局勢。艾登立刻建議邀請奧斯汀·張伯倫出掌外交，並且又說如有需要，他願在新外相手下擔任任何職務。鮑爾溫回答艾登，說他早已考慮到這點，而且已經通知過奧斯汀·張伯倫，說明他覺得不能昇與外交部一職。這或許是因為奧斯汀·張伯倫的健康不佳。十二月二十二日，艾登出任外相。

我的妻室和我，就在巴塞隆納渡過了這一個有刺激性的星期。若干和我最知交的朋友，勸我不要回國。他們說，假使我捲入這個暴烈的衝突之中，那簡直是自找麻煩。我們住的那所舒適的巴塞隆納旅館，是西班牙左派人物會集之所。在我們進用午飯及晚餐的這家考究的飯店內，常有若干神情急切，身穿黑衣的青年，成羣的集在一起，目光閃爍的在喃喃私語，講着那立刻就要使百萬西班牙人死於其中的西班牙政治。回想起來，我想我是應該老早回國的。我或許已經把一種決定性及團結性的因素投入了反對政府的集團中，或許已經結束了鮑爾溫的政權。這個時候。說不定奧斯汀·張伯倫的政府已經成立了。他方面，我的朋友卻叫道：『最好站開一點。你一回國，人家祇認你是個人向政府挑戰。』這種勸告，當然不是奉承話，我卻不感興趣，不過他們所說

我無能爲力一點，是承認的，所以就繼續住在巴塞隆納，在日光下亂塗油畫。此後林德曼加入我們一起，我們同乘一艘華麗的輪船，繞着西班牙東部沿海巡遊，至坦吉爾登陸。在坦吉爾，我遇到羅斯米爾勳爵和一班愉快的人士在一起。他告訴我，說勞合喬治在馬拉克西，那邊的氣候很好。我們全體，便坐汽車到那兒。我就在愉快的摩洛哥從事繪畫，消遣歲月；直到一月二十日國王喬治五世突然逝世方纔返國。

阿比西尼亞抗戰的潰敗，和阿國全國爲意大利所併吞，使德國的輿論，受到了無可救治的影響。甚至有些不贊成墨索里尼的政策和行動的人，對於意大利執行戰事那種迅速的、強有力的及殘酷的方式，都不勝贊歎。一般的觀念都以爲英國已呈澈底衰弱的現象。她成了意大利不能消釋的仇恨對象；她已經一下子把斯特里薩陣綫破壞無遺；而她的喪失世界威信，正和新德國實力和聲名的日漸增長，成爲很好的對比。我國在巴伐利亞的代表們中，有一位寫着道：『我感到許多人士方面談到英國時候所表示的輕視語調……恐怕德國今後在談判解決西歐問題、和關於歐洲及歐洲以外一般問題時，就要抱持強硬態度了。』

慕尼黑新聞（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六日）裏邊有一篇論文，其中有令人注意的幾段文字：

英國人喜歡一種就我們德國人標準言算安適的生活。實際上這不是說英國不能作持久的努力，乃是說，在沒有損害他們個人及國民安適的時候，他們總是儘力避免這些努力。他們亦統制生產手段及財富；靠了這種統制，在近百年左右與我們對比起來，使他們能夠多少自動的增加資本。在戰爭中，英國人經過起初的若干遲疑後，確曾表現他們驚人的力量；戰後，世界上的英國主人翁們，認爲到底可以迄可小休了。他們已把整個陣綫解除武裝——在公民生活上甚至比陸海方面更爲徹底。他們很安心的放棄等於兩國總和的（海軍）標準，而接受和美國平等的地位。……她的陸軍是怎麼樣呢？她的空軍又是怎樣？……關於陸地及空中的防禦方面英國最急切需要的不但是金錢，而且是人力，是擔任帝國國防的她公民的生命。她的新空軍方案，共需一萬一千人，實際上竟缺少七千人。還有，小型的正規軍亦有大量的缺額，計缺少大約一個整師；她的地方軍（爲業餘軍人而設的類乎主日學校的東西）其名額遠小於規定的數字，所以無論如何不能認爲是一種有效的戰鬪力量。鮑爾溫本人在不久以前曾說，他無意採用徵兵制度，來變更募兵制度。

一種要想以拖延決定來達到成功的政策，現在已是難望抵抗這個震動歐洲而且的確震動全世界的旋風。現在很少再有人根據國民的而不是黨的立場，憤起反抗政府沒有骨氣和暗昧不明的態度，並要政府負起目下帝國已在不知不覺中陷入危險境地的責任。英國的羣衆，對

於政府所謂局勢可以逐步逐步的改善，所謂可以用小規模的調整及審慎周到的策略，可以重新維持世界均勢，似乎都很贊成……

今天，阿比西尼亞全國，已是無可改變的、完全的、最後的爲意大利所有了。因爲這樣，無論日內瓦或倫敦都不得不確然相信，祇有用非常的武力，方可把意大利逐出阿比西尼亞，但是眼前沒有一個強國，亦沒有這樣膽量，敢於立刻施用武力。

這一篇話，是絕對真確的。英國政府已經很輕率的跑上前去，揭發一個重大的世界目標。他們已經用了十分勇敢的言詞，領導五十個國家向前。面逢了野蠻事實的鮑爾溫，卻向後退縮了。他們的政策，長時期來祇是在於滿足國內輿論上的有力分子，而不顧到歐洲局勢的實際情況。他們和意大利疎遠，結果祇是紊亂了整個歐洲均勢，而於阿比西尼亞一無裨補。我們已經把國際聯盟引入非常可笑的失敗境地，縱然不曾把這個制度傷害致死，至少已使它處於危乎其殆的境地了。

第十一章 希特勒進擊（一九三六年）

英國的新空氣——希特勒暢所欲言自由動手了——法蘇協定的批准——萊因地與凡爾賽及羅加諾公約——三月七日希特勒重佔萊因地——法國的躊躇——佛蘭亭訪問倫敦——英國和平主義——佛蘭亭與包爾溫——威格拉姆的憂慮——希特勒的證實及勝利——國防協調大臣——殷斯基伯的膺選——安知非福——我對國聯的希望——艾登主張與法國舉行軍事參謀談話——德國在萊因地設防——我在國會中提出警告——蒲立德戰後的揭露——七月十一日希特勒對奧地利的保證

一九三六年一月底我回到本國時，我就覺得英國有了一種新的空氣。墨索里尼的征服阿比西尼亞及施行征服時所採用的野蠻方法，霍爾賴伐爾談判的駭人聽聞，國際聯盟的失敗，『集體安全』的明顯的崩潰，凡此種種，不但使工黨及自由黨，而且使那善意而徒勞無功的民衆意見，發生了改變。在七個月以前，曾有一千一萬萬人作「和平投票」時，曾代表過這種態度。所有這些勢力，現在都準備考慮反抗法西斯或納粹暴政的戰爭了。使用武力，不特已不復是不合法的思想，在成千成萬酷愛和平的民衆，甚至以前曾以和平主義者自豪的許多人心中，都逐漸承認施用武力是一個決定的要點。但是使用武力，根據使用的目標，祇有由國際聯盟發動，和置於國聯的權力之下。而反對黨雖繼續反對一切重整軍備的措置，但仍留下不少見解一致的地方，如果英國政府能夠起而應時勢需要，一定早已能夠領導一個團結的民族，以共同赴難的精神，推進整個未雨綢繆的工作了。

政府墨守他們中庸的政策，不澈底的措置，和一切保持安靜。他們沒有設法利用此時在國內日益洋溢的和衷共濟的精神，使我深以爲異。他們由此方式，一定可以大大加強了他們的地位，和獲得加強國家地位的力量。鮑爾溫卻無意於此，他老得很快。他靠托在選舉中所佔極大的多數，保守黨安靜地在他掌握之中。

希特勒的德國一旦得准重整軍備，沒有受同盟國和前協約國家的積極干涉，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幾乎成了一定的事實。實力決鬪的日期拖得越長，則我們在第一個階段中想不經大戰而制止希特勒的機會，和第二個階段中在慘慄的磨難中獲勝的機會，也越惡化。在一九三五年夏季，德國破壞和約重新恢復徵兵。英國對此已表示默許，並且根據另外一個協定，准許德國建立海軍，和如果高興可以建造與英國規模相等的潛水艇。納粹德國曾經秘密而非法的造成了一枝空軍，至一九三五年春季，這枝空軍經公開宣布實力已與英國相等。他經過長期的暗中準備，開始積極生產軍火，現在已經進入第二年了。英國和整個歐洲，以及當時認為遼遠的美國，已經面對着歐洲最有為民族七千萬人口的有組織的武力和戰鬪意志，他們正在盼望重新恢復他們民族的光榮。一個殘酷的軍事、社會、和政黨的統治組織，遇到他們稍有躊躇之時，即予以鞭策。

希特勒現在可以自由下手了。他先前所採取的各項連續步驟，並未遇到歐洲兩個自由民主國家的有力抵抗；在美國方面，除了高瞻遠矚的總統以外，也不過逐漸引起注意而已。在一九三五年可以有致勝之望的和平奮鬪，現在已經幾乎失敗了。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亞已經獲得勝利，他公然反抗國際聯盟尤其是英國，結果居然成功。他現在痛恨我們，疏離我們而與希特勒攜手了。柏林，羅馬軸心已經成立。現在正如事實所證明的，已經很少阻止戰爭、或以類乎戰爭的決賽方式以延緩戰爭的希望了。英法現在剩下來所可以做的，祇有等待決戰時期的到來，和盡其所能，作最大的努力。

此時也許還有主張集體安全的時間，由有關各國明白宣布，準備不辭用武，以實施國際聯盟的決議。民主國家以及他們的附從國家，無論就實力或潛力而言，仍較獨裁者為強，但他們對其敵人的相對地位，比之十二個月以前已經削弱了一半。為惰性與怯懦所束縛的良善動機，並非武裝的和挺而走險的作惡之敵手。真誠愛好和平，不能作為辯護糊裏糊塗使幾十萬平民捲入全面戰爭的理由。荏弱而用意甚善的會議中歡呼之聲，不久即寂無聲響，他們的票數亦不再被人計算。切數正在向前邁進。

德國曾在一九三五年中，拒絕和破壞了西方國家談判東歐羅加諾公約的努力。新的德國此時自己宣稱，它是抵制布爾塞維克主義的一個屏障；他們說，就他們而言，與蘇聯合作是絕對做不到的。希特勒於十二月十八日在柏林告訴波蘭大使說，『他堅決反對西方與俄國的任何合作』。在這種心理狀態之下，他設法去阻礙、和暗中破壞法國與莫斯科獲得直接協定的努力。法蘇公約是五月中簽字的，但尚未經雙方任何一方批准。如何阻止這一種的批准，成了德國的主要目標。賴伐爾從柏林方面得到警告，稱如果法國批准公約，以後就不能希望法德作任何進一步的接近。以後他不肯繼續堅持批准，成爲衆所周知，但事實並未受到影響。

一九三六年一月新任法國外長佛蘭亭到倫敦來，參加喬治五世的葬儀。在他抵達的當晚，他在唐寧街和鮑爾溫與艾登同吃晚飯。談話轉到如遇德國破壞羅加諾公約，英法應採那一種態度的問題。法國政府此時預備進行批准法蘇公約，所以希特勒很有採取這種步驟的可能。佛蘭亭着手徵詢法國內閣和參謀本部的正式意見。據他的報告，他於二月中在日內瓦通知艾登，稱如遇發生德國破壞條約的情形，法國的武裝部隊即將聽受國聯的指揮。他要求艾登遵照羅加諾公約的條款，由英國作最後的協助。

二月二十八日法國下議院批准法蘇公約，翌日法國駐柏林大使奉命與德國政府接觸，和詢問在什麼基礎之上可以進行法德諒解的一般談判。希特勒答覆中要求作幾天的考慮。三月七日早晨，德國外交部長牛賴資邀請英、法、比、意各國大使到外交部，向他們宣布德國的提議，包括訂立一個二十五年的公約，萊因河國境兩邊撤除軍備，一個限制空軍的公約，和由東西隣國進行談判互不侵犯公約。

萊因地的『非武裝區』，是根據凡爾賽和約的第四二、四三、四四各條成立的。這些條文，宣布德國在萊因河西岸或東岸的五十公里以內，不許有、或成立設防區。在這些區域內，德國亦不許有任何的武力，任何時間不得作軍事演習，或維持任何供軍事動員之用的任何設備。在這些條文之上，則有由雙方自由談判訂立的羅加諾公約。在這個條約中，訂約國家個別和集體保證德比和德法邊境的永久性。公約第二條，保證德國、法國和比

利時將決不侵犯或攻過這些邊境。不過，如遇凡爾賽和約第四二和第四三條發生背約時，這種破壞舉動即成爲『一種未經挑釁而起的侵略行爲』，因爲非武裝區域內有軍隊的調動，被侵侮的簽約國家即須採取立即的行動。這種破壞行爲應該立即在國際聯盟中提出，國聯於確定事實之後，必須向簽約國家提出勸告，並對被施行侵略對象的國家予以軍事的援助。

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同一天中午，也就提出二十五年公約後兩小時，希特勒在國會中宣布他預備重行佔領萊茵地，甚至就在他說話的當口，約三萬五千德軍列隊魚貫越界，進入所有各德國重要城鎮。他們到處受到歡呼，混雜有深恐協約國有所行動的恐怕心理。同時爲了迷惑英美輿論起見，希特勒宣布佔領純粹爲象徵性質。在倫敦的德國大使，以晨間牛賴資在柏林交給羅加諾訂約各國大使的同樣建議，遞交艾登。這個提議，使大西洋兩岸每一個願意受欺的人爲之心安。艾登對德大使作了一個嚴峻的答覆。自然現在我們知道，希特勒當時用這種和解的提議，不過作爲他陰謀的一部分，和用以遮掩他所做的暴行。這種暴行，爲他的威望計，因之也就是爲了他計劃的第二步計，是非成功不可的。

這不單是破壞條約義務的行爲，也是利用幾年前協約國於規定期限前友誼退出來因地的以怨報德。這種條約義務，是由戰爭中武力來規定的，但也是由完全和平之下各國自由簽訂的羅加諾公約所規定的。消息傳出，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動。由薩勞任總理、佛蘭亭任外長的法國政府，憤恚萬狀，十分激昂，向所有它的盟邦和國際聯盟提出呼籲。在此時法國掌握着『小協約國』即捷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的効忠。波羅的海國家與波蘭亦屬於法國的系統之下。英國曾經提出過保證，保障法國的邊界，抵抗德國的侵略；鑒於英國爲了促成較早撤萊茵地，對於法國曾經實施壓力，法國尤其有盼望英國加以援助的權利。德國的行爲，是道地的破壞條約的行爲，不僅破壞了和約，也破壞了羅加諾公約；如有義務可言，這就是對各簽約國同樣具有拘束力的義務。

法國發生了一個可怕的震撼。薩勞和佛蘭亭一時激動，想立刻實行全國動員。如果他們能力勝任，或者早已做了；做了以後，就可迫使所有其他的人非跟他們走不可。這對法國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但他們非有英國的同意似乎不能有所舉動。這是一種解釋，但不能成爲一種開脫。這是一個有關法國生死存亡的問題，任何不愧其名的法國政府，應該早已立定決心，和信託條約的義務。在這些流動的年份內，人選不斷變動的法國政府，其外交部長不止一次甘於引英國和平主義，來辯解他們自己的行動。情形也許確是如此，他們從英國方面從未遇到任何鼓勵去抵抗德國的侵略。事實相反，如果說他們行動躊躇，他們的英國盟友卻毫不躊躇的對他們加以種種勸阻。在整個星期期中，倫敦和巴黎之間電話往返，作激動的談話。英國政府勸告法人暫時等待，以便兩國作共同的行動，和先作充分的考慮。一個向後轉的堂皇的擋箭牌！

倫敦非官方的反應也很冷淡。勞合喬治匆匆的說，「依我的判斷，希特勒先生的最大罪行，不是破壞了一個條約，因爲事前有過刺激的舉動。」他接着說，「我希望我們保持冷靜的頭腦」。所謂刺激行爲，是指協約國家未能比他們所做的更進一步的裁減軍備。斯諾登助爵集中於希特勒所提出的互不侵犯條約，說希特勒過去的和平建議沒有爲大家所理會，但人民將不許讓這次的和平提議再被忽略了。這類的言論，也許表現出了當時被錯誤引導的英國輿論，但殊不能爲發言的人增聲光。英國內閣追求阻力最小的路線走去，覺得最便當的出路，莫過於敦促法國向國際聯盟再度提出呼籲。

在法國也有重大的分裂。大體而論，政治家希望軍隊動員，和給希特勒一個最後通牒，而將軍們，正如他們德國方面的對手一樣，請求鎮靜、忍耐和稍安無燥。我們現在知道了此時希特勒與德國最高軍事當局之間所發生的意見衝突。如果法國政府真動員了近百師的法國陸軍，和當時仍被誤信爲歐洲最強大的空軍，無疑希特勒一定會受他自己參謀本部壓迫，撤退進駐的軍隊，而這一種對他的自負所將給子的挫折，也許很可能證明爲對他統治的致命打擊。此地必須記住，此時即使單以法國一國之力，沒有其他的援助，也足夠把德國人驅出萊因地，而祇要他一經開始軍事行動，和呼籲引用羅加諾公約，將一定可以取得英國的援助。事實上他依舊十分

惰性和麻木，因而永遠失去了不經大戰而阻止希特勒野心的最後機會。不此之圖，法國政府經英國的慫恿把擔子推到國際聯盟的身上，而國聯自從前一年虎頭蛇尾的制裁和英德海軍協定以後，早已受到削弱和失去銳氣了。

三月九日星期一，艾登偕哈里法克斯勳爵和威格拉姆前赴巴黎。最初的計劃，是預備在巴黎舉行國聯會議，但不久威格拉姆奉艾登之命赴法邀請佛蘭亭到倫敦，預備在英國舉行國聯會議，以便法國可以獲得英國更有力的支持。就這位忠實的官員言，這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使命。十一日他回到倫敦後，便立刻來看我，把全部情形告訴我聽。佛蘭亭本人於深夜抵達，在星期四早晨約八點半鐘左右，他到穆庇斯大廈我住的地方來看我。他告訴我，他提議向英國政府要求同時動員兩國的海陸空軍，並且他已經獲得小協約各國及其他國家願予擁護的保證。他讀給我聽一張所獲答覆的令人發生深刻印象的名單。在上次大戰中的協約國家，無疑仍擁有較強的實力，他們祇須起而作致勝的行動。我們當時雖然不知道希特勒和他的將領之間所發生的情形，但強大的實力顯然仍在我們的一邊。在我的私人地位，誠然無能為力，但我希望我們的貴客完全成功，把問題作一明白解決，而且我答應任何我力量所及的援助。那晚上我邀請我的主要夥伴吃晚飯，聽取佛蘭亭的勸告。

張伯倫此時以財政大臣的身分，是政府中最有力量的一員。他的能幹的傳記作者斐林，從他的日記中引述了一段話：『三月十二日。和佛蘭亭談話，強調輿論對任何性質的制裁，都不會支持我們。他的見解認為如果維持堅強的陣線，德國即將不戰而屈服。我們不能把這種見解，認為是對一個瘋狂獨裁者所有反應的可靠估計。』在佛蘭亭要求至少實行經濟抵制時，張伯倫在答覆中提議於談判時成立一支國際軍隊，同意訂立一個互助公約，並宣稱如果放棄一塊殖民地而可以獲致永久的和平，他願予考慮（註）。

同時英國大部分的報紙，以泰姆士報和每日新聞為先驅，著論表示他們相信希特勒提議不侵犯條約的誠意。奧士汀·張伯倫在劍橋大學發表的演說中，持相反的見解。威格拉姆認為讓佛蘭亭與他能想得到的每一個

人接觸，財政界、新聞界、政府人員以及羅息恩勛爵，屬於他的職責範圍之內。佛蘭亭對所有在威格拉姆處遇到的人，都提出下面的話：『今日整個世界，尤其是小國的目光都轉向到英國身上。如果英國現在願意行動，它可以領導歐洲。你們應有一個政策，所有世界都將追隨你們之後，因而你們將防止戰爭。這是你們最後的機會。如果你們現在不阻止德國，一切就完了。法國就不能再保障捷克，因為在地理上成爲事不可能了。如果你們不維護羅加諾公約，那麼剩下來你們所能做的，祇有等待法國對之無能爲力的德國重整軍備。你們今日如果不以武力制止德國，即使你們和德國成立暫時的友誼，戰爭還是免不了發生。至就我本人而言，我不相信德法之間的友誼是可能的；兩國總將常在緊張狀態之中。不過如果你們放棄羅加諾公約，我就將改變我的政策，因爲沒有其他的辦法。』這些是勇敢的話；但出之行動，一定會表現得更爲響亮。

羅息恩勛爵的貢獻是：『他們畢竟不過是到自己的後花園去』。這是一種可以代表英國人的見解。

當我聽到種種惡劣事情正在進行的消息，便於和威格拉姆談話後，勸告佛蘭亭在返國前要求和鮑爾溫作一唔談。談話即在唐寧街舉行。首相以極度的優禮接待佛蘭亭。鮑爾溫說，他雖然不懂外交，卻能很準確的解釋英國人民的情感。人民全體都需要和平。佛蘭亭說，他再作答覆，主張保障和平的唯一方法，就是乘尙屬可能之時制止希特勒的侵略。法國並不願把英國拖入戰事；她並不要實際的援助；她將自己執行那也許不過是單純的警察工作，因爲依照法國所得情報，在萊因地的德軍，奉到命令，叫他們如果遇着強力的抵抗，即行撤退。佛蘭亭申明當時他說法國向它同盟國所要求的，就是讓它自由行動。這段話當然是不確的，法國根據羅加諾公約而採取合法的行動，英國怎麼能去加以限制呢？英首相再三申說，英國不能接受戰爭的風險。他又詢問法國政府決定怎麼辦。關於這一點，卻沒有明白的答復。據佛蘭亭說，這時鮑爾溫就說道：『你的意見，或許是對的，但是，如果你的警察工作，甚至有百分之一引起戰爭的機會，我沒使英國參加的權利』。停了一會，他又說道：『英國並不處於赴戰的狀態中』，這話現在沒有證實。佛蘭亭回到法國時，他深信不疑，第一，除非英國表現出一個堅強的意志力，他自己的內部分裂的國家決難聯合一致；第二，英國絕無有這種表現的跡象，也

不能希望英國有堅強有力的行動。所以這樣一來他非常容易走到一個慘澹的結論，以為法國的唯一希望，祇有和侵略性越來越厲害的德國取得妥協。

鑒於這些日子內我所看見佛蘭亭的態度，我覺得無論他後來的過失怎樣，在後來的幾年中，有應該儘我所能、加以援助的義務。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的冬天，戴高樂政府在阿爾及耳把他逮捕時，我會用全力爲他庇護。在這一點，我曾請求並得到羅斯福總統的幫助。戰事結束後佛蘭亭被提付法庭審判。我的兒子倫度爾夫以在非洲戰爭中與佛蘭亭見面多次，被傳作證；我很愉快的想，他的辯護，以及我爲佛蘭亭所寫、替他作辯護的一封信，對於法庭宣判佛蘭亭的無罪一事，不無影響。荏弱雖然一樣可以造成禍難，但究竟不是叛國。不過，法國政府無論如何不能推卸其主要的責任的。如果克勒孟梭或樸恩克賓在，一定早已不讓鮑爾溫有自由選擇的餘地了。

英法兩國對於德國違反凡爾賽及羅加諾公約的屈服，包括希特勒佔據萊因地，對威格拉姆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他的夫人後來寫信給我說：『法國代表團離開以後，拉爾夫（即威格拉姆）就回來，坐在房間內他從來不會坐過的角上，對我說：「戰爭現在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最恐怖的戰爭。我想我是看不見的了，但是你一定會看得見的。現在等着炸彈投在這座小屋子吧。」（註）我聽了他的話非常害怕，他又繼續說道：「這許多年來，我的所爲都是毫無用處。我是失敗了。我未能使這裏的人民認清存亡關頭所在。我想，我是不能夠堅強。我未能使他們了解。溫斯頓·邱吉爾是常常了解的，並且他是堅強的人，一定會繼續奮鬥到底。」』

我的朋友對於這個打擊似乎始終沒有釋然於懷。他心中對此事看得非常重大。不過一個人如果他相信是他職責所在，總可以繼續奮鬥，冒着越來越大的危險，直到把危險打退爲止。威格拉姆的深切理解力，對他感覺銳敏的天性發生了過度的反響。他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逝世，真是死非其時；他的死，使外交部受到一個不

（註）這座小屋果然被炸了。

可補償的損失，對我們命運的陷於悲慘惡化，發生了本身的作用。

當希特勒於再佔萊因成功之後和他將領會晤之時，他已經能夠證明他們的恐怖都是杞人憂天；並且證明他的判斷或『直覺』如何高出於普通軍人之上。各將領們對他低首了。他們都是愛國的德國人，自然都歡喜看見他們的國家，這樣迅速的在歐洲得到地位，他們從前的敵人，如此的分裂和馴順。這一幕的故事，無疑大大增加了希特勒在最高德國權力階級中的聲望和權威，可以鼓勵使他能夠再向前進，作更大一點的嘗試。他對世界說道：『德國所有的領土野心，現在已經滿足了。』

法國現在陷於矛盾的狀態之中，還夾着恐懼戰爭的心理，和戰爭已經避免了的一點安慰。英國思想簡單的報紙，以下面的話，寬譬單純的英國人：『歸根講來，這不過是德國回到他們自己的國家而已。譬如說，把約克郡脫離我國版圖到十年或十五年之久，我們的感覺又是怎樣呢？』誰也沒有停下來注意一下，今後德國軍隊如果進犯法國，他們的下車地點已經移前一百哩了。這一件事，是向歐洲及各小協商國證明，法國是不願打的，即使願打，英國也會把他拉住；但對這個證據誰也沒有發生不安。這一幕戲加強了希特勒統制德國的威力，並且，使那些以前要想禁制他的將領們，反而自己覺得玷辱了愛國主義，和深以無恥愚昧為愧。

在這個緊張的時期中，我個人的運命，現在似乎已由那些高等人士在討論了。首相在經常壓力之下，最後決定成立一個新部——不是國防部而是國防協調部。張伯倫的傳記作者，對此事已有若干記述。對政府有極大影響力量的奧斯汀·張伯倫，曾經認為並說過，把我擯諸政府之外乃是『極大的錯誤』。霍爾這時已病愈回來，鑒於在霍爾、賴伐爾危機中他接受政府免職的恭順態度，他顯然有重行復職的大權利。首相心想最好是由張伯倫擔任這個新職，而使他的哥哥奧斯汀·張伯倫回來擔任財政大臣。確知不久即要繼承鮑爾溫之職的張伯倫，拒絕了這個建議。斐林先生說，『保守黨恐怕不願霍爾馬上捲土重來。假使這個新的機關由邱吉爾來擔任，

那一定會把攆斥邱氏、作爲反抗軍國主義保證（註）的自由黨及中間派人分子發生恐慌和違反那些負有解釋黨的一般意志之責的人的勸告；而且，一旦鮑爾溫去職時，豈非又得引起繼任的爭執？」我們聽說，爲了「精密估量這個微妙的和嚴重的問題」，足足費了一個月之久。

我自然知道這個步驟正在進行。在三月九日的辯論中，關於我批評政府政策的嚴厲而不失友誼的批評態度，很仔細的不使作絲毫的背棄，大家認爲我作了一篇成功的演說。我對於新機關的成立及其權力並不滿意。但我將樂於接受這個職位，因爲我自信可以發揮我的知識和經驗。顯然（據斐林說），三月七日德人的進兵萊因，對我的任命，發生決定的不利影響。希特勒不會喜歡我擔任這個職務，當然是很明白的。九日這天，鮑爾溫選中了殷斯基伯勳爵。他是一位能幹的律師，他的便宜之處，是他的不見經傳和完全不懂軍事問題。首相的選擇，使報紙和公衆都大爲驚訝。就對我而言，這種確切的、而且似乎是最後的、把我攆拒門外、使我不得參加我們的防禦準備，實是一個重大打擊。

我必須很小心，不要在這種紛至沓來到我們身邊的、和我常居主要地位的偉大討論和辯論中，失去我的平心靜氣。我必須控制我的感情，顯出沈靜，不偏不倚和超然的態度。我在努力克制之中，總是時時想到國家安全的全的問題，這是使我可以自制的一個良好而簡單的方法。爲謀安定和貫注我的精神起見，我把從凡爾賽和約起直到我們現在所達到的時期止其間所發生的全部歷史，作成一個大綱。我甚至已經寫了第一章，其中一部分可以無須修改的移入本書。但是時勢的迫促，以及在卻特威爾我用以維持我愉快生活的日常工作，使我的計劃沒有極大的進步。其次，在一九三六年底，我專心於我那部英語民族史，此書在戰爭爆發以前寫完，將於日後出版。著述一本大篇而內容充實的書，好像有一個朋友及伴侶在你旁邊，你可以時常向他找到安慰和快樂，而且同他一起，可以使你心中閃現一個新奇廣大的興趣領域，所以也更爲引人入勝。

（註）在此時，這是違反真理的。和平投票簽字者，對於武裝集體安全一點，和我的意見相同。

鮑爾溫用他權力的最後一刹那，來反抗一個嚴酷和不時揭露他錯誤的人，當然有他充分的理由。不但如此，他是一個非常機警的政黨派經理，心中想着黨內多數分子，目的在能於兩屆選舉之間獲得安定的生活，他並不需要我這種令人不安的幫助。他無疑的認為在政治上已經給了我一個致命的打擊，而且我覺得他或許已經很成功。但我們是何等難能逆料到種種後果，無論是賢明的或不智的，善良的或惡劣的！沒有這種無限量的、無窮盡的變遷，人類生活的戲劇，就會破壞無遺。鮑爾溫的行徑，使我不曾參與以後三年中內閣的所有妥協和缺點，使我未至以部長的資格，對於勢必證明極端不充國防條件，負起直接的責任，其有助於我之大，鮑爾溫同我一樣的不知道。

我受到在當時似乎於我很為不幸，而結果對我有利的幸福，這並不是第一次——也許還不是最後的一次哩。

我仍舊希望，法國向國聯的申訴，結果將造成一個國際的壓迫，共同對付德國，實施國聯的決議。

法國（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三日我寫着道）已把它的案子提交國際法庭，請求法庭主張正義。假使國際法庭認法國的理由正當，而不能提供任何滿意處置的時候，那就證明了國際聯盟盟約是騙人的，而集體安全，也是虛偽的東西。假使對於被壓迫者沒有合法的救濟方法，那末，為未來希望所繫的國際法律和国际合作的整個理論，就要很可恥的歸於無效。沒有一切保證，全靠自己手腕的各國同盟及集團制度，就會立即代之而起。他方面，假使國聯能對於成爲侵略者的世界上最有力國家之一，能夠實行它的法令，那末，國聯的權力，就將建築在一個非常偉大的基礎之上，而且自此以後，將成爲人們公認的最高權力，可以決定和統制一切民族的爭執。所以，我們或許可以在這種際會，一躍而使我们最希望的夢想，趨於實現。

但是，冒險呵！當然誰都不可不注意及此。怎樣可使危險減免呢？這裏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集成一個道德上及實力上都足以制服一切的勢力，來支持國際法律。假使兩方面的實力差不多無分軒輊，戰爭就可能在幾星期內爆發，而且沒有人能夠估計戰爭的趨向怎樣，捲入漩渦的是誰，或如何出場。但是，假使國聯所能支配的實力，比侵略者現在所具有的勢力，強大到四五倍，那末，和平及友誼解決便有極良好的機會，所以每一國家，無論大國或小國，都應該依照國際聯盟盟約盡其本職。

在這個緊要關頭，國聯究能憑藉那一種力量呢？它有沒有執行的官吏或警察官吏來執行它的判斷呢？或者，它是不是孤立無能，不是那些毫無決心，或無是非心的信徒唱高調聲中的一個空洞的笑料呢？就世界的命運而言，說來奇怪，國聯就從來不會有過能運用這種足以壓制一切的力量時候。現在，世界警察即在手邊，日內瓦四邊的大國都在武裝待命，爲這些國家的利害責任計，非但要出來維持、到

了最後必要時還要來執行公衆的法律。這個機會，假使錯過，恐怕永不會再來了。我們還是走入新時代呢？還是回到舊時代呢？現在已臨到決定孰去孰從的這個重大出入關頭了。

所有這些話，在此時和我及若干我保守黨友人共同合作的自由黨及工黨分子是頗爲中聽的。它把惶慮國家安全的保守黨，和工會分子、自由黨以及一年前參加和平投票的和平爲懷的無量數男女團結一起。假使英國政府，能夠堅決的採取執行國聯決議的行動，他們一定早能領導着統一的英國民族，向前作避免戰爭的最後探索了。

重占萊因地事件直到三月二十六日纔開始辯論。中間的停頓時間，一部分是爲國聯行政院在倫敦的會議佔去了。結果，邀請德國把它反對的和那經希特勒指摘的法蘇協定一案，提交海牙國際法庭，並於談判進行中，勿再增兵於萊因地。如果德國對於不再增兵萊因一節，表示拒絕，英國及意大利政府，即將實施羅加諾公約中他們所負義務的必要步驟。但是意大利的諾言，已經沒有多大的價值，因爲墨索里尼早已和希特勒有密切的接觸。德國已經覺得強大有餘，儘可拒絕任何限制它在萊因地的兵力的條件了。所以，艾登主張英國法國及比利時，應該舉行軍事談話，先行研究和準備根據羅加諾公約的不久即有需要的聯合行動。這位年青的外相作了一篇大膽的演說，得到議院的贊成。奧斯汀·張伯倫勳爵和我，都發表長篇的演說，予以擁護。可是內閣卻表示冷淡，因此對於艾登，竟連要求舉行軍事談話，都是並非容易的工作。通常此類談話，都是不用外交方式，而是祕密的、甚至非正式的舉行。這些談話，現在是三星期的會談和抗議的唯一的實際結果，也是協約國對希特勒破壞條約和確實佔領萊因地的唯一答復。

在我演說當中我說道：

我們不能很愉快的來回顧我們以前五年的外交政策。這以前五年，當然是不幸的年份。我絕對不是要把那個時期內世界發生惡事的責任，都推在我本國的政府身上，……但是我們確已看到人類觀感中所發生的最黯淡、最惶恐的變化，在這極短時期內，有這樣的變化，是從未有過的。五年以前，大家都感覺到很安全；五年以前，大家都在向前瞻望和平，瞻望着將來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如果和平與正義當道，科學便可把種種福利，分佈給各階級的人民，人類便享受和平之福。五年以前，如果談到戰爭，不但要給人們當作獸子，當作罪人，

而且差不多要給人認作瘋狂……

侵犯萊因地一事所以具有嚴重性，是因為荷蘭、比利時及法國，都將因此而受到威脅。國務大臣說到德國甚至拒絕在談判進行中停止建築防禦工事，我聽了甚為疑懼。我想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他們就一定會在那邊築成一道防線，有了這道堡壘防線以後，對歐洲的局勢上就會發生反響。這道防線可以把德國大門關緊起來，同時他可以從別座門戶，任意的向東面及南面衝出去。

萊因設防的影響深遠的後果，英美兩國，並不會立時感覺到。四月六日，當政府要求對外交政策作信任投票時，我就再提到這個問題：

希特勒已撕破了各種條約，已在萊因地駐兵了。他的軍隊現在那邊，而且準備長駐下去。所有這些事，表明納粹政權已在德國國內和在所有鄰近國家之內，獲得到了一個新的威望。但是，事實還不止此，德國現時正在或者即將在萊因區設防了。設防當然需要若干時日的。我們聽說，第一步不過是築戰壕，但是那些曉得德國如何能把戰壕築得十分完美，像興登堡防線一樣的完美，完全用鋼骨水泥的構築，而且包括地下室的人，就能認識德國現在要築的戰壕和永久防禦工程，不過程度上稍有分別而已，而且是從第一下的鋤地起，他們會一直認真工作到最後完工盡善盡美為止的。

我並不懷疑，德國面對法國的全部邊境，即將在可能的短期內堅強的設防起來。三個月、四個月或六個月以後，一定可以看到一座具有實力龐大的藩籬。這在外交上和戰果上將發生些什麼後果呢？……建成一座面對法國邊境的防禦線，可使德國在這條防禦線，節省兵力，並可使其主力轉而突破比利時及荷蘭……現在我們來看看東線，萊因設防的後果，在東線恐怕要實現得更快。那對於我們，固然不是一個直接的危險，但是一個更迫近的危險。一旦這些防禦工事完成，而且符合預定的完工，中歐整個的形態，就變更了。波羅的海諸國，波蘭、捷克，以及一定連帶着的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奧地利、及若干其他國家，在這個巨大建築工程完工的時候，一定將全要受到極端決定性的影響。

這篇警告，一言一語，都已陸續的迅速的被證明為真準的。

在佔領萊因地及建立對法防線以後，第二步驟顯然就是把奧國併入德帝國了。以一九三四年七月暗殺奧國總理陶爾斐司為開端的故事，即將立刻揭開繼此而起的另一幕。我們現在知道，德國外交部長牛賴資於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八日，曾經非常坦白的告訴美國駐莫斯科大使蒲立德說，德國政府的政策，是非待把萊因地消化以後，在外交上不作任何積極的活動。他解釋道：在德國把鄰近法比邊界的國防建設好以前，德國政府，不但不

會鼓勵、而且會阻止奧國境內納粹黨人的暴動，並且對於捷克，將採取安靜的方針。他說：「一待我國的防禦工事建成，中歐各國就會認清法國已不能進入德國領土，所有這些國家就會對於他們的外交政策，發生大異往常的感覺，一個新的集團就會產生。」牛賴資又告訴蒲立德說，奧國的青年，已逐漸轉向納粹，納粹黨的統治奧國已經不可避免，不過時間問題罷了。不過重要的關鍵，是在完成相接法國邊境的防禦，否則德國設和意大利發生爭執，就會引起法國進攻德國的事。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希特勒在他向德國國會演說中，宣稱：「德國並不想亦不願干涉奧國的內政，或併吞奧國，或造成一個德奧合併。」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他和奧國政府簽訂了一個條約，允許不採用任何方法來干涉奧國內政，特別不予奧國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以任何積極的支持。這個諾言發表後不到五天，就有祕密訓令傳達奧國境內的國社黨，叫他們擴大並強化他們的活動。同時，德國的參謀本部，亦奉希特勒的命令，草訂佔領奧國的軍事計劃，以便及時實施。

第十二章 箭在弦上——西班牙（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

英國的外交政策——新的佔優勢者——國際聯盟——兩年的插曲——我關於供應機構的備忘錄，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附錄）——西班牙內戰——不干涉政策——反共協定——鮑爾溫「坦白」的演說——整軍經武和擁護盟約——阿爾勃廳會議——愛德華八世國王遜位——鮑爾溫的聰明——喬治六世的登極——國王來的信——鮑爾溫的退休——張伯倫繼任首相——大臣的調動——鮑爾溫和張伯倫——和里賓特洛甫談話

這裏我應略敘我歷年來和以後仍將繼續根據的英國對歐政策的原則。一九三六年三月底時，保守黨外交委員會曾請我去作祕密演說，當時我發表的意見，實在是最正確的說明。

英國近四百年來的外交政策，是反對大陸上出現最強、最有侵略性、最占優勢的國家，尤須阻止低地國家（荷、比），被落入這樣一個強國的手中。由歷史上看，近四世紀以來，人和事，環境和情況已有這樣許多的變更，但對於一個目的能如此的堅持，實在是在任何種族、民族、國家、或人民紀錄上所罕有的奇蹟。更有進者，不論在任何情形下，英國總是走了較艱難的路。對抗西班牙的菲力浦二世，反對威廉三世和馬爾波洛時代的路易十四，反對拿破崙，反對德國的威廉二世。如果參加較強的一方面而分享其勝利之成果，不但較為容易，並且極有誘力。但我們始終走着較難的路，參加了較弱的一方面，和他們聯合起來，而打敗和挫折了大陸上的軍事暴君，不問他是誰，也不問他所引導的是那一個國家。這樣我們保持了歐洲的自由，使其富有生氣，可以自由發展各式各樣的社會。經過了四次可怖的爭鬪以後，結果信譽日隆，國土日廣，而低地國家亦受到了保護而仍能獨立存在。這是英國外交政策奇異的不自覺的傳統。我們一切的思想，在今日也都根據於這個傳統。我還沒有發見一樁事，足以變更或削弱我們祖先所據而行動的正義、智慧、勇氣、和謹慎。我亦沒有在人性中發見一樁事，能稍稍變更他們所追求的結論的效力。我不論在軍事、政治、經濟或科學方面，都沒有發見任何東西，使我覺得不應該或不能由這同一的道路前進。我胆敢將這極普通的主題向諸位提出，因為我覺得如果能夠接受這個主題，則其他的一切便十分簡單。

請注意英國的政策，對於想求君臨歐洲的國家是誰並不顧問。問題並不在這個國家是不是西班牙，或是法王國，或是法帝國，或是羅馬帝國，或是希特勒政體。這個政策和統治者或國家沒有關係；牠所唯一關心的是，誰是最強的或其力量足以占優勢的暴君。因此，人家罵我們親法或反德，我們毋庸害怕。如果情勢相反了，我們可能同樣的親德而反法的。這是我們所遵循的公共政策的法則，並非祇是一種懸偶然的情勢或愛憎，或任何情緒而定的權宜之計。

因此，我們的問題是，在今日的歐洲，究竟那一個國家是最強的國家，那一個國家想用危險而高壓的方法來支配旁的國家。現在，在這一年中，或在一九三七年中的這一個時期，法國軍隊是歐洲最強的軍隊，但沒有一個人害怕法國。每一個人知道法國要人家不要管他，他有了強有力的軍隊祇是爲了自衛。每一個人都知道法國人是和平的，是在恐懼之下。他們勇敢、堅決、和愛好和平，但仍憂慮着未來。他們是一個自由的民族，有着自由的國會制度。

反之，德國並不懼怕那一個。她現在的軍備程度，在德國的歷史上前所未見。他現在出少數幾個得意揚揚的亡命之徒領導着。在這些專制的暴君之下，金錢日益減少，不滿日益增加。不久，他們必得在經濟和金融崩潰或內亂和戰爭二者之間，加以選擇，這個戰爭，除了使歐洲成爲在納粹控制下一個德國化的歐洲外，沒有其他的目的；他們如果戰而能勝，除此之外，也不會有其他的結果。因此，由我看來，所有以前過去的情形又將再度發生了，我們國家的拯救又須靠我們再度聯合所有歐洲的軍力，來抑制和遏退、在必要時並來破壞德國統治歐洲的企圖。因爲，請相信我，如果那些強國，如西班牙、路易十四、拿破崙、威廉二世，如果他們得到了我們的幫助而成爲歐洲的專制主人，他們仍可乘勝利餘威以掠奪我們，使我們成爲不足輕重，並且趨貧困。我們應將英帝國的生命和其持續，應將這島國的偉大，作爲我們最大的責任，我們不應爲一個理想世界的幻想來引入歧途。這種理想世界，實際上祇是用他種更壞的統治來代替我們的地位，祇是把將來的指揮來改屬於他們。

就是在這種階段，國際聯盟這個廣博的概念和非常重要的機構，發生其重要性。國際聯盟實際上是一個英國的概念，和我們過去的一切方法和行爲，完全和諧。他和那些是非的大觀念，和我們一向遵守的、即以控制主要侵略者而維持和平的那些觀念，亦完全相合。我們所希望的是法治，是國與國之間和各國內的自由；過去造成我們的令譽、偉大和文明的人，他們即是爲了這些，也確是爲了這些而掙扎，而終獲勝利。英國人民所最寶貴的，是一種國際的法治，是用忍耐的但仍合乎法則及正義的談判來解決糾紛。你不要看輕這些理想對於現代英國民主所加的力量。我們不知道幾世紀來的風化如何把這些種籽灌輸入到人民的內心中的。這些理想已在那裏，正像他們的愛好自由一樣強固。我們不能加以忽視，因爲這是本島內特質的精華。所以我們相信，對於國際聯盟加以扶助，並增強其力量，實在是維護我們島國安全的最好方法，並且也是維持和我們利益一致的正義的最好方法。

我的三個主要的論據是：第一，我們必須反對想做支配者的人或可能的侵略者。第二，德國在其現在的政制下，用了迅速發展龐大無比的軍備，無疑的會在將來扮演這個角色。第三，國際聯盟以最有力的方式，集合了許多國家，並聯合了我們國內自己的人民，以圖控制有侵略用心的人。我極虔誠的將這些主要的論題提請諸位考慮。其他的一切將都由這些論題推演。

發見和宣布一般原則，通常總較把原則應用爲容易。第一，我們必須計算到和法國的有力的聯合。這意思並不是我們應該對德國，故意抱一種不必要的敵意。減低這兩個國家間的緊張關係，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利益。就法國而言，我們要達到這一點並沒有困難。他們和我們一樣，也有一個民主的國會，對於戰爭抱極端戒懼的心理，並且也和我們一樣，在準備他們的防禦時，常受到相當的障礙。因此，我們應認我們和法國的聯合防禦爲基本政策。時機已是非常嚴重和危險，現在其他一切的看法，都應適當的放在這個下面。凡具有確

切的理論體系並對理論深切信仰的人，其處理日常事務中的瞬息萬變，一定比祇具短見、憑臨時見聞感觸而衝動行事的人為高明。最要緊的，是決定你應該往那裏走。就我個人論，我主張武裝的國際聯盟，或以英法為核心儘量爭取與國，聯合起來反抗可能的侵略者。我們應盡我們的能力，建立這偉大的國際機構。如果這是我們能力所辦不到的，或如果因為人的懦怯和錯誤而終於解體，那末我們至少應該使英法這兩個尚存的自由的歐洲大國，能同舟共濟，敢冒風暴以求再度抵達安全的彼岸。

如果我們使美國加入英法一面；如果我們把可能的侵略者換一個名稱，如果我們以聯合國來代國際聯盟，以大西洋來代英倫海峽，以世界來代歐洲，以上的辯論，在今日並不是完全不能適用的。

在希特勒一九三六年三月強佔萊因地和一九三八年三月兼併奧國之間，經過了整整的兩年，兩者之間的間隔較我所料想的為長。當時所發生的一切，都按照着預見和規定的順序，但在連續打擊之間隔離的時間較長。在這個期間內，德國並沒有浪費時間。萊因地的堡壘，或稱『西境鐵壁』迅速建立了起來，一道廣大的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堡壘線，逐漸擴大。德國陸軍現在已完全建立在有條理的徵兵制基礎之上，外加熱烈的志願軍的增補，不但在數量上、並在其組織的成熟和素質上逐月增強，德國的空軍保持並繼續改進着從英國方面搶來的領導地位。德國的軍火廠在高壓之下工作着。在德國，機輪日夜轉動，鐵鎚日夜敲擊，使整個工業成爲一大兵工廠，使全國人民，合成爲一個有紀律的戰爭機器。一九三六年秋，希特勒在國內創行四年計畫，改組了德國的經濟，使在戰爭中能有較大的自給自足。在國外，他得到了他在我的奮鬥中所說過，爲德國外交政策所必需的「強有力的聯盟」。他和墨索里尼獲得了協議，組成了羅馬柏林軸心。

直到一九三六年中爲止，希特勒的侵略政策和違背條約，並非靠了德國的實力，而是靠了法英的不能合作和懦怯，以及美國的孤立。所有他以前的初步，都是孤注一擲，而且也知道不致遇到嚴重的反抗。萊因地的強佔和以後的重行設防，是最大的賭博，結果得到非常的成功。他的對手太無決心，不敢去拆穿他的虛張聲勢。當他在一九三八年作進一步的行動時，他的虛張聲勢已不再是虛張聲勢了。侵略是以武力爲後盾的，並且最好

要有優勢的武力。等到法國和英國政府發覺這可怕的變化時，已經太遲了。

我繼續密切注意我們的軍事準備。我和國防協調大臣殷斯基伯爵的關係極為友善，我在私下裏儘力協助他。根據他的請求，我寫了一個備忘錄給他，主張需要設立一個供應部，這時是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註）。但直到幾近三年之後，即一九三九年春季時，政府並沒有作有效的行動，設立供應部，也絕未企圖在我們的軍火生產方面，採用緊急的措施。

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底，西班牙的議會制度更形惡化，而共產黨或無政府黨革命運動的力量則日益增加，結果引起了準備已久的軍事叛變。根據列寧所親自訂定的共產黨教義和課本，共產黨應協助一切向左傾的運動，並幫助軟弱的憲政政府、急進政府，或社會主義政府，使他們當政，然後加以中傷，再從牠們逐漸失勢的手中攫取絕對權力，成立馬克斯國家。事實上，西班牙所發生的情形，完全是俄國克倫斯基時代的翻版，所不同者西班牙的力量並沒有為對外的戰爭所損傷，陸軍仍保有相當的團結力。和共產黨的陰謀同時存在的，是一種秘密擬定完成的相對的軍事陰謀。雙方都不能合法主張正統，至於各級西班牙人民則都不得不考慮西班牙的生命。維護文明社會的許多尋常的保證，早已由共產黨曲解腐敗的議會政府而被清算了。雙方都開始進行暗殺，而共產黨的兇殘，竟至高到可以任意在街上或從牀上捉住他們的政敵，和予以處決。在馬德里和四週，早已發生了大規模的暗殺，而以索蒂洛的被害達到了頂點。他是保守黨的領袖，相當於一九一四年前英國政界中的卡孫爵士一類典型的人。這一個罪行，乃是使陸軍中將軍們採取行動的信號。佛朗哥將軍在一個月以前，曾寫過一封信給西班牙陸軍部長，明白聲明如果西班牙政府不能維持日常生活中正常的法律安全，陸軍將出而干涉。

在過去西班牙曾看到過許多軍事首長的正式宣言。自桑周里將軍飛機失事遇難後，佛朗哥將軍舉起了反叛之旗。他獲得陸軍的支持，包括全體士兵在內。教會方面除了多明我會這個值得注意的例外之外，以及幾乎全體的右派和中間份子，都依附於他，他立即成爲若干重要省分的主人。西班牙的海員們殺死了他們的官長，參加了不久即成爲共產黨的一邊。在文明政府崩潰之中，共產黨取得了控制，即按照了他們的訓練行事。殘酷的內戰於以開始。當權的共產黨大量屠殺他的政敵和富裕的人。佛朗哥指揮的軍隊，依樣報答，外加利息。所有的西班牙人都以可異的從容精神就義，雙方都有大量的殺害。在多勒多的亞爾喀若地方的軍官學校學生，堅決保衛着他們的陸軍大學，而佛朗哥的軍隊由南方向北挺進，行軍所過，在每一個共產黨的村落中留下了復仇的蹤跡，終於趕到解圍。這是一個值得受歷史家注意的故事。

在這次雙方爭論中，我是中立的。我自然並不贊成共產黨。如果我是一個西班牙人，他們可能已把我、我的家庭、我的朋友害死了，我怎麼能贊成他們呢？但我當時深信，英國政府的手中既有許多旁的事務待理，自以不管西班牙的事爲是。法國主張不干涉政策，使雙方不受外來的援助而自謀解決。英國、德國、意大利，和俄國政府都贊成這種政策。結果，現在已歸最極端革命份子掌握的西班牙政府，雖用了手中握有的黃金，也仍不能買到軍火。比較合理的辦法，似應該根據正常的途徑，像在一八六一年到一八六五年美國內戰時那樣，承認雙方的交戰地位。但所有的大國並不如此，他們採取、和正式同意了不干涉政策。英國嚴格遵守了這個協議，但一方面意德兩國，另一方面蘇聯，始終違背他們的約定，將他們的力量加入了相對的戰團。德國甚至利用空軍，轟炸着無防衛力的尤尼加小市區，作可怕的試驗。

在五月中繼承佛蘭亭內閣白勒姆的政府，受到議院中支持他的共產黨的壓力，被迫以戰爭材料供給西班牙政府。航空部長哥脫對於其時已在衰弱狀態中的法國空軍實力，不大關心，却祕密以飛機和設備運交共和軍。對於這類發展，我很不安，我於是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寫信給法國大使考平：

在我想維持舊日形勢時遇到的最大困難之一，便是德國所提那種反共產黨國家應聯合起來的議論。我深信，如果法國將飛機之類送給現在的馬德里政府，而德國和意大利則從另一方面推進，那麼此間占優勢的力量將對德意發生好感，而和法國疏遠。我希望你不要爲了我如此寫而介意，我的如此寫，當然是完全是私人的發言。我不願聽到人民主張英國、德國和意大利應該聯合起來，以反抗歐洲的共產主義。這將是最壞的結果。

我相信嚴格實行中立；對於任何破壞中立的行爲，提出最強有力的抗議，是現在最正確最穩當的辦法。如果內戰雙方相持不下，那麼可能有一天國際聯盟會出而干涉，結束內戰恐怖。但即使這，也是很可疑的。

此外另有一樁事，這裏也應加以紀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各國駐柏林大使被請到德國外交部，由牛賴資宣布和日本政府談判的反共協定。協定的目的，爲採取一致行動以反對締約國境內或境外第三國際的活動。

在一九三六年全年中，全國和國會的焦慮日益加甚。尤以對於我們的空防爲甚。在十一月十二日關於議會致詞的辯論中，我嚴厲譴責鮑爾溫未能履行他的保證，即「這國家中的任何政府，尤其是一個舉國一致政府，即本政府，——將竭力做到使這個國家在空軍方面的實力，不弱於其射程足以及到我們海岸的任何國家。」我說，「政府祇是因爲不能下決心，或者是他們不能使其首相下決心，所以他們始終在這奇怪的矛盾之中，即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意志動搖，猶豫不定，以致非常有力的反而變成毫無作爲。所以我們繼續月復一月，年復一年的準備——這是爲保持英國偉大所寶貴的，也許是生命攸關的歲月——終將給蝗蟲一起吃掉。」

鮑爾溫先生回答我的演說，極堪注意，他說：

我要極其坦白的對下院發言……邱吉爾先生和我自己意見的不同是在一九三三年以後的幾年中發生的。在一九三二到三三年中，雖然反對黨未加承認，但這確是一個經濟危機的時期。此外還有一個理由。我希望促使下院注意的，即在我談到或竭力爲民主原則辯護時，我曾在不止一次的演說中，在幾個地方屢屢聲明，一個民主政治總常比獨裁要落後兩年。我相信這是不錯的。在此地的情形中尤其如此。

我願以慘澹的坦白之衷，將我自己的見解提出於全下院之前。你們可以記得，在那時裁軍會議正在日內瓦開會。你們可以記得，在那時這個國家中的非戰情緒也許比戰後任何時候爲強。你們可以記得，一九三三年秋季福爾罕姆選舉中，爲了非戰主義這一個問題，使全國一致政府所有的一席以七千票之差而喪失，……我做一個大政黨領袖的地位，完全不是一個舒適的地位。在福爾罕姆選舉中明白表示的情緒正充滿於全國之時，我曾自問，這種情緒在以後一二年之中，有什麼機會能突然轉變而主張國家應即重整軍備呢？假使我到民間去，說德國已在整軍，我們也必得整軍，恐怕任何人都知道這個非戰的民主國家在那時一定要嘲笑這呼聲吧？如果根據了我的想法，那我想我們在選舉中便非失敗不可。

這真是可驚的坦白，它裏面包含的赤裸裸的真相，達到不堪視聽的程度。一個首相公開直認他爲了怕選舉失敗而不盡他爲求國家安全的責任，真是我們國會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鮑爾溫的動機，當然並不是可恥的只求戀棧。在一九三六年時，事實上他曾切望能夠告退。他的政策是由於他恐怕工黨一旦執政以後，他們所能做的也許將還跟不上他的政府所想做的。工黨的宣告和投票反對設防，都有紀錄在案。但這不能作完全的辯護，對於英國人民的精神尤欠公平。上一年他因天真承認空軍均衡中估計的錯誤，曾得到成功，這一次並沒有重複。下院大受震驚。他演說所引起的印象惡劣不堪，假使沒有一件料不到的事發生於其間，對於鮑爾溫先生真將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在那時候他的身體亦日趨衰弱。

在這個時候，英國各黨各派的男男女女，看到了將來的危險，都羣趨一致，決心要採取實際方案以保持我們受兩面夾攻的安全和自由：一面是受極權的壓力；一方面是我們政府的顛覆。我們的計畫是迅速大規模的爲英國重整軍備，並完全接受和利用國際聯盟的權威。我稱這種政策做「整軍經武和擁護盟約」。鮑爾溫在下議院的行爲，我們都認爲不能滿意。這種不滿的頂點，促成了阿爾勃廳會議。十二月三日我們在那裏聚集了許多各黨的領袖人物——深信國家已在危險中的保守黨右翼；國際聯盟和平投票的領袖；許多大工會的代表，其中包括大罷工時代我的老對手薛脫林爵士；自由黨和其領袖辛克萊爵士。我們當時的感覺，不單以爲我們的見解即

將爲人所尊重，並以爲即將佔有優勢。正在此時，國王要和他所愛婦人結婚的熱情，使旁的一切又都丟在後面。遜位的危機跟着來了。

在我致詞答覆作謝時，有人喊起來：「上帝佑我王」；這一聲引起了很長的歡呼。在這興奮的場合下，我表明了我不個人的地位。

今天晚上籠罩在我們心頭的，另有一樁嚴重的事件。在幾分鐘後，我們將歌唱上帝保佑我王。我將用我前所未有的熱誠來唱這歌。我希望並祈禱不要在急促之間，遽下無可更改的決定，而應讓時間和輿論來表示其意見，不致使一個仁慈的獨一無二的人格，倉促的和他非常愛護的人民隔離。我希望在這些有關憲政的問題上，國會應被准許發揮其功能。我深信，我們的國王將尊重現在第一次由英國和英帝國表示的輿論的指導，而在英國人民方面，亦不要被人認爲對於王位占有人，一無寬大的考慮。

以後跟着來的簡短而劇烈的爭執，這裏毋庸詳述。愛德華八世國王在孩提時我就認識他，一九一〇年時我以內政大臣的身分，在卡那房堡盛大集會中宣立他爲威爾斯親王。所以我覺得有向他作最高度的個人効忠的義務。在夏季中我雖然明知所發生的事，但並沒有干預過他，也沒有在何時時進過過他。但現在在他患難之中，他請求鮑爾溫准許，和我諮商。鮑爾溫正式予以准許了，並通知了我，我立即到佩爾凡特爾堡進謁國王。直到他讓位以前，我和他始終保持連絡，我曾盡我的能力祈求國王和公眾雙方保持忍耐和等待。對於這，我絕無後悔——真的，我除此以外，沒有旁的辦法。

首相對於英國全國的情緒，證明他確是一個精明的裁判官。他無疑看出了並表現了全國的強烈意志。他對於遜位問題處理得當，在二星期中使他由深淵升到頂點。有幾次在盛怒的下議院之前，我似乎完全陷於孤立。我的行動，並沒有受到敵意情感的影響；但不止一次，我的意見幾乎沒有辦法使人聽到。我號召在「整軍經武，擁護盟約」下的一切力量，我原認爲是可以作一種原動力的，現在彼此分離了或解體了，而我自己與輿論上受着極大的打擊，大家幾乎一致承認我的政治生活終於完結了。奇怪的是，就是這一個會對我如此敵視的

下議院，竟能在漫長的，逆勢的戰爭幾年中，諦聽着我的引導，並支持着我，直到我們戰勝所有敵人時爲止！這真可以證明，唯一聰明而安全的方法，就是天天照着一個人良心的驅使而行動！

一個國王遜位了，我們又爲另外一個國王加冕，直到一九三七年五月底爲止，充滿在人們心中的是舉行全國效忠的儀式和鋪張，和國內及帝國各地對於新君主的奉聖。外交事務和我們的國防情形，一些也引不起公眾的興趣。我們的島國好像遠離着歐洲萬里之外。但我經呈准允許紀錄下來，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即加冕的翌日，我接到新國王一封親筆信：

我親愛的邱吉爾先生：

謝謝你給我的很客氣的信。我知道你對我哥哥過去和迄今保持的忠誠，自從他在十二月中離開我們後所發生的種種困難問題中，你所表示的同情和諒解，使我感動受到無法形諸言詞。我深知我受任國王後所應負的重大責任和憂慮，我收到了你的祝福信，感到無限的鼓勵，你是我國偉大政治家之一，你並曾忠心爲國服務。我唯有希望現在國內和帝國之內存在着的善意和希望，能作爲全世界各國的好模範。

你的真誠的喬治英王，英帝

三七年五月一八日於般克斯、溫沙，大園，皇舍

對於那時候勢力降落到零點的人，這種慷慨的表示，真是我生命中一種不可或忘的經驗。

喬治六世國王繼任加冕後，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鮑爾溫退休。他長期爲國家服務，受封伯爵及最高爵士勳章。他放下了他所積聚的和小心保持着的，但又極少加以利用的大權。他在公衆感謝和尊重的熱情中離職。張伯倫以財政大臣的身分，不單在過去五年中擔任政府中的主要工作，並且是最能幹和最活動的大臣，具有卓越的才幹和歷史上的名聲。我上一年曾在伯明罕引用莎士比亞的話，稱他爲「我們擔當大事件的馱馬，」他接受了這個比喻，認爲是對他的一種恭維。我不期望他會願意和我一起工作；在這個時候他如果做了，也是不聰明的。他和我對於當日主要問題的處理方面，意見大相逕庭。但這樣一個強有力的有資格的行政人才之能

當權，我極表歡迎。在他尙任財政大臣時，他曾作一個財政上的建議，要徵收小規模的國防捐，這個建議不爲保守黨所歡迎，當然更受到了反對黨的批評。在他初任首相職時，我對這個問題發表了一篇演說，幫他從一種難以維持的地位中抽身，而完全不損失他的尊嚴。我們的關係，不論在公的或私的方面，繼續保持着冷淡、隨便、客氣。

張伯倫沒有大調動政府的人員。他以前和柯柏先生關於陸軍部的意見，不能一致，但他現在請他擔任海軍部的重要職位，真使他大爲驚異。這個新海軍大臣以前曾在外交部辦事，首相對於他對歐洲舞台的看法，顯然不知道。而使我驚異的是，霍爾爵士正當獲使海軍計畫大大擴充時，竟願離開海軍部而改任內政大臣。霍爾似乎認爲在不久的將來，由人道立場來作監獄改良，將成爲一種時行的論題。他的家世既和著名的夫萊夫人（十九世紀英國著名慈善家及監獄改良者——譯者）有關係，所以他對於監獄改良有極強的個人感情。

我想在這裏對於這兩個首相卽鮑爾溫 and 張伯倫，加以比較的評價，後者我認識很久，在以前及在以後我並且都在他下面服務過。鮑爾溫是比較聰明，更富理解力的人，但他缺少詳細執行的才能。他不大接近外交和軍事。他對歐洲，所知極少，而且深恨他所知道的一點。他極熟悉英國的政黨政治，大體上他代表着我們島上民族許多的優點和許多的缺點。他以保守黨領袖的地位，在五次大選中競選而獲得了三次勝利。他有等待事件發展的天才，卽在極不利的批評下，保持鎮靜。他能非常巧妙的讓事件對他作有利的發展，他能夠抓住來臨的成熟時機。他使我想起了歷史上給我們的對於華爾坡爾爵士的印象，當然現在沒有那時十八世紀的腐敗；他們在英國政治上立於領導地位的時間，也幾乎同樣的長。

在另一方面張伯倫，是敏捷的，實際的，固執的，並且非常自信的。他和鮑爾溫不同，自以爲對於歐洲的全景，甚至對全世界都能夠了解。我們現在所有的，不復是模糊而極其根深蒂固的直覺，而是在他所深信的政策範圍之內，有了一種狹窄的鋒銳的效率。他在做財政大臣和做首相時一樣，對於軍事支出竭力加以嚴格的控

制。在這全時期內，他反對一切緊急措施最爲有力。他對於當時國內國外的政治人物，都有決定的判斷，他覺得他有辦法可以對付他們。他腦中充滿的希望，是要成爲一個偉大的和平締造者而名傳後世；爲達到這目的，他準備不顧事實而繼續努力，和使他個人和他的國家冒極大的危險。不幸的是，他跑進了他無法衡量其力量的洪流，碰到了他不肯退縮但他又無法抗衡的暴風。在戰爭前這最後的幾年中，如果我和他們一起工作，我想和我所知的鮑爾溫工作，應較和張伯倫一起工作爲容易；但他們兩人除直到最後外，都沒有和我一起工作的任何意願。

一九三七年有一天，我和德國駐英大使里賓特洛甫有過一次會談。在我二週一篇的文章中，我提到過他有些演說中的意思，爲人誤解了。當然我在公共場所中曾數度和他晤面過。他現在問我願否去看他，和他作一次會談。他在德國大使館樓上的一個大房間中接見我。我們的會談繼續了二小時以上。里賓特洛甫非常禮貌周到，我們縱談歐洲大局，軍備和政策方面都包括在內。他對我發表的要點，是德國需要英格蘭（在大陸上，我們仍被稱作英格蘭）的友誼。他說他是原應做德國的外交部長的，但他請求希特勒讓他到倫敦來，以便進行英德協約或甚至聯盟。德國將尊重英帝國的偉大和其範圍。他們也許要求恢復德國的殖民地，但這當然不是主要的。它必需達到的是，英國應讓德國在東歐可以自由行動。她必須爲其日漸增加的人民尋求生存空間。因此，波蘭和但澤走廊必須加以併吞。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是德聯邦共和國七千萬以上人民將來生活所不能或缺的。這是最底的限度。他所要求於英聯合共和國者，不過是不要干預。室內牆上掛着一張大地圖，大使幾度引我到圖旁，指證他的計畫。

在聽了這些話之後，我立即說我可以斷定英國政府決不會同意德國在東歐自由行動。我們和蘇聯的關係，的確很惡劣，我們和希特勒一樣憎恨共產主義，但他也許可以斷定，即使法國獲得了安全，英國對於大陸的命運決不會絕不關心到、主張任德國能在中歐和東歐方面獲得優勢的程度。我這樣說時，我們正站在地圖之前。

他於是說：「假使如此，戰爭是無法避免的了。這裏已沒有解決辦法。元首已下決心。沒有什麼能阻止他，沒有什麼能阻止我們。」我們於是回到了我們的坐椅。我祇是國會的一個議員，但有相當的地位。我想我應該向德國大使說——事實上我很記得我所說的話：「你講到戰爭，這當然是全面戰爭，你切不可低估了英國。她是一個奇異的國家，很少外國人能懂得她的心理。不要以現在執政的態度來判斷它。在一有大事發生在人民之前時，一切不能預料的行動會被就是這個政府和英國國家所採取。」我再重複說：「不要低估了英國。她是很聰明的。如果你使我們陷入另一次大戰中，它將和上次一樣，領導起全世界來反對你們。」說到這裏，大使激動地站起來，說，「啊，英格蘭可能很聰明，但這一次她不會領了全世界來反對德國。」我們的話題即轉向較輕鬆的話題，沒有什麼值得可記的。不過，這一樁事留在我的記憶中，我在當時報告外交部時，我並覺得有記入紀錄的必要。

當他在被勝利者審問他的生命時，里賓特洛甫對於這次會談，提出過一個歪曲的說法，並主張我應出庭作證。我上面所說的，是我如果被召時所將說的話。

第十三章 德國武裝了（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

「全部戰略目的」——德國軍備支出——獨立的調查——保守黨的代表團謁見首相——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我的陳述——一般的結論——我的恐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我們第二次會議——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斯溫登勛爵院離航空部——國會中的辯論——林特受重行參加空防研究委員會——我和達拉第的通信——法國對於德國空軍實力的估計——一九三八年六月我對於德國陸軍的估計——達拉第的同意——法國空軍的衰微——疏忽的島民

在戰爭中和在外交政策及其他事件中一樣，如能從許多引動人的或不愉快的各種情形抓住支配全局之點，往往可以得到許多利益。美國的軍事思想家曾創造了「全部戰略目的」這個名稱。我們的軍官第一次聽到這個名詞，祇置之一笑；但其後這名稱的高明，慢慢的爲人所明瞭，並爲一般所接受。顯然，這應該被視爲原則，其他的大事對牠應居於從屬的地位。如果不能遵守這個簡單的原理，必致發生混亂和徒勞無功的行爲，並且幾乎一定會使事件到後來更趨惡化。

就我個人而言，這個原則早在被宣布早以前，我便很容易的服膺信守了。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幾年間，我在戰爭中看到的和感覺到的可怕的德國，突然又重握了牠所有的軍力，而同盟各國，他們雖然得到了勉強的勝利，卻在逍遙迷茫，彷彿無主，這種印象使我的心神爲之不安。所以，我繼續以一切方法，一有機會即利用了我的力量，向下議院和各個大臣竭力主張推進我們軍事準備，並爲不久將來又將成爲我們共同的目標而尋求同盟和與國。

有一天，我有一個在政府中擔任非常機密事務的朋友到卻特威爾來和我一同游泳，這天日光明亮，池水相當溫和。我們儘是講着行將來到的戰爭，不過這戰爭的必然性他還不肯十分確信。在我送行時，他一時衝動，突然回過頭來對我說：「德國人一年化在軍備上的達到十億鎊」。我以爲國會和英國一般民衆都應知道這類事

實。我於是進而研究德國的財政情形。當時德國還有預算，並且每年公布；但從預算的許多數字中，極難發見其實況究屬如何。到一九三六年四月中，我私人發動了兩種審查的方法。第一種方法，靠了兩個非常能幹和同樣堅決的德國難民。他們懂得德國預算中一切數字的意義，馬克的價值等等。同時我請教我的朋友斯德拉可希爵士，究竟他有沒有辦法尋求實況。斯德拉可希是「聯合公司」的主持人，這家公司資金雄厚，並有非常能幹忠誠的職員。全公司裏的智力集中於這個問題者，達幾星期之久。結果他們提出了正確而又極詳盡的報告，說德國軍費支出每年當在十萬萬鎊左右。同時那兩位德國的難民用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方法，卻也得到了同一的結論。按照一九三六年幣值，十萬萬鎊一年！

因此我有了兩套可以據而提出公開主張的事實。所以我在辯論之前的一天，在議會應接室裏向當時仍是財政大臣的張伯倫先生說：「明天我要問你，德國在戰爭準備上每年化費十萬萬鎊，是否事實，我要請你證實或否認。」張伯倫說：「我不能否認，如果你提出，我將加以證實。」我引我的話如下：

根據德國官方的數字，一九三三年三月底到一九三五年六月底主要的支出如下：一九三三年近五十萬萬馬克；一九三四年近八十萬萬；到一九三五年近一百十萬萬——總共二百四十萬萬，或約二十萬萬鎊。試看這些數字，三年中的比率是五，八，和十一。這使你可以確切知道一個正常發展的軍火工業的進程。

我特地問財政大臣：

他是否知道，德國直接和間接用於軍事準備，包括戰略公路在內的支出，在一九三五年度內也許已達到八萬萬鎊；這種支出的速率，在本年度內是否仍將繼續。

張伯倫先生：政府沒有官方的數字，但從政府所有的情報中，我沒有理由以為我高貴的朋友在其問題中所提出的數字，對於任何一年中應認為過份，雖然像他自己會承認的，這裏面不能避免懸測的成分。

我用八萬萬的數字以代替十萬萬鎊，一方面掩護我的秘密情報，一方面也似乎比較穩當一些。

我用多種方法，想將英、德整軍的比較情形提出來。我在秘密會議中要求辯論，但被拒絕。「這將引起無謂的虛驚」。我的主張沒有受到支持。因為所有秘密會議，向來是新聞界所不參加的。後來，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我問首相他願否接見一個由樞密顧問官和少數能以所知事實提供給他的人所組成的代表團。薩里士伯里助爵主張上議院中也應該派出一個類似的代表團。首相同意了。雖然我會親自向艾德禮和辛克萊爵士請求參加，但工黨和自由黨都拒絕了。於是在七月二十八日，在下議院首相室中，我們由鮑爾溫、哈里法克斯公爵和殷斯基伯爵士接見。和我一道同行的保守黨和無黨無派名人有下列各位。奧斯汀·張伯倫爵士為我們介紹。

代表團

下議院

奧斯汀·張伯倫

邱吉爾

項恩爵士

阿梅萊

季爾摩爵士

蓋斯脫少校

凱斯上將

溫特敦伯爵

克洛夫特爵士

格里格爵士

華爾滿子爵

穆爾·勃拉巴桑中校

上議院

薩里士伯里侯爵

斐茲亞倫子爵

特倫查特子爵

魯易助爵

密爾恩助爵

奧尼爾爵士

這是一個偉大的時機。我在英國的公共生活中，想不起有過這種類似的情形。這一批完全沒有爲其個人利益着想，而將其一生致力於公共事務上的名人，他們代表着保守黨方面的意見，其力量不是輕易可以置諸不顧的。如果工黨和自由黨的領袖和我們一同來了，政治的情勢必將非常緊張，必致促成行動以謀有所補救。每隔一天，我們必開會一次，每次開會約占三四小時。我常常說鮑爾溫是一個很好的傾聽者。他注意傾聽，似感極大的興趣。和他在一起的有帝國國防委員會的委員。第一天，我用了一小時又一刻的時候開始陳述，其中有幾段引在卷一附錄丁中，對於當時情勢，有相當正確的說明。

我的結語如下：

第一，我們現在面對着我們歷史上最危險和緊急的時期。第二，除非和法國連絡，我們沒有希望來解決我們的問題。英國艦隊和法國軍隊聯合了，外加他們在法國和比利時邊境出發活動的聯合空軍，再加了英法所有的一切，也許能造成因而獲得拯救的警戒。無論如何，這是最好的希望。至於談到細節，我們必須去掉對於提高我們自己實力的任何阻礙。我們無法預防一切可能的危險。我們必須集中力量於關係重大的方面，而在旁的方面接受吃虧……再談到更具體的提議，我們必須竭力增加我們的空軍力量，使優先於其他一切的考慮。我們必須不惜代價，使我們的青年來駕駛飛機。不管應提出什麼誘導，我們必須由各方面，用各種方法來吸引青年。我們必須加速和簡化我們的飛機生產，使能達到最大的規模，並應毫不躊躇和美國或其他國家訂約以取得大量的航空材料和各式設備。我們正在危險之中，在以前所沒有達到的危險程度——不，即在潛水艇戰最高潮時（一九一七）也沒有如此……

這個思想困擾着我：時間很快的溜過去。如果我們再延不整理我們的防務，我們也許會受最強大的外力的干涉，不准完成這種任務了。

我們因爲財政大臣不能列席，大感失望。顯然鮑爾溫先生的健康不佳，各方都知道他不久即要設法退休。誰都明白誰將做他的繼承人，不幸的是張伯倫先生適在享受他應得的假期，以致沒有機會直接聽取由保守黨黨員方面提供的事實，在這代表團中有他的哥哥和他許多有價值的私人朋友。

關員們對於我們提出的重大提議，給予極熱切的注意，但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休會之後，鮑爾

溫纒邀請我們，聽取關於全問題一個比較考慮詳盡的說明。屆時殷斯基伯爵提出了一個坦白而有力的報告，其中他對於我們所遭形勢的嚴重，並不加以掩飾。在實質上，他以爲我們的估計，尤其是我的陳述，對於我們的前途太過悲觀；政府正在（事實上確在）努力以圖補救；但現在的情形還沒有使政府立即採取緊急措施的必要；這些措施的採取，結果必將紊亂國內全部的工業，引起普遍的驚慌，並且把缺點暴露出來，而在這些限度內可能辦到的一切，均正在進行之中。奧斯汀·張伯倫關於這一點，提出了我們一般的印象，即我們的焦慮並沒有消除和滿足。我們於是告辭。

我不能主張在這時候，即一九三六年的年底時，仍可能完全恢復舊觀。但如果盡了堅決的決定性的努力，至少可以、和應該做出很多的成就。當然這種努力的事實和證明，縱使對於希特勒不會有什麼影響，至少對於德國應有無可衡量的效果。但最主要的事實仍是，德國在空軍方面以及在軍火生產方面已經走在我們前面；即使我們承認我們的軍事需要較小，和我們也可以依靠法國和法國陸軍和空軍的幫助，我們還是落在後頭。我們已無力佔希特勒的先着或重獲空軍均勢。現在已沒有人能阻止德國陸軍和德國空軍成爲歐洲最強有力的了。用了非常的和緊張的努力，我們可能將我們的地位改進，但我們無法將牠完全治好。

這些使人喪氣的結論，政府沒有作嚴重的異議，無疑的影響了他們的外交政策；如果我們對張伯倫受任首相後，在慕尼黑危機前和危機中所作的決定，要加以任何評判，必須充分考慮到這種的結論。此時我祇是一名國會議員，並不負任何官方的責任。我竭力設法想激動政府，使其從事於熱切而非常的準備，即使引起全世界的驚慌，亦所不計。我在這樣的努力之中，無疑曾經把情形描畫得比實在更爲黑暗些。我的強調曾使對於我們感到痛苦的落後，和我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希望和希特勒決戰的意思，似乎頗有矛盾之嫌。但我仍相信應該以各種方法來刺激政府，我仍以爲在下面所要說明的各種情形之下，於一九三八年和希特勒作戰，實比我們最後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中不得不作戰時爲有利。關於這點，下面還有較詳的討論。

像我們前面已提到過的，張伯倫不久即繼鮑爾溫爲首相，我們現亦應進至一九三八年。斯溫登勛爵是一位極精明能幹的航空大臣，並且在一長時期內，他在內閣中有極大勢力，可以獲得必要的便利和經費。一般關於我們空防的焦慮，繼續增長，到五月達到了頂點。斯溫登勛爵所做的許多偉大有價值的擴充和改良，不能迅速的爲人所見，同時政府的整個政策，確也缺少魄力和緊急性。我繼續督促調查我們空軍計劃的實況，支持我的人日愈增加。斯溫登當時錯了一點，他接受了一個爵位成爲上院議員。他因此不能再在下院中爲他自己和爲他的部屬辯護。政府黨領袖所選擇的發言人，完全不能阻擋驚慌和不满的高潮。在一次最不幸的辯論以後，形勢顯然，航空大臣當時應該是在下議院中出席的。

一天早晨（五月十二日）在空防研究委員會中，我們——科學家、政治家、和官員們——正忙於研究技術問題時，航空大臣接到一張便條，請他到唐寧街去。他希望我們繼續討論，自己便立即走了。他一去不來。張伯倫已經把他免職了。

跟着在二十五日舉行的激辯中，我想把這位去職大臣的努力及能力，和一般人對於政府不滿的之處，加以區分：

最近所發生的事，影響到政府歷次文告的信用了，關於陸軍的情形，下院始終被欺騙着。首相自己也被欺騙着。他顯然一直被欺騙着到最後止。試看他在三月間發表的文告，他談到我們的軍備時：「英國人正在建立起來的這種偉大的、幾乎驚人的實力，對於世界的輿論，已發生了一種鎮靜的和穩定的效力。」

我常警告下院，我們的航空計劃已落人後。但我從沒有攻擊過斯溫登勛爵。我從沒有認爲他是應該受責備的一人——當然更不是唯一應受責備的人。批評政府的人，往往在被迫辭職的大臣身上找到以前所未經發見的美德。但我也許可以引述我在三個月以前說的話：「把造成我們這種弱點的責任，歸罪於任何一個大臣，或歸罪於斯溫登公爵，實在有欠公平，他代表着一種極端能幹，奮力以赴的努力精神，他竭盡他的能力以擴張我們的空軍力量；如果不爲預定計劃所限制，如果不爲同時發生其他有關事件所掩沒，那麼他一定可以有很光輝的成就。」

政府不能實現其對我們所作的諾言，其責任應由最近五年中亦即是應該從德國公然熱烈重整軍備之日起，統治和領導這島國的人們來

負擔，我決不想跟人之後對於斯溫登公爵落井下石。我今天很高興聽到首相對他的稱許，他當然值得我們的同情。他有首相的信任和友誼，他有國會中極大多數的支持；但他卻在這我認爲是空軍擴充過程中最困難的時候，被迫去職。在幾個月後，也許就可有相當數目的飛機會來了；但卻要他在這最黑暗的時期，負他的責任。我前幾天讀到偉大的馬爾波格公爵的一封信，其中他說：「戰役途中易換主將是致命的打擊。」

我轉而研究我們防務的其他方面：

我們現在正在公開重整軍備的第三年。如果一切都能順利進行，我們爲什麼還有如此許多的缺點？例如，爲什麼警衛團在操練時，不用機關鎗而還是用着旗幟？爲什麼我們小小的地方軍，還是如此的不健全？這是不是都照了時間表？我們的軍隊既如此之少，爲什麼我們的地方軍不能和正規軍同時配備起來？這對於英國的工業將祇是一種微不足道的工作，因爲英國工業除了軍火以外，不論在任何方面都較德國工業更容易適應需要，並更能大量生產。

前幾天有人詢問陸軍大臣關於高射砲的情形。他說，大戰時舊式的三吋口徑的砲，已改成新式，較爲新式的砲——事實上較爲新式的砲並不止一種——現在交貨已越過了預定計劃。但這預定計劃是怎樣的？如果你的預定計劃規定每月要交半打，十尊，一打，二十尊，或任何一定數量的砲，那末，這個預定計劃顯然可以很容易的達到，也很容易的超過。但這一類的預定計劃，和我們的實際需要是否能夠配合？一年以前，我曾從便下院注意當時公布的德國高射砲的進步情形——單單活動砲隊即有三十團，每團包括十二個中隊，總共約有砲一千二百到一千三百尊，此外定着的砲尙有三四十尊。這些都是新式的，不是一九一五年而是一九三三年以後製造出來的砲。

由這裏，下院也許可以得到一些規模如何之大的概念了吧？我們無需有像大陸國家那樣龐大的軍隊；但在空防方面，我們的情形和他們的完全相同。我們一樣的易受損害，也許比他們更容易受損。我們的政府以爲有了幾百尊高射砲便夠了，而德國現在所有的，應用幾千來計算。

我們現在對於海陸空軍三方面的生產，還是分開着考慮的。但在事實上和在真理上，現在所有軍隊中軍械的供應問題，已變成爲一個共同的關於技工、原料、廠房、機械、和工具的供給和分配問題。這個問題，必須有一個集中的控制機構，來加以綜合的、調和的、和經濟的處理。現在所有的祇是缺乏效率相疊杯架屋，這當然亦即是浪費。爲什麼英國的精巧飛機工業需要九萬人，而所生產的數額僅及德國一萬一千人生產的一半或三分之一？這不是一個反常的事實嗎？我們到現在還不能生產更多的飛機，真是令人不易置信。我們有了一隻普通的辦公桌，一塊空地、金錢和勞工，在十八個月中應該可以生產出許多的飛機；但現在鮑爾溫勳爵決定空軍應提高三倍時已經到第三十四個月了。

新航空大臣伍德爵士邀我仍參加空防研究委員會。天空現在變得更爲黑暗，我覺得非常需要林特曼對於技術方面的解釋，和他的意見和幫助。我於是寫信給他，說：除非他和我一同參加，我將不願繼續。經過幕後一再交涉以後，林特曼加入了主要委員會，我們於是恢復我們的聯合工作。

直到一九四〇年六月的休戰日爲止，不論在和平時或在戰時，在個人的地位或在政府領袖的地位，我和法國常在調換的國務總理以及其許多主要的部長，始終保持極密切的關係。我極希望要知道德國重整軍備的真相，並想以他們的估計來和我自己的互相比照。我於是寫信給我自己所熟識的達拉第。

邱吉爾致達拉第函

一九三八年五月三日

你的前任者白勒姆和佛蘭亭曾將法國對於近年來某一時期德國空軍實力的估計，很客氣的給我參考。你如果能將你現在的見解告訴我，我真將感激不盡。我有幾方面來的情報，以前經證明極爲可靠，但我仍希望有一個獨立性的情報來和我的互相對證。

你到這裏來訪問，如此成功，我很高興。我希望參謀部方面的佈置現在都能完成，我曾向我們的大臣堅決主張這種佈置的需

要。

在回信中，達拉第送給我一長達十七頁的文件，上面註明日期爲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這是「法國空軍參謀部精密考慮的結果」。我將這重要的文件給有關各部的朋友們傳看，他們加以詳細研究後回答說：「在各方面，這和英國空軍參謀部根據自己的情報而形成的獨立意見，完全相同。」法國人對於德國空軍規模大小的估計，略較英國的爲高。六月初，已有相當多的權威方面的意見做根據，我寫信給達拉第。

邱爾吉致達拉第

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

我從法國陸軍武官那裏收到了你的寶貴的情報，十分感激。我利用這情報時，一定要極端審慎，並專爲了我們的共同利益設想，可請勿念。

對於現在德國空軍實力的一般估計，和我私人得到的意見完全相同。但我以爲德國飛機工業所生產的飛機數量似應略較估計爲高，現

在所提出的數字係指確經提交德國空軍的軍事飛機，其他出口的和給佛朗哥將軍的都沒有包括在內。在到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時，德國的空軍可能將有三百分隊，到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時，達四百分隊。

我也亟於將我自己對於德國陸軍的估計和我從英國其他方面來的估計互相對照。我因此又加了下面的一段：

我冒昧附上一個短簡，其中有我從各方面得到關於德國陸軍現在和將來實力的情報。我如能知道這在大體上是不是和你們的估計相合，對我將有不少方便。如以為我有錯誤的地方，祇要將數字以鉛筆註出即可。

附簡

至今日，即六月一日止，德國陸軍有三十六個正規師，和四個裝甲師，全部都是戰時編制。非裝甲的各師正在迅速擴充，使其力量可以擴大三倍，現在的力量已有二倍。現有的砲隊顯不足配備七十個以上的師，全軍的軍官更是缺乏。但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我們決不能希望牠少於五十六個師加四個裝甲師，亦即等於六十個武裝配備完全的師的組織。在這後面還有人力約相當於三十六個師的經過訓練的後備軍，其簡單的組織已經制定，如果接受較正規軍中標準較低的一部份，即可有現成的設備，輕軍器和少數的砲隊交給他們應用，與地利的人力還沒有計算在內。根據最低限度估計，它能供給十二個師，他們的武器，可以由德國軍火工業的總庫中取用。此外還有許多沒有軍人身份的人和組織，如邊防隊、後備軍之類，他們是比較不完全武裝的。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八日達拉第復信：

我五月十六日信中給你的情報和你的相合，我覺得極為愉快。

你六月六日信中附短簡中關於德國陸軍的一切事實，我完全同意。但應指出的是，在德國確可應用的三十六個普通師中，有四個師已完全摩托化，還有兩個師正在加以摩托化。

事實上，按照我們在戰後由德國方面得到的情報，上述一九三八年夏季德國陸軍的縮形，異常正確，由一個私人而能得如此結果，實極難得。這顯出在我長時期為英國重整軍備的奮鬥中，我所得到的情報，並非是言之無物的胡鬧。

以前曾有幾處提到過法國的空軍。有一時期，它比我們大二倍，而德國當時是完全不許有空軍的。直到一九三三年爲止，法國在歐洲空軍中佔很高的地位，但就在希特勒當權的一年，法國對於空軍，不幸開始缺少興趣和支持，金錢捨不得花了；工廠的生產力一任其萎縮；現代的新型飛機亦沒有加以發展。法國四十小時一星期的工作，其出產量是決不能和在戰時狀態下竭力工作的德國相比的。這些情形的發生，和前面曾詳加說明的英國失掉空軍均勢，大約在同一時候。事實上，西方同盟國家，是有權建立他們認爲安全所必需的空軍的，但他們忽視了這重要的武器，而爲條約禁止建造的德國，卻將牠做成他們外交和最後進攻的利器。

一九三六年和其後的法國「人民陣線」政府，採取了許多重要方案，使法國陸軍和海軍完成作戰準備。但在空軍方面，並無相當的努力。有一張醜惡的圖解（註明白顯出法國空軍實力的線條向下，和德國始終向上的線條，在一九三五年時兩線成爲交叉。直到一九三八年香勃萊受任航空部長時，纔採取有力的步驟，復興法國的空軍。但這時已祇剩十八個月了。法國當然沒有辦法能阻止德國軍隊年復一年的發展成熟，並因此追及了他們自己的軍隊。但他們的空軍竟棄諸道旁，無人注意，却是很可驚詫的事。對於友國及盟邦的關員，我無權爲之分派責任，或加以非難。但當法國在尋覓他們的「罪魁」時，在這一方面似乎很可探究。

英國整個的國家和他們新選舉的國會，因逐漸感到德國的和後來德、意的恫嚇而精神逐漸興奮。他們現在願意、甚至極盼望採取任何步驟，這種步驟如果早在二三年前採用了，也許可以使他們將來的困難得以避免。但他們的情緒雖已有改進，他們反對者的力量和他們工作的困難也在同時增加。許多人說在我們忍辱交出萊因地後，除了戰爭外已沒有東西可以停止希特勒。這也許真是以後世代人的判詞。但有許多事實是應該可以做而沒有做，應該可以使我们準備得更好，從而減輕我們危險的。對於未能發生的情形，誰能說些什麼呢？

第十四章 外交大臣艾登和他的辭職

外交大臣和首相——艾登和張伯倫——文西泰爵士——關於西班牙問題我和外相的接觸——尼翁會議——我們的通信——英國的成功
首相與外相的齟齬——哈里法克斯勳爵赴德訪問希特勒——我謝卻了邀請——艾登自感孤立——羅斯福總統的提議——首相的答覆——總統遭到拒絕深表失望——張伯倫所負的嚴重責任——爲羅馬談話問題艾登與張伯倫發生最後決裂——卻特威爾的失眠之夜

在英國的內閣中，外交大臣佔有特殊的地位。他在他高級負責的部內，受僚屬顯著的尊敬，但在他執行事務之時，往往受整個內閣、或至少受內閣中主要分子的審查。他並不負以消息通知他們的義務。他照習慣和向例，把所有他的公事電報、駐外使節人員的報告，和他與外國使節或其他顯要人物的談話記錄，傳告他的同僚。這至少在我參加內閣的經驗中是如此的。這種審核，特別由首相保持，他親自或通過內閣，統制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針，具有支配的大權。至少對他是不能有祕密可言的，任何外交大臣如不能經常獲得他長官的支持，即無法進行工作。爲使做事順利起見，首相和外相兩人之間不單對根本的原則，須有一致的見解，就是在看法、甚至相當範圍內在氣質方面，也要沆瀣一氣。如果遇到對外交問題特別注意的首相，尤其有這樣的情形。艾登是鮑爾溫任內的外交大臣。鮑爾溫除了以愛好和平恬靜的生活著名之外，並不積極干與外交政策。反之，張伯倫對許多部門都想實施一種專斷的統制。他對外交問題抱有堅強的見解，並一開始便申明他有與外國使節討論外交問題的當然權利。因之他的就首相一職，影響所及，使外相的地位發生了一種微妙而看得出的變化。

在此以外，兩人在精神和見解方面又有一種深切的、雖然在先是潛伏着的差別。首相希望和歐洲那兩位獨裁者保持友誼，而且相信最好的方法是和他們妥協，避免任何可以得罪他們的東西。反之艾登過去在日內瓦，因爲號召各國共起反對獨裁者之一，獲得聲名；當時如果能獨行其意，大概一定已經把制裁行動推到或超越

戰爭的邊緣了。他是英法協約的忠實信徒。他剛曾堅持過兩國「參謀本部舉行談話」。他亟於和蘇聯成立更爲親密的關係；他感覺到和惴惴於希特勒的危險。他對於我們軍備的弱點以及其對外交問題的反響，慄慄不安。我和他兩個人的見解，自然除了他是負責之身以外，幾乎可說沒有多大的出入。因此一開頭我就看出，如果世界大局更爲惡化，這兩個重要閣揆之間的爭執，即大有發生的可能。

此外首相在同僚中，有一位對於他的外交見解，似乎頗表同感和甚爲信仰的人，那就是哈里法克斯勳爵。我和哈里法克斯長久親密的關係，是自一九二二年起開始的，那時在勞合喬治首相時代，他擔任我殖民部的次長，政治上的異見，始終沒有破壞我們個人之間的關係，雖則對他在印度總督任內的政策，曾發生過非常嚴重和長久的爭論。我相信對他瞭解甚深，我斷言在我們之間有一條鴻溝，而且我也感覺到，在他和艾登之間，也同樣有這一條鴻溝或類似的東西。大體而論，如果張伯倫於組閣之初，便任命哈里法克斯爲外交大臣，那要聰明多了。如由艾登擔任海軍部或陸軍部的職務，可能更爲適當得多，而首相在外交部方面也早可以有一個氣味相投的自己人了。這種不吉的形勢，在艾登和張伯倫合作期內，不斷的滋長發展。

直至此時止和許多令人焦慮不安的年內，文西泰爵士爲外交部的正式領袖。他和霍爾、賴伐爾公約之發生意外的關聯，影響了他對新外相艾登和對一般政界人士的地位。此時首相越來越信賴他的主要經濟顧問衛爾遜爵士，遇事同他商量，有許多問題都是出乎他範圍和理解能力之外的。首相認文西泰是反德人物。事實上確也如此，因爲沒有人比他更明白瞭解或預料到德國威脅的發展，沒有人比他更願意爲了應付德國的威脅，把其他一切作爲次要的考慮。外相覺得他和賈德幹爵士一起工作比較可以得心應手，賈德幹也是一位操守能力都高的外交部官員。因此到一九三七年底，文西泰獲悉即將被黜，至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他被任爲「政府首席外交顧問」的特任職。這個新名義在於使公衆認爲是一種陞職，而且實在也許很像陞職的光景。但實際上管理外交部的整個責任，不再歸他掌握了。他仍舊保持舊有的那一間辦公室，但外交部的電文現在須連同該部詳細的備忘

錄先行呈送外相後，纔由他過目。文西泰拒絕出任駐巴黎大使，在相當時期內繼續處於這種離羣獨處的地位。

自一九三七年夏季至該年年底，首相與他外相之間關於方法和目標上的異議，逐漸增長。促成一九三八年二月艾登提出辭職的事件次序，是遵循邏輯的路徑發生的。

最初的爭執點，是由我們與德國和意大利的關係而起的。張伯倫決定與兩個獨裁者進行他的折衝。一九三七年七月他邀請意大利大使格倫底至唐寧街首相官邸。艾登獲悉談話的舉行，但未獲參加。在談話中，張伯倫說起他希望改善英意的關係。格倫底伯爵向他提議，如果由首相寫封信給墨索里尼作個人的呼籲，作為初步舉動，對局勢一定有所裨補。張伯倫坐下來，就在談話中寫了這樣的一封信。信發出之時，並沒有通知正在僅有幾碼外外交部內辦公的外交大臣。這封信沒有產生明顯的結果，兩國的關係，因為意大利擴大對西班牙的干涉，反日益趨於惡化。

張伯倫自覺負一種與意德獨裁者成立友善關係的個人的和特殊的使命，而且他認為具有造成這種新關係的能力。對墨索里尼，他願意答應承認意大利的征服阿比西尼亞，作為一般解決兩國間糾紛的初步。對希特勒，他準備對殖民地問題方面提出讓步。同時，他不願以彰明較著的方式，考慮英國軍備狀況的改善，或在參謀本部以及在政治方面與法國密切合作的必要。反之艾登深信如果與意大利成立任何的協定，必須作為包括西班牙問題在內的地中海一般解決的一部分，而且事先須取得法國的密切諒解。在談判這種一般性的解決時，承認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地位，顯然可成為討價還價的一個重要條件。在外相的眼中看來，事先便把這個條件丟掉，和露出亟於着手談判，實屬不智之舉。

到了一九三七年夏季，這種異見變成更為嚴重。張伯倫認為外交部正在阻撓他的與德意進行談判的嘗試，而艾登則認為他的長官在求與獨裁者接近中，尤其在英國軍備十分薄弱的目前，正在表顯逾越常軌的操切。在兩人的見解中，實在有一種深刻的實際和心理方面的衝突。

不管我對政府的種種爭執，我對外相抱密切的同情。在我看來，他似乎是政府中最堅決和勇敢的人物；雖然他過去在任外交大臣私人秘書和後來次長任內，曾經委曲遷就過我曾攻擊和迄今仍在抨斥的許多東西，但我確實感覺到他的本心是不錯的，他本身掌握住問題的根蒂。在他一方面，他邀我出席外交部的宴會，我們有信札的自由來往。自然這種行為並無不合之處，照成立已久的先例，外交大臣一向慣於與當時政治上的顯要人物，保持接觸，商量所有廣泛的國際問題，艾登不過是繼踵前人罷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我寫信給他：

西班牙問題切斷了我們的思想。在我看來，當前最重要的，就是使白勒姆保持和我們嚴守中立，即使德意繼續支持叛軍，和蘇聯以金錢供給政府，仍是如此。如果法國政府幫助一方面反對叛軍，那就將成為德國人和親德分子的天賜良機。如果你有餘閒，請讀我在星期一標準晚報上所發表的文章。

在這篇文章內，我寫着：

在雙方都對和雙方都錯之時，纔發生最壞的爭執。在此處，一方面一個貧窮和落後的無產階級的熱情，要求推翻教會、國家、和財政制度，創立一個共產主義的統治。另一方面，在陸軍的領導之下，愛國的、宗教的、和資產階級的勢力，得到許多省內農民的支持，正在邁進，由建立軍事的獨裁而恢復秩序。雙方因破釜沉舟而採取的殘酷行為和無情的殺人，其所觸發的令人寒心的仇恨心理，信仰與利益的衝突，使任何一方勝利以後，接着大概一定會發生把失敗者中的活動分子，予以無情的一網打盡的情形，和成立長期的專制統治。

至一九三七年秋季，我和艾登關於軸心國積極干與西班牙內戰一事，由多少有點不同的步驟，而達到同一的立場。只要他採取堅決的行動，即使行動的規模極小，我在下院中總是支持他的。我很知道他的內閣中若干高級同僚以及和他長官之間所發生的摩擦，如果他不受掣肘，他一定可以作更為勇敢的行動。八月底在坎城，我們有多次見面，有一天我假坎城與尼斯中途的一家飯店，請他和勞合喬治吃飯，我們的談話涉及整個的問題——西班牙的衝突，墨索里尼一貫的背信和干與西班牙內戰，最後自然談到德國勢力日大的黑暗背景。我認為對於以上三事，我們意見大致相同。外相對於他和他長官及同僚的關係，自然諱莫如深，在談話中沒有提到這

個微妙的問題。他的行徑可說再妥當沒有了。不過，我斷言，他在他偉大的部內並不是一個快樂的人。

不久地中海方面發生了一個緊張形勢。他以堅決而巧妙的手腕處理這個危機，所以終於獲得解決，解決的方式可爲我們所取的路徑增光。先是，有一隊商船爲所謂西班牙的潛艇擊沉了。實際上這些潛艇無疑不是西班牙而是意大利的。這是絕對的海盜行爲，並使知道這件事的人奮起採取行動。九月十日地中海上列強在尼翁舉行會議，外相由文西泰與首席海軍大臣謝特斐爾特偕行出席。

邱吉爾致艾登

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

在你最後一封信中，說你極願在去日內瓦以前，與勞合喬治和我見面一次。今天我們已經見過，茲提出我們的見解，以供尊覽。

現在是督促意大利重行遵守它國際義務的時候了。地中海上的潛艇海盜行爲，以及絕不考慮船員的生命安全，擊沉許多國家商船的暴行必須予以制止。爲這個目標起見，所有地中海上列強應該同意，把他們自己的潛水艇，離開若干規定的商航航線。在這些航線內應由英法的海軍，負責搜索所有潛水艇，如果偵察器發現任何潛艇，即應視爲海盜，加以追擊轟沉。我們應以最客氣的方式請意大利參加，不過如果它提出拒絕，那就應該告訴它，『這就是我們預備要做的』。

同時，鑒於意大利友善合作的極端重要，法國應聲明如意大利不參加協定，它即將開放庇里尼斯法西邊境，准許各種武器的輸入。這樣一來，意大利即將面對：一方面在地中海航路上的潛艇騷擾，不管如何終將被肅清，同時另一方面，如果他拒不參加，則因爲法國即將重行開放邊界，亦將無利可圖。我們認爲這一點最關重要。這種使意大利加入地中海其他國家的聯合壓力，再加上拒絕參加後貽禍甚大而無利可圖的事實，只要墨索里尼知道英法的確具有認真決心，幾乎一定可以收效。

一般人不相信德國準備在本年內來發動一次大戰，如果希特勒和意大利在今後建立良好的關係，則現在就須把問題解決。現在我們所遭遇的危險，就是墨索里尼認爲敵詐和威嚇可以取得一切，和相信最後我們只會說說空話，終將不免退出。爲歐洲和平利益計，現在應該表現堅強的一致陣線了，如果你覺得能夠作這樣的努力，則我們願意向你保證，不問情勢發生如何變化，在下院中和在全國我們一定擁護這樣的政策。

就私人而言，你以前爲了萊因地條款遭過破壞，主張和法國舉行參謀人員會議，我覺得你現在又到了同樣的重要關頭了。勇敢的路，也就是安全的路。

請你任意在私人或對公眾利用這封信，祇要你覺得這有助於英國的利益與和平的利益。

附註：這封信我會讀給勞合喬治聽，他對信內所述，完全同意。

尼翁會議是簡短而成功的。會議中同意成立英美聯合巡邏，防止潛艇的騷擾，其所奉的命令，對於可能遭到的任何潛艇命運如何，極爲明白。意大利也同意了這種規定，而海上的暴行立刻終止。

艾登致邱吉爾函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

你現在也許已經看到我們在尼翁會議中所採取的方針，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與你信中所提者相合的。我希望你同意承認會議結果的圓滿。在此地看來似乎如此。我們在會議中，強調英法間合作是可以實施的，和西歐兩民主國仍可在歐洲問題中占決定性的地位，這是真正重要的政治事實。我們最後所同意的計劃，是我們自己同法國人共同完成的。我必須說，他們不能再有更精誠的合作了，他們準備就緒預備提出的海軍合作，其範圍之廣遠，使我感到詫異。現在可以公平的說，如果把他們在空中方面的援助包括在內，我們即將根據一半一半的方式而行動。

我同意我們在會議中的成就，僅僅討論到西班牙問題的一方面。但它大大增加了我們在列國之間的威信，而現在正是我們非常需要這種威信增加的時代。地中海海上各小國的態度，也同樣的可以滿意。他們在土耳其的幾乎肝膽相照的友善領導之下，有很高明的表現。謝特爾特同每一個人接觸，都收極大的成功。我感覺到，尼翁會議正因為它的簡短和成功，對恢復我們在地圖上的地位，已有相當的貢獻。我希望這也許就是你的觀感。

至少它已經鼓勵了法國人和我們自己，去同心協力處理我們非常艱鉅的工作。

邱吉爾致艾登函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日

承你好意在百忙之中寫信給我。關於這一次極大的成就，實在我應該向你道賀。能用嚴峻而有力的措置，使一個怙惡不悛之徒就範而不至引起戰爭的危險，是難得的機會。我相信下院對於會議的結果，一定極爲滿意。

我很高興知道尼維爾（張伯倫——譯者）曾經支持你，而非如流行報紙所稱，在背後掣你的肘。我希望，你將堅決保持你已經獲得的利益。墨索里尼祇懂得優越的武力，正好比他現在在地中海上所遇到的一樣。在那一方面的整個海軍形勢，從我們可以利用法國根據地起，已經煥然改觀。意大利勢不能抵抗英法有力的聯合。因此我希望讓因自貽伊戚而墮入外交窘境之墨索里尼，自己去尋找出路。爲了無可攻擊的目標，例如在地中海上發生的情形，而造成反對他的結局，原是他第一樣應該盡力以求避免發生的東西。但他已經促成了反對他的局面。我希望現在開始了的英法海軍合作，將無限期的維持下去，兩國的海軍空軍互相利用彼此的設備。爲防止因巴里阿利羣島而發生的糾紛，將需要英法的合作。意大利之繼續在地中海設防，反對我們，這是對大英帝國的一個重大危險，將待將來加以處置。現在的部署越變得永久化，則這種局面裏所含有的危險性也越減少。

巴洛電告，他正在記下他和總統談話的結果（在我們倫敦談話之後）。我認爲總統的反對總裁者的演說，無疑會大大受到我們談話的影響，我深信關於關稅和通貨的基礎問題，也正在試探之中。

謝謝你九月二十日的來信，也謝謝你關於尼翁會議的獎飾之詞，使我心感無已。我認爲你關於尼翁會議局勢的結語，『能用嚴峻而有力的措置，使一個怙惡不悛之徒就範而不至引起戰爭的危機，是難得有的機會，』已經對局面作了充分的說明。墨索里尼已經不智到逾越他的限度，他必須受他的懲罰。八十艘英法驅逐艦再加上強有力的大隊飛機，在地中海上巡邏的壯觀，無疑使歐洲的輿論發生了一種深刻的印象。從我所獲的報告，德國自己也並不落後而注意到這個事實。我們能在已經迫於情勢而不得不常採守勢的是年秋季，以這種方法來擁護我們彼此的地位，這使我和台爾博斯（法國外長——譯者）同有如釋重負之感。在我們前面，困難還多的有，而且在軍事上說，自然也還絕沒有達到如我所希望的強大程度，但尼翁會議已使我們得以改善我們的地位，和取得較多的時間。

你對於我們現在地中海方面創立的英法合作的重視，我也衷心同意。整個的法國態度，與賴伐爾執政時代的流行態度，自然根本不同。法國海軍參謀部已經盡臂助的能事，他們真正作了一大努力，對於聯合武力作了一重要的貢獻。我斷言，我們的海軍總司令已有印象。此外你所提到的關於互相利用基地的利益，是極有價值的。意大利的參加，不管其最後的形式如何，也將不能影響局勢的實在情形。

尼翁會議雖是一件節外生枝的事件，但也證明英法的聯合勢力，如果表現時具有信心和準備不辭使用武力，對於獨裁者的心理和政策可以發生何等強烈的影響。在這個階段中，誠然不能說這種政策一定可以阻止戰爭發生，也許它可以很容易使戰爭延遲發生。事實顯然，一方面各種形式的「綏靖政策」祇鼓勵了侵略，和增加了獨裁者對他們本國人民的威權，而另一方面，每當西方國家有任何兵來將擋的強硬表示，緊張的時局立即緩和化。這個法則通行於整個一九三七年，自該年以後，局面和情勢又迥然改觀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我被邀參加外交部招待南斯拉夫總理斯多雅狄諾維區的公宴。後來，在我們都站起和我與艾登閒談之時，哈里法克斯勳爵跑進來，以興奮的口氣說他接到戈林的邀請，請他赴德打獵，他一定可望藉此和希特勒見面。他說他已經和首相談起此事，首相認爲這是一件極好的事，所以已經接受。我覺得艾登聽見之後，頗表詫異，和感到不愉；但一切都在愉快的空氣中過去了。因此，哈里法克斯即以「獵狐社長」的資格訪德。納粹的報紙歡迎他，稱他爲「哈拉里法克斯勳爵」，「哈拉里」是歐洲國家行獵時的呼聲。經過幾

次出獵款待以後，他實際上終於被邀請至柏轍斯迦登，和元首作非正式和沒有大事鋪張的見面。這次的晤首並不順利，一個人很難設想出兩個人，比他們兩個更難互相瞭解的。一個是約克廈高級教會出身的貴族和熱烈的愛好和平的人，在英國舊式生活的和煦善意之下長成，曾以良好軍官的身分參加過戰爭，而他所晤面的對方，卻是窮苦深淵中出身的梟雄，受失敗的煽動，沉浸於妬忌和報復的心理，因從事於計劃使德國種族成爲歐洲或者全世界的主宰，十分激動。會面除了嘔舌和惶惑外一無結果。

在此處也許可以一提的，里賓特洛甫曾經兩度邀請我訪問希特勒。很久以前，我於一九〇七年和一九〇九年計兩次，分別以殖民部次長和牛津廈義勇騎兵隊少校身分，赴德參觀演習，爲德王的貴賓。但現在又是一番氣象了。劇烈的鬪爭正在進行之中，在鬪爭中我有我的崗位。如果我有英國全國的力量作我後盾，我或者很樂於和希特勒見面。但以我個人而言，見面之舉，一定會使我以及我的國家處於不利的地位。如果我必須對獨裁者主人表示同意，我將成爲欺騙；如果我表示異議，我一定會使他生氣，和或早已被控爲破壞英德的關係。因此我對兩次邀請都謝絕了，或者可以讓它自然推諉過去了。在這些年中，所有曾訪問過德國元首的人，都弄得忸怩不安或者自貽伊戚。沒有人比勞合喬治受到更澈底的欺騙，他的關於談話經過情形的興高采烈的敘述，今日讀來頗有奇特之感。無疑希特勒有一種魅惑人的力量，每易於使旅客對他生出權力和威嚴之感。除非能平等相待，否則以敬而遠之爲妙。

在十一月內艾登對我們軍備擴充的遲緩，越來越感焦慮。十一日他和首相有過一次談話，設法表達出他的疑懼。張伯倫等一會後，拒絕聽他說話，告訴他：「回去，吃一顆阿斯匹靈。」哈里法克斯由柏林返國後，他報告說希特勒告訴過他，殖民地是英德之間的唯一有待解決的懸案。他相信德國人並不急急，目前沒有立即舉行和平談判之望。他的結論是消極的，他的態度是被動的。

一九三八年二月外相自己感到在內閣中，幾乎處於孤立的地位。首相得強有力的支持，反對他和反對他的見解。有整個一批重要的閣員，都認為外交部的政策太危險了，甚至有挑釁的性質。反之，有許多較為年輕的閣員極願去瞭解他的觀點，其中有些人後來曾表示不滿，說他沒有對他們推心置腹。不過他絕沒有打算組織小團體反對他領袖一類事。參謀本部的首長也不能給他什麼援助，實際他們也勸告慎重，和討論到局勢的危險性。他們不願和法國人過分的接近，以免接受超乎我們力量能及之外的義務。他們對於清黨以後蘇聯的軍力，持黯澹的見解。他們相信在處理我們的問題時，必須假定我們的三個敵人德、意、日，可能聯合向我們進攻，和很少國家會幫助我們。我們可以利用法國的空中根據地，但我們不能立即派出大軍。即使這種極溫和的提議，在內閣中也將遭到強大的抵抗。

但真正的決裂，是因一個新的和另外的問題而起的。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晚，美國副國務卿韋爾斯，訪問在華盛頓的英國駐美大使。他是傳達羅斯福總統給張伯倫一個密件的信使。總統對於國際時局的日益惡化深為焦慮，提議發動邀請若干政府的代表到華盛頓，來討論目前糾紛的根本原因。不過在他採取這一步驟之前，他願意和英國政府諮商，聽取他們關於這個計劃的見解，並且規定不把這個提議的性質和事實，通知任何其他政府。他請求英國政府至遲須於一月十七日前對他的信提出答覆，而且說明他的提議祇有得『英國政府熱誠的贊助和全心的支持』後，他再向法國德國和意大利政府接洽。這是一個重大而無從衡量的步驟。

英國大使林特賽爵士在把這個最機密的文件送交倫敦時，附加意見稱：按照他個人的見解，總統的計劃，確實是滅除國際緊張狀態的一種真正努力，如果英國政府不與支持，則過去兩年來英美合作方面的進展情形，將全功盡棄。他用最真摯的方式促請英國政府接受這個提議。外交部於十二日收到這個電文，當晚即抄錄後送達在鄉間的首相。第二天早晨，首相回到倫敦，根據他的訓令發出了一個覆電。此時艾登正在法國南部作短期的休假。張伯倫的覆電內容，稱他很感激羅斯福總統的信託，用這種方式來和他商量總統提議的解除歐洲緊張

狀況的計劃，但他願意說明他自己和德意努力獲取協定的立場，特別是對意大利方面。『英國政府就其本身而言，如果發現意大利證明願意對恢復信任和友善關係有所貢獻，我們願意對意大利的佔領阿比西尼亞，作法理的承認，並且如果許可，將取得國際聯盟的核准。』電文中續稱，首相提出了這些事實以後，總統即可考慮他現在這個提議，是否抵觸英國的努力。因此，暫緩提出美國的計劃是否比較高明？

總統收到這個答覆時，感到相當的失望。他表示他將於一月十七日寫給張伯倫一封覆信。一月十五日晚外相回到英國。他不是由他的長官、而是由外交部內對他忠實的信徒催促返國，他的長官覺得他不在時，反可放手行事。小心謹慎的賈德幹，在多維爾碼頭候他。艾登曾經作了長期的和艱苦的努力，以求促進英美的關係，聽到消息後極度不安。他立刻拍了一個電報給林特賽爵士，以圖減除張伯倫的冷淡答覆的影響。總統的信於十八日晨抵達倫敦。信內稱鑒於英國政府正在考慮直接的談判，他同意延緩提出他的計劃，但他又說，英國政府稱擬予承認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地位，使他感到嚴重關切。他認為這種承認，對於日本在遠東的政策和對於美國的輿論，一定會發生最有害的影響。國務卿赫爾把這封信交給華盛頓英國大使時，說得更為強調。他說『這種承認將引起一種惡感，和復活與增加所有深恐上當的心理；它將被認為是在歐洲方面的惡劣交易，而以與美國有密切關係的遠東方面的利益為犧牲。』

總統的函件，在內閣的外交委員會許多次會議中都被提出討論。艾登卒能做到把以前的態度，作重大的修正。大部分的閣員認為他已經獲得滿意，他沒有向他們明白表示並非如此。在這種討論之後，於一月二十一日之夜向華盛頓發出了兩件公函。這種答覆的內容，稱首相對於總統的創議，熱烈歡迎，但如果美國的提案發生不良的反響，他不願分負失敗的責任。張伯倫願意指出，我們並沒有完全無保留的接受總統所提議的程序，這種程序顯然將同樣刺激歐洲的獨裁者和日本。英國政府也覺得總統沒有充分瞭解我們對於法理承認問題的立場。我們的原意，答應承認，祇是對意大利作一般性解決的一部分。

英國大使向政府報告一月二十二日把這些文件遞交總統時他和韋爾斯的談話。他說韋爾斯告訴他，『總統

認爲承認問題是一顆兩國非吞下去不可的苦丸，他希望我們應該一起吞下。」

羅斯福總統的提議，原在利用美國的勢力促使主要的歐洲國家共聚一堂，討論一般解決的可能性；這自然將使美國宏偉的力量參加在內，不管如何的帶試驗性質。這個提議就這樣的爲張伯倫拒絕了。這種態度，以最決定性的形式表顯了英國首相和外相的不同見解。他們的異見，在短時間後仍限於內閣的圈子以內；但這種的裂痕是基本性的。張伯倫傳記作家的斐林教授，對於這一件故事曾有所評述，他的話頗有意思：「一方面張伯倫深恐獨裁者將不理民主國家的這種結成同一陣線，或者甚至作爲發動衝突的一個藉口，而在艾登方面，他寧可冒這樣的危險，而不願失去美國的好感。這是辭職之初次發生。但終於找到了一個折衷……。」可憐的英國！它在滔滔不絕的心平氣和的議會空談聲中，一天天的離開自由自在的生活，徬徨地走着下坡路，達到他所竭力企圖避免的終點。最有勢力的報紙上的重要社論，除了若干忠實的例外之外，仍在以粉飾之詞撫慰人心；英國的行徑，好像是假定全世界都和它一樣的隨便、沒有算計和具良好的用心。

外相顯然不能根據張伯倫拒絕總統的提議，提出辭職。羅斯福有心使美國捲入歐洲黑暗場面的漩渦，實在他在國內冒極大的風險。這種電文的交換，任何一部分如經洩露，國內的所有孤立主義勢力一定都將羣起而攻之。反之，也沒有其他比美國在歐洲仇恨和恐懼的場面上出場，更可能延緩或者甚至防止戰爭的發生。這就英國而言，是一個有關生死存亡的問題。沒有人能事後計量得出它對於奧國事勢演變、和對於慕尼黑局勢所發生的影響。我們必須認爲，把它拒絕——事實上確是拒絕，可也就失去了用戰爭以外方法使世界免於專政的最後脆弱的機會。以見解狹隘而對歐洲局勢又不熟悉的張伯倫，竟讓他妄自尊大，拒絕了伸過大西洋岸來的援手，真是即使時至今日，仍令人惶惑不解。一個正直幹練和用心甚好的人，負有掌握全國和所有仰賴他的人命運的重任，他在這個故事中所表現的完全缺乏分寸的觀念，甚至缺乏自衛的觀念，言之使人喪氣。使這種舉動成爲可能的心理狀態，今日無人能甚至重新設想得出。

我後面還要講到，在慕尼黑危機發生時處理蘇聯合作提議的故事。如果祇要當時英國人民知道和明白，我們不單疏忽了自己的防衛和設法去削弱法國的防衛，而且又先後正在和兩個大國把關係弄得疏遠，而這兩個大國的最大努力，又正是爲保存我們的生命和他們自己的生命所必需的，那歷史也許已經有不同的轉向了。但一天天一切都好像很順利。在十年以後的今日，希望讓過去的教訓做引導吧。

艾登於一月二十五日赴巴黎，與法國人諮商，他對前途的信心一定已經減弱。現在一切都轉而有賴於對意談判的成功，關於這一點，我們在給總統的覆信中曾經大書特書。法國政府向艾登力說，西班牙問題必須列爲對意一般解決中的一部分；他對這一點無待多說便深信不疑的。二月十日首相與外相和格倫底伯爵相晤，格倫底宣布意大利人原則上準備開始談判。

二月十五日消息傳來，奧國總理舒斯尼格屈服接受德國所提條件，任命納粹主要分子殷奎特爲內政部長和警察的首腦，加入奧國的內閣。這一嚴重事件，沒有解除張伯倫和艾登個人之間的緊張。二月十八日他們再度和格倫底見面。這是他們最後一次合作處理公務。意大利大使既拒絕討論意大利對奧國的地位，也拒絕考慮英國所提撤退在西班牙志願軍的計劃，此處所謂志願軍，指意大利的五師正規軍而言。不過格倫底要求在羅馬舉行一般性的談話。首相對此表示同意，外相則強烈的反對這一種步驟。

此後即有冗長的磋商和內閣的會議。關於這些，現在已經揭露的唯一權威記述，具於張伯倫傳記之中。據斐林說，首相「讓內閣明白艾登辭職一路外，或者就是他自己辭職。」他從獲准利用的若干日記和私人函件中，引述首相下面所說的話：『我認爲必須明白說清，我不能接受任何意義相反的決定。』斐林說：『內閣雖有少數保留，一致同意。』我們不知道這些話，如何和在什麼時候在冗長的會議中提出的。但最後艾登終於以不能同意在這個階段中和在這些情形下舉行羅馬談話，很簡單的提出了辭職。他同僚對他的辭職感到詫異，斐

林說他們『深爲震動』。他們沒有曉得外相和首相的異見，已經到了破裂之點。顯然他們如果知道將牽涉到艾登的辭職，那就將成爲一個新問題了，其中包括更大的和更一般性的爭點。不過他們自己都曾負有專憑所爭執的問題而定曲直的義務。那一長天的其餘功夫，都花在努力使外相改變初衷。張伯倫對內閣的苦惱，發生感動。『目擊我的同僚突感驚惶，我提議休會至明天舉行。』但艾登認定再繼續尋求折衷的方式已無用處，所以到了二十日的中夜，他的辭職已作最後決定。首相說，『依我的見解，他的此舉大可爲人稱譽』（註一）。哈里法克斯立即被命繼任外相（註二）。

自然外面知道了內閣內所發生的嚴重糾紛，雖則原因暗昧不明。我早已聽到若干消息，但很小心避免與艾登有任何的接觸。我希望，他無論如何在先行確立他的理由，和讓他許多在議會的朋友有機會把問題弄個水落石出以前，不要辭職。但此時的政府極爲強大和超然，所以這場糾紛，卒於內閣密議室中，主要在兩人之間解決了。

二月二十日深夜，我坐在卻特威爾邸中那一間我的老房間裏，接到一個電話告訴我艾登業已辭職。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心沉了下來，一時之內，我沉沒在失望的暗潮之中。在我長的一生中，曾經有過許多升沉波折。在整個即將蒞臨的戰爭期中和戰時最黑暗的時期，我的睡眠從來沒有成過問題。在一九四〇年的危機中，那時許多責任都堆在我的身上，以及在後來五年內許多很焦灼的和棘手的時候，一天工作做完以後，總常能上床入睡，自然要預備一等緊急的叫喚即須起床。我睡得很着，醒來神清氣爽，除了把晨間送上來的食盒裏的東西，不管什麼狼吞虎嚥外，別無他感。但現在，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之夜，也祇有在這一夜，睡眠背棄了我。自半夜直至天明，我橫在床上，充滿了難過和恐懼的情緒。這裏有一位堅強的年青人物，他似乎在屹立對抗那

註一：前引斐林書三三八頁。

註二：前引書。

種浮動和屈服的、以及計算錯誤和衝動微弱的冗長、懶怠、陰鬱的潮流。我的處理事務，在許多方面一定將和他不同；但在這個時候，在我看來，他代表英國民族的生命希望，這一個偉大古老的英國民族，對人類已經有過那樣多的貢獻，今後仍將續有貢獻。現在他卻去職了。我凝視着陽光慢慢的穿進窗戶，在我的內心中看到了我前面的「死亡」的幻象。

第十五章 兼併奧國（一九三八年二月）

「奧都計劃」——希特勒取得最高指揮權——奧總理奉召去勃羅斯迦登——他的慶難——舒斯尼格的失敗——二月二日希特勒的國會演詞——關於艾登辭職事件的辯論——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同惡相濟——奧國公民投票——進攻奧國——希特勒對墨索里尼所負的債務——維也納勝利進軍和它的背景——里賓特洛甫的別宴——三月十二日的辯論——維也納陷落的後果對捷克的危險——張伯倫和蘇聯的提議——側面的打擊——奧凡勒拉的談判——愛爾蘭各港的放棄——對英國的重大損害——愛爾蘭的中立——我的無效的抗議

在現代，國家戰敗以後，往往仍得保持他們的國家結構、他們的個性、以及他們的祕密檔案。在這一，戰爭一直打到山窮水盡，我們完全獲悉了敵人的內幕情形。根據這些資料，我們可以相當準確地來核對我們的情報和行動。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希特勒於一九三六年七月，如何訓令德國參謀本部，擬具時機到來時占領奧國的軍事計劃。這個作戰計劃，命名為『奧都計劃』。現在經過一年後，至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他又發出一個特別的指令，把這些計劃具體化。十一月五日他向他的軍事領袖，揭露他的未來計劃。德國須有更多的『生存空間』，最好能在東歐——波蘭、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方面取得。為實現這一點，不免將發生一場大戰，附帶還要消滅現在住在這個區域之內的民族。德國勢須對付它兩個『可恨的敵人』——英、法，他們是『不會容忍站在歐洲中心的德國巨人』的。為了利用它在軍火生產方面所占的上風地位，以及由納粹黨所鼓動和代表的愛國熱情，德國必須一遇到有可乘之機，便訴諸戰爭，和乘它兩個顯然的敵人準備作戰以前，先行下手。

牛賴資、弗里區、甚至白隆堡，他們都受有德國外交部、參謀本部、和軍官團見解的影響，聽到這個政策以後，深為震恐。他們認為所冒的風險太大了。他們承認，由於元首的大膽，已使德國在軍備的任何方面，都確實的站在協約國家的前頭。德國的陸軍正在一月一月的成熟，而法國內部的腐敗，和英國的缺乏堅決意志，都是可能將充分自食其報的有利因素。在一切非常順利之時，再過一年或兩年又怎麼樣呢？他們必須要有完

成作戰機構的時間；元首祇須時時作一番和解性的演說，就可使無用的和墮落的民主國家忙着作口舌之爭。但希特勒並沒有如此確信。他的天才告訴他，取得勝利，不會有絕對確實的公式，危險是必須冒的，也必須作突然的躍進。過去的成功，第一次是重整軍備，第二次恢復徵兵，第三次重占萊因地，第四次墨索里尼意大利的親附，使他十分得意。如果要等到萬事俱全，也許就將等到一切嫌遲了的時候。生活和行動無須作每天打算的歷史學家和其他人，也許可以輕描淡寫的說，認為如果他在動手以前，再繼續擴充實力兩三年，他或者早已掌握世界整個命運了。不過後來的事實並不如此。在人類生命或國家生活中，並無確實不變的東西。希特勒決定趕快進行，乘他全盛之時，發動戰爭。

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希特勒解除弗里區職務，親自執取武裝部隊的最高指揮權。白隆堡因與部內平民身分的女職員結婚，使他在軍官團中的勢力削弱，也下台了。「元首」不僅對國家的政策，也對軍事機構保持支配之權，他在一個個人的可能限度之內，不管他如何的稟賦和強大，不管他能實施的懲罰如何的可怖，充分發揮了他個人的意志。他此時所有的，與奧斯特列茲和耶拿戰爭以後拿破崙的權力，頗為相似；但拿破崙破崙的光榮，是由騎在馬上、親自指揮作戰，獲得重大戰役的勝利而來的；而希特勒的光榮，則是由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勝利而來，他的周圍和信徒都知道，這種勝利，完全出於他一人，出於他的判斷和他的敢作敢為。

希特勒的希望併吞奧地利共和國，除了我的奮鬥中明白說過的，他決心把所有條頓種族納入帝國之內外，還有兩個理由。奧國如魯德有，不啻打開了捷克的門戶，並獲得通抵西南歐洲的更為寬廣的路徑。自從一九三四年七月陶爾斐斯總理為奧國納粹黨暗殺以來，用金錢、陰謀、暴力以求顛覆獨立奧地利政府的活動，始終不曾停止過。奧國境內的納粹運動，跟着希特勒在別處所獲的成功，無論在德國國內或在對協約國方面，着着發展。在名義上，巴本奉命和奧國政府維持最友善的關係，和促成奧政府正式承認奧國納粹黨為一個合法團體。

在那個時候，墨索里尼的態度尚有約束的作用。陶爾斐斯遇害以後，意大利的獨裁者飛到威尼斯，接見和撫慰在該處托足的奧總理遺孀，意大利的大軍集中於奧國南部邊界。但現在到了一九三八年開始時，歐洲方面列國的分合與價值，已經有了決定性的變化。對着法國的齊格斐國防線，全用鋼鐵和水泥築成，力量日益加厚，法國如圖突破防線，似乎非大量犧牲壯丁兵員不可。德國對西方已經緊閉大門。銀樣蠟鎗頭的制裁，已經把墨索里尼驅入德國的陣營，這種制裁激怒了他，但沒有削弱他的權力。他很可能會深以為快的想到馬基維利的名言：「人所必報的是小仇，而非大仇」。尤其，西方民主國家似乎一再證實，只要暴力行為沒有直接攻擊到他們本身，他們是會向暴力低首的。此時巴本正在奧國政治結構之內，作巧妙的活動。許多奧國的顯要，都屈服在他的壓力和陰謀之下。對維也納有非常重要的旅行業，因時局動盪不定，大受妨礙。在這種背景之中，恐怖分子的活動和炸彈暴行，使奧地利共和國脆弱的生命，危危欲墜。

德國認為現在時機已到，可以由促成最近合法化的奧國納粹黨的領袖參加維也納內閣，而取得控制奧國政策的權力了。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即希特勒執取最高指揮權後的第八天，他傳喚奧國總理舒斯尼格到柏林，斯迎登。奧總理服從命令，和他的外交部長許密特同行。現在我們已見到舒斯尼格的記載，其中有一段下面的對話（註）。希特勒曾經提到奧國邊界的防衛。為壓伏這些防衛，可能必須作軍事的行動，和因而引起和戰的大問題。

希特勒：我只須下一道命令，一夜之間，邊界上所有可笑的虛張聲勢的東西都將消滅。你不會真相信，你能把我抵抗半小時以上吧？誰知道——也許我將突然於一夜之間到了維也納，像一個大浪潮似的，那時你將真正體驗到若干新東西了。我願意奧國人避免這一層；因為這樣一來，就有許多的犧牲者要喪命。在大軍之後將繼以褐衫隊和奧國軍團。誰也將不能阻止他們進行復仇，甚至連我自己都不能。你要把奧國變為第二個西班牙麼？所有這些，如果可能，我是願意避免的。

舒斯尼格：我將收集必要的資料，和停止在德國邊境建立任何防禦工事。自然，我知道你可以長驅直入奧國；但總理先生，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此舉即將引起流血。我們並非獨處於世界之中，這種行動可能等於是戰爭。

（註）見舒斯尼格著奧地利的祭典三七頁以下

希特勒：此時，我們坐在俱樂部的安樂椅上自然很容易高談闊論，但在這個背後，有痛苦和流血的事實在。舒斯尼格先生，你願意接受這個責任麼？你不要相信，世上有任何人將阻止我的決定！意大利麼？我和墨索里尼說得明白明白：我和意大利保持可能的最親密的關係。英國麼？英國不會為奧國而作一舉手、一投足之勞。……法國麼？好，兩年以前，我們以少數部隊開入萊因地——在那時我冒很大的險。如果那時法國長驅直入，我們或者早已被迫撤退。……但到現在，就法國而言，已嫌太遲了。

這一次的談話，是在上午十一點鐘舉行的。經過一次正式的中飯後，奧國的一行被召喚至一間小房間裏。在那裏，見到里賓特洛甫和巴本，他們提出一個書面的最後通牒。所有的條件是不容討論的，包括任命奧國納粹黨人殷奎特為奧國內閣保安部部长，對所有在羈押中的奧國納粹黨人實行大赦，和把奧國納粹黨正式併入由政府創導的祖國陣綫。

稍後，希特勒接見奧國總理。『我再對你說一遍，這是最後的機會。我希望在三天之內實施這個協定』。在約特爾的日記中，曾有下面的記載：『舒斯尼格和許密特再度受最嚴重的政治和軍事的壓力。至下午十一點，舒斯尼格簽訂了這個「議定書」』（註一）。在巴本偕舒斯尼格共乘雪車、經過風雪載道的公路回到薩爾斯堡的路中，他解釋說：『是的；這是元首能如何做的，現在你已經親自經驗過了。但你下次來時，你將有一個舒服得多的時間。元首是可以真正的惹人歡喜的』。

二月二十日希特勒在國會中演說：

我很高興告訴諸位先生，在過去幾天以內，我們和一個因為許多理由和我們特別密切的國家，獲得了更進一步的諒解，德國和日耳曼人的奧國之結成一片，不僅因為他們是同一民族，亦是因為他們共享一個悠久的歷史和一個共同的文化。鑒於執行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協定所經歷的困難，迫使我們設法去肅清實現最後和解中的誤解和障礙。假使沒有做到這一層，那麼顯然無論有意或無心，有一天就會造成一種受不了的情勢，可能促成一種極嚴重性的禍難。我很高興，可以向你們保證，這種考慮，與應我之邀來訪問我的奧國總理的見解相合。我們的概念和用心，是由根據現有的立法，以日耳曼人奧國公民所享有的同等法律權利，給予該持有國社主義見解的公民，藉以減除我們關係中的緊張程度。與之有關的，為頒布大赦，和促使兩國根據與補充七月十一日協定的體制，在儘可能的許多方面——政治的、個人的、和經濟的——作更進一步的合作，這對和平前途應為一個具體的貢獻。在這一方面，我願在德國人民之前，向奧國總理謹表謝忱；

（註一）見英政府文儀局的紐倫堡文件第一編二四九頁

（註二）見前引舒斯尼格書五一——五二頁

他本於偉大的瞭解和熱烈的自願，接受了我的邀請，和我一起工作，因此我們可能發現出一條可以滿足兩國最好利益的途徑；因為歸根結底的說來，這是整個日耳曼民族的利益，無論我們生身何地，我們都是日耳曼的子孫（註）。

一個人很難找得一個比此更為完全的、可供英美人鑒戒的集欺詐與偽善大成的範本。我的所以在此加以引述，就因為它在這些方面具有獨特的特色。所可異者，任何自由國家的有知識的男女，在他們的反應中，竟會並不加以斥責抨擊。

暫時我們必須回到前一章中曾經敘述過的英國嚴重情勢。在第二天，二月二十一日英國下院關於外交大臣艾登和他的次長克倫勞助爵的辭職，舉行了一場聲勢洶洶的辯論。克倫勞「仍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他對艾登忠謹奉命，具有同樣的信心。艾登自然不能公開提到羅斯福總統的提議和這個提議的挫折。關於意大利問題的異見，只是次要的方面。艾登說：

我已經說到使我和我的同僚離異的直接爭執，但如果我假裝說這是一件孤立的問題，那我就嫌不坦白了。它不是一件孤立的事。在最近幾個星期之內，有一個與意大利完全無關的、外交政策方面的重要的決定，纔是根本的爭執。

他結論說：

我不相信，如果我們讓國外造成印象，以為我們屈服於不斷壓力之下，我們就能在歐洲的安撫方面有所進步。……在我自己心中，我斷然相信進步有賴於民族的心情狀態，而這些心情狀態，必須以堅決的精神表現出來。我深信這裏並不缺乏這種精神。默而不言，我相信對我國和對世界都有欠公平。

艾德禮提出了一個銳利的論點。艾登的辭職，在意大利正被宣布為「墨索里尼之又一大勝利」。『在全世界我們聽到這個故事，「你看我們領袖的權力多大；英國的外交大臣已經下台了」』。

我到第二天纔發言，在演詞中我對辭職的兩位閣員，作了一番稱揚。我也支持艾德禮的控告：

（註）希特勒演說詞（培尼斯編）第二卷一四〇七—八頁

上一星期乃是獨裁者的一個美滿的星期——是他們所得未曾有的。德國的獨裁者已經把他的鐵掌，伸到一個小而歷史悠遠的國家身上，而意大利的獨裁者向文登復仇，終於勝利收場。他們之間的衝突，已經很久了。墨索里尼已經獲勝，現在不能有任何懷疑了。所有英帝國的尊嚴、權力和領土，都不能保證前外相所代表的目標的成功，這些目標，是由全國和議會的公意交託給前外相的。……這就結束了故事的這一部分，那就是說，受英國人民和議會的付託，擔任某種職務的那英國人（指文登——譯者）終於去職；使意大利的獨裁者正在爲了國內的理由，迫切需要成功之時，獲得完全的勝利。在全世界，在每一塊地方，在每一片天底下，每個不問制度如何的政府，凡是英國的友人，都感到沮喪，英國的敵人，都興高彩烈。……

前外相的辭職，也許很可能成爲歷史上的一塊記程碑。通常說得好，大衝突是由小事而起，但難得因小的理由而發生。前外交大臣保守我們久已置之腦後的政策。首相和他的同僚採行了一種另外的新的政策。舊政策的內容，是努力在歐洲建立法治，和通過國際聯盟，建立起防止侵略者的約束力量。新的政策，是否就是希望，不單在情感和自尊心方面，而且也在物質因素方面，作重大而影響深遠的屈服行爲，以與極權國家妥協，便可以保持和平麼？

有一天哈里法克斯勳爵說，歐洲是混亂惶惑的。歐洲發生混亂惶惑的部分，是受議會政府統治的那一部分。我不知道在大獨裁者方面有什麼徬徨紛亂。他們知道要點什麼，而且誰也不能否認，直到現在爲止，他們正在每步實現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對世界安全最嚴重和差不多無可挽回的損害，是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間各年中發生的。……下一次的可乘之機，爲一九三六年初重占萊因地之舉。現在我們知，當時英法如在國際聯盟領導之下採取堅決的立場，接着就會迫使他們立即從萊因地撤退，而無須流一滴血；而影響所及，可能已使德國軍隊中較爲慎重的人士恢復了他們適當的地位，德國那位政治領袖，也將不會有那種使他得以一路向前的優勢了。現在我們處於達到第三次行動的時候，但是這次的機會，並不以同樣有利的方式表現出來。奧國現在已處於奴役之中，我們不知道捷克是否會受到同樣的攻擊。

歐洲大陸的情勢自然的推演着。現在墨索里尼遣使口傳告訴舒斯尼格，說他認爲奧國在柏翰斯迦登的態度既正當又周到。他擔保意國對於奧國問題無可更改的態度，以及他個人的友誼。二月二十四日奧總理自己向奧國議會致詞，歡迎對德解決糾紛，但相當斬截的強調，如果有超乎協定具體規定以外的情形，奧國決不接受。三月三日他經奧國駐羅馬的武官，交給墨索里尼一封密函，通知意首相，他打算舉行公民投票，以加強在奧國的政治地位。二十四小時後，他接到駐羅馬奧國武官敘述與墨索里尼會面情形的回電。在談話中，意首相自己已有樂觀的表示，稱局勢將漸予改善。羅馬和倫敦間的緊張關係，旦夕之間，便可解除；將保證減輕現有的壓力。……至關於公民投票，墨索里尼提出警告，「這是一個錯誤。如果投票有滿意的結果，人們會說是偽造

的。如果結果惡劣，政府的地位即將受不了；如果結果是沒有決定性的，則投票毫無用處」。但舒斯尼格已決定進行。三月九日他正式宣布，定三月十三日星期日與奧國全國各地將舉行公民投票。

最初風平浪靜。殷奎特似乎沒有躊躇的接受了這個理論。但到十一日晨五點半鐘，舒斯尼格接到維也納警察總局的電話，告訴他：「一小時前，德國薩爾斯堡邊界實行封鎖，德國稅務人員已經撤退。鐵道交通已經切斷」。與總理第二件收到的電文，是他派在慕尼黑的總領事發出的，告訴他該地德國軍團已經動員：假定的目的地——奧國！

晨間過了很久，殷奎特進來宣布他剛接到戈林電話，通知他公民投票，必須在一小時內取消。如果在限時內沒有答覆，戈林將假定殷奎特已不能自由通話，和採取適當的行動。舒斯尼格在獲得負責官吏的報告知道軍警不盡可靠以後，即通知殷奎特公民投票將予延期。一刻鐘後，殷奎特回進來，手裏拿了戈林胡亂寫在信箋簿上的答覆：

祇有奧總理立即辭職，和兩小時內任命殷奎特為繼任總理，纔能挽救局勢。如果在這個時間內沒有實行，德軍即將進入奧國。（註）
舒斯尼格等待密克拉斯總統，提出辭職。他正在總統室內時，收到了意大利政府來的密碼電，電文稱他們不能提出什麼意見。高年的總統態度堅決：「這樣到了最後決定關頭，剩下了我一個人」。他固執地拒絕任命納粹黨人為總理。他決定迫使德國人做出一種可恥的和暴力的行動。但關於這些，德國人老早準備有素。在約特爾日記三月十日項下，關於德國的反應，有一個鮮明的記載。

舒斯尼格沒有與他的閣員諮商，突然命令在三月十三日星期日舉行公民投票，此舉在沒有計劃和準備之下，應可使合法的政黨取得強大的多數。元首決定不予容忍。今晚，三月九日至十日的夜間，他傳召戈林。拉瑞諾將軍由開羅與配克委員會中召回；舒伯特將軍以及霍斯頓諸部長亦奉令前來，後者本來和區領（勃克爾）同在選侯領地。李特爾將軍在一點四十五分鐘傳報事實。十點鐘他驅車到總理府。十點十五分我跟着把舊有的草案「奧都計劃」交給他了。一點鐘李特爾通知作戰部部長和坎那列斯海軍大將；里賓特洛甫因事羈留在倫

（註）見前引舒斯尼格書六六——七二頁

數。牛賴賓接管外交部。元首要把最後通牒傳達給奧國內閣。對墨索里尼發出一封私函，其中說明迫使元首採取行動的理由。（註一）翌日即三月十一日希特勒下令德國武裝部隊，對奧國作軍事占領。經過長期研究和縝密準備的『奧都計劃』開始了。在緊張的整個一天內，密克拉斯總統對殷奎特和奧國納粹黨的領袖們始終抱堅決的態度。在紐倫堡戰犯審判檔案中，有希特勒和海斯·斐列伯親王的電話談話記錄，後者是他派至意大利首相處的特使。這個記錄頗有興趣。

海斯：我剛從文尼斯宮回來。首相以友善的態度接受了全部的計劃。他託我向你致敬。他曾從奧國得到情報，舒斯尼格把消息告訴了他。他曾經說過，這（指意大利的干涉）是全不可能的事；它將成爲虛聲恫嚇；這種事是做不得的。因此告訴他（舒斯尼格），事勢既不幸到此地步，也就無法改變了。然後墨索里尼接着說，奧國對他將無關輕重。

希特勒：請你轉告墨索里尼，對這件事我決不忘記他。

海斯：是的。

希特勒：不管發生什麼事，我永遠、永遠、永遠不忘記。我現在仍在準備同他成立一個完全不同性質的協定。

海斯：是。我也已經告訴他了。

希特勒：一待奧國問題已經解決以後，我準備和他同甘共苦，患難相依；一切不管。

海斯：是，我的元首。

希特勒：聽好，我將作任何的協議——如果我們捲入戰爭，我不再怕在軍事上有陷於可怕的惡劣形勢之虞了。你可以告訴他，我非常感謝他，我將永遠不忘記他。

海斯：是，我的元首。

希特勒：不管發生些什麼，我將決不忘記。如果有一天他需要什麼援助，或發生任何危險，甚至即使全世界和他爲敵，他可以深信不疑，我將不管一切，與他始終如一。

海斯：是，我的元首。（註二）

（註一）紐倫堡文件第一部二五一頁

（註二）見舒斯尼格書一〇二——三頁及紐倫堡文件第一卷二五八——二五八頁

一九四三年希特勒把墨索里尼從意大利臨時政府之手解救出來，他保持了她的諾言。

勝利進入維也納，一向是這位奧國伍長的夢想。三月十二日星期六的晚上，奧國首都的納粹黨曾經計劃舉行一個火炬遊行，以歡迎這位英雄征服者。但到時卻不見大軍駕臨。有三名巴伐利亞供應部隊的軍官，事前乘了火車到維也納，負責爲入侵軍隊布置營房，此時被大衆抬在肩頭，以資點綴。這種挫折的原因，慢慢洩漏了出來。德國的戰爭機器，逡巡地呆笨的越過邊界，至近林資地方停頓下來。雖然氣候理想和其他良好的條件，大部分的坦克車機件壞了，摩托化的重砲也出現了毛病。希特勒特別寵愛的第四軍團司令官拉瑞諾被認爲應負這一種失敗之責，從此也暴露出德國陸軍在其重建的現階段中，尙未成熟的情形。

希特勒自己乘汽車走過林資時，目擊車輛擁塞的情形，大爲震怒。輕型的坦克從亂堆中設法開了出來，孤單的於星期日清晨開入維也納。裝甲車和摩托化重砲裝在火車貨車上，用了這種方式纔算及時趕到參加儀式。希特勒在興高采烈或驚惶失措的羣衆之中，駕車走過維也納的圖象，是大家都知道的。但這一個神祕性的光榮聚會，卻有一個不安靜的背景。事實上，德國元首對於他軍事機構的顯而易見的缺點，憤激萬狀。他申斥他的將領，後者亦反唇相譏，他們提醒他的拒絕聽取弗里區的意見，和後者所稱德國地位尙不能負大戰風險的警告。表面是保持了，正式的慶祝和游行舉行了。星期日那一天，在大羣的德軍和奧國納粹黨人占有維也納後，希特勒宣布奧地利共和國的解散，和以其領土併入德意志帝國。

里賓特洛甫此時正要離開倫敦，返國就外交部長之職。張伯倫特別在唐寧街十號設宴歡送，我和我的內人接受首相之邀，出席參加。席上一起大概有十六個人。我的內人坐在近桌子一端的賈德幹爵士的旁邊。正在吃到一半的光景，有一個外交部信差進來交給他一封信。他把信封打開，全神貫注的看信。接着他站了起來，繞着桌子走到首相坐的地方，把信交給首相。雖然賈德幹的舉動不會表現出發生了什麼亂子，但我不由不注意到

首相的顯然的精神不定。現在賈德幹把信收回，重新歸坐。後來我聽到說起信的內容，信內說希特勒已對奧進攻，德國的機械化部隊正在很快的向維也納推進。中飯仍順利進行，沒有半點停頓；但不久張伯倫夫人從她的丈夫方面得到了若干暗號，便站起來說，「現在讓我們全體到客廳裏喝咖啡吧」。我們魚貫走到客廳，在我或者在若干其他人看來，張伯倫伉儷顯然希望快點把場面結束。大家都有一種浮躁不安之態，都只等貴賓說再會。但里賓特洛甫夫婦似乎完全沒有覺得這種空氣。相反，他們逗留着找主人主婦，作滔滔不絕的談話，幾乎半小時之久。一下我同里賓特洛甫夫人談起來，我以臨別贈詞的口氣說，「我希望英國和德國將保持他們的友誼」。『你當心不要損害了它』，這是她的溫婉的答覆。當然他們都完全知道已經發生了什麼事，但認為把首相拖住，使之不能去處理公事和聽接電話，是一個好的策略。最後張伯倫對德大使說，『對不起，現在我必須去處理要公』，說完立即走出房間。里賓特洛甫夫婦仍停留着，因此我們大部分人都藉詞脫身回家。我想他們最後終於走了。這是里賓特洛甫被絞死前我最後一次和他的見面。

侵略奧地利的暴行，美麗的維也納的屈服，連同所有它的名聲、教化、和對歐洲歷史的貢獻，一朝以盡，給了我很着實的打擊。在這些事件的翌日，即三月十四日我在下議院中說：

三月十二日事件的嚴重性是說不盡的。歐洲現在面遇到一個計算和時間安排得很巧妙、逐步展開的侵略計劃，現在不單我們，就是其他國家，都只剩一個選擇，不是像奧國一樣的屈服，就是乘尚有把危險抵住的時間、和萬一不能抵住就準備、與它作對壘之前，採取有力的措施。……如果我們繼續等待事勢演變，我們將放棄多少現在可供我們安全與維持和平之用的資源？有多少友人將因而離心，我們將看到多少可能的敵人，先後投入可怕的深淵？虛聲恫嚇要經過多少次成功，使恫嚇背後不斷彙集的力量，累積而成爲實在的東西？……兩年以後，即當德國陸軍一定比法國爲強大之時，所有小國紛紛溜開日內瓦，轉向權力日長月大的納粹制度致敬，儘其所能爲自己取得較好的條件時，我們又將到那裏去呢？

接着說：

維也納是組成舊奧匈帝國的所有各國的交通中心，也是西南歐各國的交通中心。多瑙河的一大段，現在已落於德國的掌握。制宰維也

納以後，使納粹的德國得以公路、航路、鐵路，在軍事上和經濟上統制整個西南歐的交通。這對於歐洲的結構有什麼影響呢？對於所謂勢力均衡的現況，對於所謂小協商國又有什麼影響呢？對於所謂小協商國的這個集團國家，我必須說明一下。小協商國的三國，就個別而言，可以說是第二等的國家，但他們是很有勢力的和精進的國家，如果團結起來，他們成爲一個大強國。他們過去以及現在，根據最密切的軍事協定團結爲一。他們聯合起來，補充成爲一大強國的軍事機構。羅馬尼亞有汽油，南斯拉夫有礦藏與原料，兩國都有數量龐大的軍隊，其軍火主要由捷克所供應。在英國人的耳朵裏聽來，捷克一名，也許有生疏之感。他們無疑只是一個小小的民主國，他們無疑只有一支比我們大兩三倍的軍隊，他們無疑只有比意大利所有大三倍的軍火供應，但他們仍是一個生氣勃勃的民族，他們有他們的權利，有根據條約而來的權利，他們有一個要塞壘線，而且他們有一個表現強烈的生存意志，一個要求自由生活的意志。

在經濟上和在軍事上，捷克此時處於孤立狀態之中。根據和約，漢堡是它商業的出口，現在在自然隨時可被封鎖。現在它和南部以及經南部而至西南部的鐵道與河道交通，隨時可被切斷。它的貿易，可能須繳納有破壞性的、可以絕對使之窒息性的通行稅。這一個國家，曾一度爲奧匈帝國境內最大的工業區。現在除非在此後必將舉行的談話中，對捷克的交通取得保障辦法，否則它即要被切斷了，或者也許立刻即被切斷。它和南斯拉夫原料供應來源以及在該處所建市場的交通，也許將被立刻切斷。上星期五晚上所施行的暴行，結果也許使這個小國的經濟生活，感受到極大的窒息。在所謂小協商國的心中，已經穿進了一個楔子，這些小國，在歐洲有過不受侵擾生活的權利，正與我們任何人、有在我們鄉土過不受侵擾生活的權利一樣。

現在俄國人表示恐慌了，三月十八日，他們提議舉行會議討論時局。他們希望討論如遇德國發動對和平的重大威脅時，如何在國聯行動的法制之內、履行法蘇協定的手段與方法，即使商量一個綱要也好。這個提議，在倫敦和巴黎反響冷淡。法國政府爲了別的事，弄得心神不定。此時國內的飛機工廠，發生嚴重的罷工，而佛朗哥的軍隊，正在深入共產黨統治的西班牙區域。張伯倫抱懷疑和消沉的態度。他對於我的關於前途危險的解釋，以及抵抗的方法，抱極端不同的見解。我會竭力主張，祇有成立法英蘇的聯盟形勢，纔能希望制止納粹的進犯。

斐林告訴我們，張伯倫曾在三月二十日致其女弟的信中，表示他的心情：

溫斯頓（邱吉爾）所稱的『大聯盟』，其實早在他提到以前我便想到了。……我會和哈里法克斯談到過它，和提交參謀本部首長及外交部專家審核。這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觀念；而且直至你進而考慮其有無實行可能以前，幾乎有百分之百的理由。但一到考慮有無實行可能之時，它的吸引力消失了。你只要一看地圖，知道如果德國要征服捷克，無論法國或我們，都無能爲力，加以解救。……因此我放棄任

何予捷克保證，或向法國關於履行對捷義務一事，作提出保證的念頭。

無論如何，這裏作了一個決定。這個決定，是根據錯誤的理論而來的。在現代大國或聯盟的戰爭中，要保持某一特殊區域，並不單靠局地的努力，而是牽涉到整個戰線上力量的對稱。這種政策，在戰爭尚未開始和仍可避免之時，尤其準確。『參謀本部的首長和外交部的專家』，當然毋待思索便可告訴首相，英國的海軍和法國的陸軍勢難陷身於捷克共和國和希特勒進攻的軍隊之間，在布希米亞的山嶽陸地上展開作戰。事實上，單從地圖上便可以顯然看得出來。但德國如果確知越過布希米亞邊境，一定會引起一場全歐洲的大戰，那麼即使在那時候，也許還很可以阻止或延緩希特勒下一次的進攻。我們想起一年之內，在捷克的戰略價值蕩然以盡，在希特勒的權力和威望差不多已經增加了一倍之時，張伯倫卻慨然向波蘭提出保證，則張伯倫此種私人的真摯的理解之錯誤，也顯然可見了。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首相在下院提出他對於俄國動議的見解：

英國政府認為蘇聯政府所提議的行動，其間接的、但勢所必至的後果，將加強成立排外性國家集團的趨勢；照英國政府的見解，這種集團的成立，對歐洲和平的前途，必然是有害的。

不過，首相不能避免面對殘酷的事實：即當時存在的『國際信心的重大紛擾』，和遲早政府關於英國在歐洲的義務，必須作確定的解釋。我們在中歐將負什麼義務呢？『如果戰爭爆發，加入戰圍者大概不會僅限於擔負法律義務的國家。戰爭將至那裏為止，那些政府將捲入漩渦，是差不多無法說明的』。此外必須注意的，『排外性國家集團』固然有其弊害，但如果我們記着，不這樣便只有讓侵略者逐一消滅，那麼此說即不能存在。而且，它忽視了國際關係中所有是非的問題。事實上，畢竟還有國際聯盟及其憲章哩。

首相的路線現在是很顯然了：即同時向柏林和普拉格加以外交的壓力，對意國進行綏靖，關於對法國的義務，作嚴格限制的解釋。為執行前兩點，則最後一點，必須慎重和精確。

現在須請讀者向西移至「綠島」（即愛爾蘭之別稱——譯者）了。「至底比拉雷（愛爾蘭地名——譯者）是一條長路」，但有時一次行程是免不了的。由希特勒佔領奧地利起、至他對捷克的陰謀暴露止這個期間，我們必須轉向降到我們身上來的、另一種性質大不相同的不幸了。

自一九三八年初起，英國政府與南愛爾蘭的凡勒拉即進行談判，至四月二十五日雙方簽訂了一個協定，除了其他問題以外，英國放棄占領南愛爾蘭及貝爾赫文兩港、作海軍用途的權利，和放棄洛·斯威雷的基地。這兩個南部的港口，在我們海軍防護我們糧食供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九二二年我擔任殖民大臣時，處理內閣當時所作愛爾蘭解決案的詳細規定，我把海軍大將俾替請到殖民部，由他向柯林斯（愛爾蘭代表——譯者）說明這種港口在英國取得供應的整個制度中的重要性。他立刻獲得了柯林斯的信服。他說：「自然你們必須占有這些港口，它們為你們生命所必需」。問題就如此解決，在此後的十六年中，一切都順利進行。昆斯城和貝爾赫文為我們安全計所必不可少的理由，是容易瞭解的。他們是加油站，我們的驅逐艦隊即由該地列隊向西向開入大西洋搜索潛水艇，和保護到達狹海窄口處的入境的護航隊。洛·斯威雷也為保護到克雷特和曼西入口處所必需。放棄這些地方，不啻說我們的艦隊，此後就須從北方向蘭拉墟、南方由本勃洛克碼頭或法爾穆斯出發，由此把他們行動所能提供保護的圓周，在國外和境內減少了四百多英里。

參謀本部首長之會同意放棄這種重要的安全保障，在我是難於相信的。直到最後，我認為至少已保障了我們在戰時占用這些愛爾蘭港口的權利。但是凡勒拉在愛爾蘭議會中宣布，割讓之舉，不附有任何的條件。後來我得到確實消息，英國政府對於凡勒拉所提要求的答應之快，曾使他深為詫異。他的把這一條列入要求之中，原來是作為討價還價之用的，只要其他各點能有滿意的解決，這一點原是可以放棄的。

謝特斐爾特勳爵在他的書中，曾有一章專用以說明他及參謀本部其他首長所曾採取的方針。（註）凡是願

意研究這個問題的人，當然都應該讀它。就我個人而言，我仍舊深信，這種毫無酬報的放棄我們戰時使用這些愛爾蘭港口的權利，是對英國國家生活和安全的一個重大損害。我們很難設想出一個比此更荏弱的作為——而且尤其在這樣的時候。不錯，沒有這些港口，我們最後也把難關渡過了。但如果我們沒有這些港口便無法渡過難關時，我們應該早已用武力重行占領，不能讓活活的餓死。不過這些都不是可作為辯護的理由。這種不顧前後的遷就妥協的例證，結果就要犧牲了許多船隻和生命。

整個保守黨，除了代表厄爾斯特（北愛爾蘭——譯者）的少數議員外，全體支持首相，而像這一種的步驟，在反對黨的工黨和自由黨，自然更為快心悅意。因此五月五日我起立提出我的抗議時，幾乎只有孤單單的一人。大家帶着懷疑的忍耐之心聽我發言。大家對於任何像我地位的人，願意打算作毫無見聽之望的辯論，甚至抱有一種同情的詫異之感。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下院有比此更完全的錯誤。此時距宣戰已只有十五個月了。等到我們的生存有賴於大西洋之戰的結局如何，議員先生就將有大不相同的觀感了。因為我的演說詞已經在進入戰鬪一書中全部揭載，所以除了有一點外，此地不再接引。戰時南愛爾蘭的中立問題，並沒有解決。

（我問）我們有什麼保證，如果我們和若干強大的國家發生戰爭之時，南愛爾蘭，或他們所稱的愛爾蘭共和國將不宣布中立？這一類的敵國，第一步將向南愛爾蘭提出各種完全的免除戰爭的條件，只要它願意保持中立。……你不能排除這種中立的可能，它也許就會在我們經驗的直接範圍內發生。在有迫切需要的時候，也許我們不得使用那些港口；在保護英國人口不至匱乏甚或饑餓之時，也許會受到極嚴重方式的障礙。誰將願意把他的頭放進這種圈套裏呢？世界上是否有任何其他的國家，曾對這一種步驟肯作考慮的？我們一旦離開了這些港口以後，杜柏林政府將很容易的拒絕讓我們作再度的使用。在那裏有的是大砲，也可以安放水雷。但為這一方面的目的計，更重要的是我們在那裏有合法的權利。你曾有過權利；你把這些權利割讓了；你希望代之而起的善意，足夠強大到肯為你之故而忍受艱苦。假定你得不到善意又如何？說「那麼我們將重占這些港口」是沒有用的。你將沒有作此行徑的權利。在一場大戰爭時，如宣布破壞愛爾蘭的中立，也許會使你被指出於世界輿論的法庭之外，和玷污了你參戰的目標。……你們為了無意識的幻想和為了圖安逸，正在拋棄真正的和重要的安全手段。

泰晤士報的評論可以使人啓發：

關於防務的協定……使英聯合王國政府得以解脫一九二一年英愛條約的條款。這些條款，曾使政府負起於戰時保衛考克、貝爾赫文和洛·斯威雷的沉重而困難的任務。

如果把直布羅陀交給西班牙，把馬爾太交給意大利，一定還更可以解脫哩。而且兩者對於我們人口的實際生存，關係還沒有像南愛港口那樣的直接。

關於這個可悲而可愕的故事，我只說到這裏為止。

第十六章 捷克斯拉夫

一個不至於成爲歷史爭論的爭論——希特勒的下一目標——「對於捷克並無惡意」——白勒姆的保證——一九三八年三月我往訪巴黎——達拉第繼任白勒姆之位——英意協定——和蘇台德領袖會談——德國將領的疑懼和勉強——蘇捷關係——史太林和貝奈斯——俄國內的陰謀和清黨——達拉第六月十二日宣言——希特勒對季特爾的諾言——威特曼少校赴倫敦的任務——八月二十七日我在賽東巴·亞滋向選民發表演說——八月三十一日我給哈里法克斯勳爵的信——蘇聯大使到却特威爾來訪問——我給外交部的報告——九月七日泰晤士報的社評——龐納的問題和英國的答覆——希特勒在緬倫堡的危機演說。

英國和法國在慕尼黑事件中，究竟是聰明還是愚笨，在若干年中，這個問題似乎將成爲歷史上無法解決的爭論。但是根據了從德國方面得來的資料，尤其是從紐倫堡審判中得到的，已經證明不至如此。爭論中的兩個主要問題是：第一，英法如堅決行動，是否能使希特勒退步，或引起推翻希特勒的軍事陰謀；第二，西方國家經過慕尼黑到戰爭爆發年月止的歲月後，其所處的對德國的相對地位，是否比一九三八年九月有所改善或更見惡化。

關於在慕尼黑以犧牲捷克而結束的危機，已經有過、而且今後還會有許多論述之作；這裏祇想提出幾點主要的事實，並說明其間的主要起落。這些都是必然的結果，因爲希特勒決心要將所有日耳曼人重行結合爲一個大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他並深信法英兩國的領導者因酷愛和平，和未能重整軍備，故亦不願戰爭。他對捷克用了他所常用的技倆。蘇台德的日耳曼人確有痛苦，但被他儘量加以誇大和利用。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希特勒在其對國會的演說中，公開攻擊捷克，他說「有一千萬以上的日耳曼人，生活在毗鄰我們邊境的兩國中。」德國有保護這些日耳曼同胞的責任，並應爲他們獲得「一般的自由，即個人的、政治的、和思想上的自由。」德國政府的公開表示關心奧國和捷克境內日耳曼人的地位，和德國在歐洲的政治攻勢秘密計劃，有極密切

的關連。納粹的德國政府公開宣布的目的有二個：把所有住在國境以外的日耳曼少數民族，納入德帝國內，和因此而可以在東方擴張其生活空間。至於德國政策中比較不公開的目的，具有軍事的性質。清算捷克，使其在戰爭中不能成爲蘇聯的空軍根據地，和成爲英法的軍事補充。德國參謀本部早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即已奉希特勒的命令，忙於草擬侵入和毀滅捷克國家的計劃了。

有一個草案如下：

德國武裝軍隊奇襲的目的，在使戰爭一經開始和在戰爭繼續期間內，消滅捷克對西線作戰所有的後方威脅，並使俄國空軍不能應用在捷克的主要空軍活動根據地。（註）

西方民主國家接受德國的征服奧國，大大的鼓勵了希特勒，使他對於捷克所有的企圖，更爲積極進行。軍事控制奧國境土，事實上是準備進攻布希米亞堡壘所不可缺少的初步工作。當侵略奧國正在全盤進行中時，希特勒在汽車中間向海爾特將軍說：「這將使捷克人大爲不便」。海爾特立即明瞭他這句話的意義，和使他看到將來的光景。這向他表明了希特勒的意向，同時由他看來，這也是表明希特勒對於軍事的愚昧。他說「德軍要由南面向捷克進攻，是簡直不可能的。經過林資的單軌鐵道，完全暴露在外，並且亦更談不到奇襲」。但希特勒主要的政治戰略觀念是對的。西部防線正在日漸加強，雖然離開完全成功尚遠，但已使對面的法軍回想起索姆和巴斯春特勒的慘痛經驗了（在第一次大戰中，法軍在兩地戰役，死傷慘重——譯者）。他深信無論法國和英國，都不至於願意作戰。

在德國向奧國進軍的那一天，柏林的法國大使報告，說戈林曾對駐柏林的捷克公使提出莊嚴保證，稱德國「對捷克並無惡意」。三月十四日，法國國務總理白勒姆向駐巴黎捷克公使莊重宣稱，法國將毫無保留的履行對捷克的義務。這些外交上的保證，不能掩飾殘酷的現實。大陸上整個戰略地位已經變更了。德國的議論和大

軍，現在可以直接趨向捷克的西境，在這一片區域內，居民屬於日耳曼種，他們已組成一個侵略性的、活動的日耳曼國民黨，亟望一有糾紛發生，即從事於第五縱隊的活動。

三月底，我去巴黎，和法國領袖們作透澈的談話。政府對我去重溫我和法方的原有接觸，表示贊成。我住在我們的大使館中，先後晤見了許多法國的主要人物，包括國務總理白勒姆、佛蘭亭、甘默林將軍、雷諾、柯脫、赫里歐、瑪林等輩。我會對白勒姆說，「德國的戰地榴彈砲，在射程方面或打擊力方面，據說均較即使重新裝配的法國七十五吋口徑的重砲為優良」。他答，「關於法國大砲的情形，我須靠你來告訴我嗎？」我說，「不，但請你問你們的技術專科學校，最近曾為他們舉行過一次關於現代七十五吋口徑大砲、比較火力的展覽，完全沒有使他們信服」。他立即改取溫和而友好的態度。雷諾對我說，「我們很明瞭英國決不會實行徵兵。那麼你們為什麼不組織一個機械化軍隊？如果你們有六個裝甲師，你們真將有一支強大的大陸軍隊了」，或是意思如此的話。當時好像有一位戴高樂上校曾寫過一本受到許多批評的書，書中說明現代裝甲車輛的攻擊力。它是這種言論所由來的根源之一。

大使和我單獨和佛蘭亭一同進午餐。與我在一九三六年看見他的樣子，完全變了，那時他負責而激動，現在他既無職位，故而冷靜、穩重，並深信法國除了和德國妥協之外，一無希望。我們辯論了達二小時之久。甘默林也來看我，他很信任當時法軍的力量，但當我問到他們的砲隊時，他頗現不安，因為他對於這一方面曾有正確的認識。他在法國政治制度範圍內，始終克盡他的能力。但法國政府對於歐洲舞台危險的注意力，因為國內政治不斷的漩渦，和白勒姆政府不久即將下台，心思不能專一。因此之故，關於危機發生時，我們兩國共同和相互間的義務，尤其必須予以明確的規定，不容絲毫的誤會。四月十日，法國政府改組成立，由達拉第繼任國務總理，龐納任外交部長。這兩個人在將來嚴重的歲月中，負着決定法國政策的重責。

為希望阻止德國作進一步的侵略起見，英國政府根據張伯倫的決定，設法在地中海方面和意大利尋求解決。這將加強法國的地位，並將使英法兩國可以集中力量，應付中歐發生的事件。墨索里尼因艾登的下台，已

感相當滿足，他並覺得正處於可以討價還價的地位，所以並不拒絕英國的這種反悔表示。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英意簽訂了一個協定，實質上使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和西班牙可以自由行動，以報答意大利在中歐方面可疑的善意。外交部對於這一次的交易，抱懷疑的態度。張伯倫傳的作者告訴我們，他曾在一封私人信中寫着，「你應得看看外交部所給我的草案；這真要使北極熊也爲之冰凍的」。(註)

外交部對於這一個舉動的疑懼，我亦有同感。

邱吉爾先生致艾登先生：

意大利協定當然是墨索里尼的完全勝利，他在地中海中設防對付我們，他的征服阿比西尼亞，他在西班牙的暴行，現在都得到了我們的熱誠接受。條約中規定我們非經「事前諮詢」，不得在塞浦路斯設防，這一點是非常有害的。其餘部份在我看來，祇不過是衣服內的填充材料而已。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

但是，我覺得在直率反對這個協定時，需要極大的慎重。這是一件已成的事實，並已被稱爲走向和平的一步。這個協定，無疑的能使地中海的火星，大概不至於引成歐洲的大火。法國爲了不至和英國分離起見，自必將如法泡製，以求自衛。最後，墨索里尼可能爲了他自己利益關係，阻止德國對於多瑙河流域的干涉。

在我有所決定以前，我希望知道你的見解和意思。我以爲英意協定祇是第一步；第二步將爲企圖和德國草率訂立甚至更爲虛有其表的協定，一方面用以撫慰英國人民，同時使德國的軍力日益加強，使德國對於東歐的計劃日益長成。

上週張伯倫曾秘密向（保守黨協會）全國聯合會行政部說，他「沒有放棄和德國成立同樣協議的希望」。他們聽了態度很冷淡。同時，我們空軍方面的進展，日益使人失望……

艾登致邱吉爾：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關於意大利協定，我同意你信中的見解。墨索里尼所給我們的，祇是以前曾經答應過而又破毀了的，祇有將軍隊由利比亞撤回一點是新的。但派至該地的軍隊，其原來目的，也許本祇是爲了擾亂性質。現在顯然正像我所預期的，墨索里尼在羅馬會議開幕以後，仍在西班牙繼續他的干涉。如果這種干涉是使佛朗哥達到勝利所必需，而竟有人相信墨索里尼肯中止干涉，他纔真是樂觀的人。

作爲一種外交手段而言，這協定中規定的機構，恐怕在實施之時，問題難免很多。它須待意大利人離開西班牙之後，纔發生效力。

但幾乎可以斷言，這一點必須要經過多少月以後纔能辦到，並且重要的既然並不在於意大利步兵之在場，而是他們專家和德國人的支持。那末對於撤退的是否已予實行，將極難作明確的斷定。但也許有人對這一點並不在乎。

其次是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地位，據我所知，那裏的情形不但未見改善，反有日趨惡化之勢。我恐怕在此時承認意大利的地位，對我們在阿王幾百萬有色臣民中的威信，將大為不利。

雖然，我對於你的意見，即對於協定採取任何態度時，必需極端審慎一點仍表同意。畢竟現在它還不是一個協定，如果我發表什麼言論，可以被認為更加妨礙了它的實現，那當然將成為我的過失。這也是我在我辭職演說中和在萊明頓時答應我要如此做的。

由我看來，國際局勢上最堪焦慮的事，是緊張局勢暫時鬆弛，也許會被人用以作為鬆懈國內努力的藉口，而鑒於時局的嚴重，這種努力早嫌不夠了。

希特勒正警覺的注視着這種情勢。對於他使意大利在歐洲危機中最後站在一條線上，也是很重要的。四月底，他和參謀本部首長會議時，他考慮如何加強進行。墨索里尼希望在阿比西尼亞可以自由行動。在這一種冒險行動中，他雖然已獲英國政府的默許，但也許最後仍需要德國的支持。如果如此，他應接受德國對捷克的行動，作為交換。這個問題必須早予實現，使在解決捷克問題時，意大利將參加德國的一邊。英法政治家們的宣言，當然受到柏林方面的研究。西歐國家，勸導捷克爲了歐洲和平而隱忍重用的用心，柏林深表滿意。漢倫領導下的蘇台德納粹黨，此時提出了在鄰近德境區域中，應行自治的要求。他們的步驟，由漢倫於四月二十四日在卡爾斯巴德發表的演說中，加以宣布。此後，普拉格的英法公使立即往見捷克外交部長，以「表示希望捷克政府，作最大的盡力，以謀這個問題的解決」。

五月間，捷克的日耳曼人奉命加強他們的煽動。五月十二日，漢倫往訪倫敦，使英國政府能更詳細知道他的同胞所受的不法行爲。他表示希望見我。我於是準備翌日在穆庇斯大廈中和他會談，當時在場的還有辛克萊爵士。由林特曼教授任翻譯。

漢倫主張的解決辦法，可以概述如下：

普拉格應有一個中央政府，負責處理外交、國防、經濟、和交通。所有政黨，在該地均得自由發表意見，政府應按多數決議而施政。

邊界要牽得由捷軍駐防，當然他們可以不受妨礙的開抵邊界。蘇台德日耳曼人區域，和可能其他的少數民族地方，均應實行地方自治權；這即是說，他們應有其自己的城鄉參議會，和一個全區議會，在區議會中，對經確實劃定界限的邊界以內，對當地地方有關的事務，可以提出辯論。他關於事實問題，如劃定邊界，他願意提交一個不偏不倚的，或甚至由國際聯盟委任的法庭公斷。各黨應可自由組織，自由選舉。在自治區域內，並應有公正的法庭。在德語區域中的官吏，如郵務、鐵道、和警官人員，當然應由德語的人擔任。在稅收的總數中，並應以適當的成數，撥付這些區域，作為行政費用。

捷克駐倫敦公使馬薩里克，事後獲得這次會談的通知，自己承認他對於這樣的解決方法，可以滿意。如果德國具有善意和守信，那末一方面無妨捷克共和國的獨立，另一方面和平解決大家承認的種族和少數民族的爭執，並不是不可能的。但對這個條件，我並不存什麼妄想。

五月十七日，漢倫和捷克政府為蘇台德問題，開始談判，漢倫在由英回國途中曾訪問過希特勒。當時捷克市選舉即將舉行，德國政府為準備起見，開始了一個適合的神經戰。德國軍隊向捷克邊境推進的謠言，已經不斷的傳布於外。五月二十日，張伯倫經請求轉向柏林，詢查究竟。德國的否認，並不能使捷克人安心，他們在五月二十至二十一日晚上，下令軍隊作局部的動員。

在這個階段，我們有研究德國用心的必要。在若干時來希特勒已經深信法國和英國是決不會為捷克而作戰的。五月二十八日，他召集他的主要顧問舉行會議，訓令準備進攻捷克。後來他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向德國致詞中，並加以公開宣布：

鑒於這不可容忍的挑釁，……我決定對於蘇台德德國問題作一次徹底的根本解決。五月二十八日，我命令（一）準備於十月二日對這個國家進行軍事行動；（二）立即和加速擴大我們西線的防禦工事。（註）

他的軍事顧問卻對於他的強力自信，並不一致同感。德國的將領不相信法國和英國對於元首的挑戰會屈

服，因為他們知道，除空軍以外，協約國的力量仍舊非常優越。要擊潰捷克的軍隊，突破或包抄希米亞陣線，實際上必須出動整個三十五師。德國參謀本部首長告訴希特勒，捷克的軍隊，必須承認是效率很高的，具有新式的軍械和配備。西壁或齊格斐陣線的設防工作，雖然陣地已經存在，但離開全部完成尚遠。因此在攻擊捷克之時，爲保護德國西線，防止可能動員一百師的法軍的進攻，德國祇有五個正規師，八個後備師。將領們聽到要冒這種危險，不禁相顧失色。反之，如果能再等幾年，德軍必可重新主宰一切。雖然在實行徵兵、在徵兵制、在萊因地事件、和在奧地利事件中，希特勒的政治判斷力，因爲協約國的愛好和平與懦弱，一再證明爲準確，但德國總司令部不相信希特勒的空言恫嚇能有第四次的成功。那些偉大的勝利國家，在軍事上顯然占着優勢，說他們會再度放棄他們的責任和榮譽，事實上也就是他們放棄根據常識和謹慎的路徑，聽起來似乎大出情理之外。此外還有與捷克同屬斯拉夫民族的蘇聯，在這個時候，她對於德國，正抱着充分威嚇的態度。

蘇俄和捷克的國家關係以及和貝奈斯總統私人，保持親密的和友誼的態度。這根原一方面由於種族關係，一方面亦由於最近發生的幾件事。關於這幾件事，這裏有略加說明的必要。當一九四四年一月中，貝奈斯總統到馬拉克西來看我時，他告訴了我這一個故事。一九三五年，他由希特勒處獲得了一個建議，如果捷克能保證在法德發生戰爭時維持中立，他即將保證在不論何種情形之下，尊重捷克的完整。當貝奈斯指出根據條約，他在這種情形中有和法國一致行動的義務時，德國大使回答說，本沒有廢棄條約的必要。祇要在戰爭發生時，用不動員或不出兵的方法，便可把條約破壞無遺。這個小共和國，因爲所處地位關係，對於這一類的建議，無法表示其憤怒。他們對於德國的畏懼，已極嚴重，尤其是鑒於德國隨時可以提出煽動蘇台德日耳曼人的問題，使他們陷於非常的困難和日益加重的危險。他們於是對於這個提議，不加批評，也不加可否，置諸不談，這個問題有一年多沒有再提起。至一九三六年秋，貝奈斯總統由德國高級軍事方面收到了一個電訊，稱如果願意利用元首的建議，他就應該迅即行動，因爲不久在俄國即將發生的事故，將使他能給德國的任何幫助，變成無足輕重。在貝奈斯正在考慮這種使人不安的暗示時，他注意到捷京蘇大使館正在頻繁傳遞俄德兩國政府重要人物間

的通訊。這是所謂軍事人員和共產黨內保守分子的陰謀的一部份。他們要想推翻史太林，和成立採取親德政策的新政體。貝奈斯總統立即將他所能探到的一切，通知了史太林。（註四）此後跟着蘇俄境內發生了殘酷的，但也許是並非不必要的軍事和政治清黨運動，和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一連串的審判。檢察官維辛斯基在審判中，曾擔任獨斷獨行的角色。

那些共產黨保守派雖則顯然不致會和軍事領袖攜手，反之亦然，但他們對於把他們趕出的史太林當然都不勝嫉忌，因此按照極權國家中所採的標準，自然最好是把他們同時一網打盡。革命時候的領袖如徐諾維夫、布哈林、賴台克和其他人，英王喬治六世加冕時代代表蘇聯的杜卡徹夫斯基將軍和陸軍中許多高級軍官，都被鎗斃。少校階級以上的軍官和官吏，被『清算』者，總共約在五千人以上。俄軍以犧牲其軍事效率為代價，肅清了軍中的親德份子。蘇聯政府的偏見，以顯著的方式特別轉向德國，史太林覺得對於貝奈斯總統負有個人的感激之忱；蘇聯政府很熱切的願意幫助他和他的受威脅的國家，抵抗納粹危險。這種情形，希特勒當然極為明瞭；但就我所知，英法政府卻感到莫明其妙。在張伯倫和英法的參謀本部看來，一九三七年的清黨運動，主要祇是表現出俄軍內部的瓦解，和蘇聯被殘忍的憎恨和報復，弄得四分五裂而已。這也許是一個過甚其辭的看法；因為一個建立於恐怖之上的政府制度，如能不顧一切和成功的掌握住它的權力，也很可以使其地位穩固。這一段敘述中所要表示的顯著事實，即是俄國和捷克與史太林和貝奈斯的密切關係。

但無論德國內部的劍拔弩張及貝奈斯和史太林間的聯繫，外界都並不知道，也沒有為英法公使所領會得。齊格斐陣線雖然尚未完成，似乎已是一個可怕的障礙物。德軍雖然還是新成立的，但其確實的戰鬥力，已無法加以正確的估計，並顯有誇大失實之處。此外對於不設防城市的空中攻擊，其危險更無法衡量。而尤要者，在民主國家人民心中，都憎恨着戰爭。

（註）有若干事實證明貝奈斯的消息，事前會由蘇聯國家政治保安局通知捷克警方，保安局希望這個消息能由一個友善的外國方面傳給史太林。但這並沒有減除貝奈斯對於史太林的効勞，所以是沒有關係的。

雖然如此，達拉第於六月十二日重申其前任在三月十四日所作的保證，宣稱法國對於捷克所負的義務「是神聖的，無法規避的」。這個重要的聲明，把認為十三年前的羅加諾條約使東歐在未能訂立同樣公約以前，成一切不定的空談，一掃而光。在歷史之前，法國和捷克在一九二四年所訂的條約，無論在法律上，或事實上，無疑具有完全的效力；即在多事的一九三八年中，法國政府的歷屆元首都會先後作過如此的申明。但在這個問題上，希特勒深信祇有他的判斷是正確的，於是他在六月十八日宣佈了向捷克進攻的最後命令，在這中間，他曾一度設法撫慰他感到焦慮的將領。

希特勒致季特爾：

我祇有在深信法國不致進軍，因此英國不致干涉時，（註）也像上次進入不設防區及奧國一樣，纔將決定進攻捷克。

爲了要混淆視線起見，希特勒在七月初，派他的隨從副官威特曼少校到倫敦去。哈里法克斯勳爵於七月十八日接見這位特使，外表上沒有爲德國大使館所知。據他表示，元首爲英國對於他過去的提議沒有反應，感到痛苦。也許英國政府可以讓戈林到倫敦來作更詳盡的討論。在某種情形下，德國是可以準備把進攻捷克的行動，延緩一年。幾天以後，張伯倫和德國大使研究此事可能性。爲了要澄清普拉格的局勢起見，英國首相早已向捷克建議，派遣一個觀察員到捷克，協助促進友善的妥洽。英王七月二十日巴黎之行，使哈里法克斯有機會和法國政府討論這個提議，經過簡單交換意見以後，兩國政府同意進行調解的努力。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張伯倫在國會中宣布遣派倫錫曼勳爵至普拉格，目的爲就地促成捷政府與漢倫間的和平解決。翌日，捷政府發表國內少數民族法案，作爲談判的根據。同一天，哈里法克斯勳爵在國會中說，「我不相信今日歐洲任何國家中的負責領袖，是在願意作戰的」。八月三日，倫錫曼勳爵抵達普拉格，即

（註）紐倫堡文件第二部第十頁。

和有關各方進行一連串冗長的和錯綜的談話。不到兩個星期，這些談判，終於破裂；從這個時候起，時局即有迅速的開展。

八月二十七日，現任外交部長的里賓特洛甫報告意大利駐柏林的大使曾去看過他，他「由墨索里尼接到另一書面訓令，請德國及時告訴他對捷克採取行動的可能日期」。墨索里尼要求通知，使他「可在適當時期，在法國邊境方面，採取必要措置」。

八月間，焦慮日益增加。二十七日我向我選區中的選民說：

我們在這個賽東·巴亞滋的古森林裏，單是這個名字，即使我們回到諾爾曼時代——就在此地，在和平守法的英國人的中心，很難去理解在歐洲流行的凶暴的感情。在這令人焦慮的一月中，你們無疑的在新聞紙上看到報告，一個星期好，一個星期壞；一個星期好一些，一個星期壞一些。但我必須告訴你們，歐洲的和世界的全部局勢，正在繼續移向不能再予遷延的頂點。

戰爭當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由家庭中應召入伍的德國大軍被解散之前，對於和平的危險，即無法解除。一個不受到任何人威脅，亦不怕任何人的國家，而將一百五十萬士兵實行戰時編制，是一個極嚴重的步驟。……在我看來，我同時也必須坦白的告訴你們，這些武力實行戰時編制，是存心想在極短時間內達到一個結果的。

我們對於政府派錫曼爵士至普拉格之舉都表贊同，我們訴求着他的調解任務，可以成功；現在看來，捷克政府也確正竭盡全力調整他們內部的情況，對於不至使他們國家瓦解的任何要求，都預備接受。……但更大和更狂暴的野心，可以以阻止妥協的成立，這樣一來，歐洲和文明世界，必將面對納粹德國的要求，或者遭遇德國納粹方面的突然暴烈行動，包括實行進攻和征服這一個小國。這一種事件，將不單是對捷克進攻；並且是對全世界文明和自由的一種暴行。……

不論發生什麼，世界各國都應知道——我們政府也應該讓他們知道——英國和英帝國，並非不能盡其本職和履行責任的，像在歷史上尚未忘記的其他偉大際會中他們所做的一樣。

在這些時候，我和閣員們略有接觸。我和哈里法克斯勳爵的關係，因為我和政府在國防及外交方面有着嚴重的政治異議，自然不免有所影響。大體上，我和艾登的意見是一致的。我對於他的後任者，不能抱同樣的觀感。雖然如此，在有機會會面的時候，我們仍屬朋友，並且是多年的老同事，我也時時寫信給他。偶然他也請我去看他。

邱吉爾致哈里法克斯勳爵：

一九三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如果貝奈斯讓步，倫錫曼認為是一種公平的提議而仍被拒絕，那麼在我看來，本星期中祇有兩樁事可以用來增加對希特勒暴行的阻力，而這兩樁事，又都無須你提出須受拘束的可怕保證。

第一，是否可能由英、法、俄三國提出一個聯合照會，說明（1）他們對和平與友善關係的願望；（2）他們對於德國的軍事準備，深感焦慮；（3）他們對於和平解決捷克問題，有一致的利益；（4）德國對捷克實行侵略，將成為三國全體的重要問題。這個照會草訂以後，應由三國大使正式提給羅斯福過目，我們並應竭力促使他對這問題儘其可能而行動。我以為可能他也會通知希特勒，強調說明時局的嚴重，和宣稱由他看來，侵犯捷克之舉，勢所必至將引起世界大戰，所以他熱切希望能得到一個友誼的解決。

依我看來，這種辦法，能使德國官方的和平份子有堅持其立場的最好機會，希特勒也許可以和羅斯福談判而得到圓滿。這些發展，當然無一能夠預言，祇能視為希望而已。重要的是能提出一個聯合照會。

可能解救這種局勢的第二步，是艦隊移動，並出動後備隊中的小艦隊和巡洋艦隊的全部服役。我的意思，並不是召集皇家後備艦隊，或實行動員，但我相信有五六個小艦隊，可以提高到第一艦隊的規模。此外約有二百艘括網漁船，可以用於反潛艇工作。採取了這種或旁的措施，在海軍港口方面可以發生極大的聲動，作為避免戰爭的一種阻力，或戰爭發生時的一種及時警戒，都祇有有利的影響。

我深深希望，你對於一個以前曾親身經歷過這類日子的人的這些建議，不以為忤。很明顯的，速度是有關生死存亡的。

九月二日下午，我接到蘇聯大使一封信，說他為了一個緊急問題，希望立即到卻特威爾來看我。我和梅斯基大使私人的友誼，已有多時，他也常和我的兒子倫多爾夫會面。我因此接見了大使，在略事寒暄之後，他告訴了我下面詳述的故事。在他所說尚不多時，我就感覺到他所以對我一個私人作這一次的談話，是因為蘇聯政府寧願走這一條路，而不願直接向外交部提出建議，以致也許會受到拒絕。他們顯然存心，我一定會將我聽到的一切告訴給我的政府。大使雖沒有如此說，但從他並沒其請我保守秘密一事，便可以推測出來。我立即認為這件事極關重要，所以在轉告當局時非常小心，避免參加自己的意見，亦不用可能引起我們間爭執的文字，以免在哈里法克斯和張伯倫考慮時，有偏頗的影響。

邱吉爾致哈里法克斯勳爵：

我私人從絕對可靠的來源，得到了下述的情報，雖然我並未經請求，但我覺得有應該報告你的義務。

一九三八年九月三日

昨天，即九月二日，法國駐莫斯科代辦（大使正在假）往訪李維諾夫，以法國政府的名義，問他在捷克抵抗德國攻擊時，俄國將給予捷克何種援助，特別是在波蘭和羅馬尼亞可能會維持中立的困難情形之下。李維諾夫反問他法國自己預備如何做法，他指出法國負有直接的義務，而俄國的義務則是須視法國的行動以為斷。法國代辦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不過李維諾夫對他說，第一，蘇聯決意履行他們的義務。他承認波蘭和羅馬尼亞的態度所可能引起的困難，但他以為在羅馬尼亞方面，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

在最近幾箇月中，羅馬尼亞政府的政策，對俄顯然十分友善，他們間的關係大為改善。李維諾夫以為克服羅馬尼亞有所顧忌的最好方法，是假手於國際聯盟。例如，如果國聯斷定捷克是侵略的犧牲者，而德國是侵略者，可能決定羅馬尼亞准許俄國陸軍和空軍過境的态度。

法國代辦指出，國聯行政院可能不能獲得一致的決議，李維諾夫答稱，他以為多數的決議就已夠了，同時羅馬尼亞可能在行政院表決時加入多數的一方面。李維諾夫因此主張應以有戰爭危險的理由，根據第十一條召集國聯行政院，國聯各國應共同諮商。他以為時間也許已極迫促，如能做得愈早愈好。他以後繼續告訴法國代辦，俄法和捷克間的參謀部，應立即進行會談，以尋求援助的方法和手段，蘇聯準備立即參加這類參謀部的會談。

第四，他提起他在三月十七日所作的、在我們外交部內應存有副本的談話，他主張應由和平的各國就維持和平的最好方法，進行商談，或者能發表一個包括法、俄、英三大國在內的聯合宣言。他相信美國對於這一個宣言，將予以道德上的支持。這些話，都是以俄國政府的名義而說的，是俄國政府認為阻止戰爭的最好方法。

我指出，今天的消息似乎表示希特勒方面的態度已趨和平，所以我以為如非漢倫貝奈斯的談判，發生過失不在於捷克政府的新破裂，英國政府不致於考慮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如果希特勒確有轉向和平解決的意思，我們不願再激動他。

這些消息，當然你可能由其他方面知道，但我認為李維諾夫的宣言極端重要，我不應將這消息的傳達給你，委之於機會。

我在將報告口授以後，立即送給哈里法克斯勳爵，他在九月五日以慎重的態度答復，他以為在現在根據第十一條而採取的行動，對時局不會有什麼幫助，但他將以這提議牢記於心。「我以為在現在，正像你所指示的，我們應根據漢倫已從柏徹斯迦登攜回來的報告，重新檢討全部情勢」。他又說，情勢仍舊極堪憂慮。

泰晤士報在其九月七日主要的論文中說：

捷克政府對於蘇台德人最後提議中的要求，已經願意接受，如果今日他們又有新的要求提出，那末唯一可推論的是：德國的目的，不僮限於爲捷克共和國不能安居的人解除疾苦而已。在那種情形之下，捷克政府似乎值得考慮，他們應否放棄在若干方面已有贊成表示的成立一個種族比較更純一的國家的計劃，即將鄰近邊境的異族人民，割讓於與他們同一種族的鄰國。

這意思當然即是將布希米亞堡壘線的全部地帶交出。雖然英政府立即聲明，這篇泰晤士報上的論文，不能代表他們的意見，但國外的尤其是法國的輿論，並沒有因此而得到安心。即在同一天——九月七日——法國駐倫敦的大使往訪哈里法克斯勳爵，代表政府請英政府闡明，如德國向捷克攻擊時，英國擬採什麼立場。

當時的法國外交部長龐納宣稱，他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十日，曾向我們駐巴黎大使斐普斯爵士提出下面的問題：「明天希特勒也許就要進快捷克，如果如此，法國將立即動員。她將轉向你，說「我們要進軍了；你不是和我們一同進軍」？英國將如何答覆」？

下面是經過內閣同意的答覆，由哈里法克斯勳爵於十二日交給斐普斯爵士轉交：

我當然知道我們能對於這問題有一個明白的答覆，對法國政府有如何的重要性。但像你向龐納指出的，這個問題的本身雖極簡單明白，但決不能和問題提出時的情況分離，而現階段的情勢，則完全是假定的。

再者，在這種事件中，英政府亦不能只管其自身的地位，因爲不論他們作任何決定或採取任何行動，事實上將使自治領同樣受到拘束的義務。自治領的政府，當然決不願在實際情勢並未發生之前，由別人代他們決定其立場，他們將希望由自己來決定這種立場。

所以 我在現階段中，對龐納的問題我所能提出的任何答覆，將祇是：雖然英政府將決不讓法國的安全受到威脅，但他們不能確言其將來行動的性質，也不能確言其將採取行動的時間，因爲到那時的情勢，現在他們還不能預見。（註）

法國政府根據「英政府將決不讓法國的安全受到威脅」一點，詢問在它如果受到威脅時，法國可到得什麼

（註）印在龐納從華盛頓到法國外交部第三六〇——六一頁。

援助。根據龐納，倫敦的答復，是兩個沒有摩托化的師團，在戰爭開始的六個月中，另有飛機一百五十架。如果龐納的原意，不過是爲了要讓捷克的命運委諸於天命，尋一個藉口，則我們應該承認他的尋求是成功的。

九月十二日同一天，希特勒在紐倫堡黨員大會的演說中，向捷克人大事攻擊，捷克於下一天在國內某幾區內實行戒嚴，以爲答覆。九月十四日，他們和漢倫的談判，完全破裂。十五日，蘇台德領袖逃往德國。危機的頂點到達了。

第十七章 慕尼黑的悲劇

張伯倫掌握大權——他往訪柏翰斯迦登——他和希特勒會識——倫錫曼的任務終了——英法對捷克的壓力——貝奈斯總統的風聲——法邱將軍放棄法國公民籍——我在九月二十一日中的申明——李維諾夫在國聯大會中的強硬宣言——蘇聯的實力被漠視——兀德齊集在厄運注定的國家的四周——張伯倫和希特勒在高德斯堡——希特勒的最後通牒——爲英法內閣的拒絕——衛爾遜爵士去柏林的任務——我在九月二十六日往訪唐寧街——哈里法克斯勳爵的公報——英國海軍動員——在德國前線的後面——培克將軍的免職——希特勒與陸軍參謀部的鬭爭——海爾特將軍的陰謀——陰謀失敗的所傳原因，九月十四日——德國參謀部提給希特勒的建議書，九月二十一日——李特海軍上將的規勸——希特勒動搖了——張伯倫九月二十七日的廣播——他第三次建議訪問希特勒——他對墨索里尼的呼籲——九月二十八日下議院中的好戲，——慕尼黑會議——一張廢紙——張伯倫凱旋回來——「光榮的和平！」——李特爾元帥在紐倫堡審問中的證言——希特勒的判斷再度證實——道德和行爲方面幾個通則——法英的致命路徑。

張伯倫先生現在完全控制着英國的外交政策，而衛爾遜爵士則成爲他主要的親信和代表人。哈里法克斯公爵在其外交部的環境中，雖感到疑慮日增，但仍跟從着其首長的指揮。內閣深切不安，但仍表示服從。下議院中政府多數黨，由黨的監督技巧的操縱着。一個人、也祇有一個人管理着我們的事務。他對於他所應負的責任，或他應盡的個人努力，並不有所畏縮。

九月十三到十四日的深夜，達拉第和張伯倫取得了連絡。法國政府認爲如果法英兩國領袖，能從個人的立場會同去見希特勒，也許可有相當的裨益。但張伯倫已自有主意。他自己發動，拍了一個電報給希特勒，建議去看他。第一天他向內閣報告他的行動，當天下午他收到希特勒的回電，邀請他到柏翰斯迦登。因此，英國首相在九月十五日早晨飛往慕尼黑機場。選定這個時候，在各方面看起來都是不適當的。消息傳到了捷克首都時，捷領袖簡直不相信是真的。他們所驚奇的是，在他們對蘇台德區域內部情勢第一次得以控制之時，英首相竟會自己直接去訪問希特勒。他們認爲首相之行將削弱他們對德的地位。希特勒九月十二日發表的挑釁演說和跟着

來的由德國人鼓動的漢倫黨徒的叛變，並沒有得到當地人民的支持。漢倫已經逃到德國，蘇台德日耳曼黨失去他的領導之後，顯然反對作直接的行動。捷政府在其所謂「第四次計劃」中，正式向蘇台德日耳曼領袖建議地方自治的行政計劃，內容不但超過了漢倫於四月間在卡爾斯巴德所提出的要求，並且亦完全合乎張伯倫在其三月二十四日演說中表示的意見，和西門爵士在八月二十七日演說中發表的文告。但甚至即使倫錫曼助爵，也發覺蘇台德領袖和捷政府間成立滿意的磋商，是德國人所最不願的東西。張伯倫的此行，使他們有一個增加要求的機會；蘇台德黨中的極端份子，根據由柏林來的訓令，現在公開主張和德意志帝國合併了。

首相的飛機於九月十六日下午到達慕尼黑黑機場；再改乘火車前往柏轍斯迦登。當時，德國所有的電台都廣播着漢倫的公告，要求將蘇台德區域割讓給德意志帝國。這是張伯倫下機場時得到的第一個消息。他們顯然計劃着要使他在和希特勒會面之前，得到這個消息。以前在德政府方面或在漢倫一方面，從來沒有提起過割讓這一問題；而在幾天以前，外交部並曾宣稱過，這不是英政府所能認可的政策。

張伯倫和希特勒間的談話，其現存的紀錄已由斐林加以發表。我們可以從他的敘述中得到的要點是：「雖然我在他的面容上，似乎看到的是殘酷和無情，但我所得到的印象是，這一個人人在允諾以後，他的話是可以始終信賴的。」（註）事實上，像我們前面已看到的，希特勒早在幾個月以前即已決心並準備侵略捷克，所等待着的祇是最後的信號而已。首相在星期六，即九月十七日回到倫敦，他立即召集內閣。倫錫曼助爵現在已經回來，他的報告自會引起注意。他在這些時候，健康極壞，他在辛苦的任務中受到極度緊張，更使他變成十分消瘦。他現在建議採取「立即劇烈行動的政策」，即「將德國人占優勢的區域移交給德國」。這個辦法，至少有簡單明瞭的長處。

首相和倫錫曼助爵都深信祇有將蘇台德區域割讓給德國，始可勸阻希特勒，不去侵犯捷克。張伯倫在和希

特勒會面時，對於「後者充滿鬥意」，發生強烈的印象。他的內閣也認為法國毫無鬥志。因此，希特勒向捷克提出的要求，根本無法抗拒。有的大臣用了「民族自決權」、「少數民族要求正當待遇」等文句，聊以自慰，甚至有儼然「擁護小人物、反抗捷克暴漢」的神情發生。

現在所必須做的，是和法國政府一致作向後走的步驟。九月十八日，達拉第和龐納來倫敦。張伯倫早已決心在原則上接受希特勒在柏翰斯迦登向他說明的要求。剩下來所要做的事，是草擬建議，送由英法兩國在普拉格的代表向捷政府提出。法國國務總理和部長帶來了一套設想當然更為週到的草案。他們不贊成公民投票，因為他們知道，這樣一來，斯拉伐克和小俄羅斯區域或將引起同樣的要求。他們贊成直截了當將蘇台德區割讓給德國。不過他們並主張英國政府應該和法國，和他們未曾諮詢過的俄國，共同保證割裂以後的捷克的新國境。

我們中有許多人，甚至在內閣圈子以外的，都感覺到龐納實代表着失敗主義的精髓，所有他的聰明的搬弄唇舌，目的無非在「以任何代價求取和平」。在他戰後寫成的書中，他當然竭力想將全部的責任推到張伯倫和哈里法克斯的身上。實在關於他自己當時心中所存的念頭，不能有什麼疑問可言。他願意犧牲一切，以使法國避免履行其莊嚴的、正確的、和最近重中的義務，即為保護捷克而作戰。這時候的英法內閣，在外表上，好像攪在一起的兩個爛西瓜；而實在所需要的卻是以白刃示威。有一點他們是同意的：即不應和捷人有所諮商。捷人應照着他們保護人的決定而行事。這「森林中的赤子」，真受到了無可再壞的待遇。

在向捷克人提出他們的決定或最後通牒時，英國和法國說：「法國和英國都知道所要求捷克的犧牲是如何的重大。他們都覺得，有聯合坦白說明為安全所需要的條件的義務……首相在至遲星期三以前，要和希特勒先生重行會談，如可能還要提早，因此，我們覺得應請你儘早給我們答覆。」於是，這個建議即在九月十九日的下午提交給捷政府，建議內容稱，捷境內日爾曼人占居民半數以上之各區，都須移交德國。

最後說來，英國並無保護捷克的條約義務，她也沒有用任何非正式的方法作過這一類的保證。但法國是確

實受着條約的拘束的，條約規定如果德國攻擊捷克，法國應該對德作戰。二十年來，貝奈斯總統始終是法國一個忠心耿耿的盟友，並且幾乎是法國的附庸，在國際聯盟或其他地方始終支持着法國的政策和利益。如果有所謂神聖莊嚴的義務，此時此地便是。白勒姆和達拉第的宣言，都是言猶在耳。法國政府自食其言，真是劫數的前兆。我始終認為貝奈斯的屈服是不對的。他應該防衛其防線。據我在那時的意見，戰爭一經開始，法國在全國熱情洶湧之下，一定會起而幫助，而英國也可能會立即與法國採取一致的行動。在這危機達到高潮時（九月二十日），我到巴黎去了二天，會見了我在法國政府中的老友，雷諾和孟特爾。這二位部長都非常懊喪，並有向達拉第內閣辭職的意思。我反對他們的辭職，因為他們的犧牲不會變更事件發展的路徑，反而使法國政府因損失兩個最能幹最有果斷的人而更形荏弱。我甚至胆敢將這意思明白告訴了他們。在這痛苦的訪問之後，我便回到倫敦。

九月二十到二十一日夜間二時，法英兩國駐普拉格的公使，往訪貝奈斯總統，告訴他已沒有根據一九二五年德捷條約而實行公斷的希望，並力促他「在法國和英國不能負責的情勢發生之前」，接受英法的建議。法國政府對於這一個通知，深感自愧，所以訓令其公使僅用口頭提出。在這種壓力之下，捷政府於九月二十一日屈服於英法的建議。當時在普拉格有一位名法邱的將軍。他自一九一九年起，即為法國在捷克軍事代表團團員之一，並由一九二六年起升任團長。他現在申請法政府准他離職，並即投身於捷克的軍隊。他也改取了捷國國籍。

法國會作下面的不能輕予置諸不論的辯護：即如果捷克拒絕屈服，結果發生戰爭，法國當然要履行其義務；但如果捷人準備一有壓力即予屈服，則法國的榮譽即可以保全。這一點我們祇可以讓歷史去判斷了。

在同一天，即九月二十一日，我對於當前危機，向倫敦新聞界發表了一篇申明：

在英法壓力之下將捷克瓜分，等於是西方民主國家對納粹武力威脅的完全屈服。這一類的完全失敗，無論對英國或法國，都不能帶來和平或安全。這反而將使這兩個國家處於更弱和更危險的形勢之中。捷克的力量抵銷以後，等於說德國就可抽出二十五個師團的兵力，轉而威脅着西線；此外，等於替勝利的納粹打開了到黑海的通路。所以不祇是捷克，實在所有國家的自由和民主都受到了威脅。以為拿一個小國投入虎口，即能得到安全，這種信念實在是致命的錯誤。德國的戰爭潛力，能在短期間內迅速增長，其速度將遠較法國和英國能完成其必要防禦措施的時間為快。

九月二十一日在國際聯盟大會中，李維諾夫公開提出警告：

……在現在，捷克的內政正受着一個鄰國的干涉，並受到咆哮的攻擊恐嚇。歐洲最古老的、最文明的、最勤懇的民族之一，她經過了幾世紀的壓迫之後才獲得獨立，今天或明天也許即要決定拿起武器以保衛這種獨立了……

奧地利被消滅了，這樣一樁重大事件，竟會在國際聯盟中被毫不注意的過去。蘇聯政府深知這事件對於全歐洲，尤其是對捷克的命運，有着重大的意義，所以在德奧合併之後曾立即正式向歐洲各大國建議，對於這事件的可能後果，應立即加以集體的考慮，以便採取集體的預防措施。可遺憾的是，我們的建議並沒有受到其應得的重視，這個建議如果實行，可能使我們不至受到全世界現在為捷克的命運所感覺到的恐慌。……在我離國來日內瓦的幾天以前，法國政府第一次來問捷克如被攻擊時我們將採何種態度，我用我政府的名義提出下面完全明瞭和毫不含糊的回答：「我們準備根據條約（法蘇協定）履行我們的義務，並和法國合作以我們所能採用的方法援助捷克。我們的軍部準備立即參加法捷軍部代表舉行的會議，以便商討適合時機的措施」……祇在兩天以前，捷克政府向我國政府提出正式詢問，即如果法國忠於其義務而願給予類似的幫助時，蘇聯是否準備依照蘇捷條約，給捷克以直接的有效的援助。對於這個問題，我國政府給了一個明確的正面的答覆。

奇怪的是，這樣一個有關係的大國所發表的公開而無條件的宣言，竟會在張伯倫的交涉中，或在法國對於危機的處理中，一些也不發生影響。我聽到有人說，在地理上俄國無法將軍隊開到捷克，同時在發生戰爭時，俄國的援助亦將限於小規模的空軍援助。首先自然需要羅馬尼亞和比較次要的匈牙利，同意讓俄軍通過其土地。據梅斯基對我表示，這種同意至少在羅馬尼亞方面，如果由一大同盟在國際聯盟的領導之下對它加以壓力和提出保證後，是可以得到的。由俄國經過喀爾巴阡山到捷克有兩條鐵道：北面的一條由塞諾維茲經過布哥維納；南面的一條由得布勒森經過匈牙利。祇要利用這兩條與布哈列斯脫和布達佩斯有相當距離的鐵道，即可以

供應三十師的俄國軍隊。這些可能性作爲維持和平的支柱而言，將可以使希特勒受到重大的妨礙，並且在發生戰爭時，幾乎斷然可以引起更遠大的發展。有人竭力強調蘇聯貳心無信，因此，蘇聯的建議事實上未被重視。蘇聯的建議沒有被放在對付希特勒的天平秤上，受到冷漠的——不必說蔑視——的待遇，在史太林的心中留下了一個痕跡。事態的發展，好像世界上就沒有蘇聯這個國家似的。爲了這，我們在以後付下了很重大的代價。

九月二十一日墨索里尼在特累微左演說時說——並非是毫無所指的——「如果捷克覺得它今日所處的地位，可以稱爲是一種『微妙的情勢』，這是因爲它曾是——我們或許已可以用『曾是』一字，我不久便將告訴你們爲了什麼——不僅是捷克，而是『捷克、日耳曼、波蘭、馬扎兒、露遜尼亞、羅馬尼亞、斯拉夫』，現在這個問題既經發生，我要鄭重主張，這樁事一定要依照了一般的方式來加以解決」。（註）

在英法建議的恥辱之下，捷克政府被迫辭職，另行成立了一個由薛洛維將軍領導的無黨無派政府。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捷克駐西伯利亞軍隊的司令長官。九月二十二日，貝奈斯總統對全國廣播，莊嚴的籲求人民保持鎮靜。在貝奈斯準備廣播時，張伯倫已經飛往德國，去和希特勒作第二次的會面。這一次是萊因地的一個城市高德斯堡。英國首相帶了爲捷政府所接受的英法建議的詳節，以作爲和元首最後討論的根據。這兩個人人在高德斯堡的旅館中會見，這即是四年前希特勒爲了羅姆清黨事件而忽忽離開的那一家旅館。從一開頭，張伯倫即發覺他遇到了他自己所謂「一種全出意外的情勢」。他回來後曾在下議院中描述當時的實況：

在和韋斯迪登時，我聽說如果接受了自決的原則，希特勒先生當可以和我討論實行的方法和手段。他後來告訴我，他決想不到我竟會回來，告訴他原則已經接受。我不希望下院以爲他是有意在欺騙我。我自己一些也沒有作如此想——但，對於我，我希望在我回到高德斯堡時，我祇要和他靜靜的討論我所帶去的建議，就可順利解決；使我大爲震驚的是，我在談話開始時，即聽說這些建議無法加以接受，而應代以另外一套我所未料到的建議。

我覺得我應該有一些時候，以考慮我究竟應該如何做。我因此退出，我的心中，對於我任務的是否成功，充滿了不祥預感。無論如

（註）見烈浦加著《慕尼黑》和其後中所引，第一一七頁。

何，我先使希特勒先生答應了延長其以前提出的保證，即在交涉結束之前，他不作軍隊的調動。在我的另一方面，我請求捷政府避免足以引起事變的任何行動。

討論便如此停頓，直等下一天纔繼續進行。九月二十三日整個早晨，張伯倫在旅館的洋台上踱方步。他在早餐後送了一封信給希特勒，說他準備將德國的新建議傳遞給捷政府，但指出有重大的困難。希特勒在下午給他的回答中，毫無讓步的跡象，張伯倫於是要求他在當晚最後一次會議中提出附有地圖的正式的備忘錄。捷克現在已開始動員，英法政府正式通知其在普拉格的代表，申明他們不能再勸告他們不要動員的責任。在那天晚上十時三十分鐘時，張伯倫再度會見希特勒。會見的情形，最好是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明：

在我和德國國務總理最後一次的會談中，我收到備忘錄和地圖，會談由當夜十時半開始，延長至次晨一二時為止，當時在場者除了漢特遜爵士和衛爾遜爵士之外，尚有德國外交部長；我第一次在備忘錄中發見有一個時間的期限。因此，在這一次，我極坦白的發言。我盡我的力量詳述這類條件如加堅持所可能發生的危險，和如果發生戰爭時，所能產生的可怕後果。我表示，這一個文件，這個我稱爲最後通牒而非一個備忘錄的文件中所用的文字和所持的態度，將使中立國家的輿論大爲震驚，我痛責德國國務總理完全沒有在有任何方面響應我爲尋求和平而作的種種努力。

我應附帶說明，希特勒懇切向我反覆說明他在柏赫斯迦登所已經說過的，即這是在歐洲最後一個的土地野心，他沒有要將日耳曼以外其他種族包括在德意志民族內的願望。第二點，他仍是很懇切的說，他希望和英國友善，如果這蘇台德問題能以和平解決，他極願恢復商談。誠然，他說：「此外還有一個棘手問題，即殖民地；但這是不致引起戰爭的。」

九月二十四日下午，張伯倫飛返倫敦，在第二天，內閣開了三次會議。倫敦和巴黎雙方的輿論，顯有強硬的趨勢。討論結果，決定對於高德斯堡條件，予以拒絕，這個情報經通知德國政府。法國內閣同意這種決定，並立即實行部分的動員，其效率竟出乎預料之上。九月二十五日晚上，法國國務總理和部長又來倫敦，勉強接受了他們對捷克的義務。次日下午，衛爾遜爵士奉派攜首相親筆信到柏林去見希特勒，這時正在後者準備在競技宮演說的三小時以前。衛爾遜爵士所能得到的唯一答復，即希特勒不願放棄高德斯堡最後通牒中所定的期限，即星期六、十月二日；除非他在星期三、二十八日下午二時能夠接到捷克的同意，他將在這一天向有關的土地進軍。

那天晚上，希特勒在柏林發表演說。他提到英法時用了懇摯的語氣，但對於貝奈斯和捷人則加以粗暴而又殘酷的攻擊。他斷然的說，捷克人應在二十六日離開蘇台德區域，但在這個問題一經解決以後，他對於捷克所發生的一切將不復再感興趣。「這是我在歐洲最後的土地要求」。

像在類似的其他時候一樣，由於危機日益惡化，我和政府的接觸亦日趨頻繁密切。九月十日，我訪首相於唐寧街，作了一次長談。九月二十六日又有一次，他或是請我去，或是欣然准我去見他。在這生死關頭的一天的下午三時半，他和哈里法克斯勳爵在內閣會議室中接見我。我催他們實行我在八月三十日致哈里法克斯勳爵信中所提出的政策，即由英法俄作一共同宣言，表示他們一致反對希特勒侵略的情緒和決意。我們詳細討論了一個公報，我們的意見似有了完全的一致。哈里法克斯勳爵和我意見相同，我當然以為首相亦表完全同意。當時有一個外交部高級官員在場，擬成草案。我們分離時，我極為滿意，如釋重負。

當晚大約八時，外交部新聞處處長李伯，即現在的李伯爵士以下面一節為要義的一個公報提交外交大臣：德國如果不顧英國首相的努力，仍對捷克加以攻擊，則其直接結果，法國必將出而援助，而英國和俄國自必援助法國。

公報哈里法克斯勳爵核准後，立即加以發表。

在早一些時候我回到我在穆庇斯大廈的寓所時，我發見已有十五位先生齊集在那裏了。他們都是保守黨黨員：薛西爾勳爵、魯易勳爵、格里格爵士、項恩爵士、波斯巴先生、勃拉庚先生和羅先生。大家情緒極為熱烈。各人意見集中的一點是，「我們必須使俄國參加」。保守黨一派內的意見竟如此熱烈，表示他們已經完全拋棄了一切階級、黨派、或思想上的顧慮，和表示出他們的心境到了怎樣一個絕高的程度。我深為感動，和實際上竟大為驚異。我將唐寧街發生的經過報告了他們，並告訴了他們公報的性質。他們聽了都大為安心。

法國右派報紙對於這個公報，表示懷疑，並加輕視。朝報稱牠做「一個聰明的謊話」。龐納現在正忙着表

示他的行動如何前進，告訴幾個衆議員說，他關於英方公報並沒有得到證實，使他們印象中認爲這並不是他所期望的英國保證。他當然是不難傳達這種印象的。

那天晚上，我和柯柏在海軍部共餐。他告訴我他正要求首相立即動員艦隊。這使我回想到二十五年前類似的同樣情形發生時我自己的經驗。

衝突的時候似乎已經到了，雙方的軍隊已經列陣相持。一百五十萬的捷克人，在歐洲最強固的堡壘線後武裝待命，並配有非常有組織和有效力的工業機構。法國軍隊已部分動員，法國的國務總理和部長雖極勉強，都預備履行他們對於捷克所負的義務。恰在九月二十七日午夜之前，我們的海軍部發出了警告的電報，命令艦隊在下一天實行動員。這個情報幾在同時分發英國各報（在下午十一時三十八分）。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時二十分時，由海軍部發出確切命令英國艦隊動員的實際命令。

現在可以看一下希特勒放在英法政府之前的堅強戰線的幕後情形。參謀總長培克將軍對於希特勒的計劃，大爲恐慌。他對於這些計劃全不贊成，並且準備加以阻擋。三月中侵犯奧國後，他曾提給希特勒一個備忘錄，用詳細的事實來證明征服計劃的連續不斷，必將招致全世界的禍患，並將使新近復原的德意志帝國重歸瓦解。希特勒對這置諸不復。此後有一個時期的停頓。培克不願分負元首決意要從事作戰的歷史責任。七月中，他們二人之間發生了對立。當對於捷克的攻擊即將實現時，培克要求保證以後不再從事進一步的軍事冒險。於是發生了決裂。希特勒答以軍隊是國家的工具，他是國家的首領，所以陸軍和其他軍隊應毫無疑問服從他的意志。培克因而辭職。他的要求解職，未得答復。但這位將軍的決定無可更改。此後他就不到陸軍部辦公，使希特勒不得不把他解職，並派海爾特繼任他的職位。對於培克，後面還有一個悲劇的但是榮譽的命運哩。

這一切祇有祕密的圈內人才知道；但現在在元首和他的專家顧問之間，開始了一種嚴重的、不斷的鬭爭

培克是爲陸軍參謀部所一致信任和尊敬的，他們不但在職業意見上聯合一致，並都對非軍人的、黨派方面的命令，具有反感。九月危機似乎造成了德國將領所深以爲懼的一切情勢。在德國東境展開的捷克軍有三十到四十個師團，而法軍的數量，幾以八對一的優勢開始沉重的壓在西線之上。一個有敵意的俄國可能利用捷克的飛機場而作戰，蘇聯的陸軍也可能通過波蘭或羅馬尼亞向前推進。最後，在最後階段，英國海軍據說已在動員。在這種發展之下，人們的情緒升到了狂熱的程度。

第一、我們有海爾特將軍所作、關於拘捕希特勒及其主要同僚陰謀的報告。這一件事的證據，不僅以海爾特的詳盡敘述爲限。計劃是一定有過的，但當時實行計劃的決心程度如何，我們無法下正確的斷語。將領們會一再計劃反叛，但到了最後關頭，都爲各種理由而打消了。他們被盟軍俘虜之後，爲他們的本身利益計，當然不厭求詳，說明他們爲和平而做的種種努力。不過在這時候，會有這樣一個陰謀，和會有實行陰謀的嚴重措置，則是毫無疑問的。

九月初（海爾特說），我們會採取必要步驟以使德國不受這瘋人的影響。在這個時候戰爭的預期使大部分的德國人民充滿了恐怖。我們並不想殺死納粹的領袖——祇要捉住他們，設立一個軍政府，並向人民宣布，我們所以採取這種行動，完全是爲了我們深信人民正在被引到斷然的不幸中去。

下面的人都參預這個陰謀：將軍們如海爾特、培克、斯圖波納格爾、威資萊本（柏林衛戍司令）、湯姆斯（軍械總監）、白洛克道夫（波茨坦衛戍司令），和柏林的警察總監海爾道夫。總司令白拉希將軍會獲通知，並加許可。

作爲對捷克軍事行動和普通軍事調動的一部分，他們把一個裝甲師團移駐柏林近郊，使它一夜進軍可以很容易抵達柏林。這一方面的證據，極爲顯然，在慕尼黑危機時，由霍布納將軍指揮的第三裝甲師團駐在柏林之南。霍布納將軍的祕密使命是在某一信號下佔領首都、德國國務總理府，和重要的納粹各部和納粹機關。爲達到這個目的，這一師團改歸威資萊本將軍指揮。依照海爾特的敘述，柏林警察總監海爾道夫當時對於拘捕希特

勒、戈林、戈倍爾、和希摩勒，曾作精密的佈置，「當時沒有發生挫折的可能。祇要希特勒到達柏林，政變即可完全成功」。希特勒至九月十四日晨由柏轍斯迦登到達柏林。海爾特在中午得到了這個消息，立即去見威資萊本，並完成計劃。當即決定在同一天晚上八時實行。到下午四時，依海爾特所說，威資萊本辦公處接到消息，說張伯倫要飛到柏轍斯迦登去見元首。他於是立即召集會議，在會議中他，即海爾特，告訴威資萊本，「如希特勒的虛聲恫嚇又成功了，他站在參謀總長的地位不能去拆穿西洋鏡」。因此決定暫緩行動，以待事件的發展。

這一個由當時參謀總長海爾特將軍所說柏林內部危機的故事，將來會由歷史家來加以徹查。但此後已有其他的將領們——繆勒和喜爾勃郎脫——加以證實，而審查過它的各權威方面，亦都認為確屬可靠。這如果最後終於被認為歷史事實，就可成爲另一個轉變人類命運的極小事件的適例。

此外參謀部方面尙有其他沒有這樣激烈但極熱切的努力，以謀抑制希特勒，亦無疑問。九月二十六日，一個由漢奈根將軍、李勃和鮑坦斯哈資上校等組成的代表團，到國務總理公署，請求准予晉謁希特勒，結果未獲准許。下一天中午，主要的將領在陸軍部開會。他們同意擬定了一個向國務總理公署提出的建議書。這個文件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法國發表。（註）建議書中分五章及三個附錄，共十八頁。第一章力言德意志第三帝國國內政治和軍事領袖意見的紛歧，並宣稱德國人民士氣的低落，使他們不能支持一個歐洲戰爭。其中又說如果戰爭發生，必須將非常的權力給與軍事當局。第二章描述國防軍的惡劣情形，並說軍事當局感覺不得不「對於許多嚴重違背紀律的案件，置諸不聞不問」。第三章列舉德國軍備的各種缺陷，尤其着重於忽促造成的齊格斐防線的缺點，和在愛斯·拉·沙伯和薩爾布魯根區域缺少防禦工事。牠表示集中在吉徹的法軍，恐有侵入比利時可能。最後，它強調軍官的缺乏。要使陸軍能達到作戰的力量，至少要有四萬八千個軍官和十萬個下士，如果現在就作全部動員，至少有十八個師團將發生缺乏受過訓練的下級指揮官。

（註）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由拉凡熱教授在法國和外國政治時期中發表。見烈浦加，書引，第二一二頁及以後。

這一個文件中更提出種種理由，證明除了嚴格局部戰爭之外，失敗是必然的，並確定國防軍的軍官中相信德國可以得到勝利的，尚不到五分之一。本書附錄中有關於捷克軍事上的評價，其中說明捷克軍隊縱使沒有同盟協助而單獨作戰，亦能支持三個月，反之德國在波羅的海和北海方面，在波蘭和法國邊界方面，均需有足以掩護的軍力，在奧國至少需有二十五萬士兵的實力，以防人民的暴動，和可能的捷克反攻。最後，參謀部以為在三個月的期間中，衝突必不可能限於局部性的。

陸軍方面的警告，最後更由德海軍部長李特海軍上將加以強調，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十時，元首接見李特，李特提出措詞激烈的呼籲。幾小時後英國艦隊動員的消息傳來，使這種呼籲益見有力，希特勒現在動搖了。上午二時，德國的無線電廣播，正式否認德國準備在二十九日動員，同一天早晨十一時四十五分，德國官方新聞社給了英國新聞界一個文告，再度否認德國準備動員的報告。在這時候，這一個個人和他驚人意志方面所受到的緊張程度，一定非常的猛烈。顯然他已經自陷於全面戰爭的邊沿。他在一個不利的輿論之前和他陸軍、海軍、和空軍首長的慎重警告之後，應該不顧一切向前蠻幹呢？還是應該不顧他享受已久的威望而退卻？

正在元首與他將領搏鬥之時，張伯倫自己正在準備向英全國廣播。九月二十七日晚上，他如此說：

我們爲了一個遠處的國家，我們所全不認識的民族中間的一種爭論，而須在這裏挖掘戰壕，試帶防毒面具，真是如何的可怕，不合理，不可思議！……如果我以為可以有所裨補，我將毫不躊躇的甚至作第三次度訪問德國……我個人是一個激頭撒尾的和平之人。國與國之間的武力衝突，對於我是一種夢魘；但如果我確知任何國家已經決心要以其武力來威脅、控制全世界時，我以為這是必須加以反抗的。因爲在這類的控制下，相信自由的人的生命，將不值得生活；但是戰爭總是一件可怕的東西，在我們從事戰爭之前，我們對於極重大的問題的確已到生死關頭一點，必須有明白的認識。

在這次和戰兩可之間的廣播發表了後，他收到了他由衛爾遜爵士轉達希特勒的信的答復。這封復信打開了一線希望。希特勒願意參加聯合保證捷克的新邊界；並關於實行新公民投票的方式，願意提出進一步的保證。時間已極短促。德國在高德斯堡備忘錄中的最後通牒在下一天，即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三的下午二時期滿。張伯

倫於是草了一封個人信給希特勒：

請讀來信，我深信你可以不經戰爭，立即得到一切基本要求。我願親自立即到柏林來，和你與捷克政府的代表討論移交的準備，如果你願意的話，法意的代表亦可參加。我深信我們能在一星期中獲得一致。（註）

同時，他致電墨索里尼，告訴他最近向希特勒提出的這個呼籲：

我希望閣下將通知德國國務總理，告訴他你願派代表列席，並力促他同意我的建議，這可以使我們的人民不致陷入戰爭。

這個危機中最顯著特點之一，是倫敦和巴黎之間似乎並沒有密切和信任的諮商。大體上雙方的見解是一致的，但很少或竟毫無有私人的接觸。在張伯倫不和法國政府、又不和其自己的內閣同僚諮議而草擬這兩封信時，法國國務總理和部長正在沿着平行的路線，進行他們自己分別的措置。我們已經看到法國新聞界反對與德國對壘的力量，和受法國外交部授意的巴黎報紙，暗示英國在文內提及蘇聯的強硬公報，是偽造的東西。法國駐柏林大使於二十七日晚上奉命提出進一步的建議，準備擴大立即移交德國佔領的蘇台德土地。當龐賽正和希特勒在一起時，收到了墨索里尼的來信，電內勸告應該接受張伯倫的舉行會議的意見和意大利並願參加。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希特勒通知張伯倫和達拉第，建議在下一天與墨索里尼在慕尼黑舉行會議。此時張伯倫正在向下議院演說，告訴他們最近事態的一般情況。他將近結束時，在貴族院出席的哈里法克斯勳爵把那封邀請他到慕尼黑去的信交給了首相。張伯倫那時正在敘述他給墨索里尼去信，和他這一個舉動所得到的結果：

在我給墨索里尼先生的信的答覆中，我知道意總理已發出訓令……即意大利雖將完全履行其援助德國的保證，但鑒於英政府向墨索里尼先生所提要求的重要性，後者希望希特勒先生應設法把其行動，至少延緩二十四小時，——這種行動，根據德國國務總理告訴衛爾遜爵士的，原應在今日下午二時發動。——使墨索里尼先生可以重行檢討全部情勢，並設法尋求和平解決。希特勒先生在其回答中，同意延緩動員二十四小時……現在還不盡於此。我還有些事要報告下院。我現在接到希特勒先生的邀請，請我在明晨到慕尼黑去和他會面。他也邀請了墨索里尼先生和達拉第先生。墨索里尼先生已接受邀請，我可以斷定達拉第先生亦會接受。我可毋庸說明我如何回覆了……我深信下院可讓我現在立刻啓程，看我在這最後的努力中能做些什麼。

（註）斐林，前引，第三七二頁。

因此，張伯倫第三度飛到了德國。

關於這次值得紀念的會議，已有多種記述，而在這裏，祇能記錄幾個重要特點。會議並沒有邀請俄國參加，捷克本身亦未被准列席與議。二十八日晚上，捷克政府祇獲得措詞率直的通知，稱翌日歐洲的四強代表即將舉行會議。「四巨頭」迅速的獲得了協議。會談於中午開始，繼續到翌晨二時。一個備忘錄經草擬完成，於九月三十日上午二時簽字。它在基本各點上接受了高德斯堡的最後通牒。蘇台德地由十月一日起分五期撤退，在十日內完成。另設一國際委員會以決定最後的邊界。這個文件交給了准由專程來慕尼黑聽候決定的捷克代表。在三個政治家等待專家們草擬最後文件時，首相問希特勒願否作一次私人的談話。希特勒「欣然接受」。(註)九月三十日早晨，兩位領袖在慕尼黑黑希特勒的寓所中見面，除了通譯之外沒有旁的人參加。張伯倫提出了他事先預備的一個宣言稿，其內容如下：

我們德國元首和國務總理，和英國首相，今日續有會晤，一致認為英德關係問題是為兩國和為歐洲最重要的問題。

我們公認昨晚簽訂的協定和英德海軍協定是我們兩民族，希望決不再事互相作戰的象徵。

我們都決心應以諮詢的方法，處理有關兩國的任何其他問題，我們決定繼續努力消除可能引起紛歧的根源，俾能對於保證歐洲和平有所貢獻。

希特勒讀了這短篇，一無猶豫的簽了字。

他在和他的意大利夥伴密談之時，他一定討論過沒有這麼客氣的解決方法。一九四〇年六月中墨索里尼寫給希特勒的後來經發表的一封信，很可以顯出來：

元首，

現在鞭笞英國的時機既已到期，我應提醒你我在慕尼黑時向你所說的話，即意大利應直接參預進攻島國。我準備以陸軍和空軍參加這

羅馬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個任務：你知道我是如何的希望參加。我盼你能給我一個回答，使我能及時準備行動。我敬向你致同志的敬禮。

墨索里尼（註一）

根據紀錄，從這一次慕尼黑會議到寫這封信的期間內，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間，並沒有在慕尼黑舉行過任何其他會議。

張伯倫回到了英國。他在海斯登着陸，在那裏他揮動了德使希特勒簽字的聯合宣言，向前來歡迎他的顯要和旁的人羣宣讀。在他的車子由飛機場開過歡呼的羣衆面前，他向坐在身旁的哈里法克斯說：「三個月後這一切都將成爲過去」；但從唐寧街的窗戶中，他又揮動了他的片紙，並說了這些話：「這是第二次光榮的和平又從德國還到唐寧街來了。我相信這是我們時代中的和平。」

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季特爾元帥在紐倫堡審問中對捷克代表詢問的答覆。

愛格上校代表捷克問季特爾元帥：「如果西方各國肯幫助普拉格，那末在一九三八年時第三帝國會不會攻擊捷克？」

季特爾元帥回答：「當然不。在軍事上我們還不夠堅強。慕尼黑（即在慕尼黑訂定協定）的目的是在使俄國被逐出歐洲，在爭取時間，並在完成德國的武裝。」（註二）

希特勒的判斷又再度被斷然證明是對的。德國參謀部不勝慚愧。元首畢竟又再度是對的。他單靠了他的天才和直覺，準確的衡量了所有軍事的和政治的一切情勢。像在萊因地一樣，元首的領袖才能又再度戰勝了德國軍事首長們的阻撓。這些將領都是愛國的人。他們切望祖國能在世界上重獲其地位。他們日夜努力，用各種方法加強德國的實力。因此，他們在發見他們是如此的落在事後時，覺得心中異常痛苦；在許多情形中，他們憎惡和不信任元首，但這種憎惡和不信任，常敵不過他們對於他指揮的天賦和神奇的幸運的贊美。當然，這裏是一顆他們應該跟隨的明星，一個他們應該服從的指導。因此希特勒終於成了德國不容爭論的主人，作更大計謀

（註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間的秘密書信。觀賽導言。

（註二）引在雷諾法國拯救了歐洲，第一卷，第五六一頁的註中。

的路徑打開了。陰謀者銷聲匿跡，並沒有爲他們的軍事同志所出賣。

這裏似應將可以作爲將來殷鑑的若干道德上及行爲上的幾個原則，加以說明。要評述這類的情事，決不能丟開當時情勢不論的，有種事實在那時也許並不知道，而對於種種事實所加的估計，亦必然的大部分出乎猜度，並沾染批判者自己一般情緒和意向的濃厚色彩。那些在氣質和性格上歡喜對於困難晦昧的問題尋求斬釘截鐵的解決方案的人，那些在一經外國挑釁即準備應戰的人，不一定都是對的。另一方面，那些願意低頭、忍耐而忠心誠意尋求和平解決的人，也不一定是錯的。在大部分的情形中，後者不單在道德上，即在實際的觀點上是反而是對的。由於忍耐和堅持善意，有多少戰爭得以避免了！宗教和道德同樣贊助謙讓和卑遜，不單在人與人之間，即在國與國之間亦然。多少戰爭由於煽動者所促成！多少引起戰爭的誤解，可能以暫時的彌補而得以避免！有多少次會作殘酷戰爭的國家，在幾年和平之後，發覺他們不但是朋友，並且是同盟！

基督的「登山寶訓」是基督教義中的精髓。每一個人對於見義勇爲的教友派，都是尊敬的。然而，大臣們在負責管理國家時，並沒有根據這些條件。他們第一種天職，是在對付其他的國家時，避免衝突和戰事，並避免各式的侵略，不論其目的是國家主義的或思想上的。但亦有時爲了國家安全，爲了他們自己國內同胞生命和自由——他們是靠了他們才得到其地位的——在使武力最後手段成爲正當必要，或對於武力已經有了最後確切的正當信心之時，則亦不應排斥使用武力。如果情況如此，使用武力是正當的，那末武力是可以用的。如果如此，則應在最有利的條件下應用武力。如果延遲戰事發生，徒然使自己在將來的戰爭中更處於劣勢，將爲更難取勝，則這種把戰爭延遲一年並無好處。這是有史以來人類所常遭遇到的痛苦的兩難情形。對於他們的最後批判，祇有由歷史根據了當時雙方所知道的和其後經證明的事實，纔可加以正確記錄。

不過，一個國家是否信守諾言，其行爲是否遵守與同盟所訂的條約義務，在批評之時，總是一個有用的準繩。這個準繩的名字，即是『榮譽』。人們的所謂榮譽，往往並不一定和基督教義相合，想起來真使人喪氣。聯

傲啓發榮譽，所以榮譽常受到驕傲成分的影響。榮譽的典則，過於誇張，就將引成一種實行不能辯護的無益而完全不合理的行爲，儘管其表面是如何的美好。但當時已到了榮譽與責任成爲二而一的時候，和那時如果對於當前事實，能有更正確的了解，則就可更爲加強榮譽的教訓。

法國政府遺棄其忠實的同盟捷克，使其委諸命運，真是一種令人沮喪的錯誤，由此亦產生了可怖的後果。不單爲了實施公正的政策，卽要對於一個受着恫嚇的小民族表示義俠心腸，光榮和同情，亦必須要有非常的毅力，方纔能夠達到。英國如果有條約義務的拘束，他當然要進而作戰，但現在已經深深捲入漩渦了，所可遺憾者，是英國政府不單默許，而且鼓勵了法國政府採取這種致命的路徑。

第十八章 慕尼黑之冬

波蘭和匈牙利：乘火打劫——英國生活中的緊張狀態——柯柏的辭職演說——關於慕尼黑事件的辯論——希特勒十月九日的演說——英國內閣的左右兩難：重整軍備或和平——舉行普選問題——與柯柏的通信——捷克的支解——首相的權力與責任——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他與意大利的接觸和訪問巴黎——龐納對德國的演說——慕尼黑的後果——實際及前途方面英法聯合力量的削弱——英國空軍地位的改善——一九三八至四〇年英國和德國空軍的實力——一九三八年德國人口增加一千萬

九月三十日捷克對慕尼黑的決議屈服了。他們說，『對於這一種他們不會參加的決議，願向全世界登錄他們的抗議』。貝奈斯總統辭職了，因為『他在我們新國家必須自求調整的發展中，可能將證明成爲一個妨礙』。他離開了捷克，在英國得到寄身之所。捷克的解體，即按照協定而進行。但是搶死人肉吃的兀鷹，不限於德國人而已。緊接九月三十日慕尼黑協定以後，波蘭即向捷克人提出二十四小時爲限的最後通牒，要求立即割讓德琛邊界區。捷克實逼處此，無法抵抗這種苛刻的要求。

波蘭民族具有英雄的特質，但我們不可因而抹視了他們愚昧與忘恩負義的紀錄，多少世紀以來，這種愚昧和忘恩負義曾使他們遭受到無法衡量的痛苦。我們看到，他們經過很久世代的瓜分和奴役，終於在一九一八年由西方協約國的勝利，恢復成爲一個獨立共和國，和歐洲主要列強之一。現在，在一九三八年中，它爲了這種無關緊要的德琛問題，竟甘與曾經提拔他們，使他們重過國家團結生活、和不久就要痛感需要的法國英國美國的友人，脫離關係。我們看到，正在德國磨刀霍霍相向之時，他們卻亟不及待，爭先占取劫掠和破壞捷克的一份。在這個危機之中，他們對英法大使緊閉大門，兩國使節甚至欲求與波蘭外長晤一面而不得。這一個民族，就個人而言，可以做出種種英雄的善行、稟賦良好、使人愛好，但在政府生活每一方面，幾乎再三表現出積習難改的錯誤，真是歐洲歷史上的一件不可解的事和一齣悲劇。在變亂和傾覆之中保持光榮，而在勝利之中，竟

流於齷齪可恥。他們是勇敢中最勇敢的，卻太常受卑劣中最卑劣的人的領導。然而波蘭是一向有兩個的：一個奮鬪宣揚真理；另一個則甘心與下流爲伍。

我們下面還要詳述他們軍事準備和計劃方面的失敗；他們政策的驕妄和錯誤；他們由自己的愚昧而注定遭受的殺戮和痛苦。但他們打擊反抗暴政的永久情感，和他們的以折不撓的堅毅精神，忍受他們永遠自己招致的所有痛苦，是決不缺乏的。

匈牙利人也已到了慕尼黑討論的邊際。一九三八年八月底，霍柴訪問德國，但希特勒保持極慎重的態度。在八月二十三日一天的下午，他雖和那位匈牙利攝政作了長時間的談話，卻沒有透露他想發動進攻捷克的日期。『他自己並不知道什麼時間。凡是希望要參加共餐的人，就得一起入廚下竈』。但是聚餐的時間並沒有宣布。不過到現在，匈牙利提出他們要求的時間到了。

在這些後來的日子，在我們道德上和物質上經過多少年的緊張和努力以後，誠然不易向另一世代的人，描寫出英國當時對慕尼黑協定所激發的情緒。在保守黨人之中，本來接觸親密的家庭和友人，意見紛歧到我所從來沒有看到過的程度。一向因政黨的約束、社交的交接、家庭的親誼而團結的男女，現在以蔑視和憤怒的心情互相睨視。這一個問題，不是向飛機場下來的張伯倫表示歡迎、或塞斷唐寧街及其通路的歡呼羣衆所可以解決了的；也不是議會內內閣監督員或黨人的最大努力所能解決的。在此時占有少數的我們，把擁護政府的人加之於我們的熱嘲冷諷，一切置之不顧。內閣發生了根本動搖，但事體既已發生，他們仍保持團結。只有一位閣員站了出來。海軍大臣柯柏辭去了他的偉大職位，他的決定動員艦隊，已經提高了海軍部的地位。當張伯倫正在絕對主宰輿論之時，他衝出歡欣喜悅鼓舞的人羣，宣布他和首相的意見完全不一。

在慕尼黑事件三天辯論開場時，他作了一篇辭職演說。這是我們議會生活中一件生色的事。他神情安詳，

不用草稿，演說了四十分鐘，他使他黨內抱敵意的多數人，處於他魔力之下。在當時要熱烈反對政府的自由黨與工黨分子，對他歡呼，自然是很容易的事。但在保守黨內部，這是有割裂作用的爭論。他演說中有若干真理，必須在此地記錄下來：

我懇求我的同僚，不要老是從捷克的立場來看這個問題，在檢討問題之時，不要常從那個小國在戰略上的困難地位出發，我們毋寧可向自己說：「由於侵略捷克，會有一天開始歐洲的大戰，到那一天來了，我們必須參加戰爭，我們無法置身局外，我們將站在那一邊作戰，也無疑義。」讓全世界都知道這一點，它將使準備擾亂和平的人，有感到罷手的理由。

接着張伯倫於星期二提出了最後的呼籲。在四星期的談判中自頭到尾，希特勒先生總算第一步準備退讓一時，也許一呎，無論如何總算對英國的提議，預備作若干的讓步。但我要提請本院記着，希特勒那天早上收到的第一個消息，並不是首相的去函。早在天明時，他已經獲悉了英國艦隊的動員。人的動機是無法知道的；在這兩個消息中，那一個對他發生最大的影響，使他同意作慕尼黑之行，也許我們永遠無法知道。但我們所知道的，他過去從未作過讓步，而現在卻讓步了。我多日以來就曾催促實行艦隊動員。我曾認為這種文字，比起外交上委婉其詞的詞令或公文附有條件的條款，更容易使希特勒先生懂得。我曾經力促在八月底以前和首相邁赴柏林斯迺登以前，在那一方面可能完成某些的步驟。我曾提議，它應該與衛爾遜爵士的奉命赴德同時進行。我記得首相說此舉將破壞衛爾遜爵士使命的完成，我則說此舉將使命成功。

在所有這些日子中，首相和我之間有深切的異見。首相曾相信用媿媿勳聽的合理的話向希特勒先生訴說，我則相信，用帶甲拳頭的話，更能動他的聽聞。

希特勒先生在破壞凡爾賽和約時，他努力保持羅加諾公約；在他破壞羅加諾公約時，他努力申明不再作進一步的干涉，或不再在歐洲提出領土的要求，然而首相對於希特勒先生的善意和所說的話，仍曾抱有信心。他用武力進入奧國之時，曾授權他的黨羽，提出權威的保證，稱他將不再干涉捷克。這祇是不到六個月的事。然而首相仍相信可以倚託希特勒的守信。

這一次長的辯論，不負於當時洶湧着的情感，和有關生死存亡的問題。我記得很清楚，在我發言說到：「我們已經受到一場完全的和純粹的失敗」時，全院騷然大亂，使我不得不稍息片刻，纔能繼續發言。對於張伯倫不屈不撓和毫不畏縮的維持和平的努力，以及他個人所曾經作的奮鬥，大家有普遍的和衷誠的敬服。在本文中，對於他自己所根據的對人和事的錯誤見解和判斷，自不免特加留意；但關於鼓舞他採取行動的那種動

機，始終沒有人加以懷疑；他所採取的路徑，也需有最高度的道德上的勇氣。關於這一層，兩年後我在他逝世後的演說中，曾加以稱揚。在重要保守黨人之間，雖發生極劇烈的異見，但並不因此使他們失去互相尊敬之心，而且在大多數情形之中，彼此之間除了暫時外，往往仍保持私人的關係。我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即現在行動變得十分激烈的自由黨與工黨兩反對黨，始終不會錯過機會，希望由反對和抨斥政府所曾採取的、甚至極微弱的國防措置，來爭取人民的歡心。

此外政府還可援引一個嚴重的實際方面的理由，雖然說出來不能爲他們爭光。誰也不能否認，我們很可怕的缺乏戰爭的準備。有誰比我和我的友人曾經更積極的證明過這一點？英國讓自己遠落在德國空軍實力的後頭。爲防衛世界最大的城市和人口中心，只有一百來尊的高射砲，而且大部分還在未經訓練的生人手中。如果希特勒是誠實的，最後的和平終得實現，那麼張伯倫是對的。不幸如果他已經受了欺騙，那麼至少我們應該有一個喘息的餘閒，以便葺補我們懈怠所致的最惡劣的狀況。這種考慮，以及因戰爭暫得避免而生的一般如釋重負和歡喜的心理，取得了擁護政府羣衆的忠誠同意。下院以三六六票對一四四票的多數，核准了政府『在最近危機中用以防止戰爭』的政策。持異見的三、四十名保守黨員，除了以棄權表明他們的反對外，別無他法。我們正式和一致的如此做了。在我演說中，我說：

在這一長長的辯論中，我們實在不必浪費時間，去探討在柏勒斯迦登、在高德斯堡、在慕尼黑所獲致的立場，有什麼差別。如果本院許我把譬喻變動一下，可以極簡單的予以說明。先是用鎗口相向，要求出錢一鎊。等到如數照給以後，又以鎗口相向，要求兩鎊。最後獨裁者答應收一鎊十七仙令六便士（一鎊爲二十仙令，一仙令爲十二便士——譯者），其餘擔保日後償付。

在過去，沒有人比首相更堅決更不妥協的追求和平。這是人人都知道的。這一種強烈的和不折不撓的維持與保障和平的決心，是從來所沒有過的。雖然如此，我卻不大明白，如果英法從頭至尾就預備犧牲捷克，那麼英法兩國在此際爲什麼會有捲入對德戰爭的偌大危險。關於首相所攔回的條件，我相信在夏季的任何時候，通過尋常的外交途徑都可以得到的。我要說的是，我相信如果讓捷克自己去對付，和告訴他們不能從西方列強取得援助，則他們或者早已能够取得比經過這一番非常動亂所得到的反而較好的條件。他們決不至有比現在更壞的條件。

一切都過去了。緘默、悲哀、禿禿無依，陷於分裂的捷克，落到了黑暗之中。它曾長期追從法國的領導和政策，它在各方面受到了與

法國聯繫的痛苦。

關於我們國家力量的一落千丈，落入納粹德國勢力圈內，以及我們的生存變成須仰賴他們的善意和高興，這些意義，我覺得忍受不了。爲了防止這種情形，我曾盡我所能敦促維持每一種防衛保障——第一、及時創立一枝空軍，實力較任何其攻擊力量可達到本國海岸者爲強；第二、彙合許多國家的集體力量；第三、在國聯盟約的範圍之內，成立聯盟及軍事公約，以便把力量集合起來，無論如何用以遏制這個國家（指德國——譯者）勢力的蒸蒸日上。一切徒勞無功。每一個防禦陣地，都假做似是而非和娓娓動聽的藉口，被削弱和放棄了。

我們忠誠的、勇敢的人民，他們是準備不問任何代價盡他們的職責的，在上星期的緊張狀態之下從未畏縮過。我對於他們知道了暫時無須再受艱苦的磨難時，表現出天然的自發的興高采烈和如釋重負的熱情，我並不埋怨他們；但他們應該去知道真相。他們應該去知道，在我們的防禦方面有重大的忽忽和缺陷；他們應該知道，我們業已未經戰爭而受到了一次失敗，其後果將使我們在向戰爭的路上，移近了一大步；他們應該知道，我們已經走過了我們歷史上一個可怕的紀程碑，即歐洲整個的平衡，已經紊亂無餘，西方民主國家這時已經聽到這樣可怕的話了：『你們已在天平上稱過，發現重量不足。』不要認爲這將就此結束。這不過是算帳的第一步。這不過是以後每年要向我們提出的苦杯的第一口，第一次試嘗，須待我們在道德健康和英武精神方面作最大的復原，我們再度起來，像在舊日一樣站在擁護自由的位置上。

希特勒對於英國人的好意，以及英國人出於真誠的認爲在慕尼黑已經保持了英德和平的歡幸心理，僅有冷漠的表示。十月九日，距他簽訂張伯倫力促他接受的互助友誼協定還不到兩個星期，他在薩爾布魯根發表的演說中便稱：

反對我們的政治家要求和平……但他們所統治的國家，由於其國內組織的關係，可能使他們隨時去職，而由並不亟望和平的人起而代之。而這種伺機而待的人有的是。在英國只要當政者不是張伯倫先生，而是柯柏先生或艾登先生或邱吉爾先生，那麼我們可完全知道，這些人的目標，將爲立即發動一個新的世界戰爭。他們對此事實並不保持秘密，他們公然承認。此外我們知道，現在也同過去一樣，在背後還潛伏有那個猶太國際的威脅性的角色，他們在一個轉向布爾塞維克的國家之中已經立定脚跟和具有體制了。我們又知道某一專靠諾言和誹謗而生的國際新聞社的勢力。這使我們不得不加意警覺，和記牢帝國的保護。時時準備和平，但也要一刻不容稍懈，準備自衛。

因此，我決定知我在紐倫堡演說中宣布的，以更大的努力，加緊建築我們西部的防禦工事。現在我要把迄今爲止位於我們堡壘線前面的兩大區域，即亞申區（愛斯·拉·沙伯）與薩爾布魯根區，併入堡壘線之內。

他又說：

如果英國人民，將逐漸丟棄他們自凡爾賽和約時代承襲而來的某種神氣，自將爲一件很好的事。我們不能再忍受女管家的管教了。關於德國境內德國人的命運，或屬於德國的其他人的命運，不容英國政治家作越俎代庖之舉；而我們自己，也不用管英國所發生的同樣情事。外面的世界，大概總很容易有充分的理由，專管本國的事務，或管管例如巴勒士坦的事務。

在因慕尼黑協定而產生的如釋重負之感逐漸褪淡以後，張伯倫和他的政府發現遭遇到一個極分明的兩難之局。首相曾經說過，『我相信我們時代內可有和平』，但他的多數同僚，卻希望利用『我們的時代』，儘可能的迅速重行武裝起來。在這一點上內閣的意見發生了分裂。慕尼黑危機所會引起的惶惶不安之感，我們缺乏準備的彰明昭著的暴露，尤其是高射砲方面，都表示要作激烈的重整軍備。反之，這一種的情緒，使希特勒大爲震動。他或者會伴作不解的說：『這算是對我們慕尼黑協定的信託和友誼麼？如果我們是友人，而你們信託我們，那麼爲什麼你要重整武裝？讓我保持武裝，而你表示你的信託。』這種見解，如根據提交國會的資料，或者可以充分的證明不誤，但並不能使人信服。當時國內有一種強大激進的感情起伏，要求急起直追的整軍。這自然受到了德國政府及其授意報紙的批評。不過英國全國的輿論如何是沒有疑問的。他們一方面對於首相使他們免於戰禍，表示慶幸，歡呼和平的口號，響入雲霄，同時他們痛切感到武器的需要。所有軍事各部門，都提出了他們的要求，並提及危機中曾經暴露出來的可怕的缺陷情形。內閣獲得了一個一致的折衷，其基礎爲一方面作一切可能的準備，同時不採取大規模的措置，以免擾亂本國的商業，或刺激德國和意大利人。

張伯倫拒絕了在慕尼黑事件後重新舉行普選的誘惑和壓力，這是他的功績。如果此時舉行選舉，祇有將引起更大的混亂。雖然如此，在那些曾批評和拒絕投票贊成慕尼黑協定的保守黨人，那年的冬季是令人着急和沮喪的。我們每一個人，在各人的代表選舉區內，受到保守黨黨部的攻擊，有許多一年以後成爲我們熱烈擁護者的人，大事活動，反對我們。在我的選舉區厄平區內，情勢發展到使我必須作明白的表示，聲明如果本地的黨部通過糾彈我的決議，我當立即辭去我在下院的席次，另作補缺選舉的奮鬥。但對我始終忠實和努力不倦的我的摯友和主席霍克爾爵士，和他周圍一羣堅強具有決心的男女，對我支持，寸地尺土，在所必爭；到了黨部決

定性的會議中，終於使我在此晦暗的時期之內，得到三對二的信任投票。但這一個冬季是黯澹的。

至十一月，我們又有一個關於國防的辯論，我曾作長篇的演說。

柯柏致邱吉爾函：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聽說你對於我上星期三下院演說中提到你的地方，深為憤慨，使我很難過。我看不出你為什麼要這樣。我不過說，我認為首相提及一九一四年的往事，他的意思完全是說明，任何動員後的檢討，都常可發出缺陷和不足之處，所以他恰不當受你的譴責。自然我原可根本不提到你，但我認為在辯論之中，把一個人的立論，以前面發言人的演說為根據，常有良好的效果。此外我在星期二中的地位亦不十分單純。你那篇我所大為欣賞、尤其欽佩無已的偉大演說，是對政府三年以來紀錄的總攻擊，在這三年期內，除了最後五個星期外，我始終是政府的一員。因此你很難希望我說完全同意你的所言，和作一致的投票。不過，不管你覺得受了瀆犯，理由是對是非，我對於瀆犯你的一事，總同樣深以為歉，我希望你對我寬恕，因為你的友誼，你的勸告，對我是極為寶貴的。

邱吉爾致柯柏函：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很高興收到你的來信，至以為謝。我們這一小羣朋友，在現狀之下如果互相吹毛求疵，實是一大錯誤。唯一的規則是：在可能時互相幫忙，但千萬不要互相傷害——千萬不要讓漁人得利。以你的擅於詞令，應該很容易無須提出和我的異見，說明你的立場。我要牢守這一條規則。你演說中雖然沒有我可以反對的地方，但你的離開常軌對我提出答覆，這一事實使我的若干友人，不免懷疑此舉是否別有用意，例如故意儘可能把我與反對政府的其他保守人分開。我自己並未作如此之想，你的宛轉的來信，使我完全釋然。我們人數這樣少，我們的敵人這樣多，目標又是這樣的重大，我們不能讓有任何方式互相削弱的事發生。

我聽到你的演詞，其中有若干部分，尤其是列舉最近三年來我們所受到的福難，我認為確是出色。我不懂你如何能不用草稿，而竟能全無遺漏的記出。

我對於這次辯論，自然感到遺憾。張伯倫現在已經獲得一切，安然脫免。慕尼黑已歸死亡，缺乏準備的情形，已被置諸腦後，現在並沒有真正熱誠的重整武備的新努力。甚至以可怕代價換來的喘息餘閒，也將浪費去了。為了這種公家事務我心理很難受，使我在亦提出晚餐之時態度很粗魯，因為對於你演詞中前面已經說了些什麼，那時我並不知道。

但無論如何，你總可以信賴你誠意的友人。

十一月一日名不見經傳的哈柴博士，當選登補捷克殘餘部分的總統空缺。一個新的政府在普拉格舉行就職。這個羣衆無依的政府的外交部長說：『歐洲及世界的一般情勢，其演變情況，使我們在最近的將來，不能

希望有一個安靜的時期。」希特勒也有同樣觀感。德國於十一月初把搶得的贓物作正式的分派。波蘭佔領德琛，沒有受到阻撓。曾經被德國用爲賭注的斯洛伐克人，獲得了一個朝不保夕的自治。匈牙利以斯洛伐克爲犧牲，也得到了一塊肉骨頭。到下議院中提出這種慕尼黑的後果時，張伯倫解釋說，英法於慕尼黑協定後所提出的對於捷克作一個國際的保證，僅指假說如遇無故侵略而設，並不涉及該國現有的疆界。

我們現在所正在做的（他以超然物外的態度說），是替凡爾賽和約規定疆界的重行調整作證。我不知道，規畫這種疆界的人，是否會認爲應該繼續不變，維持規定時的原狀。我很懷疑他們會作如此想過。他們也許預料，這種邊界不免要時時有所調整。要把這種人物設想成爲這樣非常的超人，以至可以看到正當的終古不變的疆界，那是不可能的。現在的問題，不是這些疆界是否應該時時調整，而是調整的方式，是否用談判和討論，或者還是戰爭的方式。調整正在進行之中，關於匈牙利疆界情形，捷克和匈牙利已經接受德意的仲裁，最後決定兩國之間的疆界。我想，我對於捷克已經說得夠了。

但不久以後還有得說哩。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寫過：

每個人都須承認，首相正在採行的政策，具有最大的決定性和非常的重要。他關於他要做點什麼，關於將發生些什麼，自己抱有堅強的見解。他有他自己的價值標準；他有他自己的眼光角度。他相信與希特勒先生和墨索里尼先生成立妥協，可以爲歐洲爲英帝國作一良好的解決。無人反對他的動機。沒有人懷疑他的信心或他的勇氣。除了所有這些以外，他具有權力，可以做他認爲最好的事。無論對於我國外交政策的原則方面，或我們國家所需對付的事實和可能性方面，抱不同見解的人，都不能不承認，我們無力阻止他不採用他所能處置的資源和方法，不走他所真誠相信的路徑。他願意接受責任；他有接受責任的權利；我們在一個比較很短的時間內，就可知道他所計劃的東西即將在我們之間發生。

首相聽信人言，相信希特勒在歐陸方面不再有更進一步的領土要求；捷克共和國和匈的征服和併吞，已經鑿足了德國納粹政府的貪慾。他也許希望使保守黨同意把現歸英國所有的委任統治區域，歸還給德國，或諸如此類被斷定爲完全相當的東西。他相信這種恢復故土之舉，可以造成英德之間長期良好的和安定的關係。他更相信，完成這種的良好關係，在任何方面，可以無須削弱我們與法國共和國之間爲自衛目的起見的根本團結；這種團結，是所有我們的共同立場，必須加以保存。張伯倫深信，所有這一切將引致成一般的協定，撫慰不滿的國家，和造成一個長治久安的和平。

但所有這些都屬於希望和臆測的境界。我們心裏必須記住可能相反的另外整個一套東西。他也許會要求我們承受我們所不能忍受的東西；他也許會被迫而要求我們承受我們所不能忍受的東西。或者再說，在這種困難談判中的對方，其舉動作爲，也許並不根據於鼓舞首相的那種同樣的善意和守信的精神。我們所已經給的，我們所須給的，也許要我們付出很重的代價，但也許尚嫌不夠。它也許包括使英帝國受到重大的損害和風聲，但效果也許不足以停止歐洲大陸事勢的進展，甚至祇能有幾個月的作用。從此時起到明年，我們就可以知道，首相關於希特勒先生和納粹黨的見解之是否準確或錯誤。從此時起到明年，我們就可知道，綏靖政策是否已收綏靖之果，或者還是祇刺激起了一個更兇狠的欲望。在同時時間內我們所能做的，祇有進行團結抵抗與防衛的力量，俾於首相不幸證明錯誤、或受迷惑、或受欺騙之時，我們最不濟還可以保持苟延殘喘。

不管對於『我們時代內的和平』作何觀感，張伯倫對於有把意大利與德國拆開的需要一點，有極明白的認識。他存着希望之心，相信他已獲得了希特勒的友誼；爲完成他的工作，他必須爭取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作爲代價很高的對德和解的對稱。在這種與意大利獨裁者重拾舊歡之中，他挾持法國一起進行。大家要來一個普遍的愛好。在下一章中，我們將研究這種提議的結果。

十一月末首相和哈里法克斯勛爵作巴黎之行。法國關員對於首相訪問羅馬的提議，冷淡的表示同意了；但他和哈里法克斯很高興的曉得了法國正在計劃，依照採取張伯倫和希特勒在慕尼黑簽字的關於英德未來關係的英國宣言。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龐納向法國駐華盛頓大使發出一封函件，敘述法國政府的這種意思：「昨天在巴黎舉行的討論中，張伯倫先生和哈里法克斯勛爵對於一個他們認爲性質與英德宣言相同的宣言，明白表示滿意，這個宣言對於國際綏靖工作將成爲一個直接的貢獻。」（註）爲了進行這種討論起見，里賓特洛甫偕沙赫特博士同行，到了巴黎。德國人不僅希望訂立一個說明善意的一般性宣言，並希望成立一個具體的經濟協定。他們獲得了前一點，宣言於十二月六日在巴黎簽字，但即使龐納也不準備接受後一點，雖則扮演法德諒解的建築師一個角色，對他有很大的誘惑性。

里賓特洛甫訪問巴黎的任務，還有一個更深的動機。也同張伯倫的希望拆散羅馬和柏林一樣，同樣希特勒

（註）法國拯救了歐洲三五至二七頁。

相信可以使巴黎和倫敦分離。關於這個題目，照龐納所說的他和里賓特洛甫的談話是不無意思的：

關於英國，我對里賓特洛甫說明英德關係的改善，在歐洲綏靖政策的任何發展中，必須扮演的作用，並且被認為任何法德諒解的基本目標。德國外長盡力把造成目前局勢的責任，推卸到英國政府的身上，英國政府，尤其是英國報紙，在慕尼黑事件結束之時，似乎一度表示過某種的理解，以後對柏林的政府採取了最令人失望的態度。……柯柏、邱吉爾、艾登和摩里遜等人在議會中增加擴大的表現，以及某種報紙上的評論，德國爲之曾發生極大的憤慨，而在德國是無人能限制報紙的反響的。我重新強調英法休戚相關的基本的和不可動搖的特質，極清楚的表明，德法關係的真正改善，從長期說來，如果同時沒有平行的英德關係的改善，那是不可思議的（註一）。

在慕尼黑後的一年內，實力增加更大的是希特勒還是協約國家，這個問題曾經引起人們的辯論。在英國，許多曾經知道國內全無保護準備狀態的人，看到我們空軍每月的發展，和旋風式與噴火式機的獲有結果，覺得有一種如釋重負之感。組成的飛機隊數長成了，高射砲也增加了。工業上戰爭準備的一般壓力，也繼續加速進行。但這種進步的情形，雖然似乎至可寶貴，但如與德國軍備的偉大進步比起來，實在渺不足道。像前面已經說明過的，根據全國性計劃的軍火生產，是一種需要四年的任務：第一年全無生產；第二年有小量的生產；第三年有很多的生產；第四年生產就可勢如潮湧。希特勒的德國，在和戰爭情形幾乎相同的緊張與猛進的狀況之下，作非常的準備，在此時期內早已到了第三年或第四年的階段了。反之，英國不過在非緊急狀態的基礎之上，有所推進，推動的力量較弱，規模也要小得多。在一九三八至三九年間英國各種軍事支出總數計三〇四、〇〇〇、〇〇〇鎊（註二），至德國的支出至少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在戰爭爆發前的這一年內，德國的軍火生產可能較英法合併起來的產量，至少高出兩倍，可能甚至三倍，而它的製造坦克的大廠，亦達到充分發揮生產的程度。因此他們獲取武器的速率，要比我們大得多。

捷克的征服使協約國失去了捷軍的二十一個正規師，已經動員的十五或十六後備師，以及他們山嶽堡壘防

（註一）見前引書四三至四四頁。

（註二）一九三七至三八年爲三三四、〇〇〇、〇〇〇鎊；一九三八至三九年爲三〇四、〇〇〇、〇〇〇鎊；一九三九至四〇年爲三六七、〇〇〇、〇〇〇鎊。

線；在慕尼黑危機中，這一條防線曾使德國不得不調動展開三十師的兵力，也就是機動的受過完全訓練的德軍主力。根據海爾特和約得爾兩將軍的話，在慕尼黑的部署中，在西線的德軍兵力只剩十三師，其中僅有五師是第一線的正規軍。由於捷克的陷落，我們無疑遭到了相當約三十五師兵力的損失。此外捷克的斯柯達兵工廠，亦被作不利的移轉，斯柯達廠原為中歐第二個最重要的兵工廠，其在一九三八年八月至一九三九年九月之間的生產量，與同期內英國各兵工廠的實際產量，幾乎相等。在全德國正在緊張的和幾乎類於戰爭壓力之下努力工作之時，法國工界卻早在一九三六年，便已取得了望之已久的每周四十小時工作制。

法德陸軍相對實力的變動，甚至更具禍難的性質。從一九三八年起，德軍不單在數量上和在編隊上，以及後備隊伍的生聚方面，而且在品質和成熟方面，每月都有進步。訓練與一般純熟，與設備的不斷增加步調一致。在法軍方面卻缺乏同樣的進步或發展，在每一路徑方面它都在被人趕上前頭。在一九三五年法國縱無以前結盟國家的援助，差不多無需嚴重的戰爭，便可以攻入和重行占領德國。到一九三六年，法國之具有壓倒的優勢武力，仍無疑義可言。現在我們根據德國方面的透露，這種情形在一九三八年還是如此，德國的高級指揮部因為知道他們的弱點，所以對於希特勒聲譽起他的每一次成功的發難，都曾作最大努力，以圖約束。到了我們現在檢討的慕尼黑後的一年內，德軍達到了充分效率，雖在受過訓練的後備隊伍方面，仍較法國為弱。德國的人口既較法國大出一倍，所以德國後備隊伍，無論用何標準將較法國為強大，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在士氣方面，德國人也占有了便宜，遺棄一個盟邦，尤其是爲了怕有戰爭，可以使任何軍隊的精神爲之削弱。被迫屈服之感，使將士同感沮喪。一方面在德國，信心、成功和勢力增長的感覺，激發了那一個民族的尙武本能，而在法國方面，自認弱點，使法國各級官兵不免大爲喪氣。

不過在有一個主要方面，我們開始趕上德國，和改善我們的地位。在一九三八年，以旋風式、和後來以噴火式新式戰鬥機補換如戰士式舊式雙翼戰鬥機的過程，還祇剛正開始。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們祇有五個大隊，具

有旋風式機的配備。而且，舊式飛機的存貨和零件，因為此後不能使用，所以只好拋棄。在新型戰鬪機的裝備方面，德國遠走在我們的前頭。他們已有數量很多的「米式」一〇九號飛機，對付這種飛機，我們的舊式飛機一定相形見绌。在整個一九三九年中，因為獲得新裝配的大隊數增加，改善了我們的地位。在那年的七月，我們共有二十六個戰鬪機大隊，戰鬪機上裝配八尊砲，雖則限於時間，還沒有儲積大規模的存貨和零件。至一九四〇年七月不列顛之戰時，我們可以用的新式戰鬪機，平均有四十七大隊。

在德國方面實力增加的數字如左：

一九三八年	轟炸機	一、四六六	戰鬪機	九二〇
一九三九年	轟炸機	一、五五三	戰鬪機	一、〇九〇
一九四〇年	轟炸機	一、五五八	戰鬪機	一、二九〇

德國空軍的擴張，無論在數量在品質方面，事實上早在戰爭開始以前完成了大部分。我們的努力，比起他們的要遲了近兩年。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間，他們所有的增加不過百分之二十，而我們在現代戰鬪機方面的增加則為百分之八十。一九三八年，我們在品質方面也有很不幸的缺點，在一九三九年雖然對於這種不均衡的狀況，我們曾有相當的進展，但比起一九四〇年試驗開始之時，情況仍舊相對的劣弱。

在一九三八年倫敦可能遭受空襲，我們對之不幸全無準備。不過除非德國已經占領了法國和荷比低地國家，和因而取得了與我們海岸極迫近的必要的根據地，決定性的不列顛空戰是不可能發生的。沒有這種的根據地，他們就不能使用當時的航程較短的戰鬪機，護衛他們的轟炸機。而在一九三八年或一九三九年，德國軍隊要戰敗法軍是不可能的。

用以突破法國陣線的大量坦克生產，是一九四〇年起纔有的事；而在西線的法國仍占優勢、和東線的波蘭尚未征服以前，他們當然不能像後來法國被迫投降後那樣，集中整個空軍力量來對付英國。而且這還沒有把俄國的態度，或捷克可能實行的抵抗計算在內。我會認為把這個有關時期內空軍相對實力的數字提出來，是正當

之舉，但這種數字，在任何方面沒有改變我上面已經記述過的結論。

根據所有以上的理由，據說由慕尼黑纜『獲得』的一年喘息餘閒，使英法與希特勒德國的相對地位，反比在慕尼黑黑危機以前更爲惡劣得多了。

最後還有這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在一九三八年一年之內，希特勒把六、七五〇、〇〇〇奧國人，三、五〇〇、〇〇〇蘇台德區日耳曼人，總數在一千萬人以上的居民、勤勞大眾和士兵，併入了德國，置於他的絕對統治之下。實際上這個可怕的對立是利於他的。

第十九章 普拉格，阿爾巴尼亞及對波保證（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四月）

張伯倫訪問羅馬——德軍向捷克集中——內閣的樂觀——希特勒侵犯捷克——張伯倫在伯明罕演說——政策的完全變更——三月三十一日我給首相的信——蘇維埃政府建議六強會議——英國對波蘭的保證——與柏克上校談話——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意軍在阿爾巴尼亞登陸——英國地中海艦隊的錯誤部署——四月十三日我在下院演說——我寫給哈里法克斯勳爵的信——戈林、墨索里尼及齊亞諾的軍事計畫會議——兼併捷克對德國戰略上的利益——英國政府實施徵兵——勞工及自由兩黨反對派的軟弱態度——英國的組織舉國一致政府運動——克立浦斯的籲訴——史丹萊自請退職

張伯倫仍然相信，祇須他親自去和各獨裁者面商，就可實現世界局勢的改善。他不曉得獨裁者早已下決定了。他抱着一片希望之心，主張他和哈里法克斯在一月間去訪問意大利。經過相當遲延，意國提出了邀請，會談就在一月十一日舉行。可是我們現在讀到齊亞諾日記中代表意大利幕後人物對於我國和我國代表的評述，不由不使人臉紅耳赤。

根本上（齊亞諾寫道），此番的訪問，還不會走入正式的步調……彼此未曾有過正式的接觸，我們和這種人，有多大的差別呀。這是另一個世界。我們在聚餐後會到首相那兒談及此事，墨索里尼說，「這些人的胚子，和那創造帝國的特拉克及其他偉大冒險者不同。」最後說「他們是世代相傳的感到疲倦了的富家子弟」……

英國（齊亞諾記着道）不情願打仗。他們是儘量設法慢慢的向後退，而不願作戰……我們和英國的談話已經完畢了，一事無成。我打電話告訴里賓特洛甫，說這是一個可笑的失敗，絕對無害的……張伯倫，當他坐的火車開始轉動，他的國人開始唱着「因他是個有趣的好朋友」的時候，眼睛裏滿眶都是眼淚，墨索里尼還問道：「這個小曲子是什麼？」

兩星期後：

潘斯勳爵，把張伯倫準備在英國下院發表的演說稿，交給我們徵求同意，使我們如果認為有必要時可加以修改。首相通過了這篇演說的大綱，並且評論道：「我相信英國政府的領袖，拿他演說的大綱，送請外國政府核准，這還是破天荒第一次。這件事對於他們是一個不

祥之光。」（註）

不過，到最後走入劫運的卻是齊亞諾和墨索里尼他們自己。

同時，一月十八日，里賓特洛甫到了華沙，對波蘭展開外交的攻勢。吞併捷克，繼之即為包圍波蘭。這個作戰的第一階段，就是由主張德國在但澤的主權，並把德國在波羅的海區域的控制，伸展到重要的立陶宛海港米美爾，用來截斷波蘭和海路的連絡。波蘭政府對於此種壓迫，曾經展開強烈的抵抗，在有一個時期內，希特勒注視着和等候發動戰爭的時機。

在三月裏第二個星期中，就有種種謠言，說德奧境內，尤其是維也納與薩爾斯堡間區域，軍隊調動頻繁。據說德國已按照戰時編制動員了四十個師團。斯洛伐克人自信有德國的支持，正在計劃把他們的領土，和捷克斯拉夫共和國脫離。柏克上校，看見條頓民族的惡風，吹向另一方面，如釋重負，他在華沙公開宣布，說他的政府，對於斯洛伐克人的希望，完全同情。教父提梭，是斯洛伐克人的領袖，希特勒竟以對待一國總理的禮節，在柏林招待他。十二日，有人在國會裏問張伯倫關於保證捷克邊疆的問題，他請議會記住，這個提議是用以抵抗無故侵略的，而現在並沒有這種侵略的事發生。他無須久待。

在三月裏這些日子當中，英國國內，充滿着歪曲的樂觀空氣。捷克在德國裏裏外外的壓力之下，雖然形勢日益緊張，但為慕尼黑協定見證的英國各部部长及各項報紙，對於這個使捷克萬劫不復的政策，依然不失信仰。甚至由納粹不斷陰謀而演成的斯洛伐克的分立，以及德國境內明顯的軍隊調動，亦不能阻止英國的內相於三月十日對他選舉區的選民演說，表白他對於那個可以及時造成「黃金時代」的五年和平計劃所抱的希望。一個和德國締結商約的計劃，仍在抱着希望進行討論。著名的定期刊物笨拙，登出了一張諷刺畫，畫着約翰牛正從一個惡夢中醒過來，作着安慰的喘息，而所有夜間一切凶惡的謠言、幻想及疑慮，都從窗外飛出去了。就

在這張諷刺畫發表的同一天，希特勒向危危欲墮的、因慕尼黑決議而剝奪了防禦界線的捷克政府，提出了最後通牒，向普拉格進軍的德國軍隊，就絕對控制了這個毫無抵抗的國家。我記得，我正和艾登同坐在下議院的吸烟室中，送進來登載這件時事的晚報。即使像我們對前途不抱幻想和曾經竭力為證的人，對此種突然的強暴行動，也不免發生驚異之感。人們很難相信，具有一切秘密情報的英國政府，會如此的徬徨無主。五月十四日，便眼見捷克共和國的解體、和歸屬於德國。斯洛伐克人正式宣布他們的獨立。暗中有波蘭做後盾的匈牙利軍隊，便越入他們所要求的捷克東部的喀巴阡·烏克蘭省。希特勒到了普拉格，宣布捷克成爲德國保護國，捷克因此就這樣的併入德意志帝國。

三月十五日，張伯倫不得不向議院說：『德國軍隊於今晨六時開始佔領布希米亞。捷克人民已奉政府命令不作抵抗。』他於是接着說，依他的意見，他所給予捷克的保證已不再有效。五個月以前，當慕尼黑會議之後，殖民大臣殷斯基曾說到此項保證，說：『英國政府對於捷克在道義上負有此項保證的義務（這話聽來好像此項保證技術上已在實施似的），……所以，假使有無故侵略捷克的行動發生，英國政府當然不得不採取一切權力之內的步驟，以監視捷克完整的保全。』到現在首相便說道：『此項保證，直到昨天爲止還是有效。但是，自從斯洛伐克國會宣布斯洛伐克獨立以後，局勢已經改變了。斯洛伐克此項宣言的結果，已使我們要保證其邊疆完整的國家，因內部分裂而趨於滅絕，所以英帝國政府不能再受此種保證義務的拘束了。』

這似乎已到定局。首相於結論中又說道：『我對於現在所發生的事，當然應該深引爲憾，但是我們切不可因此之故便遠離了我們的正軌。我們應該記得，世界上全體人民的意願，仍舊是集中在和平的希望方面。』

張伯倫預定兩天後在伯明罕發表演說。我滿腹期望他也許會以儘可能的最好的委婉詞令來，接受已發生的一切。這樣也許可以與他在國會的演說相合。我甚至想像，他或許會歸功政府，由於在慕尼黑有先見之明，使英國和捷克的運命，實際上就是中歐的運命，斷然脫離關係。他或許會說道：『去年九月，我們決定不要捲入大陸紛爭的漩渦，這是何等幸運呵！我們現在可以自由的讓這些與我們無關的各國間的騷動，不流血、不費財力

的、由其自動解決。』自從在慕尼黑決定把捷克分裂，和大多數英國人在他們瞭解局勢的範圍之下表示了同意以後，這一步也畢竟是一個合乎邏輯、亦是若干最積極擁護慕尼黑協定者的見解。我事前存着藐視之心，來等候伯明罕演說的發表。

首相的反應，使我吃了一驚。他曾經表明他自己對於希特勒的性格，具有特別的真知灼見，並且有精密估量德國行動限度的能力。他滿懷希望的相信，慕尼黑會議是一個真正的彼此誠心的會議，並且使他和希特勒及墨索里尼共同把世界從無限的戰爭恐怖中解救了出來。現在好像陡然的一個爆炸，把他的信仰，及跟着他的行動及言論而發生的一切，都炸成粉碎了。他對於事實作了錯誤嚴重的判斷，欺騙了他自己，並且強使他唯命是聽的同僚及不愉快的英國輿論，不得不接受他的錯誤觀念，這些固然他應負其責；可是一夜晚及早晨之間，使他對過去作了突然的轉向。如果說張伯倫未能了解希特勒，希特勒卻完全低估了英國首相的本性。希特勒誤以為首相的文官身份和冀求和平的熱情，即可以完全解釋他的人格，認為他的雨傘就是他的象徵。他並不認識張伯倫具有一個極堅強的心志，不愛受人的欺騙。

他在伯明罕的演說，作了一個新的語調。他的傳記作者說：『他的口氣，已是非常不同……他獲得了比較更完備的消息、和經議院、公衆及殖民地等各方面發表意見提出堅強的表示後，就把取材於國內問題及社會福利問題的已經擬好的演說稿，丟開一邊，而勇敢的站起來抵擋難局。』他譴責希特勒背信，破壞慕尼黑協定。他援引希特勒所作的一切保證，『這是我對歐洲的最後領土要求；』『我對於捷克，決不再有任何意圖，我可以保證。我們不再向任何捷克人要求什麼。』

我確信（首相說），在慕尼黑會議後，大多數英國人民，都和我同樣的虔誠希望，這種政策，應該更加推進，但是今天，我和英國人民，感到同樣的失望，同樣的憤怒，覺得那些希望已經被無理的擊成粉碎了。本星期中所發生的這些事情，和我曾經向你們宣讀的種種保證，怎能够互相調和呢？

對於這個突然遭受侵略的高傲而英勇的民族，這個自由被剝奪的民族，這個失去國家獨立的民族，誰不能不感到出自內心的同情呢？……現在，我們聽說，因為捷克境內發生擾亂，所以使這種攫取他人領土之舉，成爲必要……假使有擾亂的事，難道他們不是受外國

的煽動機發生的嗎？……這是不是最後一次攻擊弱小國家，是不是以後還有別的跟着發生？這件事，實際上是不是企圖以武力征服世界的一個步驟？

這番話，和他前兩天在下議院的聲明中所抱的態度和政策，其間之大不相同，令人難以想像。他一定經過了一個極度緊張的時期。十五日那天曾經說：『讓我們不要離開我們的正軌』。但是這次是『斷然拒絕』。

不但如此，張伯倫的改變心思，並不是口中講講就算了。希特勒名冊中第二個『弱小國家』就是波蘭。當我們記着首相所作決定的嚴重性、與他必須與許多人士進行諮商，他在這個時期，一定是極其忙碌的。在兩星期之中（三月三十一日），首相向國會演說：

我現在要報告議會的，就是……假使一旦有任何明顯威脅波蘭獨立的行動，而波蘭政府亦認爲非用全國武力抵抗不可的時候，英國政府將立刻認爲有盡他的力量所及、給予波蘭政府以一切援助的義務。英國政府已經向波蘭政府提出這一種內容的保證。

我還要申明，法國政府已經授權於我，明白的表示，在這個問題之中，法國站在和英國同一的立場，（其後）已予各自治領詳細的通知。

這個時候，已經不是彼此互咎既往的時候了。議院中各黨各派的領袖，都一致贊成對波蘭給予保證。『上帝扶助我們，我們除此以外，不能做別的事了，』這就是我的話。我們已經達到了這個關頭，這是一個必需的行動。但凡是了解這種局勢的人，都不能懷疑，就一切人情可能而言，這種保證等於是一場我們也要被捲入的大戰爭。

由於這個善意的及有能爲的人種種錯誤判斷、所演成的悲慘故事，現在已到了頂點。我們全體終於不免遭遇到這一種結局，使那些負責的人，不問他們的動機如何正大，要受到歷史上的譴責。請回頭看看，我們過去迭次所接受的或所丟掉的東西；一個以尊嚴條約而解除武裝的德國；一個破壞尊嚴條約而重整軍備的德國；空軍的優勢，甚至空軍的平等失去了；萊茵地被強迫佔領，而齊格菲防線，已經築成或正在興築；柏林羅馬軸心成立了；奧國被德帝國吞噬而消化了；慕尼黑協定遺棄和毀滅了捷克；牠的防禦線在德國手中了；牠的強大的

斯柯達兵工廠今後替德國軍隊製造軍火了；羅斯福總統要想以美國干涉來穩定或澄清歐洲局勢的努力，亦給一手撇開了；蘇俄顯然願意聯合西方各國，竭盡全力來援救捷克，亦沒有遭到理會；當大不列顛祇能供給兩個師團來增強法國邊境防禦的時候，捷克的三十五個師團，足可抵抗尙未成熟的德國軍隊，竟亦喪失了——一切都風流雲散了。

而現在，已經把這些幫助和有利形勢丟乾淨了以後，英國卻一手牽引着法國，邁步前進，要保證波蘭——這個祇在六個月以前，如餓狼似的，參加掠奪及摧毀捷克國家的波蘭——領土的完整了。在一九三八年，爲捷克而發生戰爭，是明智之舉，因爲那時德國軍隊，還很難派遣五六個有訓練的師團到西方前線，其時，法國用他那將近六七十師的兵力，一定很可風馳電掣的渡過萊茵河，進入魯爾。但是，那時候要談到這種戰爭，人們就會認爲不合理，鹵莽、不合現代知識觀念和現代道德的水準。而現在到了最後田地，兩個西方民主國家竟宣布他們準備拿他們的性命作孤注，來保證波蘭的領土完整了。歷史，據說其中大部分是人類罪惡、愚頑及苦痛的記錄。像這種突然一反五六年來隨便的妥協的綏靖政策，和差不多在一夕之間改變立場，願意接受一個條件要較以前遠爲惡劣、而規模大到極點的顯然爆發在即的戰爭，我們不妨在歷史裏邊，仔細的探尋搜索一下，看能不能找出同樣的事例來。

不但如此，我們怎樣能夠保護波蘭，怎樣能夠履行我們的保證呢？恐怕就祇有對德宣戰，向一個比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們見了嚇退的更堅強的西方堡壘、和一枝更爲強大的德國陸軍進攻了。這裏是走到災禍之路的一列里程碑。這是記載向日漸增強的德國勢力迭次屈服的目錄，不過起先的時候，一切輕而易舉，到後來種種事體漸漸棘手了。但是現在，英法兩國終於終止屈服了。在這個惡劣到極點的時候，在最不能使人滿意的立場上，終於採取了一定會引起億萬人民遭受大屠殺的決定。這裏是一個經過考慮的正當的目標在改變立場之時加上了精心刻劃的藻飾，使我們在已經把資產和利益不經意的浪費以後，再來從事有關生死的戰爭。假使你在兵不血刃可以得勝的時候不爲公理而戰，假使你在勝利可操左券、不費甚大代價的時候不戰，你說不定臨到末了，即

使一切形勢不利於你而祇有一線生存的希望時，你仍舊不得不起而作戰。那時，甚至可能還有更壞的情形。那時，甚至即使沒有勝利希望，你還是不得不戰，因為戰死總比較活着做奴隸好得多。

伯明罕的演說，使我和張伯倫先生較前接近得多：

我今大膽的把昨日下午我在議院休息室中對你說的主張，再重復申述一下，即今後對於空中防禦，應作充分的準備。這樣的步驟，不能認為是侵略的，但或者可以強調英帝國政府在大陸方面所採行動的嚴重性。把這些軍官們和人員集合在一起，使其一天天的構成一體，就會改進他們的效能。這在國內的影響，將引起人民的信賴，而不是恐慌。但我最念念不忘的是希特勒。他在這個時候，一定是在緊張狀態之下。他知道我們正在組織一個制止他作更進一步侵略的聯合勢力。像這樣一個人，什麼事他都做得出來。他們或者會試圖對於倫敦或我更為憂慮的各航空工業工廠，作出其不備的攻擊，假使事前他們知道我們一切都已有所準備，這種誘惑性就會消失。實際上現在已不能再有什麼出其不備的事了；因之，必須消除引起極端暴行的誘因，和得以實行更為審慎的計畫。

一九一四年八月間，我曾勸告愛士麥斯讓我把艦隊送到北方，以便艦隊在外交局勢未成絕望以前，能夠越過多維爾海峽及狹隘海道。現在的充實防空設備問題，在我看來，其情形亦與此很為相同，所以我希望你對於我把這件事放在你面前，不要介意。

波蘭人在清算捷克國家中，以可恥的態度取得了德琛，可是他們立刻就要繳付他們自己的罰款了。三月二十一日，里賓特洛甫接見波蘭駐柏林大使立柏斯基，他不像在從前討論中那樣客氣，現在改取嚴厲的聲調了。布希米亞的佔領，和附屬國斯洛伐克的成立，使德國軍隊，伸進到了波蘭的南部邊境。立柏斯基對里賓特洛甫說，波蘭的一般民衆，都不能了解德帝國擔任保護斯洛伐克的理由，而且認為這種保護制度，是在於對付波蘭。他又詢問里賓特洛甫和立陶宛外長最近談話的情形。這種談話是否影響到米美爾？兩天後（三月二十三日），立柏斯基就得到了他的回答。德軍佔領了米美爾。

東歐方面任何足以組織抵抗德國侵略的手段，現在差不多完了。匈牙利已經投入德國的陣營。波蘭先是對於捷克的事情，隔岸觀火，後來又不願和羅馬尼亞密切合作。而且波蘭和羅馬尼亞，都不願讓蘇俄越過他們的國境。共同反對德國結成大同盟的關鍵，就在和蘇俄成立諒解。三月二十一日，深受當時情事影響的蘇俄政府，

雖然在慕尼黑危機一幕中曾被擯大門以外，卻建議舉行一個六強會議。對於這個問題，張伯倫亦有決定的見解。三月二十六日，在一封私人通信中他寫着道：

我一定要承認，我對蘇俄抱極深切的懷疑之心。即使他願意，我亦不相信他究有何種能力可以維持一個強大的攻勢。並且我還不相信他的動機；在我看來，她的動機和我們的自由概念毫無關係，他祇是挑撥是非，惟恐天下不亂，不但如此，他受許多弱小國家的憎惡和疑懼，尤其是波蘭、羅馬尼亞和芬蘭。（註）

蘇俄的六強會議建議，因此就這樣被冷淡的看待，和讓它打消了。

要想使意大利脫離軸心的可能性，雖在英國官方的算計中，曾經期望甚大，也已經消失了。三月二十六日，墨索里尼發表一篇措詞激烈的演說，反對法國，主張意國在地中海的要求，暗中他正在計劃擴充意國在巴爾幹及亞得里亞海的勢力，使與德國在中歐的進展，保持均衡。他的侵犯阿爾巴尼亞的計劃，現在已經準備就緒了。

三月二十九日，張伯倫在國會宣布將地方軍擴大二倍的計劃，包括紙面上增加的二十一萬人（沒有配備）。四月三日，希特勒的總參謀長季特爾，發表關於波蘭的祕密的「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武裝部隊指令」——其密碼的名稱叫做「白色計劃」。德元首又加上了以下的訓令：「進行準備的方式，務須做到從九月一日起，任何時間內都可隨時作戰。」

四月四日，政府為宴請波蘭外長柏克，邀我參加在薩伏亞午餐。這位波蘭外長是來此作正式的重要訪問的。我會於上年在里維拉遇見他，我和他曾經一起吃過飯。我現在就問他道：「你回去的時候，你的專車是否將直經德國回到波蘭？」他回答道：「我想我們總會有那樣的時候」。

一個新危機現在已在我們面前展開了。

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黎明，意大利軍在阿爾巴尼亞登陸，經過一個很短的爭鬪，便佔領了全境。正好比捷克將成爲德國用以侵略波蘭的根據地，同樣，阿爾巴尼亞可能成爲意大利攻擊希臘及使南斯拉夫中立化的跳板。英國政府對於維持東北歐的和平利益，早已接受了一種義務。對於東南方面發生的威脅怎麼辦呢？這艘和平的船，已是處處發生漏罅了。

四月九日，我寫信給首相道：

我希望最遲在星期二重新召集國會，而且我在這裏邊說，我是何等的希望你所能發表的聲明，也像在波蘭協定一事中一樣將能造成同樣的聯合陣線。

不過，照我看來，時間現在是很重要的。恢復外交上的制先權，已屬刻不容緩。這已經不是僅僅發表宣言，或通告廢棄英意協定，或撤回我國大使等方法所能完成的。

星期日的各報，都曾公開說起我們正在向希臘和土耳其提出保證。同時我還注意到有幾張報紙，談到英國海軍佔領科佛一事。假使我們已經採取此項步驟，它將給我們維持和平的一個最好機會。如果我們未曾採取此項步驟，自然是經過希臘同意的，那麼據我看來，因爲報紙上已把這種念頭宣布，而且因爲顯然是事勢上的必需，科佛恐怕會很迅速的被意大利先行佔領。要想重新奪回來，那就不可能了。從另一方面說，假使我們先佔該地，甚至一個對少數幾隻英艦的攻擊，就會使墨索里尼面臨着開始對英侵略戰。這個直接的問題，將使意國境內所有反對和英國發生大戰的各種力量，有活動的最好機會。它不特不致使現在發生的嚴重危險更趨緊張，而且可以減少危險，但是今晚上下應該採取行動。

現在整個巴爾幹半島，已在危險之中。假使巴爾幹各國仍舊繼續受德意的壓力，同時我們又照他們所判斷一樣，顯出不能有所行動，那末，他們就不得不去和柏林及羅馬妥協，求取最可能的有利條件。到這時候，我們的地位將變成何等的絕望！我們就要對付波蘭問題，和由此捲入歐洲東部的糾紛，而同時卻把所有關於如果一旦結成、即可獲救的大同盟的希望，一起割斷無遺。

我在寫上面的話時，並不知道我們地中海艦隊的現在情形。我們的地中海艦隊，自然應該集中，應該在海上，並位於適當而不至太接近的互爲犄角的地位。

事實上此時英國地中海艦隊正散在各處。我們五艘大主力艦中，一艘在直布羅陀，另一艘在東地中海，其餘三艘，停靠在距離廣闊的意大利各口岸裏邊或外邊，且其中二艘，沒有小艦隊的保護。驅逐艦隊則散布於歐

洲及非洲沿海一帶，另外一大隊巡洋艦，則集中在馬爾太港，沒有有力的主力艦高射砲隊作保護。正在這個艦隊因分散而實力受到損害之時，大家知道，意國艦隊已在奧倫多海峽集中，意國軍隊正在集合登艦，準備作某種嚴重的圖謀。

四月十三日，我在下院中抨擊這種疏忽的部署：

英國人民渡過抄的習慣，英國人民的非常重視適逢教會節日的假期，都給外國人士在研究着。耶穌受難日，亦是國會解散後的第一天。大家知道，在那一天，英國艦隊，以慣常的舊例，在舉行一個早經宣布的節目。因為這個緣故，艦隊一定是散開於四方各處……我相信，假使我們的艦隊，那時是集中在一起，和在愛奧尼亞海南部各處巡弋，意大利進攻阿爾巴尼亞的冒險，恐怕永不會演出來……

經過了二十五年和平與戰爭的經驗，我相信英國的諜報部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然而我們已經見到在征服布希米亞和侵犯阿爾巴尼亞兩事中，英國的各部大臣對於當前將發生的情形，顯然全不知道，或者至少沒有確切知道，我不能相信這是英國秘密情報部的過失。

在布希米亞暴行的前一夜，英國各部大臣們，還在沉湎於所謂『溫暖的談話』，並預言『黃金時代到了』，這是什麼緣故？在顯然即將發生性質迥異尋常、後果莫能預測的事變之時，前星期的放假舊規還是照常實行，這又是什麼緣故？……在我看來，各部大臣，假使對於情報所搜集、和我相信在及時之內提供給他們的情報，先經揀選、修飾、和把內容關係重大及要點刪減以後，再行過目；假使他們仍抱出主入奴之見，因為他們熱誠及誠實的期望世界和平應該繼續保持，就專挑那些合於這種意見的情報，我可說他們是在冒最可怕的危險。

所有的事，都在同一的時際發動了。年復一年，月復一月，他們一連是一起的向前進行。等到我們心裏邊想到某種局勢，別人已經在事實上實現某種局勢了。危險現在已經極近，大部分的歐洲，已在作極大規模的動員，成千成萬的人，正在準備作戰。各處地方的邊界，都有兵防守，每一處地方，都有攻擊的危險即將臨頭的感覺。假使果然戰爭實現，那末，我們之將捲入漩渦，還有什麼疑問嗎？我們現在所過的，已經不是兩三個月以前的日子了。我們在各方面，已負起義務來；照我的見解，在已經看到所發生的一切以後，這也是正當的義務。現在無須逐一列舉出我們直接間接已經提出、或正在提出保證的國家。在一切還很有希望的一年以前，在那時候，我們所夢想不到要做的事情；甚至在一個月以前我所夢想不到的事情，現在我們都要做了。當然，我們要想把整個歐洲，從地獄的門口救回轉來，引導到法律及和平的高原上，我們必須以身作則，做成最高尚的表率。我們對一切，都不能使之落後。我們怎麼還可以繼續領導我們民眾，過着國內舒服安閒的生活，甚至連『強制』一個字都不願說，甚至不願採取那唯一能徵召和裝備我們所答應的陸軍的必需措施呢？黑暗的非常的潮流，正在四面澎湃奔湧。我們怎麼可以繼續——讓我特別坦白、誠實的說——不把整個國民的兵力編入統制的機構呢？

幾天之後，我在一封給哈里法克斯勳爵的私信裏，又反覆申述對於艦隊的不滿：

我國艦隊的處置，真是令人莫解。第一，四月十四日、星期二晚上，海軍大臣報告國內艦隊的戒備情形，說緊張到管高射砲的人員，甚至不能離開高射砲位跑到下面來。這是一個嚇人的電報所造成的結果，而且，照我看來，是超過了戒備的需要。同時他方面，地中海的艦隊，就像我向議院所說的一樣，散處於地中海全部區域，形成很易遭受攻擊的混亂狀態；並且，像報紙上照片所刊出的巴漢姆號一艦，竟停靠在那不勒斯的碼頭。現在，地中海艦隊已經集中而且已經在它應該所在的海上了，因之在地中海方面，無疑的一切已經妥善了。但是，缺乏戒備的情形，又移到了國內水面方面。大西洋艦隊，除了少數幾架高射砲以外，實際上有若干天因為大多數的人都在告假之中，簡直沒有動作，在這些時際當中，人們早想到對於請假一事，至少可予以『相當限制』。所有的掃除水雷艇，都在重加裝配。不能活動。這種情形如何能與所稱的星期二那天存在的緊張情形相符合呢？這與繼續的合理的戒備，似乎有嚴重的違背。總而言之，現在所有的情形，在原則上和前星期的情形，並沒有不同。海軍首席大臣，現在患病很重，所以我預料到有許多事要降到史丹霍伯的身上。（當是海軍部首席大臣——譯者）

我寫這封信給你，是專為告訴你個人的，以便你可以親自去查察事實。所以，我請你對這封信嚴守秘密，因為我不要拿這事去煩擾首相，但是我想你應該知道。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在德國宣布保護布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之後，戈林與墨索里尼齊亞諾晤面，其目的是要對意大利說明德國備戰的進行程度。這次談話的記錄已經發現，其中有下面戈林講的一段：

捷克的重型軍備，無論如何甚至在慕尼黑會議後，表明假使發生一個嚴重衝突，可以有何等的危險性。由於德國的行動，已經改善了兩個軸心國的局勢，因為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自大量捷克生產力移歸德國的結果，增加了軸心國經濟上的可能性。它的貢獻，為大大加強了軸心國對付西方列強的力量。尤有進者，德國現在，如遇到一個較大的衝突時，已經用不着保留一師人、準備防禦那個捷克國家了。這最後說來，也是兩國軸心國家所以享到的一種利益。……德國在捷克所採取的行動，應該認為軸心各國的利益。德國現在可以從兩翼側面進兵攻擊這個國家，而且距離新的波蘭實業中心，將祇需二十五分鐘的飛行；這個新的波蘭實業中心，因為接近邊疆，已經遷移到該國內地，距離其他波蘭實業區域更近。（註一）

幾年後約特爾將軍在一篇演說中說道：『一九三八年秋季及一九三九年春季兵不血刃的解決捷克衝突以及兼并斯洛伐克，已經完成德國領土的恢復，而現在德國已可在多少於戰果有利的基礎上考慮波蘭問題了。』（註二）

（註一）紐倫堡檔案，見前引第二卷一〇六頁。

（註二）同書一〇七頁。

在戈林訪問羅馬的這天，羅斯福總統給了希特勒及墨索里尼一封私函，力勸他們給予保證，在十年之內，『或者，假使我們看得更遠，甚至二十五年之內』不作任何進一步的侵略。這位意國首相，最初拒絕閱讀這封信，後來他加上批語道：『這是嬰兒癲癇症的結果呵！（羅斯福總統曾患此症——譯者）』他沒有想到他自己將要受到更凶惡的痛苦哩。

首相雖曾一再保證不採取徵兵的步驟，可是到了四月二十七日，他竟毅然決然的決定實施徵兵。強迫促成此珊珊來遲的覺醒的，其功當推陸相賀爾·倍里廈。他當然準備犧牲自己的政治生命，有幾次他和首相的會談，內容具有可怕的性質。在這個嚴重的試驗中，我看出了他的若干特色，在他的任期中，從沒有一天深信他的職位不至隨時可告終止。

當然，這個階段的實施徵兵，還不能構成一個軍隊，它僅徵召年在二十歲的人；他們尚須予以訓練；在他們受訓以後，還須予以武裝配備。不過，這是對於法國、波蘭、及其他我們慷慨提出保證的各國的最重要的象徵表示。在辯論中，反對黨竟未能履行他們的天職，自由黨和工黨，在這種英國歷古相傳根深蒂固的反對強迫兵役的偏見之前，也嚇退了。工黨的領袖提議說：

在我們準備採取一切必需步驟，以供保衛國家安全及履行國際義務的時候，本院對於政府破壞諾言，堅欲廢棄在供給國防所需人力方面並無差處的志願入伍原則，深引為憾；本院認為現在所主張的辦法，有欠考慮；非但在物力方面不能增強國防的實力，反會召致分裂，使國民的努力，遭受挫折；並且這又是政府在這些嚴重時期所做的事，不配全國人民及本院信任的另一證據。

自由黨的領袖，亦找出理由，來反對這個步驟。這兩黨的領袖，對於他們站在黨的立場上不得不採取的途徑，頗為苦惱。但是他們兩人畢竟採取了這種立場，而且援引了一大堆的理由。表決時各自根據黨的立場，保守黨便以三百八十票對一百四十三票的投票結果，通過了他們的政策。在我的演說當中，我曾經儘我的力量要想勸服反對派，來贊成這個萬不可少的徵兵計畫；然而我的努力，竟歸無效。我完全了解他們的困難，尤其是遇着一個他們所反對的政府之時。我必須要把這件事記下來，因為它把自由、勞工兩黨黨人批評當時政府的任

何權利，都剝奪了。這些話非常明白的表示出他們自己對於時事的辦法。不久他們就要表示出一個更爲準確的計畫。

雖然張伯倫仍在希望避免戰事，可是於一旦戰爭發生時，顯然他不會畏縮退避。斐林說，首相在他的日記中記着『戰爭發生的可能性愈大，邱吉爾愈有「加入政府」的機會，反之，戰爭發生的可能性愈少，邱吉爾加入政府的機會亦愈少。』（註）這種話不免帶點侮慢的口氣。我心中除了想再度入閣做大臣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念頭。可是，我仍舊了解首相的觀感。他知道，假使戰爭發生，他就要找我幫忙，並且他很準確的相信我一定會答應他的召喚。另一方面，他又恐怕希特勒看我加入政府，認爲一種敵對表示，而因此將使碩果僅存的和平機會，完全喪失。這是一種自然的、而不是錯誤的見解。雖然如此，關於張伯倫不願爲了招致下議院的某一議員加入他的政府、而引起如此可怕而微妙的局勢一節，大家亦很難加以責備。

在三月，我曾聯合艾登及保守黨議員三十人，從事拖延一個成立舉國一致政府的決議案。在夏天當中，國內發生了一個極大的激動，贊成這個主張，有的主張至少要我和艾登入閣。站在獨立地位的克立浦斯深切憂懷國家的危險。他曾訪晤我及各大臣，力勸組織他所謂『混合政府』。我是無能爲力；但是商務局局長史丹萊，卻深爲感動。他寫信給首相，說道，假使他的去職可以幫助政府改組，他情願犧牲他自己的職位。

史丹萊致首相書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日

在這樣一個時間，在你不勝焦思煩慮之時，我寫信給你，頗爲躊躇，祇有鑒於事情的緊急，可以作我的曲想。我想我們都覺得，唯一可能避免今秋戰爭的機會，就是使希特勒澈底知道我們將決心履行對波蘭的義務，和他的侵略行動將無可避免引起大禍。我們全體，一定都會想到，我們能否採取某種行動，一方面不致威脅太甚，惹起報復，又具有足以引起注意的戲劇性。除了現在組織一種戰爭爆發時免不了要組織的政府外，我自己實不能想出任何一種可能的比較更有效的辦法。組織這樣的政府，就是國民一致和堅決心的戲劇性的證實，並且，照我想來，不但在德國而且在美國，都會有重大的影響。而且，假使在最後的時機有了若干滿意解決的可能性，那末，由這樣一個

（註）見斐林同書第四〇六頁。

政府來作和解的努力，也一定較為容易。你當然對於這個可能的事情早經考慮，並且對於種種可能發生的困難，一定比我更能認識，但是我，我還是妄寫信給你，要使你知道我的見解，要使你確信，倘若你已經考慮成立這樣一個政府的可能，我——我也確信所有其餘我們的同僚都是如此——願意並擔任任何職位，不管職位怎樣小，不管是在政府機關以內或以外。

首相僅僅以正式收到作覆。

過了幾星期，差不多所有報紙，由每日電訊報（七月三日）領導，曼徹斯特導報加以強調，紛紛響應這個意見。我看見這種風潮的時起時伏，奔騰不息，很為驚奇。成千成萬寫着：『邱吉爾必須回來』的傳單，貼在都市招貼板上有幾星期之久，許多自動參加的青年男女，都拿了廣告板上面貼着同樣的標語，在下院門前走來走去。我和這種煽動的方法是毫無關係的，但是，假使政府對我提出邀請，我當然應該加入政府。可是現在，我個人的好運氣又被阻住，其他一切事情，又照它邏輯的、自然的及可怕的順序推演了。

第二十章 蘇維埃之謎

希特勒廢止英德海軍協定——廢止德波互不侵犯條約——蘇聯提議成立三強聯盟——邊境國家的左右爲難——德蘇接觸頻繁——李維諾夫的去職——莫洛托夫——英蘇談判——五月十九日的辯論——勞合喬治的演說——我對歐洲局勢的說明——對蘇聯盟的需要——太遲了——德意問「聖如鋼鐵的公約」——蘇維埃的外交策略

我們已經到了英德所有關係已至山窮水盡的時期了。我們現在自然知道，自從希特勒登臺以來，兩國之間就始終沒有過真正的友誼關係。他祇希望去勸說或恐嚇英國、放任他在東歐採取自由行動；而張伯倫曾經抱定希望，以求取悅他和改造他，指引他溫文知禮。但英國政府最後幻想歸於破滅的時期已經到了。內閣終於深信不疑，納粹的德國在存心作戰，首相向仍舊開放的四面八方，提出保證和訂立同盟，也不問我們對於有關國家能否作任何有效的援助。在對波蘭保證以外，又加上了一個羅馬尼亞的保證，接着又來一個土耳其的聯盟。

現在我們要重新回到張伯倫在慕尼黑會使希特勒簽名於上、和他返國在海斯敦下飛機時向羣衆得意揮舞的那張悲慘的紙頭。在這張紙上，他曾援引過他認爲存在於他和希特勒、以及存在於英德之間的兩種盟約，即慕尼黑協定與英德海軍條約。征服捷克之舉，已經把前面一個摧毀了，希特勒現在又要來掃除第二個了。

四月二十八日他向國會致詞：

今日英國既然由報紙、和正式支持在無論何種情形之下應該反對德國的見解，並副以我們所知道的包圍政策，在這種情形之下，海軍條約已經失其基礎。因此我決定於今天給英國政府一個牒文，說明如此情形。在我們，這還不是一個具有實際物質重要性的問題——因爲我仍希望我們和英國可以避免作軍備的競賽——而是一個出於自尊心的行動。不過如果英國爲了這個問題，願意和我們重新舉行談判，則我對於我們仍將有成立明白坦率諒解的希望，將比任何人都更要快樂。（註）

（註）希特勒演說集第二部一六一—一六六頁。

英德海軍協定，在希特勒政策的一個重要和決定的關係中，對他曾有過顯著的利益，現在他卻把條約說成對英國有種種好處，並且爲表示德國不快起見，要取消這種好處了。德國元首使英國政府仍保持一個希望，即以爲他可能仍願和英國政府重新討論海軍問題；以爲他甚至也許預料過，從前上過他當的人，仍將堅持他們的綏靖妥協政策。但就他而言，現在一切無關輕重了。他已取得意大利的合作，已有空中的優勢；他已占有奧國和捷克以及兩國所包括的一切。他已有他的兩壁。在純粹海軍方面，他早已一向不管協定，儘可能趕速建造潛艇。他形式上早已援用條約上所規定的權利，得建造與英國數目相等的潛艇，但這絲毫不曾限制德國製造潛艇的計劃。關於較大的艦隻，條約對他雖有慷慨的許可，但他心有餘而力不足，不能全部消納下去。他因此巧妙而膽大妄爲的、把條約就丟在那些製造條約的愚人的面上。

在同一篇演說中，希特勒也廢止了德波互不侵犯條約。他以英國對波蘭的保證，作爲他直接的理由。這個保證。

在某種情形之下，如遇德國與任何其他強國發生衝突，而使英國捲入戰爭之時，將迫使波蘭對德採取軍事行動。這種義務，與我若干時前和華蘇斯基所成立的協定不符。……所以我認爲波蘭已經在片面的違反了這個協定，因此協定已經不再存在了。我已經對波蘭政府發出一個說明此事的牒文……

當時研究這篇演說詞以後，我在一篇論文中說道：

德國的眼光，現在似乎很顯然在轉向到波蘭身上了。希特勒的演說詞，也許可以、也許不能作他內心用意的引導，但上星期五那一幕戲的主要目標，顯然在於孤立波蘭，對它提出似乎最動聽的攻擊之詞，和對它加以強大的壓力。德國的獨裁者似乎假定，他把要求集中於但澤和走廊地帶，就可以使英波協定不能實行。顯然他希望英國那些常喊「誰將爲捷克而戰」的分子，現在也許將起而叫「誰將爲但澤和走廊地帶而戰」？他似乎沒有覺得，由於他的無信背棄莫尼黑協定，已經使英國輿論發生重大的變化；他的暴行，已經造成英國政府、尤其是首相政策的完全改弦更張。

廢止一九三四年德波互不侵犯公約之舉，是一個極端嚴重的和威脅性的步驟。遲至本年一月里賓特洛甫訪問華沙時，對這個公約還曾重加申述。它也同英德海軍條約一樣，是希特勒之願而談判訂立的。它也同海軍條約一樣，給了德國顯著的利益。這兩個協定，都會在德國往弱之時，減輕了德國的困難地位。海軍協定事實上不啻由英國寬恕了德國違反凡爾賽和約中軍事條款之舉，由此也就同樣打消了斯德里薩陣線和國際聯盟行政院所作的決議。德波協定使德國的注意力得以集中於先是奧國、其後是捷克的身上，使這些不幸的國家遭遇到破

滅的結果。它暫時削弱了波蘭和法國之間的關係，阻止了東歐國家，作任何利益休戚相關的團結。現在它已經對德國効過勞了，就要用片面的行動丟在一邊。波蘭獲得暗示的通知，它現在處於可能受侵略的圈子中了。

英國政府對於它所給波蘭和羅馬尼亞的保證，究竟實際的涵義如何，必須作緊急的考慮。這兩套的保證，除非納入對蘇聯作一般性協定的體制之內，無一具有任何軍事的價值。爲了這個目的，英大使和李維諾夫間的談話終於於四月十五日在莫斯科舉行。鑒於蘇聯政府過去曾受到些什麼待遇，現在對他們是不能有多大的期望的。但在四月十六日，他們提出了一個全文未經公布的建議，主張英國法國和蘇聯結成互助的聯合陣線。這三強，如果可能再加上波蘭，對中歐及東歐處於德國侵略威脅之下的國家，再度提出保證。這個協定的困難，是這些同一的邊界國家，深恐接受了蘇聯的援助，蘇聯形式上就將以大軍開入他們境內，保護他們以抵抗德國，這樣一來，就將附帶把他們併入他們所深疾痛惡的蘇維埃共產制度之內。波蘭、羅馬尼亞、芬蘭和波羅的海三國，都不知道在德國的侵略或蘇聯的救援兩者之中，他們究竟怕那個多些。就是這種可怕的選擇，麻痹了英國和法國的政策。

不過，即使事後說來，英法無疑早該接受俄國的建議，宣布三強的聯盟，而把於戰時如何實行互援的方法，留待對付共同敵人的三聯盟國之間加以安排。在這種情形之下，將流露不同的心情。戰時的盟邦，互相之間極願聽從對方的願望；到了前線上的戰鼓聲響，一切在和平時憎惡不遑的便宜之道，此時將歡迎之不暇。在這一種可能已經成立的偉大聯盟之中，一個盟國除非得到邀請，要開入另一盟國的境內將是不容易的事。

但張伯倫和外交部，爲這個不可解的難題所挫折了。當這一方面的時勢以這樣的速率，這樣龐大的規模進行之時，最聰明的辦法是有一個時間就走一步。英國、法國和蘇聯的聯盟，一定將使一九三九年的德國，感到中心的惶恐，而且誰也不能證明，即使到該時，戰爭已是不能避免。聯盟國便可能已經以更強大的力量，採取第二步的行動。他們由外交上可以重新奪回制敵機先之權。希特勒的力量，既不能發動他曾經痛加抨斥過的兩線同時作戰，又不能聽讓半途而止。說來可憐，實際上竟沒有把他放在這個尷尬地位之上，這個地位原很可能

使之送命的。政治家的任命，不單是解決簡易的問題，這種問題是會自行解決的。在均勢發生動搖、平衡如蒙霧中之處，纔會有作保救世界的決定的機會。我們已經置身於一九三九年可怕慘況之中後，我們非把握住較大的希望不可。

即使到現在，仍舊不能確定史大林究竟到了什麼時候、纔斷然決定放棄與西方民主國家合作的本意、而與希特勒進行攜手。事實上，很可能也許就沒有過這一種時候。不過在美國國務院根據俘獲的德國外交部的大宗檔案所公布的一九三九年至四一年的德蘇關係中，其中告訴了我們若干從前不知道的事實。顯然早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初，兩國之間就已經有了若干接觸；但這些差不多一定是商務的談判，因為慕尼黑事件後，捷克地位發生變動，需要兩國重行討論。三月中捷克被併入德帝國之舉，更擴大了這種問題。俄國會向捷克政府訂購斯柯達軍火廠的出品，現在斯柯達已經成爲德國的軍火庫了，這種契約又如何處置呢？

四月十七日德國外交部次長威瑞格說明，差不多一年前呈遞國書的蘇聯大使，在那一天對他作第一次的訪問。他問起斯柯達廠的契約，威瑞格指出，「外傳俄英法成立空軍協定和類似的東西，以戰爭材料運交蘇聯的有利空氣尙待開創。」說到這裏，蘇聯大使立刻由商業轉到政治，問外交部次長對於德蘇關係作何觀感。威瑞格答稱，在他看來，「最近蘇聯報紙，對於美國報紙和若干英國報紙的反德口吻，沒有充分和調齊鳴。」關於這一點，蘇聯大使說，「意見上思想形態的差別，絕未影響到俄國和意大利的關係，所以它們對於德國也不一定要證明是一種障礙。蘇聯沒有、也不願利用目前德國和西方民主國家間的摩擦，以反對德國。在俄國，並無爲什麼不能與德國正常相處的理由。從正常之中，關係可能越來越改善。」

我們必須認這個談話是極重要的，尤其鑒於同時在莫斯科方面英大使和李維諾夫正在舉行談話，和四月十六日蘇聯會正式建議，與英法訂立三國同盟。這是俄國脚踏兩頭船的初次明顯的舉動。從此以後，就按部就班的一方面進行俄德間關係的「正常化」，一方面作三國聯盟反對德國侵略的談判。

例如如果張伯倫於接到俄國的提議，就答覆說：「是的，讓我們三國團結起來、和打倒希特勒，」或意思

這樣的一類話，議會或者已經予以核准，史太林或者已有明白的瞭解，而歷史或者早已有不同的途程了。至少它不能有比實際上所趨更壞的途程。

五月四日我以下列的話評述時局：

最要緊，不可失去時間。自從俄國提議提出以來，已經十天或十二天過去了。英國人民現在犧牲了歷久信守和牢不可破的習慣，接受徵兵制的原則，他們有機合同法國共和國向波蘭要求，不要在實現共同目標的途中，橫生障礙。不單對俄國的充分合作非接受不可，而且必須使立陶宛、拉特維亞、愛沙尼亞等波羅的海三國參加這個團結。這三個民族英武的國家，共有總數也許達二十師的精銳軍隊，就他們而言，一個供應軍火及其他援助的友善的俄國，是必不可少的。

沒有俄國的積極幫助，就無法維持一個反對德國侵略的東部戰線。阻止希特勒在東歐的圖謀，與俄國的利益有深切的關係。現在應該仍有可能把波羅的海與黑海之間的各國各民族，結合成爲一個堅實的陣線，反對一個新的暴行或侵略。這一種陣線如果建立於不折不扣的精神之上，具備堅決而強大的軍事部署，再與西歐國家的力量聯合起來，其所形成的實力將使德國人民遠巡不致對之挑戰，也許還可以對付希特勒、戈林、希特勒、李賓特洛甫、戈培爾等一黨的結合。

不此之圖，反之在一方面準備彌縫之策和作明智的妥協時，始終保持長期的緘默。這種拖延，對李維諾夫是致命的打擊。他的最後一次努力，想和西方國家把問題作一個明白斬截的決定，被認爲已經失敗了。我們的聲望淪至極低的地位。爲了俄國的安全，需要一個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必須找一個新的發言人。五月三日莫斯科發表一個公報，宣布「李維諾夫自請辭去外交人民委員職務，已予照准，其所遺職務，將由莫洛托夫總理繼任。」駐莫斯科的德國代辦於五月四日報告如下：

遲至五月二日李維諾夫還曾接見英國大使，在昨天的報上，他還列名爲游行中的貴賓，所以他的解職，似乎是史太林自動決定的結果。……在最近一次黨的大會中，史太林主張慎重，否則蘇聯即有捲入衝突之虞。莫洛托夫（不是猶太人）被認爲是「史太林最親近的友人和最密切的合作者」。他的任命，顯然是今後外交政策仍將繼續嚴格遵照史太林意志的保證。

蘇維埃的駐外代表，奉令通知駐在國的政府，說明這種人選的變更，並無蘇聯將改變外交政策的意思，五月四日莫斯科無線電廣播，稱莫洛托夫將繼續推行多年來爲李維諾夫目的所在的西方安全政策。這位爲德國眼

中釘的卓越的猶太人，暫時像一樣破傢私似的被丟在一邊，而且不容作一詞的申辯，被逐出世界舞臺，過幽居的生活，靠微薄的薪給爲生，受警方的監視。在俄國國外不大著名的莫洛托夫，成爲外交人民委員，與史太林保持最密切的結合。他不受過去所作宣言的一切牽累，不受國際聯盟空氣的限制，可以走似乎可能爲俄國自衛所需要的任何方向。事實上現在他不致走的路祇有一條。他一向贊成和希特勒成立協議。慕尼黑及其他事件，使蘇維埃政府深信，無論英國或法國，除非打到了自己身上是不會作戰的，而到打到自己身上時，就沒有多大用處了。山雨欲來風滿樓，就要到天崩地坼的時候了。俄國必須自求保衛之道。

李維諾夫的免職，表示了一個時代的終結。它宣告俄國政府對於與西方國家成立安全公約，以及組織一個抵抗德國的東歐陣線的可能，已經放棄一切的信心。當時德國報紙的評述，雖不一定準確，卻是很有意思的。五月四日德國報紙登載了一篇華沙通訊，稱李維諾夫在辭職以前，曾和伏羅希洛夫元帥（膽大妄爲的俄國人在疏忽的時候，稱他爲「黨的夥計」）有過一場激烈的爭吵。伏羅希洛夫無疑根據精確的訓令，稱紅軍沒有爲波蘭而戰的準備，並以俄國總參謀部的名義，抨擊『過於廣遠的軍事義務』。五月七日，已經有充分情報的法蘭克福新聞，宣稱李維諾夫的辭職，對於英法的「包圍」政策，有極端嚴重的影響；辭職的可能涵義，也許是俄國那些關心因這種政策所產生的軍事重負的人，把李維諾夫喝住了。所有這些話都是真的；但在一個階段之中，對這一種重大的事項，必須加上一個欺騙的掩飾，甚至即使到最後的一刻，蘇聯的態度應該仍舊保持捉摸不定。俄國必須雙管齊下，要不然，它如何能與所憎惡和恐懼的希特勒斷斷爭價呢？

猶太人李維諾夫下了臺，滿足了希特勒的主要偏見。從那個時候起，德國政府不再把它的外交政策、稱爲『反布爾塞維克的』，轉而漫罵攻擊『財閥民主政治』。報紙的論文對俄國人保證說，德國的生存空間並不侵犯到俄國的境土；事實上，這個生存空間到俄國各處的邊界爲止。因此除非蘇聯參加接受英法包圍的約定，否則俄國與德國不能有發生衝突的理由。德國大使舒倫堡經召返柏林作冗長的談話後，回到莫斯科，提出一個有

利的根據長期基礎的貨物信用貸款。雙方面的動向都在趨向於成立一個同盟。

俄國政策發生了劇烈的和不自然的轉變，這一種脫胎換骨的行爲，是祇有極權國家所能做得出的。不過兩年以前，俄軍的領袖杜卡轍夫斯基和它幾千最有成就的軍官，就爲了這些希望，慘遭殺身，而現在克倫姆林宮裏少數惶惶不安的主人，卻覺得可以接受了。在那時，親德是異端邪說，是陰謀叛國。現在一夜之間，它成了國家的政策，凡是敢於提出異議的人，就當然活該的倒霉，那些轉變得不夠快的人，也往往受到同樣的命運。就手邊的工作而言，沒有人比新外交人民委員更適合或更條件具備了。

這位以史太林命置身於蘇維埃外交政策壇上的人物，值得作若干的敘述，這也是當時的英法政府所不知道。莫洛托夫的爲人，具有非常的能力和冷靜的殘酷。他也同所有布爾塞維克領袖一樣，在革命勝利的各年中，經歷過可怕的危險和磨難，屹然無恙。他是在一個有千變萬化的陰謀、和個人有經常受清算危險的社會之下生活和發跡的。他的如砲彈似的頭，他的黑鬚，他的領悟一切的眼睛，他的平板的面部，他說話的圓轉周到，他的不加聲色的舉止，都是他特色和材能的適當表象。一個無從估計的機構，在推行其政策時，要找一個代表人和工具時，他比任何人都要適宜。我祇在有時流露出幽默意味的會議場中，在他慫慂提議作一連串慣例而沒有意思的乾杯上，站在相等的地位同他見過面。我從沒有看見過一個人，比他更能完全代表現代人心目中的機器人。但不管以上種種，他仍不失爲一個顯然講理和十分修飾的外交家。他如何對待不如他地位的人，我不能說。在德黑蘭會議中，史太林答應德國一經戰敗即對日本進攻之後，他對日本大使的態度，從他有記錄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來。在其後接一連二舉行的微妙嚴重和尷尬的談話中，始終保持完全不作決定的態度，不透露目標的內容，維持客氣的正式的禮式。他的帶有西伯利亞寒氣的微笑，他的審慎考量過的和往往很高明的話，他的慫慂的態度，合起來使他成爲這一個凶惡世界中蘇維埃政策的最完善的代表。

爲了問題爭執，與他通信辯難往往是沒有用的，而且如果推之過遠，就不免以欺騙或侮辱之詞收場，在本

書中就包括有若干例證。祇有一次，我曾似乎得到一個自然的合乎人性的反響。那時是一九四二年的春季，他由美國回來，乘飛機在英國登陸。那時我們已簽訂英蘇條約，他就要作有危險性的歸國航行。在唐寧街爲保持我們祕密使用的花園門口，我緊握住他的手臂，兩人相對而視。他似乎忽然發生深切的感動。在形像之內，真的人出現了。他以同樣的緊握爲報。我們一言不發彼此握着手。但那時是我們團結一致，和生死共共的時候。在他整個時代中，四面八方都是破壞糜爛的局面，或者是自己身受，或者是由他置到別人身上。蘇維埃機構得到莫洛托夫，當然就有了一個幹練的和在許多方面是典型的代表——常是忠實的黨員和共產主義的信徒。如果我直至我生命結束爲止，不至於經歷他所痛苦遭受過的緊張，我將引爲何等的快樂；如遇這種情形，沒有出生還要反而好些。在執行外交方面而言，如果布爾塞維克黨讓自己到第二個世界，則蘇里、塔蘭朗、和梅特涅（蘇里與塔蘭朗爲法國外交家，梅特涅爲奧國外交家，皆以鐵腕著名——譯者）地下有知，當歡迎與他爲伍。

從莫洛托夫成爲外交人民委員那個時候起，他就進行犧牲波蘭，與德國成立協定的政策。不久，法國知道了這些情形。法國黃皮書中，曾載有五月七日駐柏林法大使一個堪注意的電報，稱根據他祕密得到的情報，他斷言第四次瓜分波蘭（在十八世紀中波蘭三度爲俄國普魯士與奧國所瓜分——譯者），將成爲德俄和解的基礎。一九四六年四月達拉第曾稱，『自五月以來，蘇聯舉行兩個談判，一方面對法國，一方面對德國。他似乎寧可瓜分波蘭而不願保衛波蘭。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直接原因。』（註）但尚有其他的原因。

五月八日英國政府對於四月十六日的蘇聯照會終於提出了答覆。英國覆文的內容沒有公布，塔斯社於五月九日發出了一個舉出英國提議要點的記載。五月十日官方機關報新聞報登出一個公報，內容稱路透社所傳英國

對案的記載，即「蘇聯對於周圍每一國家，必須分別提出保證，和英國保證如蘇聯因爲所負保證而引入戰爭時，予以援助，」與事實不符。公報說蘇聯政府已經收到五月八日英國的對案，其中並未提到蘇聯向其每一鄰國分別提出保證的義務，同時對案中稱，如遇英法爲履行對波蘭維馬尼亞保證而捲入戰爭之時，蘇聯有立即予以援助的義務。但公報中關於蘇聯因履行對任何東歐國家的義務，而結果捲入戰爭時，英法對蘇聯所作的任何援助，沒有提及。

同日的下午近晚，張伯倫宣布，政府已經接受在東歐的新義務，但因種種的困難，沒有邀請蘇聯直接的參加。英國政府曾經提議，蘇聯本身應該作一個同樣的宣言，並表示對於可能成爲侵略犧牲者的國家，遇到如果他們希望時願意給予援助，和準備保衛他們自己的獨立。

蘇維埃政府差不多同時提出了一個更廣泛和更爲嚴格的方案。這個方案不管有什麼其他可能的優點，但在英國政府看來，它勢所必至將引起在政府所草提議中所要求避免的那些困難。他們因此向蘇聯政府提出了這些困難的存在。同時，他們把他們的原提議，作了某種的修正。他們（英國政府）特別明白表示，如果蘇聯政府希望把他們的干涉、繫於英法的干涉而定，則在英國政府將不表反對。

可惜這一番話，沒有早在兩星期前作明白的宣布。

此地應該一提的，五月十二日土耳其國會正式批准了英土協定。我們希望加了這個新的約束，可以加強危機發生時我們在地中海的地位。這裏是我們對意大利占領阿爾巴尼亞的答覆。正同對德作談判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一樣，現在我們與意大利實際上走到了同樣的僵局。

與俄國人的談判仍在沒精打采的進行，至五月十九日整個問題在下院中提出。辯論的時間，性質嚴重，發言者幾乎限於各黨的領袖和曾任閣員的顯要。勞合喬治艾登和我，都力促政府有與俄國立即成立性質極廣遠、根據平等條件的協定之必要。勞合喬治首先發言，以最慘澹的色調，描繪出一幅陰鬱和危險的圖像：

這種局勢，很可使我回想到在一九一八年初春時所流行的觀感。我們那時知道德國即將發動一個大攻擊，但沒有人明白知道打擊將落到那裏。我記得法國人認爲他們的前線將首當攻擊之衝，同時我們的將領認爲打擊將降到我們身上。法國的將領甚至對於他們的前線那一

部分將首先被攻，也沒有一致的見解，而我們的將領，亦是意見紛歧。我們所知道，什麼地方就要受到一個極強大的攻擊，整個空氣充滿了皇皇不安，我不說是恐懼。我們可以看到德國陣線後的非常活動，我們知道他們是在準備什麼東西。這些在我看來，多少和今日的局勢相像。……我們都很有急；整個世界都有一個印象，即侵略者正在準備具有另一次進攻性質的東西。沒有人明白知道，它將在什麼地方出現。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正在以空前的速率，擴充他們的軍備，尤其是在進攻性的武器方面——坦克車、轟炸機、潛水艇。我們知道，他們正在占領和設防新的陣地，這些陣地在對法國和我們作戰時，可以給他們戰略上的利益。……他們正在觀察和調查自利比亞起至北海止各種在戰時有非常重要性的情勢。關於戰線後面的移動，有一種極端不吉之兆的秘密。

在一九一八年也曾有這樣的秘密，用意在使我們對他們的目的莫明其妙。他們不是在準備防禦……他們不是在準備抵抗或是法國、英國或俄國的攻擊。他們從來就不曾受到威脅。我無論由私人或公開方面，從未聽到過打算進攻德國或意大利任何地點的暗示或提議，他們也知道得十分明白。因此所有這些準備，都不是為防禦之用。他們是預備實行某種經過考慮的進攻計劃，以攻擊我們所關心的某些國家。

勞合喬治接着又加上一段高明的話：

獨裁者的主要軍事目標和計劃，是求產生迅速的結果，避免長期的戰爭。長期的戰爭是從來不適合獨裁者的。像古希臘半島戰爭那樣的長期戰爭，把他們拖倒了；俄國的偉大防禦，雖未為俄國人產生偉大的軍事勝利，卻打垮了拿破侖。德國現在的、也是他一向的理想，是一場迅速結束的戰爭。一八六六年的對奧戰爭，不過打了幾個星期；一八七〇年的戰爭（指普法戰爭——譯者），由其作戰的方式，一兩個星期以後實際上已告結束。一九一四年的作戰計劃，具有完全同樣的目標，而且差不多幾乎成功；要沒有俄國，或者他們已經成功了。但是從他們未能實現迅速的勝利那一起，這一場好戲就完了。你們可以相信我的話，德國的大軍事家曾在解決的問題，就是什麼是一九一四年的錯誤？他們缺乏點什麼？在第二次大戰中他們如何能充實這些缺陷？如何能補正或避免這些的錯誤？

勞合喬治從事實至幻想，一路強調他的見解，接着又說德國人業已有『坦克車兩萬輛』和『轟炸機幾千架』。這句話遠超過了事實，而且是對恐懼心理的過了份的呼籲。這些年來我們一小羣人，奔走呼號，再三的主張重整軍備，他為什麼不會和我們一起努力呢？但他的話，使全院感到澆了一盆冷水。兩年以前，或者更早在三年以前，這一類的話和他演詞中所有的悲觀主義，早將受到譏刺和嘲笑；但在那時尚有的是時間，現在不管數字如何，一切已嫌太遲了。

首相起來作覆，也是第一次宣露他對於蘇聯建議的見解。他受理這個建議的態度當然是冷淡的，實際上還是鄙夷不屑的。

如果我們能引申出一種能使蘇聯參加合作協助，以建立和平陣線的方法，我們歡迎它；需要它；重視它。所傳我們輕視蘇聯的協助，屬於無稽之談。關於俄軍實力的確切價值，和如何方式其實力可以有最好的發揮，我們無須接受任何未經授權性質的見解，但誰也不致愚到認為這一個疆域龐大、人口衆多和資源豐饒的大國，在我們現在面對的這一個局勢之中，將爲一個可以忽視的因素。

這番話中所表現出的缺乏輕重分寸，和我們在一年前拒絕羅斯福總統提議之舉中所見到的一樣。

我於是再接再厲的發言：

關於首相自稱亟望進行的對俄協定，和照蘇聯政府所提出的廣泛而簡單的形式進行，我實在不會懂得有什麼反對的理由。

俄國政府所提出的提議，無疑是訂劃成立反對侵略的英法俄聯盟，聯盟於其他國家如果或發生希望之時，亦得以利益推廣及於他們。聯盟的目的，專爲抵抗再度的侵略行爲，和保護侵略的犧牲者。我看不出它有什麼毛病。這個簡單的提議有什麼毛病呢？有人說：「你能信任蘇聯政府麼？」我想他們在莫斯科也會說：「我們能相信張伯倫麼？」我希望，我們對這兩個問題，可以說都有正面的答覆。我竭誠希望如此。

這一個經普遍接受的土耳其的提議，在整個黑海區域和東地中海，都是一大團結的和安定的力量。已與我們成立這個協定的土耳其，與俄國保持最密切的友好關係。它和羅馬尼亞亦有最密切的友好關係。這些國家合起來正在互相保衛基本的利益。

英國和南歐各協約國家之間有極一致的利益，但和北歐是否也有同樣的一致利益？就舉會一度爲彼得大帝作戰原因的波羅的海國家立陶宛、拉特維亞、愛沙尼亞而言。不讓這些國家落入納粹德國之手，爲俄國的一個主要關心所在。那是在北歐方面的一個基本利益。我無須詳細推考關於（德國進攻）烏克蘭的議論，那一來就等於向俄國本土進攻。你可以看到，沿這一條整個東線，俄國的主要利益都受到確切的牽制，因此，你似乎可以大概斷定，他們會把他們的利益，與同樣受到影響的其他國家合成一片。

如果你們準備在爲最高試驗的戰爭之中，成爲俄國的聯盟，如果你們準備在保衛你們會加以保證的波蘭以及羅馬尼亞時，與俄國攜手，那你們爲什麼要畏縮顧慮，不在此時成爲俄國的聯盟？就在此時，你們與俄國成立聯盟之舉，可能防止戰爭的爆發。我不能懂得所有這些外交的繁文高論和遲延不決。如果不幸而發生最惡劣的局勢，則在局勢之中你們不至孤掌難鳴；你可以同他們一起盡其最善的努力。如果危機沒有發生，那你們在初步的階段中將已有安全的保證了。

英國政府曾對波蘭提出過一個保證。當我聽見提出這種保證時，我感到震驚。我擁護它，但我因它而震驚，因爲過去所發生的一切，無一使人會認爲將採取這一種步驟。我要請委員會注意一個事實，即勞合喬治十天前和今天重新提出的問題，迄未得到答覆。問題即

是，在保證提出之前，關於提出保證之是否妥當和合於實際，有沒有實現保證的任何方法，曾否和參謀本部有過諮商。全國知道問題已經提出過，和問題迄未得到答覆。這使人惶惑不安。

顯然俄國除非受到平等的待遇，和除了平等待遇以外，對於同盟國家——在和平陣線方面——所採用的方法，相信大致有成功之望，否則他們不會參加協定的。誰也不願自己和躊躇不決的領袖與游移無定的政策合作的。政府必須認清，所有東歐的國家，除非背後有與西歐國家聯合的友誼的俄國，予以重大堅強的支持，否則無一國能够支持一年的戰爭。在大體上，我和勞合喬治意見相同，如果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東線——一個東部的和平陣線，或者如果戰爭發生，即為一個戰爭陣線——，祇有獲得位於所有東歐國家背後的友善蘇聯的強大支持，纔能成立。

除非建立了東線，西線會發生些什麼呢？西線上的國家，像比利時、荷蘭、丹麥、瑞士等，如果說我們還沒有對之提出保證，但大家公認我們義應援助的，他們又將發生些什麼呢？讓我們回顧一下我們在一九一七年所有的經驗。在一九一七年，俄國的陣線已經破裂，人心已經渙散。革命和兵變，削弱了那一枝偉大有紀律的軍隊的勇氣，戰線上的情形，亂到無法敘述；然而直至和約訂立把戰線結束為止，雖則在無力和不幸的情況之下，那個陣線所吸引住的德軍，仍在一百五十萬人以上。那個陣線一旦結束，一百萬大軍和五千尊大砲即轉調到西線，在最後的一刻中，差不多轉換了戰爭的行程，幾乎使我們被迫接受一個大難臨頭的和平。

這個東戰線的問題，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現在大家對它沒有發生更大的焦急，我深以為異。當然我不是要求蘇聯的優惠。現在不是向其他國家要求優惠的時候。但此地有一個建議，公平的建議，而且照我的意見，這個建議的條件，比政府替他們自己求的還要好些；一個更為簡單、更為直捷、和更為有力的建議。讓我們不要把它扔在一旁，和弄得一事無成。我請求政府把若干這些殘酷的真理，握住在他們的手中。如沒有強大的東戰線，則我們在西歐的利益即不能有滿意的防衛，而沒有俄國，即不能有強大的防衛。如果政府久已忽略了我們的國防，已經丟掉了捷克和捷克在軍事力量方面所代表的一切；現在對技術方面不作檢討，已經使我們擔負起保衛波蘭和羅馬尼亞的義務，如果現在拒絕和丟掉俄國的不能缺少的援助，因而以最惡劣的方式把我們引導到最惡劣的戰爭之中，那麼他們將辜負了國民的信任，而且我還要加說一句，也辜負了國民對待他們的寬大為懷。

所有一切無疑現在都已嫌太遲了。艾德禮、辛克萊和艾登對於危險之迫在眉睫，和與俄國成立聯盟的必要，作了一般的陳述。工黨和自由黨的領袖，在幾星期以前還曾領導黨員，投票反對全國徵兵制度，這種投票反對，削弱了他們的立場。他們所常常提出的呼籲，是因為不滿意外交政策，但他們的呼籲是微弱的；因為如果沒有實力為後盾，和全國如果不願為了產生這種實力而接受必要的犧牲，外交政策即不能有什麼效力可言。

西方國家成立抵抗德國的防禦同盟之時，對方恰好亦有針鋒相對的表現。里賓特洛甫與齊亞諾於五月初在柯摩地方開始的談話，獲得了所謂「堅如鋼鐵的公約」的正式公開結果，五月二十二日兩國外長在柏林簽字。這是對於脆弱的英國對東歐保證制度的挑戰答覆。齊亞諾的日記中，曾記有簽訂聯盟條約時和希特勒的一段談話：

希特勒說他對公約深為滿意，並證實地中海政策將由意大利主持。他對於阿爾巴尼亞抱有興趣，對於我們的計劃，想把阿爾巴尼亞造成爲堅決控制巴爾幹的要塞，甚爲熱心。

到了簽訂「堅如鋼鐵的公約」的第二天，即五月二十三日，希特勒與他的參謀本部首長舉行會議中，他的滿意更有明白的表露。這次談話的祕密議事錄經記錄在卷：

我們現在正處於愛國熱誠的狀態之中，兩個其他國家也分享這種狀態——意大利和日本。我們過去的時期，確已曾作良好的利用。過去所採的步驟，都曾按部就班的進行，和合於我們的目標。波蘭不是一個「稱道性質的敵人」。波蘭將永遠站在我們敵人的一面。雖有友善的協定，波蘭一向暗中存心，利用每一機會傷害我們。但澤完全不是問題所在。這是一個推廣我們在東方的生存空間，和保障我們糧食供應的問題。因之饒免波蘭不能成爲問題，我們不得不作此決定：一遇適當的機會就進攻波蘭。我們不能希望捷克斯拉夫那樣舊事重演。此後將有戰爭。我們的任務爲孤立波蘭。孤立的是否成功，將具決定的性質。

如果不能斷言德波的衝突，不會引起西線的戰爭，那麼戰爭將主要對付法國和英國。如果法國英國俄國成立了一個反對德國的聯盟，那我就不得不予英法作若干殲滅性的打擊。我懷疑有與英國成立和平解決的可能。英國把我們的發展，看做可以削弱他們的霸權基礎。所以英國是我們的敵人，與英國的衝突，將是有關生死的戰爭。荷蘭和比利時的空軍基地，必須由武裝部隊加以占領。必須不理中立的宣言。如果英國有干涉波蘭戰爭的意思，我們就必須以閃電的速率占領荷蘭。我們目的必須確保荷蘭境內直至須德海的新陣線。以爲我們可以很便宜的了事，是很危險的；現在沒有這一種的可能性；我們必須破釜沉舟，現在已不是正義與不正義的問題，而是八千萬人民的生死存亡的問題。每一國家的武裝部隊或政府，都必須以速戰速決爲目標。不過政府也必須準備一個十年或十五年的戰爭。

英國知道，戰爭失敗就是他的世界霸權的結束。英國是反對德國的推動力量。英國人本身是驕傲的、勇敢的、堅毅的，具堅決的抵抗力和組織者的材能。他們知道如何利用每一新的發展。他們有愛好新奇冒險之心和諾狄克種的勇敢。德國人平均比他們高出一籌。但我們在第一次大戰中，如果多有主力艦及巡洋艦各兩艘，如果朱特蘭海戰在晨間舉行，英國艦隊或者早已戰敗，（註一）英國或者早屈膝了。除了出其不備的攻擊之外，也必須作長期戰爭的準備，同時，必須剷除英國在歐洲大陸的機會。陸軍將必須堅守爲海軍空軍所必需的陣地。如果成功的占領和守住了荷蘭和比利時，如果也戰敗了法國，那麼與英國作勝利戰爭的基本條件，就將已經實現了。（註二）

五月三十日德國外交部發給他們駐莫斯科大使下面的訓令：『與我們過去計劃的政策相反，現在我們已經決定和蘇聯作確切的談判了。』（註四）一方面軸心國家團結一致作軍事的準備，同時西方國家和蘇聯的基本聯繫已經破滅了。在五月三十日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對張伯倫五月十九日下院演說詞的答覆演說中，可以讀到兩方見解的根本不一致。

（他說）遠至四月中，蘇維埃政府進行與英國及法國政府談判，討論所待採取的必要措置。從那時開始的談判，迄今尚未結束。從若干時前起，事實已成顯然，如果對於成立一個由和平國家組成的強有力陣線，有任何真正的願望，則下列最低限度的條件是必需的：

由英國法國和蘇聯成立一個反對侵略、專為防禦性質的強大的互助公約。

由英國法國蘇聯方面，對中歐及東歐的國家，包括毫無例外所有與蘇聯為隣的歐洲國家，提出保證，抵抗侵略者的攻擊。

英國法國蘇聯對於在發生侵略者攻擊之時，彼此之間互相給予、和給予被保證國家的立即和有效的援助，應有何種形式及範圍，成立一個確切的協定。

談判已到了一個似乎無法打開的僵局。波蘭和羅馬尼亞政府一方面接受英國的保證，卻不預備接受俄國政府同樣方式的同樣擔保。在另一有基本戰略重要性的區域——波羅的海國家方面，也流行同樣的態度。蘇聯政府明白表示過，除非一般的協定包括芬蘭和波羅的海三國在內，他們纔願接受一個互助的公約。所有四國現在都拒絕了這個條件，也許他們在恐怖之中早就已經會予以拒絕。芬蘭和愛沙尼亞甚至宣稱，凡未經他們同意而向他們提出保證，他們將視為侵略行為。同日，即五月三十一日，愛沙尼亞拉特維亞和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的協定。希特勒就這樣很輕易的，把反對他的遲延而沒有決心的聯盟的脆弱防線突破了。

（註一）前引齊亞諾日記九〇頁。

（註二）希特勒顯然全不知道朱特蘭海戰的事實。這一次海戰從頭至尾，是英國艦隊想引德國人出來作決戰而未成。在這種決戰中，英艦之壓倒一切的砲火，定可一下發生決定的作用。

（註三）前引紐倫堡文件第一都一六七——六八頁。

（註四）德蘇關係十五頁。

第二十一章 到了戰爭邊緣

威魯伯澤——甘默林將軍邀我觀察萊因河前線——和喬治將軍漫遊——幾個印象——法國採取守勢——原子能研究情形——我關於空防的短簡——重新努力和蘇聯求取一致——波蘭的阻撓——莫斯科軍事談判——一九四二年時史太林對我的說明——一個欺騙的記錄——里賓特洛甫被邀前往莫斯科——俄德互不侵犯條約——世界突然聽到驚人消息——希特勒的軍令——「誠實是最好的政策」——英國的預防措施——首相給希特勒的信——一個無禮的答覆——希特勒延緩他的進攻日期——希特勒給墨索里尼的信——意大利首相的覆信——最後的幾天

夏季一天天過去，全歐洲繼續着戰爭的準備，外交家的態度，政治家的演說，和人民的意願，日漸不被重視。德國的軍事行動，似乎預示和波蘭解決但澤糾紛，實在是攻擊波蘭的初步。六月十日張伯倫在議會中表示他對於時局的焦慮，並重申如果波蘭獨立受到了威脅，英國將加以援助的決心。比利時政府聽從了國王的主張，本於躲避事實的精神，於六月二十三日宣布反對和英法舉行參謀部會議，並表示比利時企圖維持嚴格的中立。事態發展的趨勢，使英法兩國之間以及兩國國內，日趨團結。在七月之中，巴黎和倫敦間往返頻繁。七月十四日的法國國慶，被大事渲染表明英法的團結。我被法國政府的邀請，參觀這次燦爛的奇觀。

在遊行之後我正離開布爾葉時，甘默林將軍提議我應該去參觀一下法國前線。他說：「你從沒有看過萊因河扇形區，八月裏請再來，我們給你所有的一切。」因此我們擬定了一個計劃。八月十五日斯比亞斯將軍和我受到了他密友喬治將軍的歡迎。喬治將軍是法國陸軍總司令，亦是最高統帥的繼承人。我能會見這位惹人歡喜的和勝任的軍官，極為愉快，我們在以後十天中同在一起，研討着軍事上的問題，並和甘默林隨時連絡，他這時也正在考察這一部分前線的另外幾個據點。

從近勞透堡的萊因河灣角起，我們橫過全部扇形地帶，直達瑞士的邊境。在英國，正像在一九一四年一樣，有閒的人們這時正在享受他們的假期，正在和他們的孩子們一起在沙灘上優游度日。可是在這裏沿着萊因

河的一帶，完全是一番不同的景象。所有過河的臨時橋樑都被移到了河的這一面或是那一面。永久的橋樑均有重兵駐守，並都埋着地雷。忠實的軍官日夜駐守，以便信號一起，即可掀動鍵鈕把橋樑炸毀。這條偉大的河流，充滿了阿爾卑斯山積雪的溶水，洶湧的向前流去。法軍的前哨，蹲伏在叢林中來復鎗戰壕裏。我們可以二三人成羣走到河邊，但我們受到通知，不能成羣結隊，好像目標似的成羣出現。在那一邊約三百碼之外，可以看到德國人，在叢林之間，悠然用了鋤頭鏟刀，在建築他們的防禦工事。斯特拉斯堡所有河邊的住宅區中，平民早已全部撤退。我在橋上站了一些時候，注視一二輛汽車開過。橋的兩端，雙方都詳細檢查護照，並盤詰身份。在這裏，德國的營房離開法國的約略不到一百碼左右。他們之間毫無往來。然而歐洲是在和平之中，德法之間亦無糾紛。萊茵河繼續以每小時六七英里的速度，波濤起伏，江流滔滔。一兩隻載着孩子的獨木小舟，在水面上掠過。我直到五年多後再重新看到過萊茵河。一九四五年的三月中我纔和蒙哥曼利元帥搭了小船橫渡萊茵，但這是在近威塞爾地方，還在遠遠的北面。

我回國後，我將我收集的札記送給陸軍大臣，也許亦曾送給了我有往來的其他大臣：

法國的前線，無法奇襲。不論在任何一點，都無法加以突破，除非化了極大的生命代價，和許多的時間，不過在這進行的時間內一般情勢，可能發生完全的改觀。在德國一方面，情形也是相同，雖然程度稍差。

但這一前線的兩翼，須靠着兩個中立的小國家。比利時的態度，一般認為非常令人不滿。現在法國和比國之間，沒有任何軍事的關係。

在我能詳細參觀的陣線的另一端，法國已盡力準備，以防經由瑞士而來的侵襲。如果德國採取這種軍事行動，它將沿阿爾河前進，並以一支部隊移入或移向柏爾福山峽，以保護進攻主力的右翼。我個人以為在戰爭開始階段中，德國對於法國前線或對在其兩翼的兩個小國家，不致絕對會作任何重大的企圖。

德國在攻擊波蘭之前無須動員其軍隊。他們現有已經實行戰時編制的軍隊，足夠供東線之用，它於開始猛擊波蘭後，仍可有充分時間，實行動員，以增援齊格斐防線。所以我們不能以為德國的動員，是戰爭前必定會來的警號。另一方面，法國在現在這種極端緊張的時期，似乎有採用非常措施的必要。

到目前為止，希特勒似乎應該等到大雪落在阿爾卑斯山上，使墨索里尼可以得到冬季的保護時，纔有所舉動。在九月初的兩星期中，

或甚至更早一些的時候，這些條件即可能完成。十月底或十一月初的泥濘時期會妨礙德國攻勢，但在這時期來臨以前，希特勒仍可充分的時間對波蘭加以重擊。所以九月的上半月似乎是最危急的時期，現在德國準備在紐倫堡實行的示威行動——宣傳之類——似乎和上述的結論，完全相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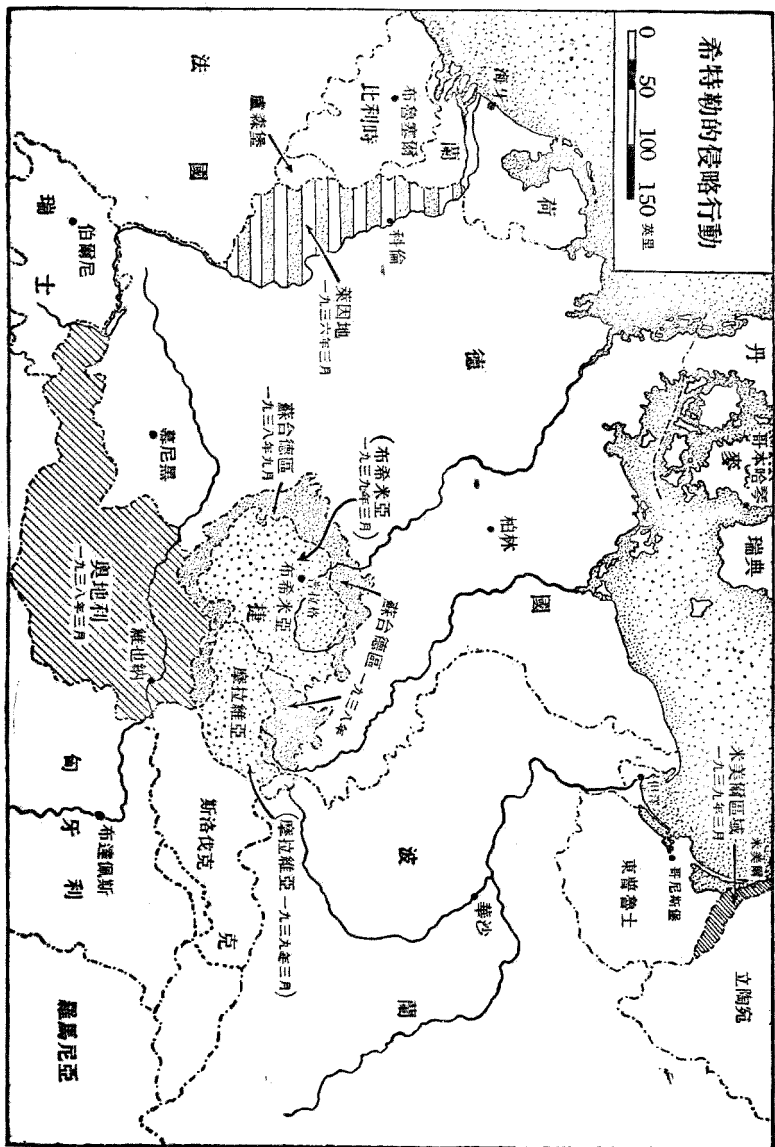
在我這一次訪問中，我認爲最堪注意的，是大多數負責任的我的法國東道主人，一致認爲應採守勢，這種思想，使我深爲不安。在和這些非常有能力的法國軍官談話時，我們不禁有一種感覺，即德國較強，法國已不復有實行大攻勢的活力。它將爲其本身生存而戰——如是而已！那邊有着設防的齊格斐防線，配備着新式武器的強大火力。我自己回想到上次大戰中索姆河和巴斯春特勒的攻勢，還有着餘悸哩。德國那時當然遠較慕尼黑時代爲強。我們不知道德國最高當局當時所感到的深切焦慮。我們在實體方面和心理方面都已到了如此程度，沒有一個負責的人——到這時爲止，我仍是在野之身——敢於相信，德國保衛由北海到瑞士的遙長前線，祇有四十二個配備不全、訓練不良的德國師團；更無人根據這種實爲事實的假定，作對症發藥的行動。在慕尼黑時代，這條戰線上德國祇有十三個師團。

在這最後的幾星期中，我深怕英國政府也許會不顧我們的保證，在德國攻擊波蘭時畏縮不前。這時候，張伯倫顯已決意投身作戰，雖然這對於他是非常痛苦的。但我當時對他的認識，並沒有像一年以後那樣深刻。我怕希特勒也許要再來一次虛聲恫嚇，佯稱有什麼新奇的东西或秘密武器，使我們負荷特重的內閣爲之嚇倒或迷惑。林特曼教授以前曾屢次和我談起原子能。我於是請他告訴我這一方面的現狀如何，在談話之後，我寫了下面的信給伍德。我和他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在前面已談到過了：

邱吉爾致空軍大臣：

幾星期以前，有一張星期報上發表了一篇談到大量能力的故事，據說根據最近的發見，在一種特殊的原子，稱爲鈾的，在爲中性電子所分裂後，即可發生連鎖作用，而產生大量的能力。初看起來，這可能預示着將發見一種破壞力極大的新爆炸物。不過我們應知道，這種

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



發見雖然在科學上有極大的興趣，將來也許最後有其實用上的重要性，但在幾年以內，決不會即有研究有結果而有能大規模施用的危險。根據種種跡象，在國際局勢非常緊張時，必有人會有意散播謠言，說要用了這種方法，來製造可怕的新秘密爆炸物，以消滅整個倫敦。第五縱隊也必將設法以這種威脅來引誘我們接受另一次的屈服。因此我們有將實在情形，加以說明的必要。

第一，最有權威的學者主張在鈾的裏面，祇有極小的成分在這些作用中能發生效力，而在要得到大量的效果時，這種成分必須先要提煉出來。這要經過多年纔能成功。第二，僅在大量的鈾被集中一起後，始能發生連鎖作用。在能力開始發生時，往往在還沒有產生真正效果以前，一遇輕微的爆發即行爆炸（註）。它也許能像我們現在所有的各種爆炸物一樣的有效力，但恐不致於會產生更危險的效果。第三，這些試驗不能小規模着手。如果他們已在大規模加以試驗而得到了成功（即得到了真正足以脅迫我們的結果，而非僅僅恫嚇我們），要保持秘密是不可能的。第四，在以前是捷克、現歸柏林掌握的土地中，祇有比較少量的鈾。

根據這些理由，可知一般人對於這種新發見，這種可以使納粹得到足以毀滅其敵人的某種兇惡的、新的、秘密的爆炸物所發生的恐懼，顯然毫無根據。今後一定會散佈出各種暗濇的暗示，不斷傳播令人恐怖的話語，但希望沒有人會受這種種的迷惑。

這個預測竟會如此正確，真是奇事。在原子能方面，摸到門徑的倒不是德國人。他們實際上走錯了路，正在羅斯福總統和我決定、並獲致可紀念的協議從事大規模建造原子彈的時候，德國人卻放棄了原子炸彈而從事於飛彈或無人飛機的研究。關於這個協議，我將在以後適當的地方，再詳為論述。

我在對空防研究委員會提出的最後一文中，也說：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日

英國對空襲的主要防禦，是對來襲者予迎頭痛擊。如果每一次空襲中，能有五分之一的敵人被擊落，那末不久便可使空襲中止。……我們可以設想得到，開始的攻擊必然是大規模的，幾小時連續不斷的接連渡海來襲。但空襲最初的結果，並不能決定空襲的將來。空襲英國並不是一樁兒戲。重大的死傷將使敵人不得不慎重計算其損益。到了日間空襲不久經證明代價過於昂貴時，我們所要對付的將限於對工業區無定時的夜襲。

墨索里尼在七月七日向英國大使說，「告訴張伯倫，如果英國預備為保衛波蘭而戰，意大利將和其盟國德國並肩作戰。」但在幕後，他的態度恰巧相反。他當時所企求的目的，無非是鞏固其在地中海和北非的利益，摘

（註）這種困難當然在後來被克服，但這經過了多年的研究，用了極精密的方法，始能成功。

取他在西班牙干預的成果，並消化其在阿爾巴尼亞的勝利。他並不願爲了德國要征服波蘭而捲入歐洲的戰爭。他雖然曾屢次公開自誇，但他知道意大利軍事和政治的脆弱，比任何人都清楚。在一九四二年時，如果德國供給他軍火，他是願意主張作戰的；但在一九三九年時——不！

夏季中，對波蘭的壓力日益猛烈，墨索里尼忽想重做慕尼黑時代的和事老，他建議召開一個世界和平會議。希特勒冷淡的拒絕了這類思想。八月十一日，齊亞諾在薩爾斯堡和里賓特洛甫會面。根據齊亞諾的日記：

首相切望我能用書面證據，證明在這時候發動戰爭將爲愚昧之舉……要想把戰爭限於波蘭一隅，是不可能的，而全面戰爭，將使每一個人人都受到損害。首相以前從沒有如此無保留的，如此熱烈的希望過和平……里賓特洛甫一味托辭規避。我問起他關於德國政策的詳細情形時，他的良心使他很爲難。關於德國對波蘭的企圖，他說謊的次數太多了，他現在對於他必須告訴我的和他們實在計劃中要做的完全不同，自覺不安……德國對於作戰的決意，無可更改。縱使給了比他們所要求的更多的東西，他們仍然是要進攻的，因爲毀滅的魔鬼已經占有着他們了……有時，我們的談話極爲緊張，我毫不猶豫的將我的意見坦白說出來，但他不爲所動。我開始發覺我們在德國人的見解中，所佔的地位是如何的渺小（註）。

齊亞諾在下一天去見希特勒。我們已得到了這一次會見的德方紀錄。希特勒明白指出，他要澈底解決波蘭，他不得不和英法一戰，他要意大利參加作戰。他說，「如果英國在其國內要保有必須的兵力，它派赴法國的兵力，最多祇能有兩師步兵和一個裝甲師團。此外，它能供給幾隊的轟炸機，但決不能供給戰鬥機，因爲德國的空军將立即攻擊英國，英國亟需戰鬥機用以防衛本身。」關於法國，他說在波蘭毀滅以後——這並不需要多少時間——，德國在西線可以集中幾百師的力量，法國因此必須將其殖民地的大意大利邊境及其他地方所有的軍力，集中於馬其諾防線，以作殊死之戰。齊里諾在答復中，對於他所聽到的嚴重程度，表示深爲驚異。他埋怨說德國以前從未有過任何表示，使他們知道波蘭的爭執已如此的嚴重和迫切。相反的，里賓特洛甫

說過，但澤問題可以留待將來解決。首相雖深信和西方各國的衝突是無可避免的，但他認為應該有二三年的時間，訂定關於此事的計劃。

英國和法國政府又再度努力，以求和蘇聯取得意見一致的協定。英國於是決定遣派一位特使去莫斯科。艾登先生在早幾年前曾和史太夫有過成功的接觸，自願前往。這個慷慨的建議，竟未為首相接受。在六月十二日，他反派了斯特朗來擔任這重大的任務，他固然是個能幹的官吏，但在外交部以外並沒有特殊的地位。這是另一個錯誤。派遣這樣一位次要的人物，實在是開罪於人。他是否能穿過蘇聯機構的外圈，實在疑問之列。無論如何，現在一切都已遲了。自從梅斯基在一九三八年八月被派到卻特威爾來看我到現在，其間已發生了很多事情。慕尼黑事件已經發生過了。希特勒的軍隊又多了一年的長成。他的軍火廠得到了斯柯達工廠的補充，都正在日夜開工。蘇聯政府極關心捷克；但捷克已完了。貝奈斯已流亡在外。一個德國的總督在普拉格統治着。

另一方面，在俄國看起來，波蘭實在是全套另外一套的長期性的政治和戰略問題。兩國最後一次的主要衝突，是一九一九年的華沙之戰，當時克律萊哥率領着布爾塞維克派軍隊攻入波蘭，畢蘇斯基得到魏剛將軍和達農勳爵領導下英國代表團的援助，逐退紅軍，更接着拚命追擊，藉雪血仇。在這些年中，波蘭是反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前哨。它用了左手，聯合並支持了反蘇的波羅的海各國。但用了它的右手，在慕尼黑時代，它又幫助對捷克實行劫掠。蘇聯政府確知波蘭憎恨着他們，它亦知道波蘭無力抵抗德國的進攻。不過他們也深知他們自己的危險，深知他們需要時間，來整理他們軍隊最高統帥部所受到的破壞。在這些情況之中，瞻望斯特朗先生的任務，是難於圓滿的。

交涉始終以一個問題為中心，即波蘭和波羅的海各國不願讓蘇聯把他們由德國的手中拯救出來；在這一點上談判始終沒有進展。六月十三日真理報在其主要的論文中早已宣稱，芬蘭、愛沙尼亞和拉特維亞有效中立，對於蘇聯的安全極關重要。「這類國家的安全」，對於英國和法國極端重要，這是「甚至像邱吉爾先生這樣

一個政治家」也都承認。這個問題於六月十五日在莫斯科提出討論。第二天，俄國報紙宣稱「在蘇聯外交部方面，認為初次會談的結果並不完全順利」。七月中，談判時作時輟，最後蘇聯政府忽然建議願和法英代表就軍事立場，繼續談判。英國政府於是派了德賴克斯海軍上將率領代表團於八月十日前往莫斯科。這些軍官並沒有進行交涉的書面授權。法國代表團由杜孟克將軍率領。在俄國方面，則由伏羅希洛夫元帥主持。我們現在知道，當時蘇聯政府會同時允許德國派遣一個談判的人到莫斯科來。軍事會議不久因波蘭和羅馬尼亞拒絕俄軍過境而終歸失敗。波蘭人所持的態度是，「對德國人，我們有喪失自由的危險；對俄國人，我們有喪失靈魂的危險。」（註）

一九四二年八月中，有一天侵晨史太林在克里姆宮，告訴了我蘇聯一方面的情形。史太林說：「我們當時所得的印象是：如果波蘭被攻，英國和法國政府並沒有決意要作戰，他們所希望的是由英法和俄國在外交上聯合起來，以阻止希特勒。我們當時確知這是阻止不住的」。史太林問過，「法國在動員時可以派出多少師兵力去對抗德國？」回答是：「大約一百師。」他於是問：「英國可以派多少？」回答是：「兩師，以後再可以接着派兩師。」史太林重複着說，「啊，兩師，以後再可以接着派兩師。」他問：「你們知道不知道，如果我們對德作戰，我們在俄國前線需得派出多少師？」這裏停頓了片刻。「在三百師以上」。他沒有告訴我這是和誰的談話，或談話發生的日子。我們必須認清這是堅實的基礎，但這不是外交部的斯特朗所贊成的。

爲了討價還價起見，史太林和莫洛托夫都認爲必須將他的真意掩藏起來，直至最後時候。莫洛托夫及其下屬在和雙方接觸時，顯出其口是心非的非常才能。遲至八月四日，德國大使舒倫堡祇能由莫斯科發出下列的電報：

（註）引在雷諾中，前引，第一卷，第五八七頁。

從莫洛托夫的全部態度，顯然在蘇聯政府實際上極願改善德蘇間的關係，但他們以前對於德國的不信任，仍固執存在。我的總印象是，如果英國和法國能滿足他們的要求，蘇聯政府現在是決心要和他們簽約的。當然，談判也許還要延長很久，尤其是因為他們非常的信任英國。……我們方面如要使蘇聯政府轉向，必得再加努力。（註一）

他實在毋庸焦慮，大事已經定了。

八月十九日夜，史太林向政治局宣布他預備和德國簽訂條約。八月二十二日，同盟國代表團直到晚上纔找到了伏羅希洛夫元帥。他對法國代表團團長說：

和法國軍事合作的問題，傳之已有幾年，但始終未有所決定。去年，在捷克遭難時，我們等待着法國的信號，但始終沒有音響。我們的軍隊是準備着的……法國和英國政府現在對於政治和軍事談判，均一味拖延，以致久無結果。爲了這個理由，在其間發生某種政治事件的可能性是不能免的。（註二）

第二天，里賓特洛甫抵達莫斯科。

我們現在由紐倫堡文件和美國發見及最近印行的文件中，已得到了這一樁應永矢不忘的事件的詳情。根據和里賓特洛甫一起飛到莫斯科去的他的主任助理員格斯所說，「八月二十二日下午，里賓特洛甫和史太林作第一次會談……德國外交部長從這長時間會談回來，顯極滿意……」即在這一天的薄暮，關於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正文，很快的獲得了協議，毫無困難。格斯說，「里賓特洛甫親自在前言中，插進了一句意義深長的語句，說明德蘇友好關係的成立。對於這，史太林力持反對，他以爲他們在被納粹覆在牛糞堆裏已有六年之久，蘇聯政府決不能突然向公衆提出德蘇友好的宣言。因此，前言中的這一句便被刪除了。」在一個祕密的協定中，德國

（註一）德蘇關係，第四一頁。

（註二）雷諾，前引，第一卷，第五八八頁。

聲明它在政治上對於拉特維亞、愛沙尼亞和芬蘭不感興趣，但認爲立陶宛應在它的勢力範圍之內。瓜分波蘭的分界線，亦經劃定。在波羅的海中，德國祇要求經濟的利益。互不侵犯條約和密約直到八月二十三日深夜始經簽訂。（註）

在本章和前一章中已經平心靜氣紀錄了一切，但對於這類不自然行爲所引起的非難，也實在祇有兩國中的極權暴君可以厚顏相向。我們不知道希特勒或史太林兩人中究竟那一個最嫌惡這個條約。雙方都知道這祇是一種暫時的便宜處置。這兩個帝國和兩種制度之間，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史太林無疑的感覺到，如果希特勒和西方各國作戰一年，他將不復成爲俄國的勁敵。希特勒所採取的方法則是「各個擊破」。這一類的協定而能成立，實在是幾年以來英國和法國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的絕頂失敗。

在蘇聯的一方面，我們必須說明的，他們最大的需要是使德國軍隊儘量向西方展開，這樣可使俄國有時間從其廣大帝國的各部分將軍隊集中。他們的心中，不能忘記他們軍隊在一九一四年所遭遇的不幸，當時他們在僅僅部分動員時，即向前猛擊德人。但現在他們的邊界，較上次大戰的邊界要偏東得多。他們必須在以武力或欺詐佔有波羅的海國家和大部分的波蘭後，始能受到攻擊。他們的政策固然是冷酷的，但在當時，實在也是非常的現實的。

這個兇惡的消息，像爆炸一般的落到世界之前。八月二十一到二十二日，蘇聯的塔斯社說，里賓特洛甫正飛往莫斯科和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不論英國政府所感到的情緒爲何，但他們當時決沒有怕懼的成分在內。他們立即宣稱，「這類事件，絕不影響他們所決心要履行的義務。」現在已沒有一件事能再避免或滯延衝突了。

這裏仍有把條約中條件加以錄下的價值：

（註）紐倫堡文件，第一編，第二一〇頁及以後。

締約國雙方約定停止任何暴行，任何侵犯行為，和任何相互間的攻擊，不論其為單獨的或和其他國家聯合的，均在其內。

這個條約的有效期間為十年，如在期滿前一年，沒有一方加以廢棄，得自動延長五年。會議桌上，歡呼頻頻，舉杯互祝。史太林情不自禁的向元首舉杯慶祝，「我知道德國人民是如何的愛戴其元首，所以我要舉杯遙祝他的健康。」從所有這些，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非常簡單的教訓，即「誠實是最好的政策」。這在本書中同樣的例證很多。狡猾的人和政治家縱有種種深謀遠慮，仍不免被引入歧途。但這是一個顯著的例證。不到二十個月，史太林和俄國的成千成萬的生命，就要付出可怕的懲罰。如果一個政府沒有道德上的顧忌，表面上往往似乎獲得了極大的利益和行動的自由，但「等到時間到了，結果就要清算明白；而在所有的日子都終了時，即將有更為公正的清算。」

希特勒從祕密的換文中，可以斷定俄國條約一定會在八月二十二日簽字；所以在里賓特洛甫由莫斯科回來或在公開宣布以前，他即寫了一封下面的信給他的總司令：

我們必須自始決意與西方國家作戰……和波蘭的衝突是遲早要來的。我早在春季即已有這樣的決定，但我以為我應先向西方而後再轉向東方……我們不用怕封鎖。東方會給我們糧食、牲畜、煤……我所怕的是在最後關頭時，有的無賴份子會建議調解……政治上的目的已進了一步。破壞英國的霸權已經開其端緒。在我政治上佈置完竣後，軍人就要繼之起來破壞這種的霸權。（註）

在得到了德蘇條約的訊息後，英國政府立即採取警戒措施。命令經分發給海岸的各主要部分，空防部隊經立即集合，對於易受損害的各據點並即加保護。政府發電報通告各自治領和殖民地，警告他們可能在短期間內要開始警戒階段。掌璽大臣受命使地方軍團實行戰時編制。八月二十三日，海軍部接到內閣授權徵發商船二十五艘，改成武裝商船巡洋艦（AMC），另外徵發曳網魚船三十五艘，都裝着潛水艇偵察器。海外戍兵預備隊六千人亦經召集。雷達站的空防和防空軍隊的全體佈防亦被核准。空軍預備隊二萬四千人 and 所有空軍輔助部

（註）紐倫堡文件，第一編，第一七三頁。

隊，包括氣球各分隊在內，都奉令集合，各軍軍人，一律不准請假。海軍部亦向商船發佈警告。其他所採的步驟尚有不少。

首相決定將這些預備措施，告訴希特勒。這一封信並沒有載在斐林的傳記內，但曾在其他書本裏發表過。爲了對張伯倫公正起見，這當然應給大家知道：

閣下也許已經知道了英國政府所採取的某種措置，這在今晚報紙上和無線電中已加以發表。

在英政府的見解中，這些步驟實屬必要，因爲根據報告，德國方面已有軍事行動，同時德蘇條約經公布後，柏林有的幾方面，顯然認爲英國將不復會爲了波蘭而實行干預，無須再加考慮。這實在是最大的錯誤。不論德蘇協定的性質如何，它不能變更英國對波蘭的條約義務，這是英國政府曾公開一再明白說過的，這亦是他們所決心要履行的。

有人說過，如果英國在一九一四年時曾將其地位更清楚的加以說明，以後的大禍患也許可以避免。不問這個說法是否有任何的理由，這一次英國政府決意不要再有這種類似的悲慘的誤解。如有必要，他們決心、並準備立即應用其所有的力量；而衝突一旦發生後，其結果是無法預斷的。如果相信戰事發生後，很早即能會有一個結果，即使在戰爭的各線上有一方面得到成功，這是極端危險的幻想。

我承認我在現在時候，想不出任何方法，可以避免這將使歐洲捲入戰禍的災難。鑒於統治者所採取的行動，對於人類所可能發生的嚴重後果，我希望閣下能對於我在上面所提出的種種，加以最慎重的思考。（註一）

希特勒在其答復中，在詳論德國準備用「無可比擬的慷慨」來解決但澤和走廊問題以後，跟着來一段下述的無恥謊話：

英國對波蘭提出了毫無條件的保證，即不問可能引起衝突的原因爲何，它將在一切情形中對那個國家給以援助。這種保證，在那個國家中唯一可以引起的結果，是鼓勵他們在這類特許的掩護下，對波蘭國內生活着的一百五十萬德國居民，作驚人的恐怖行爲。（註二）

八月二十五日，英國政府公布了和波蘭訂立的正式條約，確認以前所提供的保證。當時希望用了這一步

（註一）前引，第二編，第一五七至五八頁。

（註二）前引，第一五八頁。

驟，可以有促成德國和波蘭間作直接交涉的最好機會，因為這條約的意思是如果直接交涉而失敗，英國必將站在波蘭的一面。戈林在紐倫堡說：

在英國向波蘭正式提出保證的那一天，元首打電話給我，說他已停止了計劃中的對波蘭進攻。我於是問他，這是暫時的還是永遠的。他說，「不，我要看一看我們能不能避免英國的干預。」（註）

實際上希特勒將進攻日期自八月二十五日延展至九月一日，並像張伯倫所希望的，和波蘭進行了直接談判。但是他的目的並不是想和波蘭求得協議，而是想給英國政府種種逃避保證的機會。至於英國政府的思想，像其國會和國民一樣，完全不同。英國島民是極端古怪的，他們反對軍訓，並且在近千年來從沒有受到過敵兵的侵臨，但在危險日益接近，日益擴大時，他們反而越來越鎮定，在危險到了迫在眉睫之時，他們反而更爲兇猛；在危險到千鈞一髮時，他們反而一無所懼。這些習性，使他們能在許多次的大難中安然脫免。

這個時候，希特勒寫了一封信給墨索里尼，最近在意大利被印行發表：

首相

德國和俄國若干時來，即在尋求機會，使他們雙方的政治關係建立在一種新的基礎上，最近根據下述種種理由，更有在這方面獲得具體結果的需要。

(一) 世界一般的政治情形。

(二) 日本內閣繼續延不決定明確的立場。日本雖準備聯合反對俄國，但在現在的情況下，德國——在我的見解中，意大利也是如此——認爲這祇是次要的考慮。日本對於英國卻不願擔任任何明顯的義務——而這在德國方面，以及我認爲在意大利方面，這卻是一個有決定性的問題。

(三) 從今春以來，德國和波蘭間的關係，即令人不滿，在最近幾星期中，並且顯已成爲無可容忍，這不是由於德帝國的過失，主要的

（註）前引，第一六六頁。

原因，是田於英國的行爲……這些理由促使我急切需要在俄德談判中，得到一個結果。我到現在爲止，還沒有將這問題的詳細情形告訴過你，首相。但在最近幾星期中，克倫姆宮顯然有改善對德關係的意向——這種意向由李維諾夫去職的時候就開始發生——，使我現在能在局勢得到初步的澄清以後，派我的外交部長到莫斯科，擬定了世界上現有的性質最廣泛的互不侵犯條約，其全文不久即將公布。這個條約是無條件的，此外更規定凡有關德俄利益的一切問題，均應互相諮議。我亦可以告訴你，首相，根據了這些諒解，已可確實保證俄國的善意態度。尤其重要的，現在如果發生衝突，將不復再有由羅馬尼亞方面來任何攻擊的可能了。（註一）

墨索里尼於收到這封信後，立即回答稱：

我回復剛由麥庚遜大使轉來你給我的信。

- (一) 就對俄協定而論，我完全贊同。
- (二) 我覺得應避免和日本破裂或冷淡，以免它和民主國家集團日趨接近……
- (三) 莫斯科條約阻塞了羅馬尼亞，可能亦變更了土耳其的地位。土耳其曾接受了一筆英國借款，但它並沒有簽訂盟約，土耳其方面的新態度可能破壞法國和英國在東地中海方面的戰略佈置。
- (四) 關於波蘭，我完全明瞭德國的地位，並亦深知這類緊張情形不能永遠繼續。
- (五) 關於在軍事行動發生後，意大利的實際態度，我的見解有如下述：

如果德國攻擊波蘭而衝突能限於局部時，意大利將以德國所需要的各種政治經濟援助給予德國。

如果德國攻擊波蘭而後者的盟國向德國發動反攻時，我必須慎重提出，在目前意大利軍事準備的現況之下，我不能擔任發動戰事行爲，這一點我已屢次並隨時向你元首和貝實特冰甫先生提起過的。

但是如果德國能立即以軍火和原料供給給我們，以使我们得以支持法國和英國可能要給我們的打擊，那末我們自可立即參預戰爭。在我們前幾次會晤時，我們預料到戰爭將在一九四二年後發生，從今天起，我將在陸、海、空三方面按照了我同意的計劃從事準備。（註二）希特勒如果以前並沒有預先料到，但從這時起，他明白在戰爭發生時不能依靠意大利的武裝干預了。墨索里尼想在最後一刻重演慕尼黑時表演的任何企圖，都被置之不理。意大利首相關於德國的最後行動的消息，似

（註一）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書信和文件，第七頁。

（註二）前引第一〇頁。

乎不是由德方而是由英方得來的。齊亞諾在他八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中記着，「英國通知了我們德國向倫敦所提出的建議的全文，我們在事前全不知道。」（註一）墨索里尼現在唯一的需要是希特勒默許意大利保守中立。希特勒答應了他。

八月三十一日，希特勒發出了「戰事訓令第一號」。

（一）現在東線的情勢已爲德國所無法容忍，但要用政治來和平解決的可能已經告絕，所以我決心要用武力來求解決。

（二）對波蘭攻擊應按照「白色計劃」而施行，但陸軍方面，目下佈置幾乎全部完成的各方面，可以不在此限。至於任務和作戰目標的分配，應一如其舊。

攻擊日期——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攻擊時間——四時四十五分（用紅鉛筆註入）。

（三）在西線最重要的是，開戰的責任必須使其明白的歸屬英法方面。開始時，對於不重要的越境行爲，應儘量的使其限於局部戰鬥。（註二）

我由萊茵河前線回來後，在巴爾桑夫人的地方，過了幾天晴朗的日子，和我一起的，是一羣有趣的但焦灼不安的人們。那瓦的亨利王在伊甫里之戰前，曾在這別墅中住過一夜。華勒士夫人和她的諸子也和我們一起住在那裏。她的丈夫是一個內閣大臣。她正在等他到她這裏來。不久她接到他的來電，說他不能前來，至於不能來的原因，將在以後再告訴她。旁的危險的徵兆，也陸續傳到。一個人可以感覺到深沉的憂慮，正籠罩着每一個人，甚至在幼梨河和維斯格梨河匯流處可愛山谷中的陽光，也失掉了溫和的光彩。在這種不安定中，我發現連安心作畫也極困難。八月二十六日我決定回國，在那裏我至少可以知道正在進行中的一切。我告訴我的妻子，我將在適當的時候通知她。我路經巴黎時，請喬治將軍同進午餐。席間他告訴我法德軍隊的數字，並按素質將其師團分門別類，其結果對我的印象極爲深刻，使我第一次不禁說：「那時操勝的應該是你們啊。」他回

（註一）齊亞諾，前引，第一三六頁。

（註二）紐倫堡文件，第二編，第一七二頁。

答道：「德國有一支很強的軍隊，決不容我們先行進擊。如果他們進攻，我們兩個國家將聯合一起以履行他們的責任。」

當晚我住在卻特威爾，在那裏我請愛恩賽特將軍來盤桓幾天。他剛從波蘭回來，他對於波蘭的軍隊，提出了極爲有利的報告，他曾看到過一師人在真的排砲下實行攻擊演習，結果略有死傷。波蘭的士氣極高。他和我一起住了三天，我們竭力設法就不可知的局勢加以預測。同在這個時候，我完成了茅舍中的廚房磚牆，這個茅屋在去年我即開始建築，準備在以後幾年中居住之用。我的妻子在接到了我的通知後，於八月三十日經鄧寇克返國。

當時在英國的有組織的德國納粹黨員，經知道的有二萬人。按照他們在其他友善國家中所採的步驟，他們在戰爭爆發之前，必先以破壞和暗殺來開其端。我在當時並沒有官方的保護，我也無意請求；但我以爲我相當的受人注目，所以有預防的必要。根據各方面的情報，我深信希特勒認我是一個仇敵。我以前蘇格蘭偵探，湯姆生警長，現已經退伍。我請他攜鎗回來。我也找出了我自己的傢伙，倒仍是好好的。在一個人睡着時，另一個人警戒着。這樣，沒有人可以乘虛而入。在這時候，我知道如果戰爭一旦發生——同時又誰能懷疑它的來到呢？——一個重大的負擔，必然的會落到我的身上來。

第一卷 附錄甲

與格倫底伯爵談話

邱吉爾致文西泰書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雖然他很巧妙的辯解意大利事件，他當然是認識整個的局勢。……

我告訴他說，自從國會閉會以來，輿論方面已有了一個強大的發展。英國，實際上是英帝國，只能在國聯的基礎上作一致的行動，而且各黨都認為國聯這個工具，是防止將來任何地方發生危險的最有力的保障。他指出喪失意大利後對於國聯的傷害。意大利現政府失敗後，就難免產生一個親德的意大利。他似乎寧可承受經濟制裁。他們已經充分準備接受一個根據共同基礎的生活。不論怎樣困苦，他們都能忍耐。他講到英國輿論變動，難於捉摸。我說這當然不能由任何外國使節擔負咎責，但是我們必須承認輿論已有變動的事實。不但如此，假使阿比西尼亞發生戰爭，發生了砲轟、流血、轟炸鄉村等等以後，那麼，恐怕一定會引起輿論的無可限量的熱度增高。他似乎在設想，經濟制裁實施之初，恐怕無甚效果，但以後逐漸的增加，直到戰爭會發生的某種時候。

我說英國的艦隊，極為強大，雖然在最近的將來就要重行改裝，但在現在的時候，還是良好而有效率的；並且英國艦隊對於自衛，現已完全準備就緒。但是我再三申說，就我們在地中海的利害而言，這還是一個純粹的防衛計畫，而且我們的地位，與國聯其他會員國並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他作了一個苦笑，接受了這番話。

我於是又講起尋找一個出路的重要：『支配他的精神的人，比攻取一個城市的人還要偉大。』他回答說：除了意大利以外，他們在任何地方，都會有這樣的感覺。他們必須要對付手上拿着來復鎗的二十萬人。墨索

里尼的獨裁，是一個得人望的獨裁，成功便是獨裁力量的根本。最後，我說我贊成舉行一個三國政治領袖的會議……三個人聚在一起，總可以辦理一點一個人自己永不會做的事。意大利要求在阿比西尼亞勢力範圍內占有優越的地位，和「阿比西尼亞」迫切需要內政改革，畢竟已由英法兩國完全承認了。我告訴他，如果會議的辦法可以接受，我將予以支持。英國人民爲了獲得榮譽的和平，總會願意嘗試一切的路徑。我認爲三頭會議，應該舉行。他們所商決的任何協定，當然是要提交國聯核准，在我看來，這是避免摧毀意大利，使不成爲歐洲一個有力而友好的原動力的唯一機會。這個辦法，縱然失敗，也不能有何害處，而照我們現在的情形，正在直向一個絕對的衝突。

第一卷 附錄乙

我對艦隊空軍武力的意見書

爲一九三六年國防協調大臣殷斯基伯勳爵而作

一、海軍主帥，主張對於無論用於偵察、砲擊、或空襲敵方艦隊的艦隊飛機，必須有完全的控制和信賴，是不可予以反對的。這些都是他的耳目。所以，凡是保證這種結果所需的一切，都須採用海軍部的見解。

二、有人以爲與海軍合作的陸軍飛機，已有了同樣的情形，我們不能贊成這種意見。在某種場合，飛機固然可由飛機場起飛，在與尋常獨立空軍行動完全相同的情形下從事作戰；但是飛機由戰艦起飛，以及配合海軍作戰的行動，是完全另一回事。陸軍飛機的作戰，是一個真正的合作行動；海軍飛機的作戰，乃是現代海軍作戰當中一個完整的部分。

三、因爲這個緣故，海軍部所控制的空軍，和航空部所統制的空軍，其間必須要有一個分別。這個分別，不在於飛機的運載裝配的形式，亦不一定在起飛的根據地，而在於兩者職務的不同，它主要是否擔任海軍的職

務？

四、這些防禦的職務，大部分可以明白列舉。例如，需要各種通常由戰艦或航空母艦承載的飛機（不論是陸上飛機、水上飛機、或是用航空母艦載着的飛機，不論是偵察機、戰鬥機、轟炸機、或魚雷海上機）的一切職務，當然屬於海軍的範圍。

五、因此問題本身縮成應該選派那種飛機，可由岸上根據地起飛而在海面上空作戰。這個問題，又是只有參證海軍的職能和責任方面，始可決定。能在水面飄浮的飛機，在保護商航方面，可以發揮重大的功能。這在廣闊的水面上尤其真確。因為在廣闊的水面上，一隊巡洋艦，以它們自己的偵察機，或兩艘小型航空母艦，就可在一千哩遠的前線從事巡邏。但是海軍決不能需要——它也始終未曾要求過——維持一枝空軍，其力量大至可以應付大量強大的敵國空軍在狹隘的水道中對商業航行的集中攻擊。事實上，我們是必須實行空軍對空軍、海軍對海軍的規律。如遇到一個敵方的空軍主力或該空軍主力的任何分遣隊出動，那就必須由英帝國空軍起而應戰。

六、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要忘記，我們可以選擇一隻或多數的船，使其適合於純粹的空軍作戰，例如襲擊某一根深柢固的敵軍根據地或重要中心點。這就是一種空軍的作戰，而必須使用通常不和艦隊聯合在一起的一種飛機。在這種情形中，海軍部和空軍部的職務，就會倒轉過來，而海軍就會依照空軍部的戰略上需要，調整船艦的行動。這個特殊的情形，非但不會變成行動遲笨，而且證明了『依照職能來劃分指揮』的合理。

七、所有讓與海軍管理的事，應在已經確定的限度以內，完全授與海軍。海軍部應有完全控制艦隊的空軍武力及規定全體該項空軍人員的權限。這個空軍武力所需要的軍官、學兵、兵曹、及技工等，由海軍部向英國空軍中挑選。挑選出來的人，就須在英國空軍的訓練學校，受飛行技術及飛機處理的訓練——在這種學校裏必須附有海軍軍官人員——，但是在得到航空駕駛員及航空機械方面的必需熟練程度以後，他們就須轉到海軍部所屬沿岸的飛行場，受艦隊空軍武力的訓練，正和英國空軍的飛行員，在他們編隊訓練中學習空戰一樣。所以

服務於艦隊空軍武力的人員，是海軍中一個完整的部分，他們的訓練、晉級、以及事業和恩俸等，都完全仰託海軍部。這個原則，適用於每一階級，每一業務，不論是飄浮於水面的或沿岸的空軍力，同樣適用。

八、艦隊空軍武力，應完全成爲海軍的部門。與這種部署同時而起的，還有一件事，亦應重新予以職能上的調整，這就是使空軍部負主動的防空責任。這樣一來，就海軍而論，每一海軍港的沿岸高射砲台、探照燈、飛機、防空氣球、及其他設備，都歸一個作戰機構統一指揮，不過司令的軍官，和他所施的號令，當然要聽要塞司令的命令。

九、同樣，倫敦的防空和其他或許有設置大規模防空配備必要的易受攻擊區域的防空，亦應統歸一個司令所指揮，直屬於空軍部。這種指揮權，不但包括作戰方面，且須儘安排上的便利，包括整個主動防空人員的訓練、徵集、和管理。

十、空軍部之有指揮主動防空的名分，正和海軍部有指揮他們自己「眼目」的名分，同樣明顯。爲這個目的起見，空軍部中應該成立一個名叫「防空」的新部門，來指揮所有高射砲、探照燈、防空氣球、及各種有關這個職務的人員，以及英國空軍隨時分派指定參加這種職務的人員。在這個新部門之下，應有若干空軍軍官主持，並由適當的人員協助，指揮特定地點及區域內一切主動防空的事宜。

十一、我們並不是說空軍部或空軍參謀部，現在就能夠不要幫助的來擔負起這個重大的新責任。要建立這個防空指揮部，是必須借重舊有兩部（海軍、陸軍）的人員。陸軍部和海軍部中受過優良訓練的軍官，必須與現有航空參謀軍官併合起來。

注意——招募新兵以及移交防空司令部供作戰及訓練的各隊的內部行政問題，並不一定會成爲障礙。除非到了另有更便利的解決，否則即可由現在的來源供給。

十二、這一個備忘錄，直到現在，還不曾談到物料，但是物料問題，是極簡單的。海軍部自會根據他們已被核定的職務，決定所需要的飛機型式。他們在國家經濟及資源的範圍中可以分占到什麼程度，必須由國防協

調大臣主持的優先委員會加以審查，提付內閣核定。在現時的階段，無疑可由該部大臣，給予現有人員種種指示。但是，設或戰爭發生或備戰緊張，他一定會移交供應部辦理。在一般的航空生產方面，海軍部比較其他方面自應有優先之權，一切都應根據最高的立場，加以決定。

十三、我們的意思，並不是要海軍部另行成立飛機設計的技術機關，與空軍部或供應部所屬的同樣機關分離。不過海軍部方面，不妨成立一個由技術人員組成的核心，使他們得以熟悉種種科學發展的可能性，並以適當的術語，說明海軍方面的特別需要，通知供應部。

十四、所以總結說來，我們的主張是：

第一、海軍部應有完全指揮艦隊空軍武力的權力，負責一切具有海軍意義的職務。

第二、海陸空三部，必須會同組織一個新機關，隸屬空軍部，從事主動的防空作戰。

第三、物料供給問題，必須由國防協調大臣下之優先委員會決定。目下可由現有的手續辦理，但是到最後，應成立一個供應部處理。

第一卷 附錄丙

關於供應組織的意見書

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

一、現有國防協調大臣所屬的機關，其職能方面，不是互不相關的，便是分組分得不適當。擔任戰略上協同措置的大官，其工作與擔任：（一）保證現有程序的執行，及（二）計畫英國實業，使迅速入於戰時狀態，並對此種戰時狀態及現有狀態，予以高度統制的兩種職務的大臣，是各不相同的，雖則彼此並非絕無關聯。

二、所以第一步應把戰略觀念的職務，與平時戰時物資供給的職務，彼此分開，對於後者的事宜，應該組

織一種機構，加以管理。最和諧的部署，應由海軍、陸軍、空軍、及供應四部分別成立供應機構，而由國防協調大臣保持最後決定優先之權。

三、數目繁多的委員會，不論如何專門，如何精細，都是不能完成這個目的的。沒有一個發號施令的人，就不能完成供應。一個有負責權力的確切的系統，必須遍達於有關的英國實業的全體。（我們對於這一點，切不可認為應由國家來干涉工業的實際活動。）在現狀之下，海陸空當局分別處理他們的特殊供給，而供應部亦即是訂定計畫的當局，僅具純粹諮詢的權力；只有在戰爭的時候，方有放棄現行供應辦法的必要。戰時所必需的，是由海陸空三個機關的供應司令部，合組成爲一個組織，並得對於戰時工業擴張，有命令之權。（海軍部對於戰艦的建造及若干特殊的海軍貯備器，可以仍保留支配之權。）

四、這種聯合組織，不但包括供應，並且包括設計的職能。海陸空當局，以一般的術語，把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的形式、性質、及分量加以規定之後，即由供應組織，照估計最能使需求者滿足的方式，予以執行。換言之，供應部本身，是從事把各種適當的軍需品，於隨時隨地海陸空機關需要時，送交海陸空機關使用。

五、這個供應方法，或準時實施任何核准的程序，在現時這個普通平時準備狀態之中，都是做不到的。在這個時候，我們也沒有採行戰時權力及應用戰時方法的必要或可能。我們應該宣布一個過度狀態，不妨稱爲緊急準備時期。

六、關於這種法律的起草，應該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適用於緊急準備時期的，第二部分是適用於戰爭狀態的。第一部分應該現在就拿來實施。第二部分應該予以仔細觀摩，縝密考慮，其原則應明定界說，其條文應輪廓顯明，以便一旦戰爭發生，祇須向國會一經呼籲，即可付諸實施。在整個圖案已可預見以後，我們應該使緊急階級能夠簡捷的、沒有多大紛擾的轉入到戰爭階段之中。

七、要把這個新計畫付諸實行，應該先設立一個供應部大臣。他可以設立一個供應事務會議。每一委員，應負責研究他所主管的生產部門內四、五種生產事業。以後，海陸空軍部現有關於供應、計畫、及締約等的機

關，將儘速的逐步移歸新的供應部，而關於經費問題，就由這個新機關單獨和財政部接洽。（所謂「經費」，是指已經核准的各項程序範圍內應付之款。）

第一卷 附錄丁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代表兩院保守黨議員向代表團謁見首相時我提出的申明

在和平時期，我們的小小陸軍的需要，以及在某種限度之內空軍和海軍的需要，尤其對於武器和彈藥，統由陸軍部所供應，陸軍部爲此目的，保有若干政府設立的工廠及慣常的私人承辦商。這種組織，祇能應付尋常和平時候的需要，其所貯存的物資，祇能供給我們數量有限的正規軍幾星期的戰爭之用。在幾個月以前，除此以外，便一無所有了。約在三、四個月以前，政府纔准許陸軍部的訂貨，擴充到若干尋常的民衆實業方面。

他方面，在所有主要的歐洲大陸國家中，整個實業，若干時來，便已經過很確實的、很科學的改組，由和平體制變成戰爭體制了。在各國之中，自然尤以德國爲最，甚至在希特勒執權以前，這個問題就已成爲政府方面最重要的研究。根據和約，德國禁止設置艦隊、陸軍、及空軍。它在報仇的衝動之下，確已極度緊張的萃力於如何完成改變整個實業爲戰時體制。在別人早已把問題解決之後，我們現在纔來單獨的認真開始研究這個問題。不過在一九三二年及一九三三年，我們仍有急起直追的時間。三年前當希特勒得到權力的時候，我們大概有十幾位官吏在研究實業的戰時體制；反之，在德國境內工作繼續研究這個問題的，不下五、六百人。現在希特勒政權，已經使這個巨大機構，全部發動。他們非等到每一家工廠頂上冒煙，決不敢冒險從事，來破壞各種條約，成立海陸空軍；因爲他們以爲家家工廠頂上冒出煙以後，如果協約國不立刻加以攻擊，就可迅速的成爲一個武裝國家。

現在在做些什麼？所謂準備工作，還不能達到從訂貨日起至少須十八個月後纔能大量交貨的階段。假使軍

火的意義是指投射物（砲彈及炸彈）及含有推進火藥的彈筒，那麼工廠就需添加若干特種用途的機械工具，並且還須變更現有的佈置。此外還需要有實際製造所需的鑽模和規測器，……這種特別機械工具，多半須由那和承造投射物截然不同的廠家來製造。在這些特別機械工具交貨以後，在工廠裏裝置這些設備之時，以及在生產程序正在開始之時，都不免有相當時間的延擱。在這個階段以後，而且只有在這個階段以後，最先是一點一滴，後來是一批一批，最後是大批蜂湧而來的交貨，方能實行。只有到了這個時候，軍用資源纔能開始積聚。這種不可避免的長期過程，現在還在正以極小規模進行。擬與訂貨的工廠，共有五十二家，其中十四家已於上星期接受了契約。在現今的時候，說德國軍火廠也許已增加到四、五百家，全力生產，已近兩年，並非過甚其辭。

現在要講到大砲，我所謂大砲，是放射爆炸性砲彈的砲。創立一個大砲製造廠所經歷的過程，亦是必然很長的。它的特別的工場及機械工具，更為繁多，其佈置亦更為精細。過去十年中，我們通常的平時期的大砲產量，除了製造艦隊所用的大砲外，實在渺不足道。因此我們在今後兩年之內，斷不能有野戰砲和高射砲的大量交貨。去年德國恐怕至少製造了五千門大砲，而這種過程，在戰爭中還可以大量增加。所以我們當然應該設立工場，俾於需要時，使我們得以建立及武裝一枝數量龐大的國民軍隊。

我所以談到投射物及大砲，是因為他們是國防的核心，但是同樣的理論和實情，除略作修正外，可以適用到整個配備的範圍。英國工業具有彈性，假使立刻發動工作，應該可以在甚短的時間內，生產出各種形式的配備，例如摩托貨車及其他同類的像坦克車和裝甲車一類的武器，以及許多陸軍需用的輕便式樣的物料。但究竟發動了沒有？我們為什麼要聽到非等到正規軍已經配備以後，地方軍不能得到配備？我不知道步鎗和步鎗彈藥的情形。我希望至少足供一百萬人之用。但是新的供給來源，辦理步鎗的交貨，亦需很長的歷程。

機鎗的生產，甚至更為貼切。我並不完全知道白浪寧及勃命機關鎗的生產程序如何。但是假使和廠家訂約建造必需工場的合同，是只在幾個月以前成立的，那麼在一九三八年年初以前，除了向外國直接購買以外，我們

決不能希望有滿意的交貨。比較起來，德國開工的工場，已經能夠大量生產到供給需要而有餘的程度了。

但是這個理論，同樣可適用於所有生產爆炸物、拋射火藥、導火管、毒氣、防毒面罩、探照燈、塹壕砲、手榴彈、空襲炸彈，及一切替海軍建造的深海炸藥與水雷等所需的特別適應物品的建造過程方面。我們不要忘記，海軍所需要的一百〇一種物品，是依賴陸軍部的，是依賴全國工業擴張的，其中如果缺少一樣，便要使海軍受到嚴重的傷害。在這一切的後面，自然還有原料供應，以及其包含無限複雜情形的問題。

結論是怎樣呢？在國防的物質方面，至少就陸軍部以往所負責的全部供給量以及海軍與陸軍部所發生的一切反響而論，我們須在兩年以後，纔能有任何滿意的改良。但如照我們現在所進行的規模，即使在兩年之後，我們的供應情形，如與我們在戰時的需要、或別人在平時已經得到的結果比起來，仍將不啻小巫之見大巫。

假使這些事實，只要大概是真的——並且我相信它們大部分只有估計嫌低，那麼對於認為現在並沒有緊急狀態；我們決不可對國內尋常生活作任何干涉；我們無須和工會接觸，去商量參用粗工與技工的問題；我們可以泰然信賴國防協調大臣所謂『因工作上的必需，再訓練些工人』的話，不要做出驚擾民衆或使民衆感覺尋常生活習慣受着擾亂的事情，我們又怎麼能爭辯呢？

我們聽不到不滿的訴說，認為人民不能體會國家的需要，工會沒有合作的態度，陸軍和地方新兵的徵募事宜，非常鬆懈，甚且遭受輿論分子的梗阻。但是只要政府一天在向人民保證不會發生緊急狀態，這種阻礙，就會一天繼續存在。

法國政府曾經秘密給我一個一九三五年德國空軍力量的估計。這個估計，差不多和去年十二月我所預料而向帝國國防委員會提出的數字彼此相符。空軍參謀部現在認為法國的估計失之太高，我個人卻以為估計失之太低。德國現時可以同時出動的飛機數目，恐怕不止一千五百而將近二千了。而且也沒有理由可說他們到了二千之數就將就此而止。德國空軍的全部工場及設置，規模是非常大的，他們恐怕已在計畫一個比較任何現在所講到的更為遠大的發展了。即使我們接受法國估計的大約在一千四百左右的數字，則此時德國的力量，比較我們

的本部空軍，就可以出動及可以維持作戰的已受訓練各航空員和軍用飛機力量而言，已經大到一倍。但是兩國的相對力量，在沒有查考兩國補充戰鬥兵力的力量以前，是不能判定的。德國工業的組織現狀，一定可以在一個月內一下子製造飛機一千架，以後每月還可繼續增加。現時英國工業的產量，能否超出每月三百架到三百五十架呢？我們要經過多少時期，纔能達到和德國一樣的軍事產量呢？當然，在兩年之內是不可能的。假使兩國相戰，我們把戰爭中極大的損耗估計在內，則在頭一個月後，我們的兵力就將僅及敵方的三分之一了。現在最迫切需要的，似乎莫過於準備戰時工業的擴張，至少要比現時工業的規模大出三倍。不過本年德國空軍的經費，也許不下於一億二千萬元。所以就本年而論，明明白白我們沒有趕上他們，反而非常落後。這種情形到明年將維持多久？誰也不能說。

據宣布，建造航空隊一百二十隊及第一隊飛機一千五百架以供國內防衛的計劃，可於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完成。這個計劃，在飛機、人員、組織、或補給方面如何實行的情形，議會未曾得到任何消息。我們從未聽見過有何說明。我並不責備政府沒有宣布詳情。因為現在要透露這種消息，是太危險了。不過，在完全缺乏消息之時，就不免發生關切的心理與私人間的討論。……我很懷疑，到明年七月我們可以有新式配備的航空隊三十隊。我知道在一年或十五個月之內，新式飛機不會真正開始大量的交貨。同時我們所有的是極舊式而不合用的武器。

關於這種新飛機，還有第二個問題：十五個月後製造廠中大量出貨之時，是否所有必需的器具統統配齊？我們就拿機關鎗來作個例子。假使我們要想得到二千架最新式的飛機，這就是說，從現在起十八個月之內，交貨一千五百架，存貨五百架，試問對於這些飛機所需的機關鎗，究竟已有什麼安排？有些現代式戰鬥機，機翼上所裝配的機關鎗有八桿之多。現在即以平均每架需機鎗四桿計，那麼總數就需要機鎗一萬桿。大規模的製造白浪寧及勃倫機鎗，不是只在幾個月以前纔決定的麼？

現在讓我們用計算重量和範圍，以測驗轟炸力的方法，來試驗我們已經建造完成及在建造中的航空隊。在

此處我又必須要和德國作一比較。德國於今後任何時期內，可以派遣一隊飛機，於單程飛行中，向倫敦投下至少五百噸炸彈。從我們的軍事統計中，我們知道一噸炸彈，平均可炸死十人，炸傷三十人，並可肇致價值五萬鎊的損失。說德國的全部轟炸機隊會來往不停的轟炸英國，自然是不經之談，因為其間當然亦有種種其他的考慮。可是要實際估計兩國轟炸機隊的相對實力，則每次飛行投彈的重量，仍不失為一個極合理的標準。現在，我們假定，德國全部轟炸機隊每次飛行到倫敦，至少可能投下五百噸炸彈，那末，我們對德國能作怎樣的報復呢？他們從現在起，就可以這樣幹。我們能做些什麼？第一、我們怎樣能夠對柏林施予報復？在目前，我們還沒有一隊飛機能夠把相當滿載的炸彈，飛往柏林，實行轟炸。明年這個時候，我們會有些什麼呢？我今請你考慮，明年這個時候，德國的航空隊說不定可能在倫敦投下將近一千噸的炸彈，而我們對他的報復，恐怕還不能向柏林投下六十噸以上的炸彈。

但是現在讓我們不談柏林，我們新轟炸機的最大缺點，莫過於航程的短促。我們大部分新式重轟炸機及中型轟炸機，從本島起飛，都僅能飛達德國的海岸。只有與我們距離較近的德國城市，處於航程範圍以內。所以實際上，明年此時我們如從本島起飛對德施行報復，就投彈的重量來斷，恐怕不啻兒戲，而且攻擊地點僅限於德國的邊境。

假使我們的飛機，可以從法國及比國的機場起飛，那當然可以有較為良好的情形。果然如此，德國所有極大的及極重要的實業區域，便都在我們飛機攻擊所及的範圍以內了。假使我們能和法國及比國的飛機聯合起來，那麼我們的空軍，便會發揮比較我們單獨和德國決鬪，更為有效而無可比擬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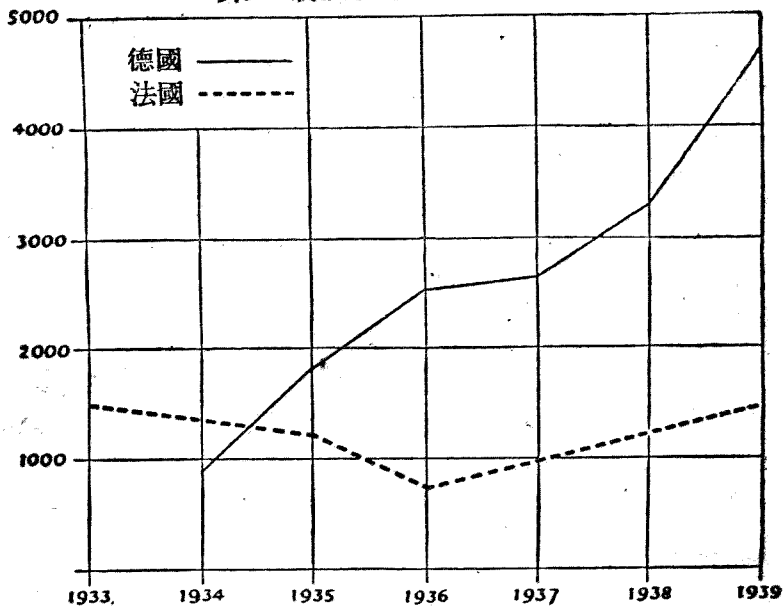
我現在再講到第二個場面。這就是我們國內被動和主動、地面和空中的防禦。顯然，我們的大城市和重要的補給海港，或許要忍受一種以前人類社會從未受到的苦痛試驗。試問在這一方面，究竟佈置了些什麼？就拿倫敦和它的七、八百萬居民來講。將近兩年以前，我曾在下院解說鋁熱炸彈攻擊的危險。這種像橘子大小的炸彈，在那時德國就已經造有幾百萬枚。單獨一架中型的飛機，就可播散五百枚。我們必須設想得到，在一個

小規模的空襲中，無量數的這種小炸彈散落下來，使地面的房屋一座復一座的起火燃燒。假定只有一百處地方起火，而救火隊只有九十隊，試問將發生什麼後果？真正的攻擊，顯然要大大的比這個假定可怕得多。我們必須料到，重磅炸彈會在同一時間投落下來，自來水、電燈、煤氣、電話等各種系統，會發生嚴重的紊亂。試問這個時候，將發生什麼後果？在世界歷史中，從來不曾見有像這樣的事情的。遇到這種情形，勢必大批的撤退人民。講到撤退人民，就要使政府考慮到公共秩序問題、衛生問題、食品供給問題，這些都要他們來特別注意，而且說不定還要出動所有他們受過訓練的部隊。

各補給海港，尤其是泰晤士、桑浦敦、布里斯它爾、及麥爾西，沒有一個不是在射程以內，假使受到攻擊，將發生什麼後果？關於把食品從更遠大的補助路徑運進來的事宜，究竟部署了些什麼？關於保護我們的防禦中心，又做了些什麼部署？我所謂防禦中心，是指我們連續抵抗的力量所憑恃的中心。人民和他們的災難問題是一件事，我們進行戰爭所用的手段，又是一件事。假使倫敦陷於混亂，我們是否要組織並建立一個接替的政府駐在地點。這個問題，在紙面上當然已經有人討論，但是關於供給一兩個可以接替的號令中心，具有深藏的電話線及無線電，使若干有聯絡的思想機構，可由此種電話及無線電發出必要的命令的事宜，可曾做了些什麼？……

附 錄 戊

第一線飛機產量之比較



註：德國數字根據俘獲文件；法國數字根據法國方面來源。

邱吉爾第二次大戰回憶錄第一編上冊漢英對照表

一個騎士的回憶錄

人民觀察報

凡勃拉
凡爾登
凡爾賽和約
士倫
厄平
厄伯特
厄羅斯特
反共協定
夫萊
尤尼加
巴巴
巴洛堤
巴爾都
巴哈馬島
巴漢騰號
巴塞隆納
巴里奧利島
巴斯春特勒
巴爾桑夫人
戈林
戈倍爾
戈四泰

一 畫

Memirs of a Cavalier

二 畫

Veilischer Beobacher

三 畫

De Valera

Verdun

Versailles Treaty

Toulon

四 畫

Epping

Friedrich Ebert

Ulster

Anti-Comintern Pact

Elizabeth Fry

Guernica

Franz von Papen

Bernard Baruch

Louis Barthou

Bahamas

Barham

Barcelona

Balearic Islands

Passchendale

Madame Balseu

Hermann Goering

Joseph Goebbles

Sir Robert Vansittart

日内瓦

牛頓賓

牛津

世界的危機

包尼穆斯

卡孫

卡塞爾

卡那房堡

卡爾斯巴德

卡爾登俱樂部

台維斯

台爾博斯

史丹萊

史太林

史汀生

史丹霍伯

布哈林

布爾葉

布哥維納

布達佩斯

布里斯托爾

布哈列斯脫

幼梨河

弗里區

本勃洛克碼頭

尼斯

尼翁會議

五 畫

Geneva

Neurath

Oxfordshire

畫

The World Crisis

Bournemouth

Sir Edward Carson

Cassel

Garnarvon Castle

Carlsbad

Carlton Club

Norman Davis

Yvon Delbois

Oliver Stanley

Joseph Stalin

Henry L. Stimson

Shanhope

Nicolai Bukharin

Le Bourget

Bukovina

Budapest

Bristol

Buharest

Eure

Herrner Frisch

Pembroke Dock

Nice

Nyon Conference

甘默林
白里安
白里門
白勒姆
白羅堡
白魯蒙
白拉希茲
白倫海姆
白洛克道夫
白倫納山口
立柏斯基

六

Maurice Gamelin
Aristide Briand
Brennen
Leon Blum
Werner von Blomberg
Heinrich Brüning
Brauchitsch
Blenheim
Brockdorf
Brenner Pass
Joseph Lipski

佛朗哥
佛蘭亭
克拉克
克雷特
克星浦斯
克律萊哥
克洛夫特
克洛茲人
克倫斯基
克勒孟梭
利比亞
卻特威爾

伍德
伊頓公學
伊雷里之戰
伏羅希洛夫
列寧

Sir Kinsley Wood

Eton
Battle of Ivery
Clement E. Voroshilov
Nicholas Lenin

坎城
坎那列斯
坎列夫·李斯特
希特勒
希羅勒
希特勒演說集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秘密書信

Cannes
Admiral Canaris
Sir Philip Cunniffe-Lister
Adolf Hitler
Heinrich Himmler
Hitler's Speeches
Les lettres secretes exchanges
par Hitler et Mussolini

吉徵
多勒多
多瑙河
多維爾
米特爾
米美爾
考克
艾登
艾德禮
西門
西利西亞

七

Toledo
Danube
Dover
Jutland
Memel
Cork
Anthony Eden
Clement R. Attlee
John Simon
Silesia

蕪
Birmingham
Tanzig

此里尼斯
我的舊綽
李伯
李勃
李特
李斯
李頓
李維諾夫
杜美
杜孟克
杜柏林

Pyrenees
Mein Kampf
Sir Reginald Leeper
Ritter von Leeb
Frich Raeder
Reith
Lord Lytton
Maxim Litvinov
Gaston Doumergue
Doumenc
Dublin

伯明罕
但澤

社卡撒夫斯基

每日電訊

沙遜

沙恩霍斯特

狄福

貝奈斯

貝拉孔

貝爾福

貝爾萊文

李克萊

那不勒斯

里維拉

里西奧尼

里賓特洛甫

亞申

亞多亞

亞默利

亞斯雷邦

亞爾喀若

亞漢萊頓

亞德里亞海

亞歷山大國王

亞歷山大特里亞港

佩爾凡特爾

萊曼斐爾特軍營

依利薩伯王后號

命運之翼

坦吉爾

孟特爾

Mikhail N. Tukachevsky

Daily Telegraph

Sigfried Sasson

Hjalmar Schacht

Scharnhorst

Defoe

Edward Benes

Bela Kun

Arthur James Balfour

Berhaven

Sir Archibald Sinclair

Naples

Riviera

Riccione

Joachim von Ribbentrop

Aachen

Artois

Leopold Amery

Aix-les-Bains

Alcazar

Appleton

Adriatic Sea

King Alexander

Alexandria

Fort Belvedere

Lichtefeld Barracks

The Queen Elizabeth

Wings of Destiny

Tangier

Georges Mandel

季特摩

底比拉雷

拉凡勒

拉瑞諾

昆斯城

東亞精

東福爾漢姆

林賽

林特倫

林特曼

林特賽

法威

法爾德斯

法蘭德斯

法蘭克福新聞

法蘭德斯了歐洲

法國和外國政治時期

波茨坦

波斯巴

波特蘭港

波斯尼亞

波羅塔克

波美拉尼亞

阿杜瓦

阿拉斯

阿梅萊

阿爾良

阿爾河

阿加地亞

Reial

Sir Gilmour

Tipperary

Bernard Lavergne

Walter Rathenau

Queenstown

The Eastern Front

East Fulham

Linz

Anton von Rintelen

Frederick Lindemann

Sir Ronald Lindsay

Faucher

Falmouth

Flanders

Frankfurter Zeitung

La France a sauve l'Europe

L'annee Politique Francaise et

l'etrangere

Potsdam

Boothby

Portland

Bosnia

Plutarck

Pomerania

Adowa

Arras

Amery

Argonne

Aar

Agadla

八

阿爾及爾
阿爾勃廳
阿爾曼柴
阿蒙提亞爾
阿爾薩斯·洛林
阿的斯·亞巴巴

Alerier
Albert Hall
Almanza
Armenieres
Alsace Lorraine
Addis-Ababa

九 畫

哈柴
勃克爾
勃拉庚
勃賴敦
勃度海特
哈伯斯堡
哈得爾浦
哈里法克斯
威西
威特島
威特曼
威塞爾
威瑞格
威爾遜
威爾遜
威資萊木
威爾摩特
威廉·馬克斯
威斯特敏斯脫
施萊徹
柏克
柏爾福
柏林斯迪登

Emil Hacha
Barekel
Braden Bracken
Brighton
Earl of Birkenhead
Hapsburg
Hartlepool
Lord Halifax
Wiessese
Isle of Wight
Weidemann
Wesel
Weizaecker
Woodrow Wilson
Ralph Wigram
Wizleben
Wilmot
Wilhelm Marx
Westminster
Westphalia
Kurt von Schleicher
Beck
Bellort
Berchtesgaden

柯柏
柯特
柯摩
柯立芝
柯林斯
柯爾文
柯倫茲
洛·斯威靈
科良
科佛
突巴西亞
約克廈
約特爾
耶拿
胡根堡
英語民族史
韋爾斯
韋瑪共和國
香賓
香勃萊
俾馨
俾斯麥
俾康斐爾特
倫錫曼
倫敦特萊
徐維諾夫
恩斯特
格里格
萊倫底

Duff Cooper
Pierre Cot
Como
Coolidge
Michael Collins
Ian Colwin
Coblentz
Lough Swilly
Comines
Corfu
Tunisia
Yorkshire
Jodl
Jena
Alfred Hugenberg
History of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Summer Welles
The Weimar Republic
Champagne
Guy La Chambre

十 畫

David Betty
Otto von Bismarck
Lord Beaconsfield
Lord Runciman
Lord Londonderry
Grigori E. Zinoviev
Karl Ernst
Sir Edward Grieg
Count Dino Grandi

格斯特
 格納森諾
 桑周里
 桑波敦
 恒斯特郡
 泰狄歐
 泰姆士報
 殷香特
 殷鑾鏢
 殷斯基伯
 殷斯勃路克
 殷尼齊大主教
 海爾登
 海爾特
 海爾道夫
 海斯·斐列伯親王
 烈浦加
 烏特里特和約
 烏爾斯勃里奇
 特拉克
 特倫查特
 特累微左
 特里安農和約
 真理報
 納案
 納爾遜號
 紐倫堡
 索維婁
 索蒂洛
 索瑪利蘭
 馬賽

F. E. Guest
 Gneisenau
 Sanjuria
 Southampton
 Worcesterhire
 Andre Tardieu
 The Times
 Arthur von Seyss-Inquart
 It Might Happen Again
 Sir Thomas Inskip
 Munsbruck
 Cardinal Innitzer
 Heston
 Halder
 Graf von Heldorf
 Prince Philip of Hesse
 Ripka
 Treaty of Utrecht
 Uxbridge
 Francis Drake
 Viscount Trenchard
 Trevisis
 Treaty of Trianon
 Pravda
 Nassau
 The Nelson
 Nuremberg
 Sonne
 Senor Sotelo
 Somaliland
 Marseilles

馬朱巴
 馬爾太
 馬德里
 馬鐵尼
 馬拉克西
 馬脫爾博
 馬薩里克
 馬爾波洛公爵傳
 高德斯堡

勒辛
 培克
 培尼斯
 培爾恩
 密克拉斯
 張伯倫
 得布勒森
 從華盛頓至法國外交部

農報
 曼西
 曼徹斯特導報
 梅特涅
 梅斯基
 畢加底
 畢蘇斯基
 萊迪維諾
 莫洛托夫
 壽密特
 陶定
 陶萊茲

Majuba
 Malta
 Madrid
 Martini
 Marrakesh
 Maratshen
 Thomas G. Masaryk
 Life of Marlborough
 Godesberg

十一

Theodore Lessing
 von Beck
 N. H. Baynes
 Lord Milne
 Wilhelm Miklas
 Neville Chamberlain
 Debrecezen
 De Washington an Quai
 d'Orsay
 Morning Post
 Mansey
 Manchester Guardian
 Metternich
 Jan Mikhailovich Maisky
 Picardy
 Joseph Pilsudski
 Punoeh
 V. M. Molotov
 Guido Schmidt
 Dowding
 Maurice Thorez

陶爾斐斯
麥肯生
麥唐納
麥格里治

十二 畫

傑部地
凱斯
勞透堡
勞舍喬治
喀爾
喀士穆
喀巴汗山
喀塞爾雷
喜爾勃朗脫
喬治六世
喬治將軍
提梭
提茲河
提柴特
斐林
斐魯
斐普斯
斐茲亞倫
斐末資
斯特朗
斯諾登
斯比亞斯
斯加波洛
斯特拉薩
斯特里薩
斯加伯·弗洛

Engelbart Dollfus
August von Mackenson
Ramsey MacDonald
Malcolm Muggeridge
Jibuti
Sir Roger Keyes
Lauterbourg
Lloyd George
Otto von Kahr
Khartoum
Carpathians
Castlereagh
Hillebrandt
King George VI
General George
Father Tiso
Tees
Sir Henry Tizard
Keith Feiling
Lord Fisher
Sir Eric Phipps
Viscount FitzAlan
Jan Christiaan Smuts
Strang
Snowdon
Spears
Scarborough
Gregor Strasser
Stresa
Scapa Flow

斯特拉斯堡
斯特莫斯曼
斯德拉克希
斯泰亨堡親王
斯圖波納格爾
斯多雅狄諾維區
斯泰斯基舞樂案
報
湯姆生
湯姆斯
腓特烈大帝
舒伯特
舒倫堡
舒斯尼格
華爾街
華孫·瓦特
華爾坡爾
華爾·華爾
華爾斯子爵
萊因河
萊因地
萊明頓
費上校
賀德號
賀爾·倍里廈
連入戰團
都爾
項恩
須德海
黑列哥蘭

Straßbourg
Gustav Stresemann
Sir Stakosch
Prince Starhemberg
Stuelpnagel
Stoyadinovich
Slovitsky Scandal
Main
Thompson
Thomas
Frederick the Great
Schubart
Schulenberg
Kurt von Schnuschnigg
Wall Street
Watson-Watt
Sir Henry Walpole
Wal-Wal
Viscount Wolmer
The Rhine
Rhineland
Leamington
Major Fey
Hood
Leslie Hore-Belisha
Into Battle
Tours
Sir Robert Horne
Zeuiler Zee
Heiligoland

塔爾曼
塔蘭明
塞克
塞浦路斯
塞諾維茲
奧尼爾
奧倫多
奧都計劃
奧斯特列茲
奧爾福納斯
奧地利的琴典
奧斯汀·張伯倫
愛米山
愛格
愛恩賽
愛士斐斯
愛斯·拉·沙伯
愛奧尼亞海
愛德華六世
愛利斯·蒙賽爾
新聞報(蘇聯)
新聞報(英國)
新政治家
新聞紀事報
楊格
溫莎
溫特敦
聖母寺
聖約翰
聖日爾曼條約
賈德幹
道威斯計劃

Ernst Thaelmann
Talleyrand
Hans von Söckt
Cyprus
Ozerowitz
Sir Hugh O'Neill
Oranto
Otto Case
Austerlitz
Orfordness
Ein Regiment in Rot. Weiss-Rot
Austin Chamberlain
Vimy Ridge
Eger
Ironsides
Herbert Henry Asquith
Aix-la-Chapelle
Ironian
King Edward VIII
Sir Bolton Eyles-Monseil
Ivestia
Newsletter
The Newstatesman
News Chronicle
Owen D. Young
Windsor
Lord Winterton
Notre Dame
St. John
Treaty of St. Germain
Sir Alexander Cadogan
Davies Plan

達農
達拉第
雷諾
榮譽號
漢倫
漢尼根
漢特通
福照
福俾斯
福爾罕姆
瑪林
維克斯基
維也納和約
維斯格里河
維勒·白里敦諾
蒙哥馬利
蒲立德
蓋斯脫
赫斯
赫爾
赫里歐
齊亞諾
墨索里尼
德森
德勒斯登
德賴凱舍
德賴克斯
德黑爾會議
莫尼黑
莫尼黑新聞

Lord D'Abernon
Edouard Daladier
Paul Reynaud
+ 畫
Renown
Hennein
Hanneken
Sir Neville Henderson
Ferdinand Foch
Sir Charles Forbes
Fullham
Louis Marin
H. A. Y. Vyshtinsky
Treaty of Vienna
Vesgre
Vallers-Bretonneaux
Sir Bernard Law Montgomery
William C. Bullitt
Captain Guest
Rudolph Heess
Cordell Hull
Edouard Herriot
Count Ciano
+ 畫
Benito Mussolini
Tesehen
Dresden
Delcasse
Drax
Teheran Conference
Munich
Muenchener Zeitung

邱吉爾第二次大戰回憶錄

曼尼黑和其後

- 曼里遜
- 摩洛哥
- 博德晚報
- 潘斯
- 魯易
- 魯爾
- 魯登道夫
- 歐文
- 歐戰後篇

- 穆里穆斯
- 撲恩克萊
- 撲茨萊斯
- 穆庇斯大廈
- 穆爾·勃拉巴桑
- 奧登堡
- 奧爾遜
- 賴本諾
- 賴伐爾
- 賴達克
- 霍榮
- 霍爾
- 霍布南
- 霍克爾
- 霍斯頓諾
- 施爾溫
- 施坦斯哈茲

- 穆勒
- 南洛維
- 魯西爾

十六畫

- 薛脫林
- 薩魯
- 薩爾
- 薩維爾
- 薩拉其武
- 薩爾斯堡
- 薩里士伯里
- 薩爾布魯根
- 謝斐爾特
- 賽東·巴亞茲
- 韓斯泰格爾

- Munich and After
- Herbert Morrison
- Morocco
- Evening Standard
- Lord Perth
- Lord Lloyd
- Ruhr
- Erich von Ludendorff
- Lord Irwin
- Aftermath

- 七畫
- Mueller
- Syrov
- Lord Cecil

十六畫

- Sir Walter Citrine
- Albert Sarpant
- Sarr
- Sir Herbert Samuel
- Sarajewo
- Salzberg
-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
- Saarbruecken
- Lord Chalfeld
- Theydon Bois
- Hantfaengle

- Law
- Ernst Roehm
- Lord Rothian
- Arthur Rosenburg
- Lord Rothermere
- Locarno Pact
- George Lansbury
- Maxime Weygand

九畫

- Andrew Bonar Law
- Francois-Poncet
- Andrew Bonar Law
- Sally
- Sudeten
- Fulvio Suvich

十一畫

- Lawlash
- Landsberg
- Alfred von Tirpitz